A BIOGRAPHY OF SUN LIREN

李洪文◎著

孙立人全传

他是抗战时期
军级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

孙立人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有“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的美称。

团结出版社

孙立人全传
A BIOGRAPHY OF SUN LIREN
李洪文◎著
团结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孙立人全传

李洪文　著



團結出版社

目录

孙立人全传
第一章 土木报国，学霸是这样炼成的
1．青岛，少年立志驱列强
2．清华，篮球称雄东南亚
第二章 异国留学，去弗吉尼亚军校
1．留洋，适者生存要忍耐
2．报国，路漫漫兮而修远
3．参军，毅然加入税警团
第三章 入缅作战，取胜之路很迷茫
1．困局，三十八师的由来
2．大捷，一战成名仁安羌
第四章 转进印度，卧薪尝胆学勾践
1．撤兵，败军亦是可言勇
2．立足，整军经武蓝姆迦
第五章 铁血抗日，第二次入缅作战
1．劲旅，诞生中国驻印军
2．反攻，缅战枪声重打响
第六章 纵横驰骋，缅甸上空的蓝鹰
1．奇谋，刀光剑影妙争先
2．百战，穿插迂回神威显
第七章 胜利会师，北缅已尽归吾手
1．重镇，血雨腥风密支那
2．回国，班师齐唱凯歌还
第八章 落日夕阳，挥手萧萧班马鸣
1．东北，内战毁掉新一军
2．练兵，尽为他人作嫁衣
第九章 整饬被囚，遭遇人生“滑铁卢”
1．坦荡，问心无愧对天地
2．千古，十全九美在人间
参考书目

引言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位消灭日寇最多的抗战将领，曾经被西方军事学家誉为“东方隆美尔”。他就是新一军的军长——孙立人。

1900年12月8日，孙立人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山南，他的父亲孙熙泽是国内知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孙熙泽曾任青岛警察学堂总监、山东全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还曾经做过总统府咨议、北京中华大学校长。

月有云遮，花有风吹，孙立人寄人篱下的童年是在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度过的。有一次他在海边玩耍之时，曾经捡到过一颗漂亮的小石子，可是这枚石子，却被一个德国小孩的父亲野蛮地抢去，蛮横的德国人，不仅打了孙立人耳光，而且还辱骂了中国人。委屈和无奈，让童年的孙立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强盛，才能够让人民都活着有尊严。”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孙立人幼承庭训，他在孙熙泽的督导下，发奋立志、受教报国。在1913年冬，孙立人报考清华学校，在近千人的考生中，孙立人一举夺魁，名列千人榜的榜首。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1914年，孙立人入学清华大学，他听从父亲的建议，开始就读土木工程系。在读书期间，孙立人为实现报国必先强健体魄的目标，他组织校篮球队，并担任队长，他率领清华大学篮球队，曾获得过华北大学联赛冠军。1921年，他还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并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击败菲律宾队和日本队，孙立人和他的队友们，用“剽悍”的成绩，彻底颠覆了国人被列强视为“东亚病夫”的观念。

孙立人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便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他漂洋过海，到美国普渡大学，主修土木工程。在当时孙立人的思想中，也许这样认为，只有学好土木工程，才能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可是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五卅”大罢工，以及广

州英军向中国老百姓开枪、放炮，酿成了“沙基惨案”的暴行，还有段祺瑞政府假爱国、真卖国的严苛形势——孙立人以土木建国的“空中楼阁”开始崩塌，孙立人经过思考，他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当作自己人生新的理想，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南方西点”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并开始努力学习军事。

1928年，孙立人在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回国，一开始，他游走权门，力图一酬壮志，但孙立人的军事才能并不被当权者赏识，只能委委屈屈地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军训队长之职，可是锥处囊中，其锋必现，金玉殊铁，光岂可埋？

1930年，孙立人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他调入税警总团第二支队，任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孙立人曾经这样说过：所谓忍受，并不是被环境征服，而是抱定自己的志愿去忍受横逆之来侵。孙立人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任何恶劣环境，都不可征服他，孙立人却要将恶劣的环境、不利的因素，踩在脚下，将其当成台阶，并拾阶而上，以达更高的人生目标。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1937年，让孙立人一战成名的淞沪会战爆发了，他率领税警总团开赴前线。税警总团作战顽强，即使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亦奋勇作战，7次打退了利用橡皮艇强渡苏州河的精锐日军。

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财政部部长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在民国的军队建制中，其战力理应属于第三流，可是因为孙立人的缘故，这支在抗日战争初期，战力完全可以被忽视的部队，在孙立人带领下经过凤凰涅槃，浴血奋战，竟蜕变成为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抗日的顶尖力量。

由于敌众我寡，苏州河一线被日军突破，孙立人在战斗中，被日军榴霰弹炸成重伤，他全身中弹片13处，曾重伤昏迷3天。日军渡过苏州河后，他们在孙立人率部坚守过的阵地上立起一块石碑，上面大书：遇华军抵抗最激烈之处于此。

身受重伤，九死一生的孙立人还是顽强地站了起来，孙立人非凡的作战才能，

以及独特的练兵手段，得到了当权者的肯定；孙立人还根据国内军队的情况，加上美国军校的训练大纲，制定出一套独特的练兵方法，被称之为“孙氏操典”，该操点循序渐进，而且系统科学，不仅能快速取得练兵的实效，而且对提高单兵和部队的战斗能力也有极大的裨益。

当年，南昌行营曾举行过一次全军大比武射击比赛，孙立人派队参赛，他手下的将士，不仅拿下团体第一，而个人前十有七个竟是税警团的官兵。故此，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被打散后，即使暂时不能作战的伤兵，也都被参战的其他部队，当成香饽饽一样瓜分掉了。

孙立人不久之后，便被授权以税警总团的班底，组建新编第38师，这支部队隶属于第66军，38师建成后，成为民国时期最能打的部队之一。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后爆发。美国为了借助中国的力量，削弱和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军力，便开始利用滇缅公路，为国民党政府运送战备物资，侵华的日军为了切断滇缅公路这条为国民政府输血的“生命线”，1942年春，日军向驻守仰光的英印军发起合围，企图拿下仰光，堵住滇缅公路出口。

孙立人等部临危受命，组织远征军入缅作战，抗击日寇，守住滇缅公路，保证重庆政府这唯一一条获取国际战备物资的“生命线”的安全。

1942年4月，孙立人率新38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并以113团不满千人的兵力，击退7000名日军，解救7000名英军，并取得了轰动全球的仁安羌大捷。罗斯福授予孙立人“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将“帝国司令”勋章颁给了他，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该勋章的外籍将领。

美军王牌特种部队“麦支队”曾经在缅甸和新38师并肩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功卓著的麦支队被改编为美军第75步兵团，为了不忘孙立人部对他们的救命之恩，这支美军的王牌部队，他们至今仍佩戴着印有旧中国“青天白日”的军徽。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位名将对于一支军队来说，那就是不败的军魂。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的日军大举反攻。孙立人指

挥新38师，猛攻胡康河谷。这时，孙立人的主要对手就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代号“菊”兵团。

菊花为日本皇室标记，以“菊”为号的日军，无疑代表着日军最强的战力，这支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军队，在孙立人师以及盟军部队的联合攻击之下，日军王牌中的王牌——“菊”兵团，伤亡过半，溃不成军，狼狈逃窜。

“菊”兵团的官方信印亦被孙立人的手下官兵缴获，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唯一被缴获的日军甲种师团信印，如今，该信印被保存在中国台北，每逢“九三军人节”时，都会拿出来对公众进行大展。

日方在战后也承认，缅甸战役中共有9万余日本军人，在孙立人等部队的枪口下阵亡。孙立人在军队的官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他成了新编第一军的军长，该军在缅甸击败日军次数最多，也因此被赋予了“天下第一军”的称号。

1945年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后，中印缅战区总司令史迪威上将曾经这样说：“孙立人将军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中国将军。”

孙立人回国后，他在东北地区，曾经和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交过手；在解放金门的战斗中，他手下的军队，也曾让攻岛的解放军，没有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孙立人抗战有功，可是帮助蒋介石大搞独裁政治也有错。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行视事”重任“总统”后，孙立人接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之职，但孙立人性格桀骜，完全就是一个“刺头”，他虽然爱兵如子，但却对大搞权谋的蒋介石并不买账，有一次，他竟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大吼：“等共X再打来，你往哪里逃，你只能去跳太平洋！”

孙立人的才干，让蒋介石感到了深深的忌讳，1955年，蒋介石以孙立人“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X匪，密谋犯上”为借口，将其革职，接着对他实行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进行软禁。孙立人无辜被囚33年，直到1988年，才重新获得了自由。1990年，享年89岁的孙立人在台中寓所病逝。

2001年1月8日，“中华民国”“监察院”重新调查后，认为孙立人“兵变案”纯系遭诬陷。

孙立人将军的一生，正如李敖先生所说：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从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

孙立人将军的一生，是骁勇善战的一生，更是曲折坎坷的一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谁都做过错事，要知道，人为主观的评价必具偏颇，只有经过历史大浪的淘洗，才叫公正。

在宝岛的文坛，有“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 一说。孙立人经历传奇，确实有值得浓彩重书之处。正所谓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故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差万别。现在两岸还未统一，对孙立人将军下一个公正的结论，可能为时尚早，后人站在我们前人研究的肩膀上，他们会看得更远，也许在并不久远的将来，会给孙立人将军一个更契合的评价。

第一章　土木报国，学霸是这样炼成的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唐·戴叔伦

安徽自古就是穷地方，正因为资源的贫乏，故此这里的男人吃苦耐劳、坚韧实在而且从不被坚苦的环境所屈服。更有人以“徽骆驼”来形容安徽男人的诚信、持久和对事业的追求和努力。孙立人就出生在安徽省庐江县的金牛镇，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环境给了他皖地男人所能具备的所有优秀品质。

当华夏民族，饱受列强欺辱时，一些热血的青年，纷纷走上了报国之路，他们有的学医报国，有的选择了从军入伍，可是孙立人却不同，他选择考上清华大学的土木系，并期待着将来毕业后，能够将画在图纸上的线条图形变成真实可感的高楼大厦，可是理想往往是大西瓜，而现实偏偏却是黑芝麻。

孙立人清华毕业后，他留洋来到了美国普渡大学，继续对土木工程学进行深造，可是严苛的现实，让他意识到“土木”报国只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孙立人决定弃笔从戎，他要走军事救国之路，可是这条路走得通吗？

1．青岛，少年立志驱列强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唐·李白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侵占青岛，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强租青岛99年……1908年的青岛海滩上，一个名叫孙立人的小男孩，捡到了一块五彩的漂亮小石头，可是这块石头，却被一个德国孩子的父亲给野蛮地抢走了。

蛮横的德国人，还打了孙立人两个清脆的耳光，这让他第一次有了要发奋自立，驱逐列强的念头……

安徽省庐江县人杰地灵、文化殊胜，“庐江”两个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原文是“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但古水庐江，历经千年的更迭变迁，今日以无法见其湍急澎湃的形貌了，究其缘由，可用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的几句话解释：“郡县山川之古迹，朝代变更，陵谷推迁，盖已不可复识……”

庐江县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名人高士如星辰珠玉，在历史的天幕上，不时地发出了熠熠的光亮。自上古溯下，灿烂的文化如云缎蜀锦，炫致七彩，让世人感到啧啧的惊叹。



孙立人将军一家

春秋晚期，华夏铸剑鼻祖欧冶子曾在此铸剑；三国时期，此地出了纶巾羽扇，挥手间，樯橹灰飞湮灭的周瑜；再观近代，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最后宁死不屈的丁汝昌；还有坚持了长达103天，并取得中法镇海之役胜利的名将刘秉璋。

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全都出自庐江县。庐江县境内有一座金牛镇，该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又名安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赤壁之战”时，曹操攻打东吴曾在此屯兵建城，至今该镇西北尚存有魏晋时代古城墙的遗址。

距离该镇4里路，有一座金牛山，此山海拔108米，方圆1000余亩，金牛山海拔虽然不高，但却平地兀起，孤峰瑞秀，树木郁葱，名传遐迩——相传此山是金牛自地而出，裂土面世而得名，《太平寰宇记》金牛山《图经》云：“昔有金牛从此山出，奔江，人逐之……在山顶的石岩的平台上，至今尚留有金牛腾空而去，留下的殷然蹄印。”

金牛山上，不仅有一块2.4米高的曹军旗杆石巍峨竖立，这里还是庐江八景之一“金牛晚眺”的所在地。每当夕阳西下，晚霞灿金，登峰西眺，此山便会融于暮色的苍茫之中。

1900年，庐江县金牛镇的金牛山山南，有一片鳞次栉比的大宅，此宅堂号“亦德堂”。这座白墙黛瓦马头墙，八字大门冲南开，宅门外配石鼓、石狮各一对的徽派大宅，共有103间房屋，坐落在金牛山的山南，是庐江县富商孙炳炎建造，乡人多称其为“山南孙家”。

孙炳炎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其先祖曾定居皖南后迁于舒城，据光绪十一年（1885）《续修庐州府志》记载：“舒城孙氏，原出休宁县，迁舒城东乡三河镇南岸者，自贡生正仁始。其后子孙以科第起家，蔚为望族。”在清朝时，舒城共出进士13人，孙家就占了3人！因此，孙氏被称为书香门户、诗礼人家、文深海澜、祖荫繁茂。

孙家的始祖，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齐国有一大夫名叫田无宇（古人以地为姓，因为其祖封地在陈，故也称陈无宇），田无宇的后世子孙，曾经废除齐康公，并把其逐到东海海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氏代齐”事件。

田无宇有一长子名叫田书，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故又称孙书。孙书便是孙家的始祖。

如果提起孙书的名字，很多人都会不知道，孙书的儿子孙凭，也是寂寂无闻，可是孙凭的儿子，那就尽人皆知了，他就是“兵圣”——孙武。孙武著《孙子兵法》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和用间13篇。这13篇兵法被后世称为“兵学圣典”备受推崇，名显于世。

孙氏家族，一脉相衍，其名人辈出，比如孙武之后人孙膑，曾做《孙膑兵法》。随着战争的影响、时代的变迁、生活的需要，相传了几十代孙氏家族，辗转居于皖南后迁舒城三河镇，而孙正仁也就成了“迁舒始祖”。

孙正仁是清代的贡生。而孙正仁之子孙有荣却对经商有独到之处，他在三河镇以经营布匹起家，根据当地的县志记载，孙有荣曾经“积资百万，乃广置田产，岁收租息十五万九千余石……”孙氏有了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这才能广请名师，孙家子弟在私塾中捧经受教，孙家才得以成为书香之家，并名传乡里，阡陌有闻。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孙氏在三河镇的宅子被毁，迁舒六世孙孙炳炎这才领着一家人，定居到了距离三河镇18公里之外的金牛山的山南。孙炳炎在金牛山落地生根后，他凭借自己的人脉以及不菲的家资，经过几年苦心经营，便成为了金牛镇的巨富。

孙炳炎生三子：淙泽、熙泽、春泽。在孙炳炎的严格管束和督导之下，他的三个儿子都熟读四书五经，才名闻达，乡里敬仰。26岁的孙熙泽为光绪甲午科乡魁，光绪二十六年（1900），孙熙泽进京参加进士大考时，却意外地名落孙山。孙熙泽一身的才学，得不到施展，落魄回乡后，神情郁闷，其长兄孙淙泽为了让弟弟移情，便邀请他一起共同编纂《续修舒城县志》。

孙熙泽续修县志，造福舒城，为家乡出力，为家族显功，为自己扬名，这本无可厚非，有个事儿需要重点提一下，孙熙泽在21岁时，他和定远县两淮盐连通判方侯立的长女结婚了。

在清朝时，一般男孩子在十五六岁便已经结婚生子，更何况富甲一方的孙家公子。孙熙泽的婚事一直拖到21岁，可见孙炳炎望子成龙、早捷南宫心情之迫切。

方侯立对孙家来说，绝不是外人，他是孙熙泽的亲舅舅，而方氏就是孙熙泽的亲表妹。方氏性格温婉，上孝公婆，和睦妯娌，持家有道，绝对是宽以待人的典范，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总能在她的身上一一找到并发现。

1900年12月8日深夜，方氏为孙熙泽生了第二个儿子，小男婴哭声微弱，谁也没有想到，只有骨头没有肉，羸瘦的男婴就是后来的抗日名将——孙立人。

孙立人出生的时候，身体状况颇差，孙熙泽焚香祭告过先祖后，他抱起了包在襁褓中的二儿子。孙立人的身体轻飘飘，好似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也许是对生逢乱世不满，他一个劲地啼哭，而且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孙家为世家大族，家里骡马成群，富有良田，生活中并不缺营养品，可孙立人自出生后，直到5岁之前，他根本就不会走路。

1903年，孙立人的生母方氏因积劳成疾，溘然去世。孙熙泽这时，已经是三子

三女六个孩子的父亲，三子分别是孙同人、孙立人和孙衡人，3个女儿孙静人、孙作人和孙之人，为了照顾孩子，管好家庭，孙熙泽又续娶了方氏的堂妹为妻。

孙立人的继母身体也不是很好，在孙敬婉（孙立人堂妹）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记得孙立人的继母常来我家和我母亲打牌，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人很瘦小，却老穿着厚重的衣服，夏天都要穿棉裙，洗手是用滚水洗；冬天更是穿得圆滚滚的，常将我家的楼梯塞得满满的。

从孙立人继母的身体状况，可以推及孙立人生母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孙立人小时候身体孱弱，有可能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

关于孙立人名字的由来，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本源，孙熙泽饱读诗书，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吗？

孔子说："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凡事能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立人，在圣贤经典中就是站得住的意思。如何站得住，怎么站得住，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值得孙立人用自己的一生去寻找最佳的答案。

孙立人在继母的关心和照顾下，直到五岁时，才蹒跚地学会走路、娴静，沉默、体弱的男孩子孙立人，竟和他的属相——鼠，完全不合拍。

在2011年，位于北大西洋沿岸的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绍，该国为助力中国无锡举办的第27届亚洲国际集邮展览，曾经发行了一枚中国名人与十二生肖小全张，其中第一枚邮票是孙立人将军和鼠票。孙立人出生于1900年，农历为庚子年，生肖属鼠。

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的性格篇上，曾有这样的归纳和总结：属鼠人，脾气暴

躁，但聪明好学，反应迅速，对其他的人非常关心，属“鼠”的性格特点，决定了该属相的人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属鼠人能够克服重重的困难，并能临危不惧，直至最终达到目的。由于属鼠人的冷静和机警，他具有敏锐的直觉、远见和敏感。灾难只能使属鼠人智慧更加出众，因为该属相的人总是在忙着制订自己的应变计划。

接下来，有专家还对属鼠人处世的原则，以及性格缺陷方面，这样阐述：属鼠的人容易相处，工作努力，生活节俭，关心他的人大可不必为他的安全担忧，因为在做一件事儿之前，属鼠人早已想好退路，一旦发生不测，属鼠人会迅速而及时地退出来。自卫的本能在属鼠人的心中是占第一位的，他通常采用风险最小的方案。

如果属鼠人能克服贪心，那么，属鼠人生活的道路会很顺利。

其实这篇号称科学的性格总结，纵然放诸四海而皆准，但关于贪心的论述，根本就和孙立人的行事原则一点都不挨边。

在沈克勤先生编著的《孙立人传》中，曾经在“童年岁月”一章中，这样真实地写道：孙氏之孙，都以世代“忠义传家”为荣，并以“族无怨（违）法之男”为傲。孙立人也常在袍泽面前说：“我们孙氏家族的人，在历史上没有坏人！”

孙立人是一个视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不贪、不占，肯于散尽家财帮助他人的人。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自己的父亲就是教会他如何处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良好的家教，对于匡正和塑造一个少年的性格，绝对起着模范和圭臬的作用。良好的家教，就好像血液中的白细胞一样，已经蕴藏和活跃在受教者的身体内，对于一些有悖道德和教育观念的侵入，它就会像白细胞对付细菌一样，将其杀死和歼灭。

德莱赛在《嘉丽妹妹》中所说的：“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种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有东西比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

孙立人后来成为税警四团的团长后，他为了更好地带兵，将“义勇忠诚”的团训精神贯彻到全团的每一个人，他就请清华的教授应尚能作曲，请父亲孙熙泽作词，

编了一首铿锵有力、气壮山河的税警四团的团歌。

这首团歌的歌词这样写道：

吾团欲发扬，精神团结毋欺枉，矢志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方，不怕刀和枪，誓把敌人降，亲上死长，效命疆场，才算好儿郎。道德要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张，谁给我怕，百姓脂贵公家粮。步步自提防，骄纵与贪赃，长官榜样，军国规幸，时刻不能志。大任一身当，当仁于师亦不让，七尺何品昂，常将天职记心入。爱国国必强，爱民民自康，为民保障，为国栋梁，齐学勾践王。

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孙熙泽的正直之心，带来的都是孙立人的报国之情，孙熙泽的同仇敌忾，也让孙立人抗日的豪情越烧越旺。

孙熙泽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孙立人六岁的时候，他不惜聘金，请来了舒城的宿儒宋执中先生，让他成了孙家私塾的老师。

孙家的私塾，设在孙家采光最佳的一间上房中，屋内窗明几净，私塾正面的墙上，悬挂着先师孔子行教像，行教像的旁边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下联是：德参天地道贯古今。

室内正前方摆着先生用的书桌、靠背椅，书桌上放着笔墨纸砚等一干用具，除了长约1尺5寸，宽约2寸的榆木戒尺，书桌的上面还放着正面写着“出必告”三个字，反面写着“反必面”三个字的木板。

孙家的子弟在上课期间，短时间外出或上茅厕，就要把这块板子取来，把“出必告”一面放在自己座位桌上，回来后，把木板交给老师，说明原因，并将其放回原处。如果谁想耍滑头，趁着宋老夫子不注意时，偷偷地溜出去玩，老先生绝不客气，他定会举起戒尺“啪啪啪”打三下掌心，以示惩罚。

私塾教育讲究的是“天作君师，门罗将相”读书识字，为将来科举做准备，以期将来能够鱼跃龙门，闻达天下。宋老夫子绝对是贯彻“教不严，师之惰”的典范，他教孙立人等学童先识“方块字”，接着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和《千字文》，等这些都会读之后，他就开始手把手地教孙家的

子弟扶手润字、描红和临帖。

孙立人自小就表现出了非一般聪明的资质，宋老夫子教一遍课目后，孙立人不仅能够背诵，而且还能默写。对于孙立人这样睿智的弟子，宋老夫子也相当的满意，可是孙立人的弟弟孙衡人却很是让宋老夫子操心。

孙衡人年纪小，玩心甚重，有一次上课不注意听讲，惹得宋老夫子火起，他抡起戒尺，一尺下去，正砸中孙衡人的头皮，孙衡人的脑袋当时血流如注，孙熙泽得知消息后，急忙飞奔了过来，他看着三儿子脑袋上挂彩，不但没有责怪下手过重、惶恐不安的宋老夫子，反而抱着拳说："打得好，打得好，不打不成才，谢谢先生的严加管教！"

孙立人回忆起这段历史，曾这样说：我6岁入家塾，起居饮食，与先生在一起，都有一定的规矩。同时我的父亲，管教极严，在子女幼时，即加管束。常对我们说"坐有坐样，站有站样"，绝对不许随便，尤其不准子女说谎骂人。

严加管教不见得就能成才，但放纵恣肆却绝对不会成才。对私塾教育，很多现代的教育家都嗤之以鼻，认为死记硬背，不求甚解，是对教育的摧残，可是翻开民国历史上，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的教育史，哪个不是从私塾起步的？

学而优则仕，孙熙泽虽然经历过考场失意的打击，但他却未忘自己作为孙家男丁的责任，那就是通过仕途来光大门楣。孙熙泽虽然会试失利，但在1894年，即光绪的甲午科考中，他考中了乡魁，也就等于是取得了举人的功名。

孙熙泽曾被授为山东候补知县，济南、烟台地方审判厅丞，署理登州知府等职，孙熙泽成为知府后，他就把家眷接到了济南，由于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没落，世界列强入侵，大肆抢占清政府的地盘，割地赔款变成了常事，再加上各路军阀争权夺势，整个社会处在了非常的动荡时期，孙熙泽为了家属的安全，几经搬家，最后让孙立人等家眷住在青岛。

当时的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地。说起青岛被德国强行租借的经过，还得从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西南部被大刀会会员杀死的"巨野教案"讲起。

“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下令派德意志东亚舰队三艘战舰，直抵胶州湾，准备进行疯狂地报复。七百名德国海军士兵，举枪杀上岸来，可是令人脸红的是，驻守胶州湾的两千清军早在德国军舰抵达胶州湾的第二天，就不战而退，将胶州湾乖乖地让给了德军。

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期限为99年。

孙熙泽不相信大清朝有保护自己妻儿的能力，转而求助于德国人的庇护。唐朝的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个心酸的故事：一个永州人为规避官府的苛捐杂税，他宁可做风险度极高的捕蛇的工作。

捕蛇人在政府和毒蛇之间选择，他最后选择了毒蛇。孙熙泽作为清朝的执政官员，为了给妻儿寻求最大的安全保障，他在大清和德国殖民地中进行选择，他选中了后者。可见清朝政府如果不灭亡，绝对是一件没天理的事儿。

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这里不仅有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崂山、沆茫旖旎的大沽河、风景如画的海岸线，更有海参、鲍鱼和对虾等等的美味海产。孙立人初到青岛，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随后，他和弟弟衡人被父亲安排到了青岛教会学校德文高等小学读书。

德国教会办的高等小学，里面配有专门的德文老师，德国人如此安排，一是输出文化，展示德意志帝国的“伟大”成就；二是通过教育，可以消除殖民地人民对德国强占胶州湾为所带来的仇恨观念；三是借助教育，获得认同，为长期占据青岛打好基础。

不管德国当局如何通过教育对中国人示好，并努力淡化殖民色彩，中国人在德国殖民地青岛都是二等公民，一些德国的移民在当地颐指气使，横行霸道，而他们的子女，在学校中，更是高高在上，从来不把中国的同学放在眼里。

青岛的海滩长10多公里，宽有150米，这里的海沙洁白如银，干净如洗，不见一点泥渍，唯有西班牙的大加那利岛南部海滩才可以与之比肩。

青岛的海滩，是未满十岁的孙立人最喜欢玩耍的地方，这里的海滩，不仅可以洗澡、看风景、呼吸新鲜空气，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捡到好看的贝壳，以及红色的漂亮圆石头。

青岛是花岗岩地质，很多的花岗岩都是黄红色的原石，这些石子，经过海水常年的冲刷，被剥去了棱角，变得光泽鉴人，圆润可爱。很多当地的青岛人，捡到这种圆石头后，都喜欢将其携带回家，放到鱼缸中，或者陈列在水仙盆内。

有一个星期天，德文高等小学放假，孙立人一大早就来到了青岛的海滩，海滩上腥风习习，海洋中波翻浪涌，孙立人发现有几个居住在海边的德国小孩，尾随大人的身后，正在捡拾着被海浪冲上沙滩的贝壳。

孙立人来得比较早，故此还算幸运，他没费多大的力气，便捡到了五六片贝壳，可是离他不远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德国小孩，却没有他的收获丰盛。

孙立人在沙滩上，看到了一片德国小孩子不要的大牡蛎壳，这种大牡蛎壳颜色灰白，被人称为猫耳朵，是青岛海边最差的一种牡蛎壳，这种牡蛎壳有一种用途，养蛎人喜欢将其收集在一起，然后逐个打洞，再用绳子串一串，丢进海中，等待明年，那串沉在海底的蛎壳上，便会长出带肉的海蛎来。

孙立人捡那只难看的牡蛎壳，绝对不是想收藏，他是想看看，牡蛎壳的下面是不是藏着他想要的好东西，果然，又丑又大，浑身还散发着海腥气的牡蛎壳被掀到了一边，壳底下的沙滩上，真的有一个龙眼大小，圆溜溜的红色石头，这块红色的石头，经过海水的冲刷，晶莹圆润，在初升的晨曦之下，散发着红宝石一样的光亮。

青岛海滩，这种红色的圆石，除了漂亮，并不珍贵，大人对其不屑一顾，但对于孙立人这样的少年，却是最好的玩物。孙立人兴奋得尖叫一声，他将这块红色的圆石头捏在了手里，海滩上的德国小孩，一见自己错过了宝贝，他冲到孙立人面前，一伸手，说："把这块石头给我！"

孙立人将紧攥着石头的右手背到了身后，说："是我先发现的，凭什么给你？"

孙立人虽然身体消瘦，但个子却不低，超过了德国小孩半头，德国的小孩一见强索不成，他当即连哭再喊，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德国小孩的父亲冲了过来，问明了情况，他蛮横地挥舞胳膊，对着孙立人就是一记耳光，孙立人手中的红色石头，也被身高体壮的德国人给抢到了手里。

孙立人委屈地道：“你凭什么抢我的石头？”

德国人一脸的轻蔑，他用手一指偌大的青岛海滩，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德国人的！”

德国人耍完了野蛮后，领着他的孩子，扬长而去。海滩上，只留下了被一巴掌打蒙了，也被打明白了的孙立人。

孙立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时我虽然年纪小，就已经深深地感悟到中国太弱，中国人太受欺侮，我将来非争气不可……

孙立人当时在德国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读书，所接触的德国教会的校长，以及教他们德文的老师，虽然全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情，但对于学校的中国学生，还残存着一点可怜的客气，今日这一巴掌，算是彻底地揭掉了殖民者最后一张戴在脸上的伪善面具。

在青岛殖民地，中国人就是二等公民，他们跟殖民者德国人之间，根本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德国人打在孙立人脸上的一巴掌，终于将孙立人打醒，火辣辣的疼痛告诉他，想要公平，只有自己去争取，只有将殖民者赶出中国去！

2．清华，篮球称雄东南亚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清华作为国内的第一学府，想要到那里读书，势必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孙立人不发力则已，他略一发力，便在安庆报考的近千名学子中，列于榜首，考取了第一名。

孙立人来到清华读书，作为一个学生，除了好好读书，想要报国，恐怕是力有不逮，但孙立人却加入了清华大学的篮球队，后又升任队长，他率领这支篮球队，多次战胜国内的其他球队，并获得过华北大学联赛冠军。

最值得称道的是在1921年，孙立人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担任主力后卫，他和队友们，要在上海的赛场上，与日、菲、印、暹罗、马来、爪哇等各国强队进行交锋，孙立人和队友们凭借着主场之利，越战越勇，并在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击败菲律宾、日本队等强队，获得远东区篮球赛冠军，并让中国在国际大赛中，捧回了一尊沉甸甸的奖杯，世人称赞，溢美之词，如潮水般涌来。各大主流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

1923年，孙立人在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获得了美国普渡大学公费留学的机会。美国普渡大学是一所世界级的名校，孙立人学习的同时，他的眼界也为之大开，随着各国列强对中国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掠夺和殖民风潮，孙立人清醒地意识到，真正想要报国，只有弃文从武，孙立人随后申请去读弗吉尼亚军校，在弗吉尼亚军校，他又将面对怎么样的磨难？他能否在这座和西点军校齐名的军校中，学得一身治军报国的好本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经过风起云涌、艰苦卓绝的斗争，1912年2月12日，腐败的清王朝被迫退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顿告土崩瓦解、化为昨日尘烟。

1914年，孙熙泽举家迁居北京，他任中华大学副校长。这时，孙立人的哥哥孙同人已经进入北京大学读书，而孙立人一时间，没有合适的学校，他就在家开始自

学。

这时，发生了一件改变孙立人命运的事儿，那就是美国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并建立了一所有异于国内其他学校的学校——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最初名叫“留美预备学堂”，是用于被政府派送到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年而建立的预备学校。学校最初采用英语教学，毕业生在清华学堂读两年书后，直接留学美国，进入美国大学开始学习欧美的先进科学和技术。

清华学堂所设之地位于北平西北郊，距离当时的北平城约十多公里，毗邻颐和园和圆明园，安静不喧嚣的环境，确实非常适合读书和做学问。

梁实秋先生在他《清华八年》中，曾用隽永秀美的文字，记录下来了当时清华学堂的环境，将其引用，可以加深对孙立人读书的这座学堂的了解。

>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
>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

美国之所以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有两个原因，一是（引用美国国务卿的原话）庚款原本就索要过多。大清国的谈判代表梁诚本着“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国用，即纾一分之民力”，1907年，梁诚见到了罗斯福总统，他提出的退款要求，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同意。

二是美国人退款不退给清政府，而是用这笔退款建“留美预备学堂”。美国投资教育，看似冠冕堂皇，其实最初的本意是培养一批亲美学者，近而影响中国国民，为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做铺垫和打算。美国富有远见的战略目光，果然比其他列强

棋高一着，他们投资教育这步棋，在几十年后的孙立人身上显现出了实际的效果。

清华学堂由于是在退还庚子赔款下建立的学校，更是一所留美的预备学校，不归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委派，故此，校舍、师资和出路等方面，都比国内的学校好，孙熙泽得到消息后，便兴冲冲地告诉了立人和衡人两个孩子。

孙立人说："我和弟弟都要考这所学校！"

孙熙泽伸手摸着自己两个孩子的头顶，担心地说："只怕是不好考！"

清华学堂招生，是需要严格甄别、仔细选拔的，并按照地域不同，分片分区进行选招，孙立人和孙衡人想要读清华，必须回归安徽的安庆府，参加统一考试。

1914年，孙立人、孙衡人被父亲派人送回了安庆府，因为清华学堂是用庚子赔款筹办，故此，各省录取的名额也就不一样，比如四川省，当年赔给八国联军的款项多，故此，就被分配了十多个清华学堂的录取名额，而安徽当年赔给八国联军的款项少，录取的名额就相对较少，也就是说，安庆府一地参加考试的虽然有一千多名学生，但清华在安徽只有区区五个招生名额。

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果然，这一段时间孙家兄弟突击复习的英文、国文和数学的效果显著，孙立人过关斩将，一举夺魁，获得了正取第一名的好成绩，孙衡人也具实力，他考得了备取的第一名。

消息传到了北京，孙熙泽兴奋得也是连连搓手，他虽然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学，因知己不知彼，孙熙泽却从来也不知道他们竟然有如此超强的实力，孙立人的成绩，考取清华已经没有了悬念，但同时，身为中华大学校长的孙熙泽也有着深深的担心。一个学生的入学成绩，并不代表着他的毕业成绩，如果来到大学，不知道努力，只知道混日子，即使入学的成绩再好，毕业的时候，也会成为资质平平的一个人。

清华大学开学时，孙熙泽领着孙立人，并亲自将他给清华学堂的校长周贻春送了过去。周校长出身于徽商世家，1904年从上海圣约翰学院毕业后，自费留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并获硕士学位，1912年，曾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

担任英文秘书等职。

孙熙泽和周贻春供职京城的教育界，彼此都是熟人，孙熙泽为了让孙立人戒骄戒躁，他对周校长说："请你把我这个孩子就当你的小孩子，有什么事情就打，打死了我都不心疼。"周校长说："你放心，我绝不会对他客气。"

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该学堂的名字，由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题写。周校长接手后，为了清华以后的发展，便开始着手于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建设。扩建后总建筑面积达4560平方米，并开始由清华学堂，稳步向清华大学过渡。

清华学堂当时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孙立人等新生刚入校，便属于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他读完了中等科，接着再读高等科两年，毕业后全都送美国留学，高、中两科的食堂和教室是隔离的，采取分别教学的方式。

清华学堂的教学很是严格，根据孙立人先生的回忆，当时学堂为妥善安排学生的食、宿、游、息等课外活动，成立斋务处，设置了一个斋务主任，斋务主任名叫陈筱田，因其身宽体胖，大家送他一个绰号：陈胖子，陈胖子说话不拖泥带水，管理学生不留情面，新生入学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学生手中的钱收上来，然后登记造册，学生如有正当的花销，可以到陈胖子处支取，如果学生私自留钱乱花，那就要被罚禁闭思过，思过不仅要被牌示，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等于恶贯满盈，学校将实行最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开除！

对于如此严格管理学生的陈主任，不管是孙立人还是其他的学生，都是毕恭毕敬，尊重有加。

清华学堂的学生在学校需要用钱的地方并不多，伙食一开始免费，后来每月的伙食收六元半，洗衣服每月二元，当然这些钱在开学时，学生必须一次性缴清，理发每次一角，有的同学为了省钱，就自备工具，不"麻烦"学校那个技术很水的理发师了。

梁实秋先生也是孙立人清华大学的校友，两个人都是在1923年毕业，他们的关

系也一直非常好。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孙立人义愤填膺，他这些年，不仅看到了太多的世界列强欲亡我中华的野心，他在青岛的海滨，被德国殖民者在脸上狠狠地打过的耳光，至今仍痛在他的心里。孙立人与同学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在体育馆门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并宣誓：“口血未乾，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张……”

孙立人和梁实秋两个人曾经并肩上街游行，抵制“二十一条”，并露宿天安门两昼夜，反对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以及卖国的徐世昌政府。

孙立人为了讽刺这些道貌岸然的军阀，他还在清华的内部《癸亥级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守财虏》的短文。

> 江北某翁，善贾，积赀累巨万，然啬甚。有向之假借者，必摇首不肯。问何故？曰：“吾将贻子孙。”
>
> 江南某翁，亦善贾，亦积赀累巨万，然慷慨好施。有乞助于翁者，给之无吝色。
>
> 江北某翁，闻而访之，问其何故不为子孙计。
>
> 江南某翁曰：“汝休问我，我且问汝。汝有父乎？”曰：“有。”“汝有祖、曾祖、高祖乎？”曰：“有。”
>
> “汝父为谁？”曰：“为某某。”“汝祖为谁？”曰：“为某某。”“汝之曾祖为谁”曰：“为某某。”“汝之高祖为谁？”江北某翁，瞠目不能对。
>
> 江南某翁笑曰：“汝之子孙之忘尔也，亦犹尔之忘尔高祖也。”
>
> 江北某翁，垂头丧气而返。

这段短文的意思是，某个吝啬的富翁，想给子孙留下一大笔钱财，但他没有想到，真正留给子孙的，应该是乐善好施的好名声，钱财即使能够继承，恐亦三世而斩。他这篇短文，暗中讽刺了那些军阀，抛名声于不顾，即将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

清华学堂的学子们历来有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传统，但除了向反动政府抗争

之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中度过，清华学堂的学习环境，绝对优于一般的学校，孙立人的同届同学梁实秋，曾经写有一篇关于清华学校读书和生活的散文：

>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服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可以想见，清华学堂的观念是超前的，他们在学生毕业留洋前，已经在学校里在做好了预热的准备，并安排同学熟悉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出国后，不至于手忙脚乱，为他们迅速融入到国外大学的生活，做好了应有的铺垫和预备。
>
> 清华学堂的课分上午课和下午课两种，上午的课有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等一律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讲授国文、历史、地理、修身、中国文学史等等，用国语讲授，当然教科书也是中国的。上午的课是为了学生出国做准备，而下午的课却是让学生们不能忘记作为一个国人的根本。
>
> 清华学堂在注重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体育的锻炼，每日的上午有15分钟的柔软操。下午4时至5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这时候教室寝室全都锁头看门，学生们必须到外面去锻炼。

孙立人入清华学堂读书，他的身体并不很康健，8年的读书时光，需要在清华学堂中度过，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恐怕书没读完，身体先累垮了。

清华学堂建有体育场馆，也为低年级的同学建了单杠、双杠和跷跷板等体育设备，有一次孙立人在和同学玩跷跷板的时候，正赶上上课铃响，那位压低跷跷板的同学急忙从板上跳下来，孙立人“咣”地一声，坐着跷跷板从高处蹲在了地上，结果他受了内伤——输尿管被摔断，只能接受手术，被迫休学一年。

身体羸弱，伤病就多，孙立人身体康复后，重新回到清华学习，孙立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 我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选上了足球校队，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足球，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清华的体育主任的观念比较老一点，在我四年级的时候，他退休，新来一个，叫做 Dr. Will，

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开始教篮球。当时我对篮球也有兴趣......他就选我，说我将来篮球的造诣会比足球高。

1914年，一个让孙立人在体育方面受用终生的人来到了清华执教，此人就是马约翰。

马约翰毕业于美国的圣约翰大学，他是国内著名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的学生，身份特殊，他们在清华学堂毕业之后，需要去美国留学，总不能清华学堂为美国的上一级名校，输送一群“病包子”吧？马约翰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体育方面也不要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孙立人在马约翰的影响下，刻意加大了体育锻炼的强度，很快他就在篮球队中崭露头角，随着他的身体越练越强壮，球技也越来越高，孙立人竟成了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关于清华的体育，梁实秋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清华对于运动素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

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惚，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运动可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清华大学的学风很浓郁，但想要学习好，除了师资、环境和自身的条件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项羽在《垓下歌》中，写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没有力气，自然就没有可以拔山的气势。如果换在大学，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就无法承担繁重的学习任务。

孙立人的身体越练越壮，个子也长到了1.85米，清华大学有五支球队，分别是足球、排球、棒球、手球和篮球，孙立人经过锻炼，逐步掌握了其中的运动技术，最后，竟分别担任了这五支球队的队长。当时，同学之间都不怎么称呼他的名字“立人”，而是称他为“站人”，意思是干什么事都能成功的人。如果称他为体育健将，相信绝对没有人会有异议。

在清华的五支球队中担任队长，可绝非易事，不仅要学习好、技术好，而且要事事表率，身先士卒，更要团结队员，让队员们心服口服才成。有一句名言，叫做“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很显然，孙立人在清华大学的体育队，就已经在不断地增强体质，实施他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远大计划了！

在当时的京津地区，有一支英军水手足球联队，这支球队的队员，因为都受过比较专业的足球训练，故此，整体水平颇高，又加之中国国内的足球尚未正式开展，英军水手足球联队和京津地区许多业余的足球对打比赛，几乎从无败绩，孙立人率领着清华大学足球队，与这支目空一切的英军球队比赛时，首场便先声夺人，大胜了对方一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可以说政府和民众，饱受国外列强的欺辱，孙立人率领清华的足球队，能够战胜最为骄悍的英国球队，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国人扬眉吐气的事儿，虽然两支球队又经过多次比赛，互有胜负，但孙立人率队战胜英国球队的消息传出去后，这两支球队再比赛，竟有许多球迷不惜从保定等地花钱买车票，也要坐长途车到比赛现场为孙立人站脚助威。此时，胜负都已经不重要，在国弱民贫的时代，只要孙立人率领着球队，能和英军水手足球联队并肩站在赛场上，就已经是了不得的胜利了。

时过境迁，孙立人率队和英国水手足球队如何征战的报道与历史文献，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孙立人以一己之力、一队之力，面对强队，展开挑战的无畏精神，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孙立人虽然在清华的五支球队中任队长，但他独领着清华的篮球队走得最远，取得的成绩也是最大。篮球运动起源于1891年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是由体育教师詹姆士·奈史密斯发明。直到1896年，篮球运动才正式传入中国。

说句公道话，篮球运动是一项非常适合美国人身高的运动，而相对于身材普遍矮小的亚洲人，这项运动先天就有不足的地方。但孙立人却并不迷信亚洲人玩篮球不成的观念，为弥补清华队身高等条件的不足，他和球队的队员们，苦练传球、运球和投篮等技术，用娴熟的技术，弥补身高上的缺憾。

1919年，孙立人已经20岁了。在民国时代，安徽老家庐江县金牛镇，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便已经开始娶妻生子了。孙立人的父亲孙熙泽抱孙心切，他已经为孙立人物色了一位妻子，她就是龚夕涛（又名毓兰）。

在明末清初的江左诗坛，向有“三大家”之说。这“江左三大家”，指的是吴梅村、钱谦益和龚鼎孳。而龚夕涛就是龚鼎孳的后人，合肥举人龚彦师之女。

而孙立人的曾祖父孙观，曾经做过晚清时期的直隶布政使，也同是淮系集团的重要人物。所以，孙家和龚家，算得上是世交。龚夕涛先后就读于济南、天津女中，是个知书懂礼的新时代的女性。

孙立人和龚夕涛在父亲孙熙泽和龚夕涛的异母长兄龚积柄的包办下，互换了庚帖，孙立人在读书的间隙，回到金牛镇和18岁的龚夕涛拜堂成亲了。孙立人接下来去清华大学读书，而龚夕涛代替丈夫，在金牛镇为夫尽孝。

两个人虽然聚少离多，但龚夕涛从不埋怨、更不抱憾，不管是敬重公婆，善待妯娌，都表现出了一个大家闺秀应有的风范。

孙立人结婚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因为篮球的技术突出，1920年升任队长，

他率领这支球队，曾经击败过当时称霸京津篮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院队，并一举获得了华北大学联赛的冠军。

1921年5月30日至6月4日，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参赛国有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暹罗、马来西亚和爪哇。比赛项目共有8个，分别是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网球、棒球、拳击等项目。

远东运动会，原名为“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20世纪由中国、菲律宾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发起的一个地区性的国际比赛。后来，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也纷纷参加，“远东运动会”可以看做是后来“亚运会”前身，并在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

民国时期，中国的篮球运动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其中水平较高的有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开大学等球队。为了组建一支能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球队，先由地方队逐渐淘汰选拔，经过比赛再选拔出各大区代表队，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竞相角逐，华北地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队脱颖而出，该队战胜了华中、华南、华东其他三区的代表队，最后取得了代表国家对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的资格。

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是王石卿，而孙立人因为意志顽强，防守得力，球技高超，技术出色，被特选到国家篮球队，成为了主力后卫。当时这支球队队员的平均身高为1.82米，而孙立人身高1.85米，在球队中亦属于身高偏上的队员。

根据当年参加这支球队的主力队员王耀东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体育总会陕西分会主席）回忆：孙立人虽然外表如文静书生，话语也不多，但性格刚毅，很能鼓舞全队士气。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花园运动场举行。该运动会的名誉会长为张謇，会长为王正廷，副会长为张伯苓，总干事为美国人葛雷博士。推定王正廷为委办长、郝伯阳为委办，此届大会除东亚各国及全国各省参加比赛外，欧美各国旅华人士均派选手参加比赛，可谓盛况空前。其中，日本派出大型代表团，领队、教练23

人和运动员90人；菲律宾亦派出139人的代表团。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人数是140人。

孙立人知道，中国篮球队想要夺冠，必须要越过两个障碍，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菲律宾。中国篮球代表队首先迎战的是菲律宾篮球队。

菲律宾虽然国家力量并不强盛，但由于篮球传入比中国早，故此，基础和技术比中国的球队要雄厚，而且教练还是球技高超的美国人，从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开始，菲律宾篮球队就取得了冠军，到现在第五届，他们已经连着斩获了前四届的冠军。

再看中国参赛的这支篮球队，队员皆为临时拼凑，参赛的费用也是靠募捐得来的。孙立人等人在参赛之前，为了统一着装，他们一人分得了一双布鞋，一件背心还有一条短裤。

5月30日比赛的当天，天降暴雨，孙立人等球队队员因为没有球鞋，他们只有找来绳子，将鞋子牢牢地捆在脚上，条件之艰苦，设备之简陋，真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可是孙立人球队的队员，想要战胜菲律宾队的信心，却没有因为客观条件的不足而丝毫有减。

菲律宾球队比赛经验丰富，面对暴雨，他们提出将比赛改期的申请，远东运动会的领导经过研究，最后同意了菲律宾的申请，并将比赛的时间，定于5月31日的上午。

一场暴雨过后，第二天的篮球比赛，继续在北洋政府徐世昌大总统斥资4800大洋整修的新运动场进行，赛场上空气都透着紧张，孙立人等球员组成的中国队，开始正式和菲律宾球队对决。如果从整体球技和实力方面来看，中国队比菲律宾队稍弱，但中国队在上海比赛，属于主场，有上千名观众和球迷鼓掌加油，士气始终高昂，再加上孙立人等篮球队的队员们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将四连冠菲律宾队拉下马，故此，球赛一开场，双方便陷入了白热化的对攻状态。

孙立人等人绝对是大学生中的高才生，他们实力比不过菲律宾队，但他们的脑

子却比那些孔武有力的菲律宾队员灵活好使，菲律宾队中线防守坚实，他们就打两翼；菲律宾队员的技术好，孙立人等队员就跟他们拼速度；菲律宾队员的投球准，他们就和他们抢篮板球；这场比赛的上半场，菲律宾队以17球对15球暂时领先，后半场，两支球队的比分咬得很紧，在球赛结束的半分钟，中国队连得两分，终于以30：27战胜了菲律宾队。

孙立人当时兴奋得和队友们抱在了一起，他们跳着、喊着欢庆战胜菲律宾队的胜利。赛场上观战的球迷和观众，也是欢声一片，场上场下，仿佛陷入了一片兴奋的海洋。

中国队战胜菲律宾队，只能说将夺冠赛的最大的障碍扫除，要知道日本队虽然实力不如菲律宾队，但也是中国队夺冠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量级的对手。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经过一场交战后，全军覆没！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当时的民众，普遍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双方球队开战后，支持中国队的观众和球迷甚至比上一场的人数还要多。

新运动场四周有十多级木质看台，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但当时国内民众还是比较苦，根据当时一张留下的老票根——一张学生票是大洋贰角，估计一张成人票在半块大洋左右，这半块大洋，也有很多人花不起。

有报社为了让那些围在场外，买不起票的观众随时得到比赛的最新消息，他们就在场内搭了一个高高的木架，有专人站在上面，手持话筒，随时报告场内比赛的消息，这种最为“原始”的实况转播虽然有些粗糙，但也能小小满足一下那些民众关心赛事的初心了！

一场苦战，孙立人等人果然不孚众望，终于中国队以32：28的比分战胜日本队，从而获得了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

要知道，在1949年以前，一共举办了十届远东运动会，菲律宾队一共九次赢得冠军，孙立人和他的队友们能够虎口夺食，取得这块沉甸甸的冠军奖牌，委实是不容易。中国的篮球史册，也必将给孙立人等运动员记录辉煌的一笔！

当时上海《申报》有这样的报道：主力后卫孙立人打满全场，行动灵活、飞驰跳跃，赢得“飞将军”雅号。

中国篮球队取得了冠军之后，场上的球迷立刻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欢呼——中国队赢了。当时国内有不少家报刊，都对中国篮球队夺冠予以了溢美的报道，并称：此次夺冠，等于将“东亚病夫”的帽子丢进了太平洋！



1921年，孙立人参加的篮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打败日本队和菲律宾队。

第二章　异国留学，去弗吉尼亚军校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李白《侠客行》

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是世界著名高等学府，主校区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孙立人在普渡大学主修土木工程。可是孙立人入学不久，国内第二次直奉战争就爆发了，千疮百孔的民国，重又面临着分崩离析，饱经磨难的国民，再次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普渡大学真的是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这时候的孙立人，总是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自己学习的土木专业，真的能改变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吗？如果想要国家安定富强，如果想让国人挺直腰杆站起来，只有将那些荼毒中国的列强统统赶走；将那些只知道为一己之私，而不惜使国家陷入混战的军阀统统消灭，才能使他的土木工程所学有一个和平的施展和建设空间。



孙立人留学于普渡大学时在图书馆前的留影。

1925年孙立人在普渡大学毕业后，他毅然考入被称为“南方西点”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开始了军事学习。1928年，孙立人在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可是性格耿直的他，并不会钻营，无法讨得当权者的欢心，他只能委委屈屈的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军训队长之职，纵有才华，也是无处施展，纵有理想，也是无法实现。

直到1937年，淞沪会战大爆发，孙立人率领税警总团开赴前线，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孙立人如何展露自己的军事天才？他如何领着税警团连连打退敌人的进攻？他全身中弹片13处，又是如何死里逃生？……

1．留洋，适者生存要忍耐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魏·曹植《赠白马王彪》

出国留洋，一直是很多年轻学子不断追求的梦想，可是留学国外究竟有没有用，社会上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学子精英，出国之后，学成不归，报效他国，楚才晋用，这种留洋，基本等同于养了一匹白眼狼。

而另一种观点是学子们胸怀国家，学得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慕高官厚禄，不为优厚待遇所羁，一心归来，报效祖国，这样的留洋，才是真正的留洋，无疑，孙立人就属于后者。

1923年，孙立人在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并顺利地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孙立人在赴美留学之前，孙熙泽送给他一块端砚，并在砚台盒上，刻上了这样一段话，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诫孙立人：一个有志之士，必须宏大刚强，因为他担负的责任很重并且达成目标之路很远。把仁义当作自己的担负，还不算重吗？担子必须一直承担下去，到死才可以放下，还不算远吗？

这段话最重要的主旨是"以仁为己任"。孙熙泽的意思就是，要孙立人把仁义道德当做自己一辈子的责任和追求目标。而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统统不值一谈。

同年8月17日，孙立人带着父亲的嘱托，乘美国"杰克逊"（Jackson）号邮轮赴美，同船者有吴文藻、梁实秋、冰心等一批青年才俊，可是孙立人和冰心在邮船上却不认识，两个人熟悉，却只能等到1942年，孙立人在抗日战场上扬名以后了。

这艘邮船，从上海黄浦码头到美国西雅图港，大约要走半个多月的时间，因为船上有众多的同学，大家可以在一起谈理想、谈未来、谈人生，故此，孙立人的赴美之旅倒也不寂寞。

有哲人如此说：旅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段人生的浓缩，人生其实就是一段漫长的旅行，带着知识上路，为的是带回更多的知识。半个多月之后，孙立人等人就来

到了美国普渡大学。普渡大学是世界著名高等学府，该校的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尤以理工科和农学见长，普渡不仅拥有全球顶尖的工程学院，与麻省理工、斯坦福、加州理工等校一同常年包揽着美国工科的十强榜。著名的金门大桥和胡佛水坝均出自其土木系师生之手。更为剽悍的是普渡大学还造就过13位诺贝尔奖得主。

孙立人因为在清华的时候，已经打好了工程学的基础，故此，他来到普渡大学，直接就读三年级，并加修土木工程学。

大学的生涯永远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可是孙立人在普渡大学的两年学习时光，过得绝不平静，国内的消息还是通过美国的报纸、同学的家信，不断地传到了孙立人的耳朵里，1923年，四川水灾引发大饥荒，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

1924年直系大战爆发，几十万的军队，在多个省份，展开了鏖兵，一时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1925年5月30日，日、英两国的资本家和军警，杀害我国人，引发了“五卅运动”，这些负面的、血腥的、带有枪炮声的坏消息，让孙立人真的在课堂上坐不住了。

孙立人当年在青岛的时候，曾被德国人打了一记耳光，就在那时候，他就有扛枪参军，驱除列强的想法，可是此愿望一直被两个硬性的条件所阻碍着，一是他父亲不同意。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孙熙泽怎么会同意一个仕家子弟从军入伍？

二是孙立人身体状况不佳，用一句谁都听明白的话来说，你想上阵杀敌，至少也得身强体壮吧？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孙立人投笔从戎的夙愿，一直空悬，至今都无法实现。

如今，孙立人通过清华大学一系列的体育锻炼，已经身高体壮，勇敢坚强，他自身的条件，已经远超一个合格的士兵所需要的门槛。还有一点，他身在美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熙泽鞭长莫及，孙立人已经是个成年人，他在大洋彼岸应该

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了。

1925年8月，孙立人在普渡大学取得了土木工程的学士学位。孙立人手拿学位证书，心中暗道：有了它，终于可以向望子成龙的父亲有一个交代了。

孙立人将自己寒窗苦读、奋斗了十多年，才取得的证书藏到藤编衣箱的箱子底，然后直奔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他向大使馆提出了一份申请，那就是官费就读弗吉尼亚军校。

其实当时孙立人的条件，已经无法读弗吉尼亚军校了，因为该学校对提出申请的学生有两个硬性的要求，第一年龄必须在16—22岁，而且还要未婚。

孙立人在1925年，他已经26岁了，而且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结婚，好在当时学校的审查不严，孙立人为了读军校，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虚报年龄，隐瞒婚史，孙立人做出的这两个决定，是建立在报国的基础上，所以虽小有微瑕，但绝对是与大节无亏。

孙立人提出的这份申请，绝对令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有一种无法理解的感觉。要知道，十几年的铁砚磨穿，寒毡坐破，苦读名校，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取得一份好工作，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社会上扬眉吐气吗？

弗吉尼亚军校是一所非常严格的军校，铁一般的纪律、艰苦的训练暂且放在一旁不说，即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也只不过是一介赳赳武夫，孙立人从普渡大学毕业，然后申请去读弗吉尼亚军校，这已经有悖“常理”，有道是人往“高处”走，可是孙立人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却偏偏只往“低处”行！

申请官读弗吉尼亚军校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儿，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不仅要仔细核查孙立人递上来的资料的真实性，而且开会研究、批准落实也有一个过程。

孙立人不知道自己能否去读军校，他决定骑马找马，首先找一份工作。孙立人虽然家境优越，即使不工作，靠着父亲每月给他邮寄的生活费，他也可以在美国舒舒服服地生活，但天性自立的孙立人，还是在美国一家桥梁工程公司，找到了一份见习工程师的工作。普渡大学的土木工程的学士文凭含金量颇高，从该校毕业的学

生，绝对是建筑公司的“抢手货”和“香饽饽”。

孙立人靠着一个月将近两百美元的工资，不仅买了汽车，而且在异国他乡生活得优哉游哉。这种天堂般的生活，正是很多留学生日思夜盼的，但孙立人接到中国大使馆同意他官读弗吉尼亚军校的通知，立刻喜出望外地辞了工作，卖了汽车，并拿着简单的行李直奔弗吉尼亚军校报到。

孙立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申请弗吉尼亚军校如此顺利，是因为遇到了一个贵人——施肇基大使，施大使1877年4月10日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他也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国的大使，他在国内任吉林交涉使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伊藤博文遇刺案。

施肇基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如果按照正常的官读留学程序来说，孙立人已经念完普渡大学，他就没有资格再去官读弗吉尼亚军校了。因为孙立人去了弗吉尼亚军校，就等于国内必然有一个学子失去官读军校的机会。

但施肇基以他超一流发现人才的眼光，还是从孙立人递上来的简历看出，他绝对是个可堪造就的将才，施肇基便批准了孙立人官读弗吉尼亚军校的申请。

美国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是一所美国老牌的陆军军校，1839年11月11日创校于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市，在美国的陆军军校中，有南北两强；北是位于纽约州的西点军校，南即是弗吉尼亚军校。

一开始的时候，西点军校和弗吉尼亚军校齐名，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因为战败的缘故，故此，西点军校的名声才渐渐超过了弗吉尼亚军校。

弗吉尼亚军校不仅有近百年的传统，也有深厚的军事教学积累，著名的巴顿将军，就曾经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过。1901年马歇尔将军也曾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

弗吉尼亚军校（简称VMI）是一座四层土色城堡式建筑。它是美国第一所州办军事学院，1839年第一次招生时，只有23名新生入学，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具有军地双重性，因此学员不仅要修完技术课程，还必须完成军事课程的学习和训练。

该学院不刻意要求学生加入军队，他们在学院毕业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发展，但如果国家遇到危难，学员应该投身军旅，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马歇尔将军后来称赞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不但给了我与人相处的日常行动准则，而且还给了我一种军事遗产——荣誉与自我牺牲精神。

孙立人因为普渡大学的学士学位，故此，他来到弗吉尼亚军校不用从一年级读起，可以直接进入到三年级开始学习文史，但不论孙立人从几年级读起，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都是一名新生。他以一个新生的身份，很快就见识到了老生的厉害！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管理体系和一般的学院不同，1842年，该校的一名教授被枪杀在学校的草坪之上，可是却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凶手，该学校的校董会经过研究，做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决定——下放权力，让学生们自己管理自己。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生自管包括了三个方面：1．成立学生团；2．成立一般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由学生推选，负责维持学校的纪律，以及遇事和校方进行交涉；3．成立荣誉法庭，对偷盗和说谎的同学进行判决。

如果从学校的各项规定上看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应该是一个管理严格，但却处处充满了人性和民主的地方。

但在孙立人的回忆录中，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用孙立人的话说：弗吉尼亚打得厉害，我说没有关系，我挨打挨惯了。弗吉尼亚军校那时打学生不当回事，非要有耐心才可以。一进去，无论是得了什么学位，就像从前的童养媳妇一样，我本来觉得自己不错，趾高气昂地一进大门，威风就没有了，整个空气形成一种传统，新生进去要做“老鼠”（新生被称为老鼠），旧生就像公公婆婆一样，有理无理一天给你三顿打，三天给你九顿骂，就是这样养成你绝对服从、绝对尽职，同时绝对诚实。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老生欢迎新生用的是拳脚，辱骂在这里变成了打招呼，但适者生存，想在这里毕业，必须学会忍耐！

孙立人这一学期入学的中国同学，有五六个之多，他在这里“混”成了老生之后，国内有个学弟绰号“黄天霸”，他也想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可是他听说该学院打人之风甚盛，而且非常不好毕业，写信给孙立人询问情况，孙立人便提

起笔来，一五一十地将该学院的规矩讲给了“黄天霸”。并在信中一再强调——你能不能忍受弗吉尼亚一切的“虐待”？

孙立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 黄天霸说他绝对能忍受，黄天霸的思想老早就有点“左倾”。后来他来了之后，会一点儿中国武术，个子不是很高；在美国学校里，个人要是活泼一点，就比较占便宜；要是古板一点，他就觉得你老是不高兴似的。我说“你要改变你的个性”，他说“我绝对能忍，绝对能忍”。结果，没过三天（黄天霸就挨打了），（他）忍不住了也回了一驳，这一驳，那不得了了，大家就闹起来了，说有一个中国学生反抗老生；这是弗吉尼亚历史上所没有的，大家过去就是一顿打（黄天霸）……又到医院，他找我哭说：“怎么办，我要把命送在这儿？我不能干了。”
>
> （黄天霸后来退学了）孙立人曾这样评价这件事：这就是一个人没有做到一个“忍”字；所谓“忍辱负重”，既然自己有大的志愿，就要有忍耐的能力去克服一切；没有“忍”字与毅力，绝对受不了折磨。

黄天霸事件，绝不是个例，中国当时有一个姓李的学员，曾经被打得发了羊癫疯，还有一位姓胡的奉军选送的学员，半年后，直接被打得受不了而跳楼了！据校方记载，从 1906年至今曾有77名中国学生在弗吉尼亚军校就读，其中毕业于该校的只有35名。不到一半的毕业率，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剩下的一多半，不是受不了学校的严格，中途退学，就是开小差逃跑了！

孙立人这样写道：在弗吉尼亚最好的，就是这个教育；我的脾气，原来也是火暴脾气，但是后来我为什么要给人家打，为什么要听人家的，我心里有数。我有好多同事、同学认为不需要这个，我觉得没有这个毅力，经不起挫折。尤其是青年学生，一经小挫折，就自杀或是灰心颓丧，这都不是办法；我们一个人有一个理想，要想达到理想，非得经过许多挫折，不然达不到理想的。

新生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一贯是被称为rats（大老鼠），相对于老鼠，老生自然就是猫。当时全校只有四五百名学生，新生约占四分之一，一百多名老鼠，面对三百多只猫，可以想见，这日子过得真的要多苦有多苦。

老生欺负新生，可以说是陋习，也可以说是歧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野蛮行为，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管你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新学生，全都是一样的待遇，故此，孙立人也只有咬牙忍耐了。因为孙立人明白，你想学到有用的军事知识，你想为国效力，你就得学会受“委屈”，学会“忍耐”，学会在其他地方学不会的“一切”。

老生用巴掌猛拍新生的胸口，这叫打“苏醒”运动，新生被逼着为老生洗衣服这是家常便饭，甚至老生还将燃烧的烟蒂硬塞到孙立人的脖子里，这些“折磨”，孙立人都承受了下来，两年的军校生活，不仅让他学来了专业的知识，而且还让他变得更坚强、更果断、更有信心了！

用孙立人的话讲，就是：

> 我在弗吉尼亚军校两年，在学科方面对于战史和战术作业最感兴趣……自认为最得意的，却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以及千奇百怪的苟虐，将我的性格磨炼了下来，后来在社会上做事，虽然曾遇到过种种挫折，但一想到在弗吉尼亚军校时的情形，就觉得我应当承受，而且也就觉得可以忍得下了，否则我这二尺五的军装，早已脱下不干了！

孙立人在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密支那对教导总队学生讲演》中，这样总结了弗吉尼亚军校两年的学习生活：

> 要知道，这并不是野蛮，这样锻炼，就是要锻炼你坚忍奋斗的意思，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接受一切艰难困苦……就是希望他训练出，成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应付一切艰难困苦的完人！



LI-JEN SUN, Anhwei, China

A.B. Liberal Arts

Born 1904. Matriculated 1925.
Infantry

Second Class—Pvt. Company "D," Company Basketba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arshal Final Ball. **First Class**—Pvt. Company "D," Company Basketba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ociation, Marshal Final German.

Like the pioneers of old, this son of the Orient succumbed to his thirst for knowledge and crossed the great Pacific to follow the cours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western land of progress. He was one of those unusual species called a "Second Class Rat," but we soon found out that he knew a good deal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Entering V. M. I. as a graduate Civil Engineer from Purdue University, he embarked upon the seas of the Liberal Artists, to delve into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We soon found out, however, that his main goal was military training. He will return to the place from whence he came to become a commander in one of the several Chinese armies.

As to his character, he has many good qualities. He says little but he is kind and gentle, respectful to his superiors, and sincere and friendly to all. He is an excellent basketball player, and although he failed to make the varsity, he was a mainstay on his company team.

The making of a soldier is no bed of roses. Forced marches across hot sands and standing guard on a bitter cold night are not romantic dreams. Li has shouldered his responsibilities like a man and we do not doubt that he will make an excellent soldier. We only hope that he will not use his military knowledge to stir up any more revolutions in his native land.

He leaves behind him a host of friends who wish him continued success in his military career.

"Ah, that's all right."

孙立人于美国弗吉利亚军事学院毕业纪念册上的照片及评语。

第二年的时候，孙立人参加了学校举办的颁发戒指典礼，此典礼必须是大三的学生，学校给每个学生都会订制两枚戒指，一枚叫formal ring（礼仪戒指），另一枚是combat ring（战斗戒指），军校的很多的同学与孙立人平常戴的戒指是combat ring，除非正式场合，大家才会戴formal ring。

后来，在孙立人的戎装和生活照片上，人们总能看见他的右手无名指上，带有一枚宝石戒指，这就是弗吉尼亚军校发给他的毕业戒指，可见孙立人对军校的那段学习的生活，始终是念念不忘，铭记在心！

两年的军校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27年，孙立人终于以文学士在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在该军校的毕业纪念册上，印有一张孙立人穿西装、留背头的毕业照片，有校方为孙立人下的毕业评语：

这位东方青年，正如昔日的拓荒者，渴求知识，横渡太平洋，来到西方进步的国度里，追求高深教育，他在三年级新生中，禀赋优异，超越同侪。

关于他的性格，具有许多优良品质。他不多言，但仁慈温顺，尊敬长官，对人诚实友善。

要练成为一个军人，生活并不舒服，更非浪漫梦想，须在炎热沙漠中行军，在酷寒的夜间站岗守卫。孙立人有男儿志气，肯负一切责任。我们坚信他将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人……

清代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曾经这样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这句名言，不仅放在文学上管用，放在军事上也管用。孙立人在军校的所学所得，基本上是纸上谈兵，世界列强是如何将其军校的各种治军理念，变成真实有力的治军方法，需要孙立人满世界地去看一看。

孙立人手拿弗吉尼亚军校的毕业文凭，再一次来到了中华民国驻美的大使馆，并递上了他准备去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的申请，施肇基大使很快批准了孙立人的申请，随后，孙立人便开始了他的考察之路。

英、法和德国的军建设施、军事技术，以及练兵方法，确实让孙立人大开眼界，几个月后，孙立人又来到了（前）苏联的莫斯科，孙立人最后从莫斯科乘火车到大连，再从大连乘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再转车回到了安徽的家中。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孙立人从1923年出国留学，再到1927年学成归来，整整五年的时间，虽然间或有书信往来，但将近2000个日日夜夜他没有见到自己的双亲了，他回家的心情不仅急切也是急迫的，即使用“归心似箭”来形容孙立人，也一点都不为过了。

当孙立人坐车来到了金牛镇外，他看到金牛山的时候，只觉得双眼湿润，泪水差点流淌了出来！

2．报国，路漫漫兮而修远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拼爹本身并没有什么道德指向，毕竟父亲的金钱和势力，也是后辈拼搏入世的一种雄厚的社会资源。但在现实社会中，拼爹一词都是以贬义的面貌出现的。

孙立人不仅是个富二代，他家有良田千顷，而且是个官二代，他父亲孙熙泽做过总统府咨议、北京中华大学校长等省部级的高官。但孙立人根本不想拼爹，他要自己去闯一闯，他坚信，凭着自己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所学，他在军界闯出一条路来，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小事儿。

1927年，孙熙泽已经接近60岁，他退休在家，开始含饴弄孙了。看到留洋归来，学业有成，人又出落得风度翩翩的二子孙立人，孙熙泽的心里有喜有忧，真的是五味杂陈。

学而优则仕，如果换句通俗一点的话讲，封建社会的时候，皇帝上朝，尚且文东武西地站立，可见文的地位，自古就比武重要，如今孙立人左手拿着普渡大学的文凭，右手托着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文凭来见自己，这让孙熙泽说什么？他几乎无话可说了。

毕竟孙立人已经28岁，男儿三十而立，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选择的权利了。

孙立人回到金牛镇，孝敬父母、拜会亲友，和妻子龚夕涛团聚，一连多日，都是在忙碌和欢快的气氛中度过，等过了这段必要的应酬时间，孙立人和孙熙泽父子便有了一次听更对坐、秉烛深谈。

这次深谈的方向，是关于孙立人的前途以及未来的职业选择。孙熙泽本想用自己一生的政治和社会经验，对孙立人施加影响，他甚至预想借助一些官场故旧，袍泽同好之力，让孙立人的仕途走得更顺畅；他还想，假如孙立人实在不愿意走仕途，那么也可以拿着普渡大学的文凭，去做土木建筑工程师。这毕竟也是一件倍有

面子的工作！

可是一番谈话后，孙熙泽发现，他已经无法左右自己二儿子的思想了。

孙立人觉得现在社会动荡，军阀割据，黎民涂炭，正是他参军报国的好时候。

孙熙泽一见二儿子的主意已定，他的态度，随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的意思是，自己可以不反对二儿子投笔从戎，但孙立人却要拿着他写的举荐信，找熟人去从军入伍。

孙熙泽也是皖系的官员，段祺瑞虽已通电下野，可是余威尚在，只要孙熙泽给皖系军队里的熟人写一封举荐信，孙立人也能少奋斗五年，直接就可以带兵当官。可是孙立人却对父亲的关心婉言谢绝，他一有美国名校的毕业文凭，二有远超赳赳武夫的超强实力，有道是“黄金白壁风烟笑，快马轻裘觅王侯”，他就不信自己的从军之旅不是一条光明的大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民国时期的军队贪污成风，卖官鬻爵被视为家常便饭，而那些崇信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的腐败的军官们，对凭能力、靠本事准备在军队里干出一番事业的孙立人，采取的都是摒弃的态度，故此，孙立人的从军之路，一开始走的可谓困难重重！

1928年是农历戊辰年（龙年）中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过龙年，因为每到龙年，都会发生一些大灾大难，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大事。虽然关于龙年的谶语有些绝对，但从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发出第二次北伐的总攻令这一刻开始，注定戊辰这个龙年将被载入史册。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北洋军阀政府彻底被摧枯拉朽，张作霖率领奉军的残兵败将，退出了关外，1927年4月18日成立的南京政府，便成了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府。

而加入南京政府的革命军，也就成了当时有志青年的唯一理想。孙立人觉得新政府刚刚成立，军队也是万象更新，北上应该有大把的机会，所以，他辞别了父母和妻子，带着随身的行李和皮箱，直奔长沙而来。

孙立人直奔长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清华有一个同学陈崇武就住在那里。陈崇武在清华的时候，他和孙立人一样，都是清华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当时，孙立人打后卫，而陈崇武打前锋，两个人不仅是朋友关系，而且还是在篮球的战场上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也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只不过经历了北伐的战火洗礼，长沙城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今非昔比了。

孙立人来到长沙，他凭着记忆中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陈崇武，他和陈崇武已经多年未见，两个人一见面，自然少不了一阵亲热和唏嘘。孙立人之所以找陈崇武，是因为他有一个在国民革命军13军当军长的叔叔陈嘉佑。孙立人和陈崇武有同窗之谊，说话自然不用客气，他一说从军入伍，请陈崇武引荐的要求，陈崇武一拍胸脯说道："放心，13军正缺你这样的人才，我保证你会得到重用！"

第二天一早，陈崇武领着孙立人雇了一辆马车，两个人直奔30里外的13军军营而去。

长沙城外，尽多平畴旷野，萧索村庄，抬头远望，山上多荒草，水里无游鱼，地里的庄稼也是长得稀稀落落，没精打采。可见战争的破坏力，对黎民百姓生活的影响实在是极大，想要恢复鸡犬相闻、耕田劳作的景象，没有三年五年，恐怕难以办到。孙立人心情沉重地和陈崇武来到13军的军营。13军的军部设在一片荒村外的土地庙里，土地庙外，虽然有士兵训练，但人数不多，而且训练的热情也并不高涨。孙立人本想多了解一下13军的底细，可是却被陈崇武一路拉着，两个人来在土地庙中，见到了13军的军长陈嘉佑。

陈嘉佑圆脸大眼，挺直的鼻子下面，留着浓黑的八字胡，他祖籍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将领。陈嘉佑听完陈崇武的介绍，一把抓住了孙立人的手，兴奋地说："留学海外，学成后不忘报国，你这样的年轻人实在难得！"

孙立人谦虚地说道："陈军长，请您给我安排一个最艰苦的职位，哪怕是做一个最基本的士兵，我都会欣然接受！"

论文，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和普渡两所名校；论武，他又是弗吉尼亚军校的高才生，13军经过第二次北伐，不仅部队减员得厉害，高级指挥人才更是欠缺，陈嘉佑说道："你既然有志参军报国，那就到我的骑兵团任职吧！"

在民国的时候，因为缺乏汽车等机动化运输工具，故此骡马等落后的运载牲畜，在军队中一直充当着运送辎重的角色。虽然现代化的快枪和重炮都已经在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骑兵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觑，骑兵如果运用得力，不仅可以担任正面突击，而且还可以完成诸如迂回包围、追击、奔袭等任务。其行动轻捷，受地形、气象影响较小。故此，在民国的军队中，是属于"杀手锏"性质的重要兵种。

换句更通俗一点的话说，骑兵在民国军队中的作用要远超步兵，很显然，孙立人确实被陈嘉佑高看了一眼，并在13军中得到了重用。

中午的时候，陈嘉佑派副官请孙立人和陈崇武吃饭，吃罢午饭，陈崇武要坐车回长沙去上班，到骑兵营报道的事，他就不能陪着孙立人去了。

孙立人送走了陈崇武，陈嘉佑的副官领着他，就直奔十几里外的骑兵营而去。孙立人在读书的时候，对中国的古诗词非常感兴趣，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也曾多次被"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千骑奔腾、万马如云的气势所感，可是他来到骑兵团的驻地，却连一声"聿聿"的马嘶之声都没听到。

更让孙立人没有想到的是，13军的骑兵团的建制实在"庞大"，除了团长和副团长之外，还有两个传令兵，外加孙立人一共才五个人。更为搞笑的是，13军骑兵团，竟一匹马都没有，只有几个破旧不堪的坏马鞍。

13军骑兵团的团长尴尬地告诉孙立人，他们也想将骑兵团快速地组建起来，可是现在一没有马匹，二没有士兵，最让人头痛的就是没有军饷，看来组建骑兵团的事儿，只能徐徐图之了！

孙立人在骑兵团无所事事，几天之后，他请假返回长沙，找到了陈崇武。陈他

听孙立人讲完骑兵团的真实情况，不以为然地笑道："我的'站人'老兄，经过北伐战争，别说13军，哪个番号的国民军都是减员严重，一个个都是空架子，只剩下唬人的份了！……"

孙立人摇头说道："我从军入伍，不怕从'零'开始，但却不能忍受饱食终日和碌碌无为！"

陈崇武瞧着不甘心的孙立人，他出了一个主意，长沙有一个体育馆，那里可以让孙立人去打球、去散心，可是现在孙立人心不在"球"，而是在"军"，他就通过陈崇武，联系到了十多名清华大学的同学，大家工作之余，来到体育场，组成一个班，大家轮流当班长，孙立人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复习弗吉尼亚军校学来的国外操典，熟悉国内军队的操典，时间不等人，岁月易流逝，他不想在长沙骑兵团这样无限期地蹉跎下去。

三个月后，孙立人觉得他可以熟练掌握国内练兵的操典了，他就向陈嘉佑和陈崇武叔侄二人辞行，陈嘉佑虽然难舍孙立人这样的人才，但浅水难养蛟龙，为了孙立人的将来，他也只有抬手放行，并默默地祝愿他前程远大了。

陈崇武将孙立人送到了火车站，他不放心地问："立人，你准备去哪里？"

孙立人用手往北方一指说："南京，我觉得南京政府刚刚成立，那里应该有让我施展拳脚的大把机会！"

陈崇武送孙立人上了火车，看着坐在开动的火车内、踌躇满志的孙立人渐渐远去的身影，陈崇武心中不由得连问：孙立人孤身一人，他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只重权钱背景，不重视真才实学的南京军界，真的有出头的机会吗？

但孙立人和陈崇武的想法不同，他坐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耳边响的竟是陶渊明写一首古诗《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一个平凡人和不平凡的人所差的就是志向，而一个不平凡的人之所以不平凡，就是因为他百折不挠，并很好地坚持了自己的志向。

孙立人坐在火车上，直奔南京而来。南京古称金陵，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古语有云："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南京，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浩瀚的历史遗存。

孙立人来到南京，他一没有去钟山龙蟠的紫金山，二没有去波光粼粼的玄武湖。南京的风景、意境吸引不到他的注意。南京的名小吃鸭血汤、小笼包和南京蟹饼虽然可以诱惑他的味蕾，可是却无法蛊惑他的心智。

孙立人这次并没有着急去"投军"，而是先在南京城找了一家客栈小住了下来，他经过逐个打听国民革命军各路军的作风、战绩以及军官的人品，最后决定投奔方鼎英的部队。

方鼎英号伯雄，他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方鼎英军纪严明是促使孙立人投奔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方鼎英还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的背景。

孙立人觉得自己也曾在国外留学，大家都有"海归"的背景，自己去毛遂自荐，一定会得到重用。但是不巧的是，方鼎英当时并不在军营，接待他的一个参谋长却以"你是一个洋学生，将来必然会被国家重用，如果当兵牺牲了，实在可惜"的理由给挡了驾！

孙立人不怕牺牲，甚至不怕从学兵做起，当时，他真的想不明白，自己有学历、有体力、有能力，为何会被方鼎英手下的军官拒绝？

其实道理很简单，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良莠不齐，方鼎英是个好将领，不代表他手下的军官都爱才惜才。孙立人没拿举荐信，也没有"哗哗"响的大洋孝敬招兵的军官，人家不爱收；孙立人根本与参谋长这一类人不同，他们不愿收；孙立人的文凭太高，人家害怕收！换句敞亮话，文武全才的孙立人一旦来到部队，得到了方鼎英的赏识，接待他的参谋长恐怕就得哪凉快哪歇着去了！

孙立人的投军之路，没想到走得如此坎坷，当时孙立人刚刚走出校门，对国民革命军内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内斗认识不够，他并没有想到人家不招自己入伍，是因为自己太优秀的缘故，反而一个劲地在自身找原因，孙立人觉得一定是自己的

资历不够、学历尚差、经验不足，国民革命军的军队才不收留自己，两年弗吉尼亚军校的“魔鬼”式教育，教给了孙立人百折不挠、从不言败，不久之后，一个“曲线参军”的机会，终于让孙立人等来了。

1927年，蒋介石打着“亲爱精诚”的招牌，在南京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这座学校和黄埔军校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是为了国民党部队培养军事人才，而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是为了培养执政的国民党干部。一文一武，都很重要，但侧重点不同。蒋介石为了强化其领导，便担任了该党务学校的首任校长。

而实际管理学校的有教育长陈果夫、张道藩、程天放等蒋氏的亲信。党务学校有四五百名学生，他们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需要一定量的军事化训练，当时曾广棻（读“分”）任大队长，曾广棻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对军事化训练很有一套，可是让他一个人教育四百多名学员是不可能的，他急于找到几名精于军事操典的副手。

开始训练的时候，该学校的训导主任谷正纲相中了姚恺，但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军校的姚恺却觉得军校的职位太低，因为他如果回山西老家，至少可以在军队中直接干营长。

美国当时有四大军校，排在前面的两个即是国立的西点军校、州立的弗吉尼亚军校，而后面两个就是南卡罗莱纳军校、私立的诺维奇大学（诺维奇骑科学校），既然毕业于诺维奇军校的姚恺都被选中可以去干教官，孙立人觉得自己绝对可以胜任那个职务。

在姚恺的介绍下，孙立人认识了谷正纲，求贤若渴的谷正纲对能文能武的孙立人也非常欣赏，随后便让孙立人做了曾广棻的附和教官。孙立人在教学员们操典的同时，还附带着教他们一些桥梁学。

附和教官就是个无职无权的中尉，曾广棻对学员有什么操典的要求，而孙立人则要应声附和，领着学员们随后便做。教官就是老师，有道是教不严师之惰，孙立人在弗吉尼亚军校学的是西方的操典，他为尽快熟悉国内的操典，一边买书自学，

一边“现炒现卖”，过了七八个月，用孙立人的话讲：“才觉得具备了一点教练的能力，可以勉强到军中做一个班、排长而无愧了！”

孙立人本来为了报答谷正纲的赏识，他应该能在党务学校干一段时间，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心中升起了离开党务学校，到别处发展的念头。

曾广菜是党务学校的大队长，他手下的教官除了孙立人之外，还有两个人，他们一个是黄埔毕业，另一个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们三个教官分领三个分队，因为各自的教法不同，而教学成绩突出的孙立人就遭到了另外两个分队长的排挤，再加上党争，派系的斗争，搞得孙立人实在不堪其扰，他这样说：

> 我本身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以说我一生最讨厌的就是政治，所以我很不愿意跟政治有关联。但在这个环境里，有的时候，军事和政治就是不分的。我老实一句话，我反对狐群狗党……后来我看看这个学校我也不想做了，太过政治方面了，我就想离开。

多年的正规教育，让孙立人做事变得稳重，正当他发愁以什么理由离开党务学校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冯轶裴奉蒋介石之命，在南京的小营成立教导师，要把教导师打造成一支多兵种、现代化的新军。

蒋介石当时名义上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目标远未实现，为了增强实力，培养亲信，牢牢地抓住枪杆子，蒋介石就让心腹爱将冯轶裴担任了小营教导师的师长，教导师不仅武器装备一水是德国货，而且还从德国请来了军事顾问，负责军队的日常训练。

教导部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如果讲得通俗一些，就是示范部队，或者是模范部队的意思。蒋介石成立教导部队，就是要以此部队为“龙头”、为“榜样”带动后进部队迅猛精进，一改部队的委靡不振之风，争取全军的整体风貌为之一变！

冯轶裴治军孙立人有所耳闻，而且该教导师延请德国教官，必然会有一个新的气象，孙立人得到消息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当即写了一份求调的申请，报给了党

务学校的校长蒋介石，他准备去教导师当一个教育班长，并希望能在新兵的训练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孙立人在普渡大学的土木工程学位证书，帮了他一个大忙，教导师并不缺教官，但工兵营却缺真正懂得工程技术的教学人才，孙立人的求调申请获得了批准，蒋介石并没有让他去当教育班长，而是让他做了工兵营第三连的上尉排长。

1928年11月，孙立人来到教导师报道，发现所谓的新军，并没有欣欣向荣的气象，却显得处处死气沉沉，虽有德国教练，但那十几个德国教练，在教导师中，就像是一方湖水中，撒进了一把咸盐，根本就无法整体改变这支军队的军人们腐朽、懒散和官僚的作风。

单说一件事，就可以知道这支军队的军纪和面貌如何，工兵营一共分三个连，孙立人所在的第三连一共有四个排，除去孙立人，剩下的一个连中三个排长竟有两个在偷偷地抽大烟。

孙立人加入新军，却有一个让他感到欣慰的地方，党务学校虽然也在实行军事化管理，但毕竟比不了真正的军营，在教导师里练兵，才让孙立人真正找到了带兵的感觉。

孙立人在三连的四个排长中，不仅年纪最小，而且带兵的时间最短，故此，那三个排长都自诩为老兵油子，他们全拿孙立人当新手看待，孙立人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他一有时间就往部队跑，同士兵齐操练、共食住，并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努力使自己在学校学得的带兵知识，尽快转化为适合国内的带兵经验。

其他三个排长对孙立人并不友善，背后还倾轧排挤，但有一点，他们觉得孙立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孙立人练兵不挑拣，干活不埋怨，一旦他们想偷懒，只要说句话，孙立人抢着为他们值星（一周内带队并处理一般事务），这一点，这三个排长还是欢迎的。但这三个排长，即使得了便宜，在背后也是一个劲地说孙立人“傻气”。

在这三名军痞排长的眼中，少干活、图享乐、多捞钱就是他们人生追求的最高

的目标，他们不仅忘记了当兵的责任，更是混淆了做人的目标。有句名言这样说——锥处囊中，其锋必现，孙立人能力有限，暂时改变不了环境，他就让自己变得更加勤奋，孙立人官微职小，他改变不了别人，他就改变自己。

孙立人一开始加入教导师，身上还有一些洋学生所独有的骄傲和矜持，经过一年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的教学，他就能和学员们打成一片了。孙立人刻苦教学、认真操典、体恤士兵的好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军营，冯轶裴也被惊动了，他经过实地考察，确认孙立人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也就是教导师移防南京上清河的时候，孙立人的官职就得到了火箭式的提升，他就成了连长、副营长，最后又成了步兵团第三营的营长。

孙立人虽然得到了教导师师长冯轶裴的赏识，但孙立人在教导师的这段时间里，他已看清了“新军”的真实面目，那就是表面堂皇，暗地腐朽，当官的抽大烟、喝兵血、玩女人，而当兵的混日子、骗军饷、唬长官。这样的军队，实在是没有前途，孙立人决定再一次“跳槽”，他就不信，找不到一个真正能施展才华的地方。

孙立人当时真的是够书生气，他没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民国的旧军队里，哪有一方没有被金钱和权势腐蚀的净土？哪里有摆脱倾轧和排挤，能让他发挥才华的天地？答案是，真的没有。要是有，除非经过自己的打拼，而开创出只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蒋，双方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又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这是一场从5月一直打到了11月的大战，战争持续了半年，军阀内战中一场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

蒋介石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在南京成立了宪警教导总队，宪警就是后来的宪兵，他们不受陆军司令的指挥，而是归属宪兵司令部直接管辖，而中华民国宪兵司令部直属“国防部”，拥有独立的指挥、人事及后勤补给系统，说句更直白的话，这支部队在国内的地位类似于蒋介石的禁卫军。

这样一支重要的队伍成立，对于孙立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让他感到兴奋的消

息。孙立人练兵得法的消息，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有所了解，故此，这次孙立人将求调宪警教导总队的报告递上来之后，蒋介石没有犹豫，很快就批准孙立人走马上任，成为该总队第一大队上校队长。

宪警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为温应星，这位温队长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传奇，他曾经留学美国，并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了一年，接着转入了西点军校，并成为第一位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温队长上任后，聘请齐学启为大队长，齐学启不仅是孙立人清华大学的预科同期校友，他还有诺维奇军校留美的经历，故此，孙立人觉得上级温应星是自己的留美同校的学长，而齐学启又是自己的同窗，这个上校队长他一定能干好！

可是事实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执教宪警教导总队，却让孙立人尝到了从军路上，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宪警教导总队的职责是为国内训练20万宪警。其当家人温应星深受高层的重视，下辖的三个大队，三个大队长分别为齐学启、孙立人和宓熙。宓熙为黄埔军校毕业，四个人中唯他没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当然，也属他的带兵和训练的能力最弱一些。

由于宪警教导总队刚刚成立，一切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状态，孙立人能力突出，总队长温应星就将训练军官大队的担子，交给了孙立人。

如果做个比喻，军官可比一支军队的骨干，而士兵就是这支军队的血肉肌肤，只有训练出一批合格的军官，这批军官才能带出一批合格的士兵。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军官在一支军队中的作用，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军官大队被训练出来后，孙立人接着又开始训练军士大队，军官和士兵都有了着落之后，宪警教导总队便随后成立了第一团，按照惯例，孙立人训练出的队伍，宪警第一团理应是他出任团长，可是上峰一纸调令，齐学启就成了第一团的团长。

齐学启不仅带兵有方，而且是孙立人的同窗旧好，由他摘了孙立人的“果子”，孙立人并无怨言。

孙立人接着练兵，随后不久，宪警第二团成立，可是团长却仍然不是他，而是宓熙。孙立人虽然心里有火，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接着练兵，按照他的想法，宪警第三团成立的时候，团长总该是他的吧？

在国军的队伍中，很多事情都不可基于常理去想象，往往努力干活没有好果子吃，身上还经常挨鞭子，而和上级关系好的将领，不仅能取得职位和信任，还能捞得更多的好处。

孙立人带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深入一线，与士兵泥里水里，一起摸爬滚打，真正像兄长似的关心士兵，这与其他国军部队中，官不知兵，兵不知官，当官的侵吞军饷，大搞五子登科，当兵的吃粮混日子，遇到打仗，只想着如何保命的军队的军官是不一样的。

宪警第三团的训练基本完成，就在团长的任命即将确定的关键时刻，孙立人却同军需主任吵了一架。起因很简单，因为这位军需主任扣了宪警第三团几名学兵的军饷。

军需主任扣这几名学兵的军饷的道理基本拿不到台面，因为这几名学兵在训练中，因生病请假，耽误了几天时间，并没有完成全部的训练课程。

当兵拿饷，这和上班拿工资一样，纯属天经地义，而学兵在训练中生病，宪警教导总队哪能不管，再说一个月的军饷并没有几个钱，但这几个钱，却对学兵非常重要，那几个学兵被军需主任扣了军饷之后，有冤无处申，他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孙立人。

孙立人一听，心中蹿火，宪警总队的军需主任，仗着自己是领导的姻亲，平日里骄横跋扈，早让孙立人看不惯了，扣生病学兵的军饷，根本就是拿学兵不当人看，孙立人决定去找那位军需主任理论。

可是军需主任对孙立人的合理要求，根本当成了耳旁风，两个人中午争吵一通，结果不到下午4时，总队就给孙立人下了一份撤职令，撤职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是目无长官，第二是强勒军饷。

在一些关于孙立人的传记中，孙立人和军需主任争吵一段，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孙立人面对官痞作风十足的军需主任，他竟饱以老拳，将其暴打一顿，宪警教导总队的领导闻信后，这才勃然大怒，当即将孙立人撤职。

究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怒从心头去，恶向胆边生，抡起了醋钵大小的拳头”，从孙立人的学识、心胸还有一贯行事的作风来看，应该是前者无疑。

孙立人被温应星在宪警总团撤职后，可是山不转水转，温应星和孙立人先后都曾在税警总团任职，温应星是总团的团长，而孙立人是手握重兵、深得宋子文信任的第四团团长，如果这时候，孙立人要报复温应星，温应星团长的位置，绝对坐不稳，当时温应星心存顾忌、惴惴不安，孙立人得知情况后，他让自己的夫人转告温应星的夫人：外敌当前，现在正是我们精忠报国的时候，哪还有其他不利于团结的想法呢？

1951年，温应星离开军界，在华盛顿威斯康辛大道2328号开了一家机器洗衣店，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度日，而温应星之子温哈熊（台“陆军”二级上将，官至“国防部”联勤总司令，曾经做过孙立人的随从参谋）他回忆孙立人时，曾经这样说：

> 我只能说孙先生是个不懂政治的人。他脾气急躁，不高兴的事就说。除此之外，我觉得他真是个好军人，也不贪钱，凡是都以身作则。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与短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觉得他的长处比短处多。

孙立人的心胸，决定了他的格局，而格局又会决定态度。孙立人的所作所为，可以让当年对他“打击报复”的旧上司的儿子都交口称赞，可见动手打人这种暴力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在这世界上，总有一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就是人心。孙立人不懂政治，只懂带兵训练，每每是费力不讨好，成了攻击和伤害的对象。

在现实社会中，也有一些遭受冤屈而被炒鱿鱼的人，他们在离开的时候，都会大吼一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回家卖豆腐，然后转身

负气地离开。

孙立人虽然饱受委屈，心中有火，但他受过高等教育，他将手中的公务一一交割清楚之后，便拎着行李卷，潇洒地离开宪警总队，回到了他在南京和张晶英（又名张清扬）一起组成的新家。

孙立人在宪警教导总队的经历，可以说是“人从热渐到冰”，最后以“不带走一片云彩”作为结束，但他在南京这段时间，在感情上，也有“携得美眷归”的收获，那就是和张晶英携手共筑爱巢。

孙立人和龚夕涛的感情不错，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准备离开安徽老家，到长沙13军投军入伍的时候，便想带龚夕涛一起前行。

可是孙立人的父母年事已高，龚夕涛已经多年侍奉膝前，孙熙泽夫妇，早已经离不开二儿媳了。孙立人带着龚夕涛到外面闯世界的想法，就这样搁浅了。

孙立人身材伟岸，相貌堂堂，他在宪警教导总队任队长，那是正儿八经的校级军官，他又有清华、普渡和弗吉尼亚三所名校的毕业文凭，甚至用高富帅三个字来形容，都感觉到有些委屈了他。

孙立人在宪警教导总队高强度的训练之余，经常会被同事拉到舞场上去放松一下，一来二去，他就和南京汇文中学高中学生张晶英熟稔了。

当时，身为校花的张晶英身边不乏追求着，其中最有实力的追求者当属熊式辉，熊式辉已经是江西省省政府主席，仕途一片光明，而张晶英的父母，也看好了官险财丰的熊主席，但张晶英偏偏就喜欢孙立人，当时让熊主席非常尴尬。

孙张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恋，感情进展迅速。不久之后，两个人即在上海宣布结婚，结婚的礼堂在沧州大饭店。孙熙泽得到消息，赶到上海，本想阻止，可是晚了一步，两个人木已成舟，已经名正言顺地办完了婚礼，张晶英也就成了孙家的媳妇。

龚夕涛和孙立人是有感情的，孙立人游学和从军在外，龚夕涛和小姑说私房话的时候，总是昵称孙立人为“我家的二傻子”， 孙熙泽为了挽救龚夕涛和孙立人的感

情，孙立人在税警团任第四团团长，驻守江苏海州的时候，孙熙泽便派人护送龚夕涛到海州，与孙立人团聚。

可是时间总会消磨情感，距离让龚夕涛和孙立人逐渐变成路人，龚夕涛只是在海州住了两个多月，便辞别了孙立人，回安徽老家，继续伺奉孙熙泽夫妇，替孙立人尽孝去了。



孙立人与张晶英

1935年，孙熙泽夫妇相继去世，孙立人对为父母尽孝送终的龚夕涛甚为感激。虽然孙立人从印、缅战场获胜归来，回到南京，他也曾将龚夕涛接到六朝古都，并与之团聚，但内战爆发，孙立人领兵参战，龚夕涛为避战乱，便跟随胞兄龚意农逃难到抗日根据地，龚夕涛后来参加革命，走上了另外一条救民族于水火的道路。

1982年，念念不忘统一大业的龚夕涛病逝于合肥，2010年，龚夕涛还被评为“合肥百年最有影响的女性”。

孙立人在被撤职不久后，他回了一趟安徽老家，去看望父母，孙熙泽本想劝说他向宪警教导总队的长官认个错，希冀着能回去复职，毕竟辛辛苦苦地开创出一片天地不容易，可是孙立人本身无错，怎肯去向宪警教导总队的长官道歉？他说：“父亲，您给我起名立人，就是让我在物欲横流的浊世站稳脚跟，并顶天立地做一个男子汉，您放心好了，既然我认定了从军这条路，我就不会放弃，而且一定会走好！”

不久之后，孙立人又回到了南京，孙立人不相信，凭着自己治军的才华，在南京的军界中，就没有自己的存身之地？

3．参军，毅然加入税警团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李白《蜀道难》

孙立人加入税警总团，可以说是自然，也可以说是必然。孙立人的性格，使他和国军将领们格格不入，他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军界之外的“游侠”。而在那个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宋子文虽然手握财权，但也想组建一支私家部队——即税警总团，并非蒋氏黄埔嫡系的孙立人，因为治军有方、带兵得法，就成了宋子文急于招募的人才。

孙立人来到了税警总团，税警总团游离于国军序列之外，应该是连三流都算不上的一支部队，他又是如何通过整军训练，终将自己的第四团，变成了战斗力让人刮目相看的一支抗日劲旅？

孙立人回到了南京城，他这次重回故地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军界中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孙立人回到南京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的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成立侍卫总队。

蒋介石的侍卫总队，是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成立的，其性质等同于过去的御林军，专司警戒总统府，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责任。而侍卫总队的成员，必然是军界中的精英，大多数都来自教导师和宪警教导总队。

孙立人在教导师的时候，曾经和德国顾问共过事，孙立人精明能干，治军有方，确实在德国顾问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德国顾问就向蒋介石举荐了孙立人，经蒋介石同意后，孙立人就成了侍卫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

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上校副总队长位高权重，因为接近最高层，故此升迁机会甚多，但此职位却对孙立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要知道侍卫总队只是一支警卫部队，专司的责任只是保卫高层的安全，并不是一支战斗部队，作为一个军人，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在孙立人看来，那就不算军人，至少也不能算作一个合格的军人。

孙立人之所以应下了该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黄埔一期步兵科毕业的王世

和是侍卫总队的总队长，王世和虽然是蒋介石的表侄，但他性格忠厚笃实，为人低调谦冲，从不对外炫示功绩，孙立人觉得这样的上司，他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第二个是孙立人准备骑马找马。靠近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令人目眩的权力机关，他并没有想到会早日飞黄腾达，而是觉得自己一定会比较容易找到带兵的机会。

而改变孙立人成为军界“游侠”身份的人，就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宋子文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他决定在海州（今连云港）成立税警总团，其目的是保护盐场和打击走私。

税警总团的第一任团长为温应星，第二任团长就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王赓（陆小曼前夫），第三任团长为莫雄，而第四任团长还是温应星。

税警总团可以说成是独立于国民政府军队之外的一支非正规军队。这支队伍的军饷来自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款项，因为宋子文具有编制、装备、人事的决定权，故此，这支军队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蒋介石为何能容忍这支武器精良、人数高达3万余人的私人武装的存在，这完全得益于税警总团的后台老板是“国舅爷”宋子文的缘故。

在国民政府的高层，唯蒋介石之命是从的高官不少，跟蒋介石同床异梦的高官更多，但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却没有几个，而因为政见不和，敢于当面掀蒋介石桌子的恐怕就宋子文一个。

宋子文因为赴美留学的背景，故此，他成立的税警团，排以上军官的资历，大多有美国留学的背景。为了使税警团的战斗力，尽快由弱变强，他还高薪聘请了由18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

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淞沪抗战爆发，税警团参战，因为作战勇猛，很快从默默无闻，变得让国人眼前一亮，从而大踏步地走进了公众的视线。孙立人在清华同学的引荐下，见到宋子文，并向他表露出想要加入税警团的想法。

宋子文和孙立人一番谈话，也觉得他谈吐不俗、英气逼人，练兵多年的孙立人是个难得的英才，便欣然同意了孙立人加入税警总团的要求。

孙立人身为侍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不仅被蒋介石认识，他的名字也是被蒋介石所熟知，但孙立人的求调报告递上来之后，蒋介石却并没有挽留，也许蒋氏觉得，孙姓的高个子副总队长，并非不可替代，人去心难留，走就走了吧。

孙立人如果像某些八面玲珑的军官一样会“做人”，他又怎么会离开“御林军副统领”的宝座？要知道越靠近权力中枢，升官的速度越快，发财的机会就越多，但孙立人和某些“人精”的军官们的想法绝对不一样，他不想用高官厚禄来证明自己，他要带兵打仗，他要在金戈铁马的军营中挥洒自己的人生。

孙立人来到了税警总团，税警总团的团长就是王庚，王庚手下目前有三个团，团长依次为：一团团长赵军迈，二团团长古景华，三团团长刘天绍。孙立人参观完税警总团，觉得确实非同一般，不管从武器装备，还是部队的士气，都远超当时的国军其他部队，他便在总团长王赓那里领来了一个任务，那就是组建一个特科兵团。孙立人首先派部下四处招兵，特科兵团的兵员很快就被补充完整，孙立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新兵的素质也有了迅速的提高。宋子文检查部队的时候，发现特科兵团进步最为迅速，他甚为满意，便批准将特科兵团改为第四团，孙立人任第四团的团长。

第四团下设三个营，营长分别为一营营长葛南杉（担任过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其子葛熙熊后来成为台防空司令），二营营长唐守治（后任台国民革命军陆军副总司令），三营营长张在平（资料不详）。

税警总团武器装备绝对非同一般，国内正规甲种师团的武器，均由国防部统一发放，由于当局均衡实力的考虑，常以军费军饷等限制部队的规模，故此，即使是国军序列中的王牌部队，武器装备也领先不了其他部队多少，但税警团却不一样，他独立于其他部队之外，名字虽然挂在财政部的名下，其实就是宋子文的私人武装，部队所需的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出资，并由宋子文派专人在世界各大军火厂家选择性地采购，其精良程度远超一般部队。

税警总团采购的武器，几乎都来自欧美的军事强国。比如美国产的欧立根防空

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步枪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毛瑟M1932手枪，以及比利时产的FN1924/30步骑枪、水冷式重机枪。甚至还配备有老牌英帝国产的“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

第四团想要练兵，必须有一个练兵的场地，孙立人就向宋子文递交了一份报告，宋子文对孙立人建兵营练兵的计划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胡德华（曾任新一军第二炮兵营中校营长）在《孙立人练兵与抗日功绩》一文中，这样描写道：他所选定的地点为东海南城（海州），该地区附近只有几家农户，距新埔市20多华里，附近两面是丘陵地，另外两面是一片无耕种的荒野，班、排、连训练的各种地形均备……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营房终于建成了。

孙立人为了掀起部队在海州练兵的高潮，他亲自上阵，手拿小皮鞭，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带领全团的官兵做“基本教练”“射击教练”和“战斗教练”。孙立人在训练场上，不仅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而且他发现谁做的技术动作不对，他就会亲自用小皮鞭敲对方背一下，然后亲自做一遍正确的动作，海州练兵非常之苦，但孙立人强调官兵一致，他和大家吃住一起，部队上下，谁也没有任何怨言。

孙立人所在的税警四团，是管理不懈、纪律严明的队伍，部队官兵一定要做到“军人五要”：1．要有铁一般的体力；2．要有钢一样的毅力；3．要有高尚的道德和敏慧的智力；4．要有勇敢牺牲的精神和决心；5．要有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孙立人训练税警的同时，经常这样讲：本团官兵练兵的目的不是“抓盐贩子”，而是为抗日做准备。孙立人练兵有方，他的治军之术，会让人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代名将吴起。

在战国时期，卫国的武士吴起，因为整天和人击剑，被母所责，他就向母亲发誓：其今辞母，游学他方，不为卿相，拥节旌，乘高车，不入卫城与母相见！

吴起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他便开始训练一支精锐的部队——魏武卒，吴起当时“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

疽者，起为吮之。”有这样爱兵如子的将军，士兵自然肯拼命，根据历史记载，吴起领兵期间共与诸侯军队大战76次，大胜64次，其余不分胜负。爱兵如子的吴起也就成了一代名将！

但在盘根错节、利益攸关的社会中，个人能力太强，是会招庸人妒忌的，吴起最后被容不下他的贵族们用利箭射杀，悲惨血腥的结局，至今也有某些警醒的作用。

孙立人曾经留学海外，故此，他对美欧各国的练兵方法都很熟悉，他说：

> 世界上的军事，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英美系统，二是德日系统。法国和（前）苏联包含在德日系统内。
>
> 英美的长处，是自发自动活泼负责守法，他们的士兵，没有了长官的统帅，仍然可以战斗到底。他们的短处是，吊儿郎当，粗枝大叶，官兵生活浪漫随便。
>
> 而德日的长处，是精确细密，整齐严肃，丝毫不苟，短处是呆板迟钝，缺少机动。英美国家的军队，遇到德日系的军队，一定会吃亏。我们知道了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就能训练出自己的一支精兵。
>
> 至于我的训练方法，并没有什么稀奇奥妙，非常简单平常，仍然是射击教练加体力锻炼，一切训练都要从确实着手。

孙立人为了鼓舞练兵，他做出了如下人性化规定，即军官想要升级，必须要在学、术两科上取得优先的成绩，学术两科包括练兵操典和攻防作战等等。而士兵想升军官，必须在射击和障碍跑中成绩领先。孙立人的衣袋里，还装着一个专门记录人事的小册子，孙立人视察部队、操场练习还有野外训练时，他对各级军官和部队长在训练中的表现，都一一记录在案，这本人事册，也是日后军官们升迁时的依据。

根据彭克立（赴台后，任206师副师长，在李鸿案中，受牵连，曾被囚25年）的回忆，孙立人下连队视察时：采取全面检查和抽查、抽问相结合……点名时，连长将全连名册呈给点验官，然后安排班名次顺序由连长唱名（不准看名册），孙将

军必将每位受检战士从头部到脚，详细地看一遍，看其军容、姿态、体质、着装是否符合要求，发现姿态、体质表现欠佳者，便走近队列前，向受检战士询问原因，并交代连长给予关照。

孙立人的部队，对神枪手的培养也是恪尽全力的，为了调动士兵的射击热情，孙立人做出了这样的规定，那就是优胜者，每月可以得到2—4元的奖励，要知道在税警总团当兵，一个月的军饷才10元，这笔奖励等于每月军饷的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还是相当诱人的，故此，士兵练习射击的劲头高涨。

1932年，“南昌行营”举行过一次射击比赛，要知道射击比赛，以子弹上靶为准，是最不能作假的比赛项目。孙立人将全团的神射手都找到了一起，并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赛前动员，他说：“练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次射击比赛，一定要赛出好成绩，赛出四团的威名来！”

这次在“南昌行营”进行的射击比赛，一共有120多个团的神射手参赛。面对标靶，孙立人团派出的神射手，稳扎稳打，枪枪咬靶，不仅荣获了团体比赛的第一名，而且在个人成绩的前10名中，税警四团的神射手就占了7人。

关于孙立人手下士兵射击精准，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孙立人团在“南昌行营”射击比赛，出尽了风头之后，其他兄弟团的军官，领着精兵强将，慕名前来学习射击经验。

该团的一名军官枪法不错，他来到孙立人团，从战士的手中，挑出了一支毛瑟步枪，对着一百米外的标靶“砰砰砰”连打三枪，可是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他枪枪脱靶，没有成绩。

这位军官对身边的孙立人埋怨道：“四团的枪械精准度太差，该校一校了，否则上了战场还了得！”

孙立人一见这位军官射击脱靶，还一个劲地找理由，他心中来气，点手招呼过一个抱着柴火经过的伙夫，说：“你过来打几枪试试！”

伙夫丢下柴火，双手在围裙上蹭了蹭，他接过那位军官的毛瑟步枪，也不怎么

瞄准，只听“砰砰砰”三枪，竟打出了28环的好成绩！

那位射击脱靶的军官，诧异看着伙夫放下了步枪，抱起柴火转身便走，他不甘心地问：“孙团长，这位神枪手叫什么名字？”

孙立人说道：“他就是我们团的炊事兵，我们都喊他赵伙夫！”

怨枪不准的军官，当时就成了没嘴的葫芦，他今日算是领教了孙立人的厉害，一个只知道烧饭蒸馒头的伙夫，都有如此精准的枪法，他手下士兵的军事素质，那就可想而知了。

孙立人带兵，不仅从军事技能上将四团的官兵培养成了能征惯战的勇士，而且注意从精神方面，也让他们变成了一支可以拉到战场上抗日的劲旅。孙立人经常在全团官兵的面前这样说：“你们不仅要完成长官布置的保盐护税的责任，更要成为一支抗日卫国的精兵，真正的健儿，不惧间关百战，马革裹尸；可敬的勇士，一定要血沃沙场，建功立业！”

人怕出名猪怕壮，孙立人税警四团在这次射击比赛中大出风头后，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假使不能解散税警团，那就将其抓在手中，他经过斟酌，派出自己的心腹，黄埔一期毕业的黄杰代替温应星，出任税警总团的团长。

黄杰对于税警总团来说，只是一个外人，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便成立了第五团和第六团，第五团的团长是黄杰的亲信，而第六团团长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子。税警总团的编制比当时正规军的甲种师团的编制还要庞大，每班的士兵共有14人，六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每连共计252人，也就是说，税警总团的一个连，相当于正规军的两个连，可见，税警总团的6个团，共有士兵3万余人，相当于一个野战军的编制。

当然，黄杰一手成立的两个新团，团长和团里主要的干部，都来自黄埔，孙立人作为宋子文一手培养起来的嫡系，黄杰一开始的时候，还处处和他过不去，甚至想把他从税警团中排挤走，可是孙立人不仅有宋子文在后面撑腰，而且治军练兵的能力在税警团更是有口皆碑，黄杰几次暗中做手脚，可是难起任何作用，他拿根深

蒂固的孙立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税警总团之所以在后来成为抗日的一支劲旅，其原因完全是阴差阳错，宋子文建立这支部队，只想在争权夺势中当成一枚决定胜负的棋子，可是这支部队在孙立人等的不懈努力、苦心经营之下，军力倍增，最后脱颖而出，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厮杀，奋战建功，这也算歪打正着的一段佳话吧。

孙立人在乱世中，加入了税警团，注定生活就不会平静。1935年，噩耗传来，孙熙泽在金牛镇山南老家病逝。孙立人接到电报后，急忙返家，可是回到家中，他继母在父亲去世的第3天，也因悲伤过度而过世了，孙家出殡时双棺并行，僧道诵经，幡幛缟素，倍显哀荣。最后，孙立人和家人一起，将孙熙泽与妻子的墓合葬于庐江柯坦镇龙灯桥附近。

根据金牛镇的乡亲们回忆，孙父病逝后，孙立人带着一个排的警卫士兵回家，由于孙熙泽在金牛镇很有名望，故此，在其出殡的路上，有很多乡邻都来沿途祭拜，孙立人一点团长的架子都没有，见有人祭拜，必下跪还礼，并赏其一块大洋。

孙熙泽夫妇下葬后，孙立人曾在家乡守孝两个月，孙立人在守孝期间，是睡在稻草上的，而且这两个月内，他一不剪头，二不剃须。孙立人守孝期间，还不忘让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在金牛山上下进行跑步锻炼，可见孙立人带兵之严谨，已经到了一丝不苟、毫不懈怠的程度。

孙立人为父母出殡、守孝之后，在返回海州军营的时候，路过南京，曾经到孙敬婉家探望，孙敬婉曾经这样写下了看到孙立人时的情形：

> 我们只见一位留着长胡子、长头发，穿着长袍、白布鞋的人，一进门就向我父母亲跪下直磕头，也不知是何人，我和姊姊见了就抿嘴直笑，却被母亲呵斥。母亲说：“这是仲能（孙立人的号）二哥，你们怎么不认得了呢？还笑什么？”我们才知道这是家乡旧规矩：孝子进门要向长辈跪下磕头，以示未能尽孝养之责而歉疚。孙立人一向很讲究穿着，所以平时都是服装笔挺整齐，可是他更讲究旧规矩，所以父丧时期他则是未剃须发，进门就下跪磕头，因此让我印象很深。后来我们常拿此开他玩笑，他就数落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一点规矩都不懂。

孙立人回到海州后，开始继续练兵。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挑起了事端，日军随后，便向中国守军第29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就是日军全面对中国侵略的开始。

日本国内，陆军和海军的争斗始终是处于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卢沟桥事变是陆军发起的，日本海军自然不甘落后，继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海军便开始筹划对上海地区的侵略，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驾车直冲上海虹桥军用机场。

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作为职业军人，岂能不明白擅闯军事禁地的后果？这两个胆大的日本军人，还未等闯进军事禁区，便做了机场卫兵的枪下之鬼——这一时间，便被称为“虹桥机场事件”。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随后便据此事件，找到民国的上海市长，并向其提出了撤除该地区所有防御工事等等苛刻的要求，民国的上海市长对之无理的要求，予以拒绝。

1937年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严厉惩罚”南京政府，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下令：第二空袭部队对南京、广德进行空袭；第三空袭部队对南昌进行空袭；第十战队及第一水雷战队派飞机对虹桥机场予以空袭。

随后，台北和长崎的日本海军基地就接到日本内阁的命令：明晨出发，空袭南昌、南京。随后，日军派遣军舰16艘，陆战队共约1.5万之众在淞沪登陆。

日方对上海的垂涎由来已久，要知道，上海不仅是民国最大的工业和港口城市，当时对外贸易额占全国五分之三，日本军方曾经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占领了上海，就等于扼住了南京政府的咽喉，接着以上海为跳板，南京城就将指日可待——三个月灭亡“支那”的叫嚣，此起彼伏，但侵略者的呓语，唤醒了全国军民发出了抗争到底的呐喊，悍然侵略的枪炮声，更是激起了全国军民奋起反抗的决心。

南京政府在经历了1932年1月28日的淞沪抗战后，对日军准备侵略上海的意图，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南京政府在得知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展开了侵略行动后， 1927年8月11日21时，张治中部的第9集团军、王敬久部的87师和孙元良部的88师，奉命先行开进上海，由此，八一三淞沪抗战拉开了战火纷飞的大幕。

1937年8月14日，南京政府发表了一份《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里面这样写道：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施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日方悍然对上海发动侵略，南京政府完全是一副被迫自卫的口吻，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博取同情，希望世界列强能够站在南京政府这一边，经过和日本的斡旋和调停，制止这场战争，但这只是南京政府的一厢情愿罢了。

双方战前的兵力与武器对比由下：国军方面有87师、88师、36师、独20旅等作战部队，各样各式舰艇约10艘可支援战斗之飞机约250架，总兵力约5万人！

日方总兵力约1.5万人，舰艇30多艘，约有百余架新式飞机，两方对比，国军人数众多，但日军的火力要占优。

孙立人部所在的税警团，在这场反侵略的淞沪抗战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战争爆发半个多月后，也就是8月28日，税警团便作为预备队，开赴到上海。

孙立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懊丧地写道：

（税警总团）装备齐全，可以当作三个师用，如果担任一个方向的攻守，可以发挥很大的战果，可惜上面指挥官没有整个计划，（税警总团）竟被分散着（当预备队）用了……

在《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战争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时的国军指挥官，虽然对淞沪抗战曾经做了一些准备，但基本上还处在不知彼也不知己的

懵懂状态。

不知彼的表现在：对日方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实力认识不足，对敌的情报工作做得不细，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仓促进攻，只是一味地在上海打对攻战；对日军进军杭州湾，抄国军后路的狠招没有充分防备，更无反制的任何预案。对日军先进武器，飞机、重炮、军舰、坦克，陆海空全方位立体作战的新战法认识不足，以至于始终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

不知己的表现在：不知道如何团结兄弟部队，不知道协调进攻的步骤。对部队缺乏掌控力，以至于内部奸细频出，进攻计划屡屡被日军知晓。孙立人、张治中等能战、会战和善战的将领得不到放手使用，与敌交战的皆是二流的将才，即蒋介石的心腹、庸将的大量使用，只能加速战争失败的进程。

虽然当时的国军同仇敌忾，战斗意志高昂，但个人的勇敢和力量，在飞机大炮面前，会显得微不足道。连天累月的恶战一路打下来，国军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队伍减员严重，税警团开赴上海后，随即被各个部队拆零使用，而孙立人所部的税警第四团归孙元良的88师使用，孙元良让孙立人领兵当了预备队，即哪边形势危急，孙立人就要领着队伍去哪支援。

孙立人领着预备队，首先参加了大场镇的战斗，大场镇位于上海市区北郊，是88师防御日军的一个主要阵地，可是随着战局不断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最终大场镇被日军攻占，连番的恶战，让孙立人手中的预备队的人数急剧减少，这日下午2时，一道命令传到了孙立人手里——88师丁家桥的指挥所阵地，已经被日军攻破，这道命令近乎“逆天”的内容是：让孙立人领着税警团的士兵前去增援，并将失去的阵地再夺回来。

孙立人看到这份增援的命令，他当时真有一种义愤的感觉。孙立人领兵来到上海，就是想找仗打，可是现在他身边只剩下了20多个传令兵，增援丁家桥，夺取被日军占领的阵地，孙立人现在没兵没将，这仗可怎么打？

但是军令难违，别说有20多个传令兵，即使没有传令兵，就剩下孙立人一个

人，这场仗也得去打。孙立人一挥手，对那20多个传令兵说道：“弟兄们，丁家桥阵地危急，虽然我们人少，但家贫显孝子，国难见忠臣，现在正是打出我们税警团威风，展示我们税警察团实力的时刻，跟我上！”

二十几个传令兵虽然不是正规的战士，但孙立人作为四团的团长都不怕死，他们怕什么，当即纷纷叫道：“孙团长，咱们税警团没有孬种，您只要下命令往前冲，我们皱下眉头，不算好汉！”

孙立人领着20多个传令兵直奔丁家桥而去，丁家桥阵地上战火纷飞，炮声隆隆，当时的丁家桥是一座简陋的水泥桥，桥下是一条深不可涉的急流，孙立人站到丁家桥的一端，另外一端的国军顶不住日军的进攻，正潮水一样地退了下来！

孙立人抽出手枪，大喝一声，道：“你们为什么要后退？”

后退逃命的士兵们叫道：“他妈的，长官都逃了，我们难道不要命吗？”

孙立人上前走了几步，喝道：“我就是你们的新团长，现在跟我冲锋，把丢失的阵地再夺回来！”

孙立人的眼神勇敢坚定，他的态度勇往直前，那些后撤逃命的士兵们，看着孙立人肩膀军衔上的三朵梅花，他们一下子都愣住了，他们的团长撤了，他们才拼命逃跑，如今的新团长不怕死，要领头往前冲，他们作为一个小兵，难道命比新团长还值钱吗？怕，面对流弹如矢的战场，谁都害怕，但孙立人的一个舍命不顾的精神，就让“怕”字变得轻若鸿毛了！

丁家桥战场的形势立时逆转，这些被日军追着打的国军士兵怒吼着，端着步枪，跟在孙立人身后，向日军发动了冲锋。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日军也被吓蒙了，一般出现反冲锋的情形，只有在对方获得了强大援兵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日军不明情况，指挥官也怕陷入包围，他立刻命令队伍后退。孙立人虽然走了一步险棋，但总算将丁家桥丢失的阵地夺了回来。可是孙立人收复失地，回去交令的时候，却发现88师有两位团长，跷着二郎腿坐在师部的椅子上，正在悠闲地喝着茶水。

后来，该部打给上峰的作战报告上面，这样写道：炮声一响，税警团即四散，致使士气受损，影响全局。

当时国军军队的一贯作风就是，遇到功劳就抢，遇到过失就推，只要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官位，什么阵地、友军和战局，没有什么不可以背弃和出卖。孙立人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丁家桥一仗，他赢得实在窝囊。

但战场上真实的表现，却不是任何无中生有的报告可以抹杀的，在很多将领因为指挥作战不利，纷纷被撤职的同时，孙立人却被升为第二支队少将司令，统领第二支队继续对日作战。

淞沪会战注定是一场参战的双方，谁也输不起的战争。税警总团的战斗力，也得到了认可，经过集结后，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参加淞沪抗战，编为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司令官分别为何绍周、王公亮，总司令为黄杰。

随着闸北区的沦陷，孙立人奉命领着税警团坚守苏州河。可是日军的进军速度，却远超国军，孙立人还未去接防苏州河，就有五百多名日军，乘坐橡皮艇，纷纷登上了苏州河的南岸。

面对上海战局不利的局面，蒋介石已下严令，一定要坚守苏州河，一旦日军渡河，将对驻守该阵地的军团长军法从事，讲句狠话，你斩不下敌人的人头，那么委员长就要你的人头。黄杰得知日军渡河，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要知道，日军这是从税警团的防御阵地上渡河，一旦处理不好，别说他的官职、性命都有可能不保。黄杰急电孙立人，孙立人接到电话后，他镇定地说：“日军抢先渡河，咱们税警团管不了，但是，他们渡河之后就休想再回去了！”

孙立人领着税警团经过一个冲锋，五百多名渡河成功的日军，就被全部消灭在苏州河的南岸！

黄杰得到获胜的消息，他颤抖着右手抓起了电话，用激动的声音说道：“孙团长，你打得好，打得好啊！”

苏州河是黄浦江支流吴淞江的另一个称呼，此称呼源于上海开埠以后。苏州河

自上海市青浦县赵屯乡进入上海市境，至入海的河口，长度约为53.1千米，境内最宽处为700米，市区最狭处只有区区的40米。

40米的河床，实在是令人尴尬的距离，说句形象一点的话，即使是一个顽童，站在苏州河的北岸，拿起了一块石头，只要使点劲，他都能将这块石头飞砸到苏州河南岸的税警团的阵地上。

这样一条水流不急、宽度不够的河流，根本就无法构成防卫沪西地区的“天险”，孙立人领着税警团的官兵，他们在苏州河最容易被日军选为渡河战役突破口的南岸，开始构筑阵地。

渡河受挫的日军改变了战略，他们借助飞机和大炮的威力，对着税警团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紧接着两方的军队，隔着苏州河开始激烈交火，直到10月27日凌晨，日军人马集结完毕，他们趁着晨雾笼罩苏州河的机会，偷偷用橡皮船搭建了一座浮桥，然后一队精锐的日军，穷凶极恶地杀过了河来。

孙立人得知敌情，立刻组织税警团的官兵开始反击，他们先是一顿手榴弹，炸毁了那座简易的舟桥，接着再一阵疾风暴雨似的弹雨，将那队冲过河的日军全部消灭。

与孙立人交手对阵的日军是第18师团，是号称常胜军的久留米师团，该师团臭名昭著，卢沟桥事变便是该师团发起，其成员大多是日本的战争孤儿，由日本政府集中军事抚养，从小接受武士道教育。该师团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作战凶猛，凶悍异常。

久留米师团的司令官非常狡猾，几次强攻、偷袭失利，他便改变了战术，既然孙立人的阵地无法突破，他就一边佯攻孙立人的阵地，一边派兵绕路从刘家宅渡河。

刘家宅阵地是税警团第五团的防区，其团长毕业于黄埔，是总团长黄杰的心腹爱将，可是这位团长恃宠而骄，他命手下的营长，将部队在刘家宅防区铺开后，自己就去大上海应酬去了（在孙立人回忆录中，这位团长曾经在大上海的舞厅，偎红

倚翠、潇洒风流地跳了三天舞，真实与否，不可考证，但后来这位团长为抗日牺牲，亦很悲壮，将生命都献给了国家民族的抗日大业，便可称为烈士，瑕不掩瑜，小节当不必论），刘家宅阵地上，由于团长擅自离开，已经处在一种“爹死妈出门，个人顾个人”军心涣散的状态。

在河堤旁的地堡中，守卫地堡第五团士兵，因为怕被敌人的炮弹炸死，故此，大小便都在地堡中解决，搞得地堡内臭气熏天，完全没有一种压敌人一头的士气，更可怕的是，久留米师团又是重施故伎，他们借着清晨税警团第五团士兵酣睡，苏州河晨雾弥漫的机会，日军工兵在苏州河上，又架起了一座结实的舟桥，上一次他们在孙立人防守的苏州河上，也架起了一座舟桥，却被税警团一顿手榴弹炸毁，日军的工兵这次架设的舟桥，吸取上次失败的经验，他们在舟桥上面铺有铁板，坚固结实，再也不怕税警团的手榴弹了。

日军踩着坚固的铁舟桥纷纷渡河，第五团的官兵在日军的攻击下，苏州河滩涂的阵地已经全部丢失，如果让日军这样源源不断地渡河，势必刘家宅阵地不保，第五团团长和黄杰的脑袋就生得不牢靠了。

第五团团长急忙打电话向黄杰求救，黄杰立刻派兵增援，可是因为阵地狭窄，增援的部队一时间无法展开，难以对渡河的日军发动有效的攻击，故此，刘家宅失守的阵地不仅没有收复，反因“乱”的缘故，阵地丢得更多了。

就在黄杰觉得大势已去，准备拔枪自杀，将一颗好大的头颅交给委员长的时候，孙立人急匆匆地赶到了司令部，说：“总团长，我带兵去驰援刘家桥，一定能消灭敌人，并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

黄杰手枪落地，他一把抓住了孙立人的胳臂，就好像见到了救星似地叫道：“孙团长，你真的没骗我，你真的能夺回阵地吗？”

孙立人说道：“黄总团长放心，你就等好消息吧！”

刘家桥并不是孙立人的防区，但为了整个苏州河防线的安全，他已经不能置身事外了。孙立人第四团的实力果然非同凡响，他赶到刘家桥，领兵一个冲锋，便将

渡河成功的日军消灭了大半，剩下的一小部分日军，在激烈的枪声中，吓得抱头鼠窜，沿着舟桥，都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似地逃回了对岸！

孙立人得胜收复阵地的消息报上来，黄杰的眼泪欢喜得“哗哗”地流淌，孙立人这算救了他一命，他叫道：“请功，一定要给孙团长请大功啊！”

27日，久留米师团的日军不甘心被阻苏州河，他们借助舟桥，攻到了苏州河南岸第五团阵地的堤坝之下，并藏到了堤坝下面的储煤洞中，由于储煤洞向着苏州河开口，税警团不管是开枪射击，还是丢手榴弹，都难以奈何在储煤洞中藏身的日军。

孙立人看着附近的申新纱厂，他决定施用火攻之计，来对付龟缩在储煤洞中不出来的日军，他让税警团的弟兄们取来十几个棉花包，然后倒上火油，点燃后，将其全部推入了储煤洞。

储煤洞中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洞中的日军大多被烧死，没被烧死的冲出洞外，也做了税警四团官兵的枪下之鬼，这一仗，孙立人共歼敌470人，算是又取得了一场了不起的胜利。

日军虽然被击退，但横在苏州河上的铁板舟桥还在，如果不能毁掉这座舟桥，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孙立人为了以绝后患，他命令手下，准备烧桥。

税警团原本有炮，可是经过连日战争的消耗，炮弹已经全部打光了。战争最后拼得是后勤，看来这句话说得实在是太精辟了。

刘家桥阵地靠近申新纱厂，纱厂内有很多棉花包，孙立人命税警团的手下取来棉花包，并浇上火油，点燃后，从上游将其推到苏州河中，可是狡猾的日军工兵，早就预防税警团用火攻这一招，他们在舟桥上游的水中，铺设了一道铁丝网，点燃着火的棉花包，虽然对舟桥很有威胁，但无奈都被铁丝网所阻挡，故此，火攻之计失败了。

孙立人接下来又尝试派人泅水投弹，利用工兵到河上游布设水雷等办法，可是因为那些工兵贪生怕死，行动迟缓，最终那座日本人搭建起的舟桥，还是没有被炸

毁。

孙立人领着税警团，一连打退了久留米师团的七次疯狂进攻，让侵略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后来，日本人称上海八一三淞沪之战是“血肉磨坊”，足见当时战况之惨烈，已经达到血肉横飞之程度。

最后，第五团的团长为抗日，亦中弹牺牲。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状态，日军占领了苏州河桥上的桥头堡，孙立人仍然坚持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指挥，指挥着税警团的弟兄们准备用地雷炸毁桥头堡，可是不幸的是，一颗日军用火炮发射的榴霰弹在孙立人头顶爆炸，幸亏孙立人带着钢盔，他的头部虽然没有受伤，但是身上却中了13块弹片。他的背后、臀部和腿部扎满了弹片，鲜血直流，成了一个血人，但孙立人的神志还清醒，他临阵重新任命了指挥官，并交代如何坚守阵地后，税警团机枪连长胡让梨和号长苏醒轮换着将孙立人从火线背了下来。

战火纷飞，孙立人弹片满身，血流不止，真的是生命垂危。孙立人作为税警团的高级军官，在战场上的表现可圈可点，故此，他受伤后，便得到了宋子文的特殊照顾。孙立人被送到了位于租界的军方医院中。

淞沪之战，双方不仅出动了几十万的地面部队，飞机大炮也在战争中得到了大量的使用，宋子文为了防止军用医院被日军飞机的轰炸，他就凭着自己和租界中洋人的特殊的关系，将一个专门救治高级军官的医院，秘密地开在了租界。

但有一点，进入租界，接受救治的负伤人员，必须脱掉军装，换上便装。身受重伤的孙立人被送到了医院后，医院的医生随即对孙立人开始抢救。

医院的大夫首先为孙立人清理弹片，其中最重的一处伤是弹片将他的肺叶洞穿，在长达七八个小时手术的过程中，医院里的血浆不够用了，就在危机的时刻，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主动献血600CC，医院的工作人员，想让这名大学生喝杯牛奶，补充一下体力，然后留下姓名再走，那名大学生这样说：“孙将军为国不怕牺牲，为他献血是我的光荣，还需要留下什么姓名！”

鲜红的血浆，输入到孙立人的血管中，孙立人苍白的脸色，得到了缓解，一场

手术做完，孙立人身上的弹片已经被取出，但胸口却有一颗嵌在骨头中的子弹，因为无法取出，只能永远地留在他的体内了。

孙立人的背部和胸口全都是包扎了纱布的伤口，故此，他一不能仰卧，二不能俯卧，只能侧卧在病床之上，孙立人昏迷了三天之后，终于在11月6日醒来，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战况如何？"

当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的战况于南京政府方面不利的消息后，孙立人虽然急得用拳头直捶床板，但他有伤在身，想要继续带兵参战，只能等身上的伤口愈合再说了。

后来孙敬婉曾写过一篇回忆性的文章《追念二哥琐事》，在这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孙立人身上的伤痕：

> 记得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他洗完澡后，常因只有少数家人在座，就只穿条短裤，披个大毛巾，坐着同我聊天，有时就叫我们姐妹们哪一个替他背后搔痒。每当我看到他背上在淞沪抗战时遗留的一颗子弹旋转进去形成的像小石头投进水里去的那种漩涡，那么扭曲、那么深，不禁感慨万千。

宋子文对孙立人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写了一份禁止其他人探望的手令，贴在了孙立人病房的门口，他还派自己的弟弟宋子安代替自己，前去探望，给孙立人还带去了500元现金，并对孙立人好言安慰，让他安心养伤。

关于刘家宅一战，当年黄杰曾经这样说："守军士气高昂，咸抱必死决心，远屋必争，一墙不让，敌尸横枕藉，血流成渠，一日之间，伤亡两千以上，虽幸占刘宅一村，所付代价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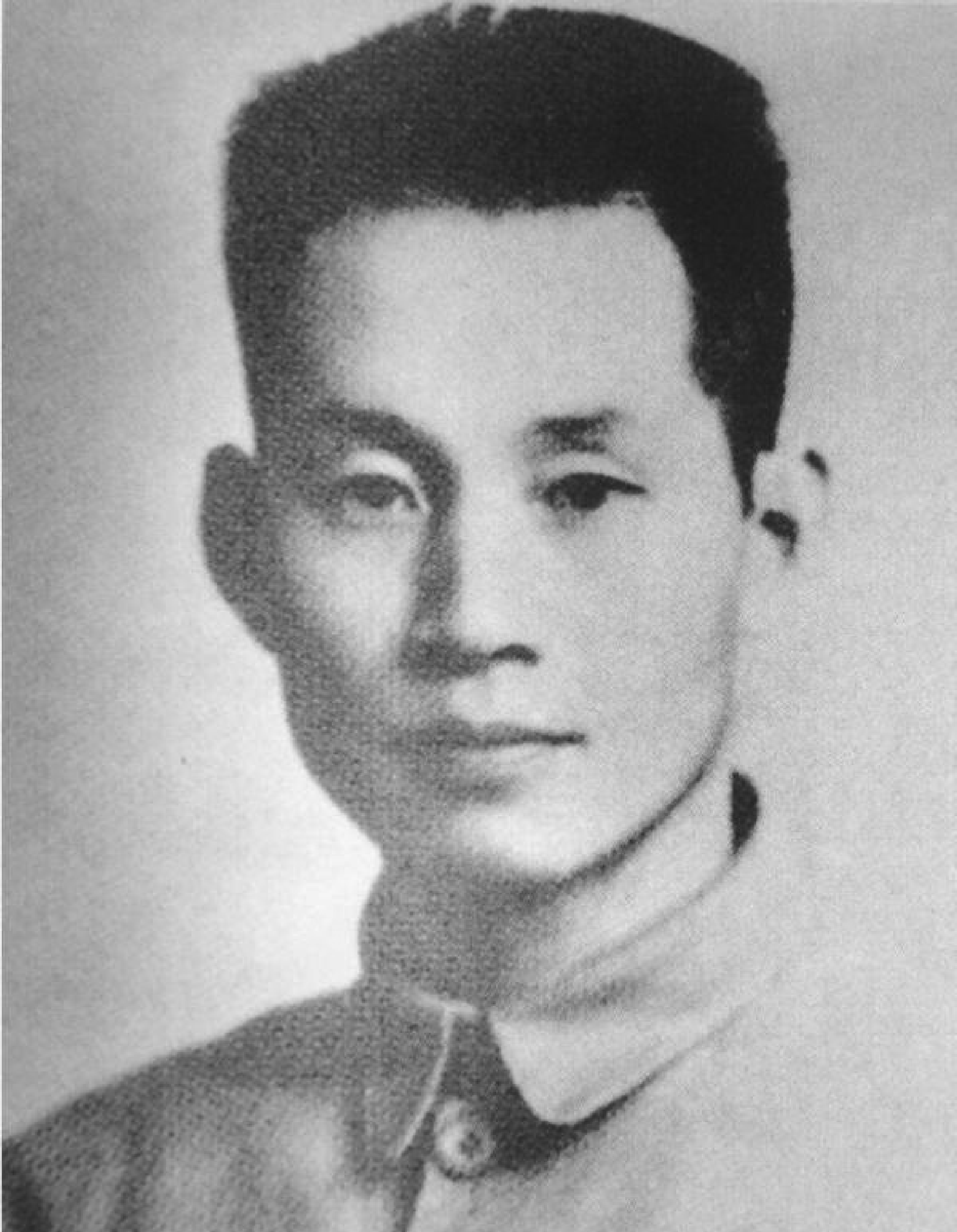
黄杰的说法是否有"夸大"战果，向上峰"邀功的嫌疑"，并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还请读者见仁见智，但从日军渡过苏州河的反应，确实印证了遭到税警团抵抗之激烈的程度。

虽然最终苏州河并没有守住，但是孙立人指挥的税警四团一战却打出了威风。日军在孙立人重伤送医后，最终还是突破了税警团坚守的苏州河段，死伤惨重的久

留米师团的指挥官来到苏州河南岸，他在遍地弹坑的税警团的阵地上，立一石碑，上写“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如果不是孙立人七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税警团的团长黄杰恐怕早就被“军法从事”了，孙立人重伤住院后，黄杰曾经派副官前来探望，并转达了他的“最诚恳”的问候：“只要我黄杰在，就有孙立人一口饭吃！”

孙立人的拼力死战，当时确实感动了黄杰，黄杰一开始担任税警总团的团长，实有裁撤孙立人，然后将第四团团长换上黄埔嫡系的打算，也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虽说无怨，但始终不睦，是孙立人取得的战绩，让黄杰感恩的同时，并被迫承认了孙立人的指挥才华、人格魅力，还有可以相交一辈子的德识。



淞沪会战伤愈后，回到长沙收容旧部的孙立人。面容消瘦，病容犹在。

孙立人倒在病床上，因为关心淞沪之战的战况，他怎会安心养病，可是他身上

的伤口还没愈合，狡猾的日军便改变了战略，他们不再一味地和国军在上海开展攻守战，而是在11月5日拂晓，利用大雾、大潮的机会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咀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中方军队猝不及防，阵地接连失守，情况急转直下，淞沪之战在蒋介石11月8日下达的撤退令中，就这样黯然地谢幕了。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到11月12日结束，在这 3 个月的时间里。中方共投入70多个师共计75万兵力，日方投入的兵力为10个师共28万人。中方以国军主力伤亡了40万的代价，换得了毙伤日军4万人的战果。

虽然上海失守，淞沪战役失利，但却换得了上海的民族工业迁往内地的时间，此役虽因南京政府高层对日妥协、消极抵抗、武器性能不佳、单兵战力不及日军、高级指挥官指挥作战能力有限等原因最终导致上海沦陷，但却一举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随着南京政府军逐步撤出上海，大上海即将沦于敌手，一旦孙立人在租界的医院治病的消息被日军的情报机关得知，那么孙立人就将万分危险了。

宋子文便派人将重伤不能行动的孙立人用车接走，然后乘飞机辗转着送到了香港的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孙立人终于能下地走路了。

香港在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中环商铺的繁华，沙田跑马场的喧嚣，铜锣湾的美食还有兰桂坊的灯红酒绿，都无法吸引孙立人的关注，孙立人一心想的是，他的税警四团在哪里？和他并将作战的税警团的弟兄们现在哪里整军战斗？孙立人躺在医院里，可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国内的战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随后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约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这则消息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以后，孙立人真的在香港的病床上躺不住了。

国家民族遭此大劫，作为军人的孙立人，他觉得痛心疾首，但同时，他也更懂得了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还有一件事，始终让孙立人担心，他的妻子张晶英在税警四团，奔赴淞沪会战前线的时候，就已经搬去南京居住，南京沦陷，张晶英是否

安全，她是否脱险，都说好男儿要先国后家，孙立人浑身13处弹伤，在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孙立人对得起国家，但却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孙立人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陈述了自己要继续领兵抗日、报国为民的想法后，他在1938年2月20日，搭乘飞机回国，经过多方查找，他才知道张晶英已经离开南京，目前正在长沙，孙立人直奔长沙，最后在长沙城外的尼姑庵，找到了岳母一家以及妻子张晶英。

孙立人于张晶英见面后，真的恍如隔世，孙立人将岳母和妻子安顿好之后，他随后向张晶英辞行，因为他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干，他要找到税警四团，他要归队，他要领兵抗日！……但他想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找到税警总团的团长黄杰。

现在兵荒马乱，想要打听到一个人的下落，简直难比登天，但孙立人却有自己的办法，因为他知道，黄杰的老家就在长沙，他就不信，在黄杰老家打听不到黄杰的消息。

孙立人拜访了几次黄老太爷后，他终于从黄老太爷那里得知了黄杰要去汉口开会的消息。孙立人直奔汉口，他找到黄杰下榻的宾馆，可是两人见面的情形，只有两个字——尴尬来形容。

税警团已经不在了，现在的税警团已经变成了第四十师，归属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指挥，驻守河南归德，黄杰“兼并”税警团之后，等于是替南京政府除了一患，现在他已经官升一级，成了胡宗南手下第八军的军长，并兼第四十师代理师长。

那些被打散的税警四团的弟兄，因为名声在外，即使是伤兵，也被其他兄弟部队给“收编”了，孙立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税警四团，就好像是一场春梦，醒来的时候，一切都烟消云散。

黄杰在孙立人负伤后，因为感激，曾经送给孙立人这样一句承诺——只要我黄杰在，就有孙立人一口饭吃。黄杰确实是给孙立人留了一口饭，但这口饭却是夹生饭，他为了“对得起”孙立人，便让胡宗南给孙立人留了一个少将参谋的位置，等着

伤愈归队的孙立人去走马上任。

黄杰包藏祸心，他来到税警团当总团的团长，并没有肩负起能保全税警团建制，战后招兵买马重新拉起税警团的重任，而是拱手将税警团送给了胡宗南，虽然黄杰后来飞黄腾达，但他却是一个不合格的税警团的总团长。

孙立人找到了黄杰之后，向他表达了自己想要重回税警四团的要求，黄杰心中不由得暗暗叫苦，要知道，税警四团的团长已经变成了李鸿，其他团的团长，也都是黄杰的心腹。总之孙立人回去后，已经无法带兵，只能当有职无权的少将参谋，再说一句到家的话，在税警团中，黄杰急于一脚踢开的对象便是孙立人，再把他“请”回去，这已经不可能了！黄杰随后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言语闪烁，让人莫名其妙。孙立人看天色已晚，他只有先行告辞，可是第二天他再来到宾馆，黄杰已经不辞而别。

孙立人这才明白，自己想回税警团的计划，已经是无法实现了。这时的孙立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重建税警团，再次将队伍拉起来。

孙立人想要再建税警团，他必须要得到老东家宋子文的支持，孙立人先坐车后乘船，直奔山城重庆——这座民国政府的陪都而去。

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和雾都等，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后，中华民国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重庆也从一个不太重要的地方，将身一跃，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敌我双方争夺的权力和政治的中心城市。

孙立人在重庆见到了宋子文。相比他和黄杰见面的冷冰冰的情形，孙立人和宋子文的见面，完全就是一壶滚水的那种感觉。

有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宋子文是民国政权高层中对日态度上著名的强硬派代表。他甚至为了抗日，不惜和蒋介石闹翻！

宋子文当时抓住了孙立人的手，他看着因为受伤，面白体虚，身体尚未复原的老部下，激动地说：“抚民（孙立人字抚民）啊，苏州河一战，你打出了税警团的威风，真是辛苦你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孙立人“啪”地一个立正，说道：“保家卫国，何谈辛苦，宋部长，我这次来重庆见您，是想重组税警团，再次为国家效力！”

宋子文现在已经不是财政部部长了，他转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中国银行虽然有发币权，但却没有养兵权，宋子文听完孙立人的话说：“重组税警团，我一百个支持，但想要招兵买马、购买武器，必须要孔祥熙部长点头才成！”

孔祥熙生于1880年，是山西太谷人，他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也是一名银行家及大富商，而且和宋子文是姻亲的关系。孙立人在宋子文的引荐下，见到了这位戴着圆眼镜、留着八字须的财政部部长。

孔祥熙对组建税警团也是很感兴趣，要知道在民国的政治丛林中，光有钱，并不能事事占优，身居高位，想要没人敢惹，势力通天，手中必须要牢牢握有枪杆子。

在民国时期，如果换另外一个人，或者一股势力，以挂靠的名义，组建私人武装，这绝对是近乎天方夜谭的事儿，因为生性多疑的蒋介石，铁定会对其下狠手，让其下场很悲惨。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而宋子文又是蒋介石的小舅子，而且他们两个，一个是民国的财政部部长，另一个是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他们都是蒋介石忌惮三分的主。

更何况二人打得还是财政部的旗号，一切是为了保证盐税的征集需要，并非为自己组建私人的武装。上一次的税警总团，有警有团，还和军队沾边，这次为了避嫌，孔祥熙和孙立人商量后，决定改个名字，就叫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

故此，孔祥熙以财政部的名义，再次于长沙组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孙立人将练兵之地选在长沙的岳麓山下，孙立人选择岳麓山，那绝对是有道理的，首先，这里有清华大学南迁后，留下的一大片空闲校舍，可以给缉私总队当营房，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要招募更多的湘军，要知道，练兵可有“无湘不成军”的古训。

湘军之名震天下，最早源于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湖南资源贫乏，土地贫瘠。因

为环境恶劣的缘故，故此，人民养成了不畏艰苦、坚忍不拔的性格。故此，湘军上了战场，团结、勇敢，有担当，敢拼命。这就是孙立人将练兵之地选在湖南岳麓山的最重要原因。

蒋介石明着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暗地里却开始下上了绊子……孙立人成立缉私总队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便有不少旧部前来投奔和归队，孙立人首先成立了干部教练所，对那些曾经领兵打仗的军官进行培训，另外还召集有志从军的流亡学，组成了学生队，这些有文化的学生们，经过短期的训练，后来也就成了缉私队的骨干。

孙立人后来在印度蓝姆迦基地整训的时候，有一位士兵曾经写过一首诗，这就是《知识青年从军歌》，旋律铿锵，一经唱起，令人热血沸腾，这首歌的意思是鼓励学生参军，抗日杀敌，建功立业！歌词是这样写的：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矜。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这首歌在社会上唱响后，确实有很多流亡和在校的学生，唱着这首铿锵的歌曲，前仆后继地到孙立人的部队效力。

这一次孙立人在岳麓上下，树起了招兵的大旗后，首先是那些受伤，被其他部队收编的税警团弟兄前来投军，接下来，那些被打散的税警团的弟兄们得到消息，也便纷纷前来报效，可是他们一共才几千人，别说组建成一个税警总团，成立一个团都不算富裕。

孙立人经过仔细斟酌，他首先给在胡宗南40师当团长的李鸿发了一份电报，孙立人的召唤，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的响应，李鸿脱离了40师，领着税警团的旧部，前来襄助孙立人。接下来，陈鸣仁、齐学启、唐守智和刘放吾等同事和部下相继来到了缉私总队，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孙立人随即又诚聘了贾幼慧、阴毓章和孙克刚等有德有才的人士，让他们成了缉私总队的军官，孙立人的建军班底，全都是军人中的精英，报国勇士中的翘楚，他们不仅经受过战争的考验，而且人品也都是上上之选，这就从根本上就保证了缉私总队不再是一支贪腐、官僚和没有战斗力的队伍。

孙立人要成立缉私总队，等于狠戳了“独掌军权”的蒋介石的肺管子，他明着不反对，可是暗地里却连使阴招。

重庆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秉承蒋介石的意思，暗中做出以下布置，首先：不允许黄埔等军事院校，给缉私总队输送毕业生当军官；接下来，还不允许他们在贵州等地招兵，很显然，蒋介石对这支不听命自己的武装力量深深忌惮，设置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企图将缉私总队扼杀在摇篮里，让其无法建成，毕竟这样一支既能打又不听“国防部”指挥的武装，实在让蒋介石无法安心。

孙立人抗日的名声，早就已经传遍了国内，贵州不让缉私总队招兵，孙立人就直接去找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龙云号称“云南王”，他坐拥一方，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早已经心怀不满了。

孙立人来到云南，他一讲组建缉私总队为民护财、为国抗日的目的，龙云对着孙立人一竖大拇指，说：“抗日救国，正合吾意！”

龙云对孙立人组建缉私总队，非常支持，他当即同意，孙立人可以在云南省设立招兵办，并允许他招募一万名滇籍的新兵。

滇军，特指民国时期云南的军队。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便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抗日战争时期亦有“滇军素质已成为全国之冠”的赞誉。

孙立人在云南，招募到了一万名精干的新兵后，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的建

制基本上也就有模有样了。孙立人这次练兵，秉承“管理严格、训练严格、人事公开、经济公开”为治军思想，私总队共下设四个团，孙立人为中将总队长，齐学启为少将副队长，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第四团上校团长李鸿，以后又增加为六个团，还有通信、特务、工兵三个直属营和一个教导队。

孙立人虽然是安徽籍，可是他手下的高级将领，没有一个人是安徽同乡，在缉私总队中，长官的任用和谪贬，基本上做到了唯才是举，按资晋升。

1938年10月，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武汉形势岌岌可危，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便下了撤守武汉的命令。

孙立人的缉私总队，也从长沙转移至贵州都匀，孙立人领兵训练的同时，官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兼任贵州第三绥靖区司令。绥靖中的绥，本义是借以登车的绳索，引申为安定、安抚。靖，安定之意。

贵州自古匪盗横行，孙立人出任靖区司令，他便肩负起了安地方治安、卫一方百姓的责任，孙立人随后领兵，就开始帮助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剿匪，精锐的缉私总队经过一系列的战斗，贵州省内的大小匪帮，基本都被肃清。肃清匪帮是保民，保民的同时，缉私总队也得到了实战的锻炼。

孙立人后来讲有一段话，这样总结他的练兵生活：只要我训练的兵，在夜间看背影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孙立人在都匀练兵，生活总算难得地安定了下来，他的夫人张晶英也就成了随队的家属，孙立人就在都匀总部东侧，开了一所慈幼院，张晶英也就成了院主任。这所慈幼院中，一共收养了五六十名孤儿，还聘请来有经验的幼教女青年担任老师，这些孩子不仅吃穿都由部队供应，而且也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每逢节日，他们还登台为缉私总队的官兵表演节目，在军队中办慈幼院，这应该是孙立人的创举。

可是让孙立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吞掉”缉私总队的阴谋，正在向他步步逼近，当然始作俑者就是蒋介石，当年，税警总团发展壮大后，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一

场淞沪会战，饱受战火摧残的税警团，就被划归胡宗南的麾下。

而这次扮演胡宗南角色的便是戴笠。1941年，财政部通知孙立人准备成立缉私署，而戴笠就是署长，很显然，蒋介石任命戴笠为署长的意思是，准备一口吃掉缉私总队，让这支能打能杀的抗日部队，真的变成一支为缉私忙碌，对蒋介石的统治无法构成威胁的松散武装。

孙立人为了缉私总队的前途，他直奔重庆，首先找到孔祥熙，在被告知改编的命运不可避免后，他又开始对重庆的高层展开游说，但却没有人谁敢抗命蒋介石。孙立人真的想不通，他为国家训练出了一群狮虎，可是偏偏却有人看缉私总队不顺眼，非得让这群狮虎变成吃草的绵羊，这简直就是不负责任、误国误民！

就在孙立人山穷水尽的时候，日军从缅甸维多利亚角登陆，缅战在一夕间爆发，孙立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心里想也许是机会来了。当时的国内已是山穷水尽，内无可用之兵，外无可来之援，而缅甸与我们息息相关，是外来补给的一大动脉，万一缅甸被日本占领，我们对外就完全绝缘，所以我们派兵帮助英国协防缅甸是势在必行的。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判断，用不用我的这支部队又是一个问题，我只有把握机会，向各方面去联络打听，到处都碰壁，而我绝不死心。"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时正在闹心，因为国内准备组建一支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赴缅参战，出国抗日。但他的手中除了新五军、第六军之外，已经无兵可派，为了凑够10万人入缅的中国远征军，他便找到孙立人，问孙立人可否愿意领兵入缅，孙立人答道："国家有难，抗日为先，我愿意领兵赴缅作战！"

何应钦当即允诺，可以给孙立人的这支队伍——签上参加远征军的申请。

但有一点，缉私总队即使能够出国抗日，也是逃不过被分割的命运。缉私总队的六个团必须一分为二，即：二、三、四团，被编为38师，归张轸的66军建制，由孙立人率领，出国到缅甸作战，而一（一团是缉私总队的精英，最能打）、五、六团，归戴笠的缉私署，留在国内，干一些缉私的琐碎工作。

孙立人看到了自己辛苦组建的缉私总队六个团，就这样一刀下去，被分为两

部，他的心，真的比刀剜还要痛，但他作为必须服从命令的军人，又有什么办法？他甚至还得感谢这场缅战，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的缉私总队，就真的直接被戴笠“一口吞掉”了。

现在缉私总队的二、三、四团，已经变成了38师，出国作战，远去缅甸，又有什么艰难险阻在等着孙立人？

第三章　入缅作战，取胜之路很迷茫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北朝民歌《木兰诗》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爆发，以日本、意大利、德国等轴心国为非正义一方，以中国、美国、俄国、法国和英国为正义的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战场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九一八事变之机，占领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入侵华北，随着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打破日军的“铁壁囚笼”政策，在1938年开始修建滇缅公路，即中国云南省到缅甸的公路。该公路承担的任务是，抢运南京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军用物资，以及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

当时中日两国战争的形势是，自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即攻战变成了攻守战，攻守战又变成了消耗战，日方认为，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如果切断了此咽喉通路，中国的抗日烽火必将被扑灭，随即，日军33、55、56师团，以及王牌久留米师团（第18师团）开赴缅甸，准备以武力断掉国际社会为中国输血的大血管——滇缅公路。

当时的缅甸为英属殖民地，驻扎缅甸的英军总数约为5万人，很显然，这些英军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最早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并不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因为外来势力的进入，势必会影响英国殖民者在缅甸的利益，可是随着英军在日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丘吉尔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劝说下，只得答应了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要求。

蒋介石当时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有统一指挥中国战区（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境内作战的联合国军队之职责，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

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后。中国远征军正式组建，共计10万之众，可谓精英尽出，一场赴缅之战，即将拉开血色的序幕。

1．困局，三十八师的由来

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

缉私总队六个团，最能打的团被戴笠吞掉，成了真正的缉私队，而相对实力弱一些的三个团，被组建成38师，准备开赴缅甸，在海外开辟一个新的抗日战场。

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由于殖民的行径，早就不得人心，再加上日方对缅甸早就垂涎三尺，故此，日方早在几年前，便派出很多特工人员，在缅甸收买“缅奸”，鼓吹——把榨取压迫我们的白种人赶出去、我们不要为英帝国主义利益而效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可以想见，中国远征军赴缅与英军一起，并肩抗日作战，其所面临的战争补给的环境用两个字形容，就是恶劣，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很恶劣，如果用四个字，那就是——特别恶劣。

在尽人皆知的田中奏折上，曾经提出过这样一句狂妄的口号——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抗战进入到中日双方的“消耗战”阶段后，对缅甸的争夺，于中日两国来说，全都提高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时，新38师赴缅作战，曾经缴获日本刊行的《缅甸兵要地志》，在上面重点写下了缅甸对日本在华战争的重要性：

> 以现在及未来的世界情势而论，缅甸实在占有极重要之地位，为确保大东亚战争之胜利，而与“满洲国”共同形成两大据点，若能确保缅甸，不但能控制去就彷徨之泰国及安（越）南，又能封锁英属之马来半岛及苏门答腊等地，借以阻止英人东进之企图……在作战之时，若能确保北缅甸地区，不但能遮断中印间之交通，又能协制重庆政府，更能阻挫英、美利用中国大陆进攻日本本土之雄心。

日本军方想要占领缅甸的目的，一不是想驱逐英国殖民者，更不是想抢占这片物资贫乏地，而是想控制并切断滇缅公路。其实，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南京政府的军队应无法抵抗日军的进攻，沿海的重要

城市丢失后，南京政府为保实力，必将退守西部等地区。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他在会上郑重地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此计划包括修一条公路，以及一条直通印度洋的铁路，战时，运送战备物资，和平时期，可让天堑变通途，大力发展云南省经济，是利国、利民的一项重大工程。

蒋介石对这项计划非常支持，但建设滇缅铁路由于工程巨大，以当时的人力和财力，无法支持这项工程的启动，故此，修建铁路的计划被雪藏，而滇缅公路的建设，因费用较低则可以立刻进行。

滇缅公路起点为云南省的昆明，经过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横断山脉，又跨过汹涌澎湃的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西出云南边境畹町与仰光公路相接，这条路全长963公里。龙云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后，便派出特使缪云台去缅甸，与英方在缅甸的殖民政府，展开了修路的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可以修路的协议。

就在中缅双方谈判期间，南京城沦陷，全国的抗日形势陷入了低谷，为保证国际救援物资渠道的畅通，蒋介石下严令，必须在3个月内修通滇缅公路。

三个月修通滇缅公路，这真是一项难比登天的任务，要知道滇缅公路之所以难修，是因为该公路经过的地方大多都是崇山峻岭，激流险滩，路况复杂只是表面的难题，其内部更是困难重重，首先，筑路需要富有经验的高级工程师，需要高精尖的探测设备，还有大公路修路机械，可是这些硬性的条件，南京政府都不具备；接着，修路需要一支精干的修路队伍，可是现在国难当头，年轻的小伙子大多参军入伍，剩下的妇孺老人，能否承担得起修路的重任？

可是三个月后，这条在外国人认为不可能修成的天路，就在20万妇孺老人的手中，神奇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1938年9月21日《云南日报》曾经这样记载：有不少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首，血肉横飞，怪可怕的死于无情的悬岩底下，怪凄惨的牺牲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据大约统计：牺牲于上述种种缘故的男女民工不少于两三千人……

美国驻华大使在途经滇缅公路后，他曾经发出这样感慨地说：且修筑滇缅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机器，第二纯是人力开辟。全靠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在《圣经》中，曾经这样记载：神创造天地，造万物，最后造人。但在昆明至仰光的滇缅公路，却正好反过来，竟是人创造和改变了世界，人可以创造奇迹，华夏民族就是一个可以创造神一样奇迹的民族。

军人的名字就叫服从。孙立人领着三个团，徒步从都匀开始，向地处滇、桂、黔三省结合部的兴义进发，这一千多华里的路，走得虽然艰苦，但官兵们感觉受欺压太久，都有一股尽快出国参战，打出缉私总队威风，展示新38师实力的期盼，故此，这一路走来，也不觉得太累。

兴义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之地，主要民族有布依族、苗族、汉族、彝族、白族、傣族等，其传统的建筑形式有吊脚楼和平底楼两类。吊脚楼古称“干栏”或“麻栏”，积木而成，上层住人，下层圈牲畜和堆放家具、柴火等。

孙立人到兴义是来找66军的军长张轸，张轸1894年出生，他是河南罗山县人，曾在保定军校就读，还留学过日本士官学校。但他的66军下辖的新28师、新29师，却是正宗的杂牌军，其班底是由康泽别动队改编而来。

康泽别动队隶属“中华民族复兴社”（蓝衣社），创始人是康泽，该别动队是一个十足的特务组织，1937年，蒋经国自俄国归来后，康泽与蒋经国为争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等职务，发生了直接冲突，康泽不敌蒋经国。他长期控制的别动总队，便被改编为新28师、新29师，康泽想任该军军长，但何应钦认为康泽没有作战经验未予批准，改由张轸充任。

张轸后来也指出：“以新成立的66军参加远征军，是应付美帝国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把66军作为牺牲。”

中国远征军由三个军组成，一开始建军的时候，卫立煌为司令长官，但卫立煌有亲共的嫌疑，而未到任，后来确定的司令官为罗卓英，副司令为杜聿明。中国远

征军下设三个军，第五军军长为杜聿明。所部有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22师师长廖耀湘、第96师师长余韶、游击司令黄翔。

第6军军长甘丽初，下设三个师，所部有：第49师师长彭壁生、第93师师长吕国铨、暂55师师长陈勉吾。

第66军军长张轸、所部三个师，新38师师长孙立人、新28师师长刘伯龙、新29师师长马维骥。

中国远征军的司令罗卓英，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和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都有必要重点说明一下。

杜聿明1904年生，陕西省米脂县人，黄埔系的骨干，在1939年，曾经取得过昆仑关大捷。第一次入缅作战，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先以副司令长官身份入缅指挥战斗。


孙立人、廖耀湘与史迪威

罗卓英1896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他在1941年的抗日战场上，是取得了歼敌两万四千人的上高会战的名将，上高会战还被誉为：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可与台儿庄大捷齐名的又一重大胜利。

甘丽初1901年生，广西容县人，1938年3月，曾经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

国民军第五军是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第五军还有“王牌军摇篮”的称谓。国民军新六军曾经被誉为印缅远征驻印军主力“中国虎”。后来，廖耀湘为其军长，是为蒋介石武大王牌主力之一。而张轸的66军军长，因为国内无兵可调，而是临时“捡鸡毛凑掸子”聚集起来的三流部队。

张轸的新28师、新29师在第五军和新六军面前，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兄

弟，一支十足的“杂牌”军。

孙立人领着新38师的弟兄，经过徒步千里的跋涉，终于赶到与新66军会合的地点。张轸看着这支虽然精神饱满，但却是风尘仆仆的队伍，心中也是不由得暗自摇头。

当天晚上，在66军军部，张轸设宴给孙立人接风，席间，张轸说道：“据我看来，66军三个师中，属新38师实力最弱！”

孙立人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他的心里虽然意气难平，但却没法在新长官面前表现出来。张轸小看新38师，自有他看轻的道理，新28师、新29师虽然是杂牌军，但最差也是由康泽别动队组成，那也是参加过战斗的队伍，而新38师却由缉私总队的三个团组成，缉私总队不就是查盐贩子、欺压商贾的队伍吗？

孙立人心中虽然有怒气，但他还是镇定地将这场接风宴吃罢，他离开新66军军部的时候，心中暗暗地道：是骡子是马，咱们战场上见。

可是随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儿，就让张轸对38师的总体实力，有了一次翻天覆地的重新认识。

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了解孙立人部的整体实力，便命66军军长张轸代替自己检阅新38师，并如实具报。

胡德华在《孙立人练兵与抗日功绩》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孙立人接到这项命令后，即亲往拜见张轸军长，请示校阅范围，张军长告诉他：不阅兵不看操场动作只看“射击”和“战斗”。他（孙立人）回到部队即规定各团以连为单位，造好班排名册，准备迎接张军长的亲临校阅。

当进行校阅的那天，孙立人为了要展示部队的整体实力，全师官兵全副武装，背背包，军容严肃壮盛，官兵集合在一学校的大操场上，他首先呈上一份全师包括四个直属连，共40个连的建制名册，请军长随意指定任何班、排、连出列受校。此时张军长说：先看射击。随即在每一个团及直属连共指定四个建制班同时在四个靶位实施实弹射击……射击开始三分之一时，靶沟每次报出的环数最低为7环，绝大

多数为10—12环。这些师长、团长（张轸的手下）很不以为然，乃窃窃私语，表示怀疑，忽然有一位师长向军长提议：我们也射几发？



孙立人在战场

于是军长和师长各占一个靶位，开始射击五发（慢放），而此时靶沟报出的成绩最高为7环，大多为2—5环。于是这些师、团长以靶沟有反射镜，会看到是军、师长在射击，故意把环数报低。

此时孙立人和三个团长胸有成竹地在旁，不好说什么，于是一位师长提议请九个团长去靶沟看靶，然后仍令各靶原班战士依次射击，此时对方所报成绩，仍最低为8环，这次这些师、团长面面相觑，都服了。

下午，只是在一一二团随意指定一个建制班出列实施班攻击，在进行中，这些师、团长极其重视组与组的协同，班长的指挥能力及各个兵协同、掩护、地形、地物利用，及冲锋的火力利用，无不可圈可点，当该班演习完毕，班长向军长报告"班

攻击演习完毕”，张军长紧握该班长的手说：你到我那当排长好吗？

张轸能讲这句话，代表他彻底服气了。

如果说阅兵和队列可以造假，那么射击和战斗却凭得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孙立人让新38师用真正的实力“震”了张轸一下，同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根据张轸的具报，正式批准孙立人新38师为入缅参战部队。

孙立人新编第38师的地位，也由以前在66军中排名最后，开始排到第一，由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新38师入缅作战，已经迫在眉睫，随后，孙立人主持召开了一场誓师大会，齐学启副师长，高声喊出了此次出国抗日的口号：“将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念！”

随后，孙立人就给38师的弟兄们，每人都发了一枚刚刚制作出来的蓝鹰军徽——一个带着红色圆圈的铭牌上，里面有一只展翅傲睨的蓝鹰，蓝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箭头，正指东方，意思为，反攻缅北，消灭日寇！蓝鹰的铭牌，后来就成了新一军的军徽。也有人用“蓝鹰”代称孙立人后来组建的新一军。



新一军徽章

1942年3月27日，孙立人率领队伍来到了滇缅公路，孙克刚是孙立人的堂侄，入缅作战，他全程参与，他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一书中，这样写道：

3月17日早晨，安宁县公路左旁，摆起了一列汽车长龙，车上贴满红绿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欢送新三十八师出国远征""扬威异域""为国争光"一类使人兴奋的标语，老百姓夹道欢呼，爆竹声不绝于耳，沉重的马达响声，渐渐掩盖了人群的叫嚣，带走了这群远征战士。

全师坐上汽车后，从瑞丽的畹町镇出境，直奔缅甸的境内开去。现在的滇缅公路上，路窄车多难民多，在《宋希濂自述》一书中，宋希濂用最真实的笔，记录下战争给当时滇缅公路，造成了乱成一锅粥的情景：

还有缅甸侨胞逃向国内的，还有一些到缅甸经商运带货物回国的，或乘车、或步行，同一个目的，就是拼命向后方跑，于是滇缅公路上，人车拥挤，途为之塞，车辆头尾相接，进退两难！……

当然造成如此"慌乱"的情况，完全是日军入侵缅甸，妄图切断滇缅公路的后果。

日军开始对缅甸进行侵略，是从1942年1月4日开始的，当时日军55师120团一部的冲支队，越过泰缅边境，对缅甸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1月20日，日军第5军主力在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的指挥下，开始悍然地入侵缅甸，攻击目标是孟邦首府毛淡棉，很快，英军不敌，毛淡棉便被日军占领。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英军投降，日军18师团和56师团从新加坡调入缅甸。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仰光沦陷后，日军集中重兵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一举切断滇缅公路。使中国因为缺少国际性的援助，而不战自溃，最终输掉这场中日战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编有169个师团，其中1—20以内的番号的师团为主力师团，满编约两万人，主要负责进攻作战，这次侵略缅甸，一下便调来了15和18两个主力师团，可见日本军方，对切断滇缅公路之战的重视。

接下来，从20到50番号内的日军师团，为治安师团，负责在占领区治安作战，

而番号50到100以外的师团，为补充师团，有替补师团的意思。

美国真的不愿意看到日军攻占缅甸，切断滇缅公路的计划得逞，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初，日军用起精锐的主力师团，连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席卷整个中南半岛，后又长驱直入缅甸，并扬言要与轴心国希特勒纳粹德军会师于中东。

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看来，中国战场是亚洲战场的主战场，要知道，中国的抗战，拖住日军整整21个师团还有20个旅团，而且在中国的东北，日军还有13个师团动不了窝。中国的抗日战争，至少拖住了日军几十万的正规军，这让美国等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减轻甚多。

罗斯福就曾经这样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打下澳大利亚、印度……甚至可能侵占中东。正是由于中国的斗争，才让日德不得不相互独立作战，未能建立战略合作。"

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对美国的防务有极其重要的特性，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

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是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的一项法案，目的是在美国不卷入战争的同时，为盟国提供战略物资的帮助。7月的时候，美国租借中国的第一批数千辆租借卡车运抵仰光。而到了8月，美国还为中国的抗战需要，在仰光港口建成了一家小型卡车制造厂。

虽然这些支持，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不到决胜当场的效果，但蒋介石挂在嘴边有一句话：我们获得了美国盟友的支持，这句话在抗日战争中，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凝聚人心的作用。

1941年6月，在罗斯福的牵线之下，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中英缅共防御意见书》，随着日军侵犯缅甸，节节败退的英缅军，急忙向蒋介石求援，随后，中国远征军正式赴缅甸，一场对日作战即将展开。

杜聿明在这场赴缅抗日的大戏中，担任的是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在《杜聿明传》中，他临出征之前，向蒋介石讨教了两个问题：1．为何不设置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2．他到了缅甸听谁指挥。

蒋介石告诉杜聿明，英国方面在同意中国远征军赴缅之后，便单方面宣布亚历山大为中英联军的最高统帅，故此，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任命实在让他为难。

杜聿明到缅甸后，不归亚历山大管辖，需要听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挥。

杜聿明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校长命令，我怎么办？"

蒋介石答："向我请示！"

中英双方组织联军，对日作战，战事未开，就因指挥权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英国对缅甸的殖民战争的肇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824年，经历了三场血腥的殖民战争后，直至公元1886年1月1日，英国殖民者宣布吞并整个缅甸，至此　，缅甸全部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缅甸在被英国殖民之前，是大清的附属国，英国殖民缅甸已经超过了50年，虽然中英双方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英缅军对来自中国的军队，也是存在着深深的忌惮。他们从不认为，中国远征军的到来，是帮他们"巩固"在缅甸的殖民地，而是觉得道殊谋异，中国远征军此来是夺取他们在缅甸的利益。

英缅军在缅甸的兵力约有5万，他们分别是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英装甲第7旅等，他们的总司令就是亚历山大将军（曾经指挥过敦刻尔克英军撤退，以撤退扬名的英国将军）。

英缅军养尊处优，早就成为了一群"老爷兵"，他们并没有想到，英方"横扫一切"的战斗力，在凶悍的日军面前，简直就不堪一击，如果英缅军能和中方在双方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后，即刻邀请中国远征军赴缅，并在仰光、曼德勒、密支那等的重要城市外面，修筑坚固的工事，面对日军来袭，则中英联军占据以逸待劳的天时、有险可守的地利、中英联手的人和，那就不会出现，今日中国远征军匆忙入缅，承担巨大牺牲的被动局面。

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一边决定放弃仰光，暗中修路，准备撤往印度，一边给中国远征军拍电报，让他们迅速进入缅甸，对日军发动攻击。其实这位以撤退闻名的英国将军，是在背后暗打小算盘，中国远征军为滇缅公路而来，只要他们和日军一交火，不仅英缅军的压力减轻，而且还会为英缅军安全撤往印度，赢得最为宝贵的时间。

故此，亚历山大急电催促中国远征军，尽快赴缅作战，理由是：为盟军的反攻赢得时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托词，甚至有史学家称，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就是被英缅军给出卖了。

英军从骨子里，并不欢迎中国远征军，故此，他们对“请”来的这位盟友，不仅没有给予应有的食品、弹药、汽车甚至最基本的派当地向导引路的帮助。

在《杜聿明回忆录》中，曾经通过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英国人之口，揭露了英国人为何不欢迎中国远征军到来的原因：

英方（不肯为中国远征军提供汽车用的汽油）为什么这样呢？此中内幕，当时谁也猜不透。

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较善良的英国人揭穿了：“……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话，我给你每月发一百万加仑油，再多点也行。”英国人气愤地说：“没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你懂吗？”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说：“这许多油，你们几年也用不完。”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

在《军碑1942》中王楚英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记录：

韦维尔（英军元帅）又说，缅甸是英帝国的重要属地，也是印度的屏障，如果让日军占了，将来英国还可以从战后的“和会”上把它收回来。若是让中国军队来缅甸，而他们肯定会赖着不走，那么我们就无法赶走中国人——这就是英国人不欢迎中国远征军到来的“症结”所在。

当时日英交战，由于战火连天的缘故，缅甸已经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缅甸本地的官员不是被匪徒杀死，便是隐身逃亡，法律成为了一纸空文，社会动荡，民

不聊生。中国远征军第5军精锐的第200师最先进入缅。而孙立人的新38师，也在不久之后开赴到了多山、多雨、多密林更是多灾多难的热带国家——缅甸。

中国远征军入缅保护滇缅公路之战，是在多线路、多地点、交叉打响的一场战役，虽然此战以失败结束，但孙立人却取得了仁安羌大捷，彰显了中国远征军的军威，其他的远征军部队，也取得了一定的骄人战绩。

中国远征军当时有三位最高指挥官。他们分别是：中方蒋介石、美方史迪威和英方亚历山大。

10万远征军为中国籍，故此，中方的蒋介石理应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司令官；但中国出兵，美国却间接地出了武器、弹药和辎重，故此，美方的史迪威也是缅甸战区的实际指挥官；中国出兵，美国出枪，但不要忘记，中国远征军是在英国人的地盘战斗，故此，英方的亚历山大也有一定的指挥权。令出多门，指挥紊乱在缅甸的战场上轮番上演。

蒋介石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其作战目的是保住滇缅公路仰光入海口，确保北缅的这条给中国抗日输送战略物资的“大血管”畅通，可是随着英军放弃了仰光，日军占据了这座缅甸重城之后，中国远征军重新夺取仰光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这时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便调整了出兵入缅的战略，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谈话记录》中，曾经这样记载：

（蒋介石说）固守缅北战略要地曼德勒，不仅是保卫曼德勒，既可使缅北地区充当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使大西南地区免受日军的直接威胁，又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中印公路），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缅北战场上孙立人与史迪威

后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处境不妙，蒋介石便下了撤退回国的命令……

美方史迪威：全名约瑟夫·史迪威，生于1883年，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等职。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美军并无地面部队参战，蒋介石对史迪威委以重任，完全是看在美国对华的物资援助上。

史迪威作为美方在缅甸的最高长官，他也是美国在缅甸利益的最高维护者，同时也是体现美国在缅甸军事意图的最高执行者。蒋介石派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指导思想保守，即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是史迪威的作战思想却是主动，那就是支持中国远征军对日军发起攻击，只有取得相应的战果，才能彰显美国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成效（当时美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借以安抚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

民众一致对日作战的呼声。并通过大量地杀伤日军，减轻美军在欧洲战场上的实际压力。

英方亚历山大，生于1891年的爱尔兰的贵族家庭。1911年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亚历山大作为缅甸的最高军事长官，他面对日军的进攻，当时是急于撤回印度，又不甘心撤回印度，故此，他对中国远征军的到来，采取了口头欢迎，实则怠慢的态度。美国总统为照顾英国人的面子，曾经指示史迪威在行使缅战指挥权的时候，需要与亚历山大密切配合。

消极的蒋介石想“守”，积极的史迪威想“攻”，还有急着抽身想“逃”的亚历山大，造成了中国远征军作战指挥权的掣肘和拧巴的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一致的指挥，中国远征军想要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胜利简直比登天还难。

中国远征军入缅的部队的次序是戴安澜部200师、第5、第6军、而战斗力最“弱”的第66军的三个师，包括孙立人的新38师，都被当作预备队驻守在腊戌一带。

1942年3月8日仰光失陷后，以戴安澜为师长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其先头部队在3月中旬便抵达同古，第200师不仅是中国远征军的一支精兵，更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摩托化步兵师，全师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等，其作战能力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

同古在仰光的正北方，直线距离大约有280公里。它是南缅平原上一座小城，又译作东吁或者东瓜，曾是缅甸的东吁王国的古都。同古位于仰光北进曼德勒的铁路要冲，它也是中部公路和水路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戴安澜为了能使第200师坚守住同古，他们取来附近铁路旁堆砌的枕木，用以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而同古城的旧城墙，也被利用了起来，成为保卫同古城的防御工事之一。

蒋介石为了打好同古保卫战，他曾经坐飞机从昆明飞抵腊戌，亲自部署第5军入缅的作战计划，并在一天之内三次召见戴安澜，面授作战机宜：一定要守住同

古，不仅要为后续进缅的远征军争取时间，而且蒋介石要调兵遣将，并在同古和日军打一场大会战。

蒋介石打同古大会战的想法是好的，英缅军一心想撤回印度，而第五军刚出中国和缅甸边境，基本上远水不解近渴，戴安澜在到达同古的第一天，他曾经去拜访原驻同古的英缅军一师师长斯科特，他在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赴同古，与英军第一师师长斯科特（Scott）会晤，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敌战法，则亦不知，苦恼之至，今后非由我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戴安澜为了守住同古，他在战前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1942年3月18日，200师的骑兵团在与日军第55师团一部在皮尤河遭遇，随后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毙敌30余人后，日军仓皇退去，19日上午，日军700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乘坐着装甲车，气势汹汹地行驶上了大桥，向200师的阵地攻了过来。

当时守桥的黄行宪副团长一声令下，炸断皮尤河上的大桥，日军的装甲车，大多葬身河底，敌强攻计划失败。

日军第55师团从3月18日开始，到3月29日，以两倍于中国远征军200师的兵力，并在强大的火炮、坦克在地面做掩护，3个航空中队的火力支持下，对戴安澜部发动了疯狂的进攻。甚至在还向同古城中发射了灭绝人性的糜烂性毒气弹。

戴安澜在战争进行到最激烈处，他不仅让全师官兵，都留下了遗书，他在给妻子王荷馨的遗书中，这样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正孤军奋战，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中国远征军200师全体官兵经过12个昼夜的苦战，最终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虽然此战以戴安澜部退出同古城结束，但此役

严重打击了日军的骄悍和锐气。

在日军一位参战大佐遗落的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

日军第5军司令饭田祥二郎也在日记中也写道：敌军抵抗既极顽强，又善夜战和阻击，我军损失重大。

英国《泰晤士报》也在头版头条，盛赞中国远征军在同古打出了军威！他们这样说：（200师）前仆后继之作战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又增一页。

200师官兵孤军作战，补给中断，没有增援，却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战果，不仅鼓舞了当时国内军民的抗战之心，也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了中国远征军的实力。

1942年5月18日，戴安澜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北茅邦村以身殉国，时年38岁。

200师的同古之战，为远征军的其他后续部队进军入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远征军第5军入缅后，因为实力最强，该军便被部署在同古到曼德勒一线，担任阻击日军55和56师团中路的正面作战任务，而第6军则被布置在泰缅边境的景东以及毛奇等地，并和日军第18师团展开了拉锯战。

而这时的英缅军在西路，正和日军33师团交火，并被日军打得并节节败退。因前方吃紧，作为预备队的新38师，也奉命开拔，进入缅甸战区。

新38师一开始的时候，被当成了预备队驻守在腊戍，腊戍位于缅甸北部，距离云南的畹町仅130公里，这里存有中国远征军大量军需物资。随着同古会战的夭折和失利，作为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为了挽回颓势，并让美国盟友看到自己抗日的“决心”，他决定策划一场更大的曼德勒会战。

曼德勒会战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以史迪威和亚历山大为首的缅甸盟军统帅部的同意，该计划是这样的：以曼德勒为依托，集中中国方面三个整军（第5、第6和第66军）英国方面5个整师，共计25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

想要打赢曼德勒会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那就是一定要守住曼德勒，然后

尽可能吸引来更多的日军，驻守曼德勒的守将人选，又将是谁？谁又能堪此大任？谁又能不辱使命呢？

1942年，孙立人率领着新38师官兵准备离开腊戍，当他得知日军的主力第18师团和第55师团对曼德勒虎视眈眈，曼德勒形势危急时，他当即派114团一营的将士，留下守护腊戍机场，他领着全师余下的官兵，急速向距离230公里处的曼德勒赶去。

缅甸是一个地处热带的国家，被称为蝴蝶王朝。那里的女性，都喜欢往脸上涂抹一种用香楝树树枝磨成的香木粉，据说这种神奇的木粉有美容去皱和不被蚊虫叮咬等功能。曼德勒（Mandalay）是缅甸仅次于仰光的第二大城市，因背靠曼德勒山而得名，曼德勒的巴利语名称为“罗陀那崩尼插都”，意为“多宝之城”。因为曼德勒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樯帆如云，舟楫穿梭，故此，缅甸有句名谚语：条条道路通曼城。著名的伊洛瓦底江（发源于我国，我国境内称为独龙江）绕城而过，侵缅的日军，当然不会放过这座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城市，经过日军飞机的连番轰炸，城市中木制建筑的房屋，早已经毁于轰炸后的大火，现在的曼德勒城几乎成为了一座死城。



孙立人

孙立人领兵一入曼德勒，即刻发布安民布告，布告中这样写道：“本司令奉命卫戍是间，保此土，安斯民，职责所在，兹特与全城民众共约四事：一、放火者杀无赦；二、杀人越货者杀无赦；三、充当敌人间谍侦探者杀无赦；四、造谣惑众扰乱治安者杀无赦。其余僧侣人等，生命财产均在本司令保护之列。”

布告张贴后，孙立人随即派手下，疏通街道，安置难民，清剿趁火打劫的匪徒，并派人四处动员因躲避日机轰炸的难民回城，孙立人的新38师官兵，军纪严明，确实做到了秋毫无犯、保障安民，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曼城的市民认同了这支中国远征军，便扶老携幼逐渐回城，曼德勒城市秩序基本恢复，曼德勒在当时，成为了治安相对稳定的地区。

蒋介石因为同古失利的缘故，他忧心忡忡地从重庆坐飞机直飞梅苗，梅苗缅甸名叫彬乌伦，景色优美，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又被称为夏都，距离曼德勒也就一个

小时的车程，这里就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当然盟军司令部也建在这里。

蒋介石随后召集缅战的高级指挥官开会，在这次有史迪威、亚历山大还有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上，最终确定了曼德勒会战的作战计划，并命孙立人驻守曼德勒，吸引日军，孙立人就这样成为曼德勒的卫戍司令。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将缅战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史迪威，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重庆统帅部的指挥下，行使一切前线的具体指挥事宜。

当史迪威获得了把缅甸战役的指挥权后，他写道："现在我不必每天早上在惶恐不安中醒来，搞不清楚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来证明我的存在价值了。那种日子实在难以忍受。"

蒋介石召开完作战会议，不久之后，他便领着"第一夫人"宋美龄来到曼德勒，检查新38师的防务。蒋介石看到了虽经长途跋涉，但精神旺盛、军容整齐、斗志轩昂的新38师官兵，他连连对孙立人说："好，好，守住曼德勒的任务，就靠你们了！"

孙立人说道："保卫曼德勒、保卫滇缅公路，这是新38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孙立人陪同蒋介石登上了曼德勒皇城的城头，蒋介石指着曼德勒山和伊洛瓦底江，告诉孙立人，他发现曼德勒城的格局和南京城很像，南京城也是背依紫金山，坐拥长江天险……只可惜南京城已经沦陷，孙立人是个聪明人，他早已经听出来，蒋介石话里的意思，那就是以南京对比曼德勒，来说明曼德勒对整个缅战的重要性。

当时王楚英担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和警卫排长，陪同蒋介石访问的宋美龄，非常懂美国人，曾经这样告诫他："同美国人在一起生活、工作、战斗，要紧的是保持中华民族传统，维护中国尊严和利益。要以强者自居而不可示弱。美国人的心理特点和行事风格是崇尚强者和英雄。他们对于弱者大多是出于怜悯而生出同情心，而乐于相助，却无敬意……"

蒋介石离开曼德勒之前，将一幅曼德勒全图送给了孙立人，然后乘飞机由梅苗

回国，孙立人随后接到了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罗卓英如何布防曼德勒的命令，在这份命令中，新38师的各团兵力被进行了如此分配：

新38师112团防守曼德勒山，113团驻守伊洛瓦底江大桥防线，这两个团的总指挥是齐学启副师长，孙立人则率领114团的第二和第三营防守曼特勒城。虽然孙立人不愿意看到自己整师的官兵，被如此零散分配使用，但军人面对上峰的命令，他也只有照做不误了。

新38师的布防刚刚完成，可是随后一个不利的情报传来——日军33师团的一部，在仁安羌地区，将英缅军第一师7000余人，给铁桶似的地包围了起来！情报传来，让新38师严守曼德勒的计划，彻底地被打乱了。

2．大捷，一战成名仁安羌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一度流传所谓“三枪日军”的说法，即日军在挨第一枪后会判断大致方向、第二枪会瞄准开枪者、连打三枪可能就会被日军打死。由此可见日军单兵的素质是相当强悍的。

李宗仁就曾经这样说过：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仁安羌的7000名英军被围，而孙立人只是带着113团的800名官兵去解救，没有谁会相信这场解困之战会成功，但孙立人硬是在日军的合围之中，将一个师的英缅军给救了出来，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两强相遇勇者胜，但在仁安羌之战中，孙立人手下官兵的取胜之道，绝对不是单凭“勇敢”两个字这样简单！

日方进攻缅甸的第15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针对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新形势，也制订了一整套的作战方针和计划，这份计划中，有最为重要的三点：

1．第18师团和第55师团沿仰曼铁路（仰光—曼德勒）进攻曼德勒，此路军为主攻部队，目的是要迅速攻取曼德勒。

2．在曼德勒会战前，以一个兵团在仁安羌、马跬附近进行作战，尽力歼灭该地之敌，为尔后参加会战清除障碍。

3．日方西路军由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行进普罗美、仁安羌，包抄曼德勒的左翼，东路由第56师团经莫契（毛奇）、乐可（罗衣考）、东枝（棠吉）、雷列姆（来林）直插腊戌，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退路。

日军这三招，第一招是猛招，准备和中国远征军，以及英缅军在曼德勒展开大会战。第二招是巧招，仁安羌是缅甸的第一大油田，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谁抢占了油田，就等于扼住了对方的脖子。第三招是狠招，日方西路军一旦迂回穿插占领了腊戌，就等于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

这三招的第一招，即进攻曼德勒是在明处进行的。第二招抢占仁安羌是在半明

半暗中进行的，而第三招绝对是在暗中悄悄地进行的。

英缅军第一师从阿南苗和马革威不战而退后，全师官兵在师长斯科特的带领下，一路仓皇地撤到了仁安羌。这时候，英缅军第一军团长史莱姆拍电报经向总司令亚历山大请示后，便给斯科特下了一道命令——炸毁油井，破坏井架，不让仁安羌油田完整地落到日军的手中。

仁安羌缅语的意思便是“油河”，仁安羌油田是亚洲最早开采石油的地区之一。位于缅甸中部的干燥地区，即伊洛瓦底江的东岸。这座油田年产优质原油百余万吨，日军飞机在对缅甸狂轰滥炸的时候，唯有仁安羌油田没有落下一颗炸弹，很显然，日军早就做出了完整地夺取油田的打算。



新38师第113团仁安羌激战。

仁安羌油田井架林立，有油管直通仰光东南的炼油中心沙廉，全长440公里，此处还是伊洛瓦底江附近城镇的发电总基地。其油井和发电的设施众多，即使是用炸药将钻井的井架、采油的设备以及储油罐等设置全部炸毁，然后再放火焚烧，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换句话说，英缅军想要将其完全破坏掉，已经不可能。

1942年4月15日中午，亚历山大下令全面爆破仁安羌油田，因油田爆破直到16日中午才能完成，故此电告蒋介石请求中国军队协助和增援。英缅军破坏油井的爆炸声，以及爆炸后升起的浓烟和大火，很快就让随后紧追的日军得知了英缅军的企

图。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缅甸作战》记载，当时，日军为攻占仁安羌，曾拟派其第5军33师团进攻，该师团的师团长为樱井省三，其各部作战次序如下：

荒木部队（213联队）：部队指挥官为荒木正二大佐，该部首先沿伊洛瓦底江左岸前进，进攻仁安羌以南的马跬；

原田部队（215联队）：部队指挥官为原田栋大佐，掩护师团左侧，牵制敌军；

作间部队：部队指挥官为作间乔宜，其建制为步兵214联队（缺第1大队）、山炮兵第3大队、一个工兵小队、卫生队。这支部队属于一枚暗箭，急袭攻占仁安羌，并断英缅军的退路。

33师团直属部队和独立工兵第26联队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

仁安羌地形是这样的，西面就是汹涌的伊洛瓦底江，南临因河，北面就是拼墙河，因河与拼墙河就是伊洛瓦底江的两条支江，这三条河流，就好像一个缺了一面的C字形巨大容器，将长约9公里，宽1.5公里，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仁安羌油田，像是饺子馅一样，包裹其中，而C字形的缺口处，是一片呈现沙漠化的沟壑和丘陵，其中战斗最激烈之处，就发生在这片丘陵的501和502高地。

日军为了占领仁安羌地区，部队按照既定计划迅速展开了行动，荒木部队和师团直属部队武装泅渡过因河后，直攻战略要地马跬。

原田部队对英军第一师发动佯攻，佯攻的目的是吸引斯科特的注意，使其临战判断错误，其目的是掩护作间部队的214步兵联队，迅速穿插，占领仁安羌油田镇区，切断英缅军的退路。

作间乔宜率领214联队快速急进，日军在穿插行动中，得知英缅军一师战车营的1部过了拼墙河上的大桥，已经来到了河北岸，他便迅速派了一个大队的日军，击溃了这股英缅军，并抢占了英军撤退的必由之路，拼墙河大桥。这支孤军深入214联队，在仁安羌地区，就像一把利刀，当时就断了英缅军的后路，让该师成

了“瓮中之鳖”。

英缅军陷入了日军33联队的重围之中，要知道，仁安羌地区多为沙漠化地质，英缅军战车旅一部的坦克，在平地的时候，冲锋陷阵，堪称利器，可是在沙漠中冲锋突围，最后因不熟悉地形，履带竟陷入到了细沙中，开不动的坦克车，就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

仁安羌地区的唯一水源，就是周围C字形的三条河流，日军据河设围，断了困守仁安羌英缅军一师的水源。要知道在4月份的仁安羌地区，中午最高的温度可达42°。英军面对重兵包围，饮水断绝，立刻陷入到了军心涣散的状态。

英缅军一师的师长斯科特虽然组织了几次突围，但终因日军太强，英缅军实力不济，都以失败而告终。斯科特看着手下的官兵，一双双焦虑的眼睛中，透漏出的绝望的眼神，他急忙拍报，向英缅军第一军团长史莱姆求救。

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史莱姆打来的电话里，得知英缅军一师7000名官兵、牧师以及随军记者被围的消息，他再也坐不稳“金銮殿”了。他当即找到史迪威，两个人坐在吉普车里，飞速赶往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部飘背（piawbwe），接下来，亚历山大、史迪威、罗卓英和杜聿明四个人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军事会议。

亚历山大在退守战略要地仰光城的时候，已经损失了近万人，这已经让他很没有面子，如今英缅军一师又有7000人，即将被日军在仁安羌“包饺子”，这件事，已经惊动了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亚历山大一旦处理不好，不仅要受到牵连，甚至前半生取得的军事荣誉，都将化为云烟泡影。

目前在缅甸，英缅军消极进攻，积极撤退，英缅军一师陷入日军的包围圈，其他英缅军的队伍，距离仁安羌路程遥远，即使调集一些机械化部队，赶过来拼死相救，但亚历山大明白他手下英缅军的战斗力，估计赶过来的队伍，也得被凶悍的日军给“一勺烩”。

故此，亚历山大向罗卓英请求，派中国远征军的精锐之师前去相救，可是戴着金丝腿眼镜的罗卓英却连连摇头，说：“派兵解困，这事儿……”罗卓英瞧了一眼没

有发表意见的史迪威，然后给杜聿明使了一个眼色。

杜聿明用为难的口气说道：“蒋委员长临走之前，曾经严令新38师驻守曼德勒，我们也是无兵可派！”

史迪威虽然同情亚历山大的处境，但严苛的现实，已不容他做任何乐观的估计，要知道，日军33师团编制在1.3万人左右，否则怎么能将备有重炮和坦克的英缅一师困在仁安羌，面对这样一支凶如虎狼的日军，恐怕调哪支中国远征军部队去，都是难以解围。

史迪威迎着亚历山大带着恳求目光，他为难地说道：“新38师固守曼德勒的两营人马不能调动，但驻守伊洛瓦底江大桥防线的113团，距离仁安羌地区最近，就让他们去解围吧！”

史迪威是缅战盟军的最高指挥官，罗卓英可以拿亚历山大的话当耳旁风，但对于史迪威的建议，他却不能不认真考虑。要知道中国远征军毕竟是在英国殖民地缅甸作战，不管英国人是否合作，他都得给主人一些面子，否则以后的事情不好办不说，更可怕的是，不能在国际社会上落下一个对盟军“见死不救”的恶名。

但新38师113团一个团才800名官兵，让800名将士去对阵日军33师团1.3万名骄兵悍将，那结果一定是有去无回。但为了“友谊”罗卓英只有咬牙忍痛，拿113团一部当战局中的“弃子”了。

1942年4月16日，罗卓英下了一道命令，命38师副师长齐学启与113团团长刘放吾一起，率领113团的800名官兵，前去解仁安羌英缅军一师之围。

当时史莱姆给刘放吾写有一张手令，内容如下：

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全团，乘坐卡车到拼墙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场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拼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的敌人。史莱姆17日11时。

对于史莱姆和亚历山大来说，113团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中国远征军的一个

团，在日军33师团的包围中，去救被围的英缅军第一师，该计划能不能成，其实在这两个人心中好像都已有答案，但是他们却必须这样去做，换个角度说，只要做了，如果不成功，那只能怪中国远征军不给力，他们背负的救援责任，也就彻底地卸掉了！

史迪威、亚历山大对113团没有感情，罗卓英和杜聿明也可以为了换取一个廉价的名声，甘愿拿113团去当“弃子”，但不管是113团，还是112团或者是114团，这都是孙立人的心尖子，他领着新38师的弟兄们出国抗日，怎么会让生龙活虎的800名官兵有去无回地前去送命？

孙立人坐车直奔飘背，他赶到盟军司令部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孙立人想找罗卓英，说明情况并请战去仁安羌。

可是当时罗卓英不在（也有资料说罗当时已经睡去，或者故意躲着不见孙立人），罗卓英的参谋长杨业孔代替罗卓英，接待了孙立人。

孙立人一说自己的要求，杨参谋长的脑袋却晃成了拨浪鼓。不管孙立人怎么说，杨参谋长就是不同意派孙立人去领兵解围，孙立人没有办法，只得跟他讲113团是自己训练出来的，他知道这支部队的脾气秉性，因为史莱姆并没有指挥中国军队的经验，如果孙立人亲自前去指挥，很有可能这场仗就打胜了。

杨参谋长实在讲不过孙立人，他最后绷着脸说：“军令如山，谁也改变不了！”

孙立人也急了，他说：“但军令是错误的，我们也要一定执行吗？”

杨参谋长尴尬地咳嗽了几声说：“只是擅改军令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孙立人一挺胸膛说：“现在不是讨论谁承担责任的时候，请孔参谋长禀报罗司令，等我打仗回来，我甘愿承担任何责罚！”

孙立人坐车直奔仁安羌前线，当他赶到拼墙河的时候，已经是18日的清晨了。

齐学启副师长和113团刘放吾团长从巧克柏当地区，领兵来到拼墙河北岸，正是17日的黄昏时分，借着朦胧的暮色，113团的将士发起了冲锋，很快便肃清了拼墙河北岸的日军。

战斗结束，史莱姆命令齐学启和刘放吾率领113团官兵渡河作战，解救英缅军一师的时候，齐学启很明确地告诉史莱姆：“将军阁下，我们现在要停止进攻，等候新38师孙将军的命令！”

英缅军一师的师长斯科特通过电报，已经连续向史莱姆求救，要知道现在他手下的官兵，已经断水48小时，军心涣散，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

但不管史莱姆如何下命令，113团官兵就是拒不执行，史莱姆真是气得七窍生烟。直到18日的清晨，孙立人英挺的身影，出现在113团前面的时候，史莱姆这才真正地知道了113团官兵不惜违抗命令，在苦等什么。

113团官兵经过一场行军苦战，晚上再休息不好，本来脸上已经尽现疲态，可是乘坐吉普车前来的孙立人刚一出现，113全团的官兵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一种莫大的惊喜，随后士气猛振，看官兵们精神抖擞的模样，别说攻打仁安羌，就是进攻仰光，113团的官兵，都会嗷嗷怪叫着往上冲了。史莱姆直到这时才明白，113团的将士们在等什么，孙立人就是113团的胆量，就是他们的军魂，就是他们一往无前的杀敌精神。

可是让史莱姆弄不明白的是，孙立人却做出了暂时停止攻击的决定，他打算利用一天的时间，将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然后在第二天拂晓，敌人防范最为松懈的时候，再进行突袭、攻击、解围和作战。

孙克刚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中，曾经这样记录道：

英第一军团长史莱姆将军对于孙将军这样做出完全的筹划，虽然表示十分钦佩，但怎样才能使他的被困部队立刻解救出来，却是他更焦急的问题，因为他接到被困的第一师师长斯科特将军的告急无线电话，报告被困官兵已经断了两天的水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便有瓦解的可能。所以史莱姆将军要求孙将军无论如何要立即渡河攻击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后来孙将军一再的解释厉害，并且请他打电话通知斯科特师长务需再忍耐一天。

史莱姆将军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斯科特师长又打来了第二次告急的无线电话，说是被围的部队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再也不能忍耐一刻了。史莱姆将军脸上显然是变了颜色，他凝视着孙立人将军，目光慌乱，神情紧张，但孙将军的态度却依旧是一样的平静，并再请史莱姆将军转告斯科特

师长说：“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再坚持这最后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将贵师完全解救出围。”

无线电话中又以焦急而怀疑的语气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孙将军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这句话使史莱姆将军大为感动，和孙将军郑重地紧握着手，认为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孙立人不立刻发动进攻，绝对是有道理的。首先，113团在白天武装强渡拼墙河，就等于背水一战，日军的精锐部队，就驻扎在河对面的501高地上，对113团的实力，一览无余，113团的兵力一旦展开，就等于硬碰硬地在打一场消耗战，113团的800名将士，怎么也敌不过人数众多的日军。

孙立人将自己对敌的战况分析一说，史莱姆也是连连点头，可是随后，两个人在团部的帐篷里，商量明日一早如何进兵解困的计划时，孙立人和史莱姆的意见又发生了分歧。

史莱姆的意思是，113团一旦渡过拼墙河，应该首先向日军的右翼发动进攻，因为他觉得，被围的英军一师就聚集在仁安羌的东北，也就是右侧，如果攻左，则双方队伍的内外夹攻的方向不一致，且解围后撤退也成问题。故此，向日军右翼发起攻击，绝对是首选良策。

孙立人却和史莱姆的意思正相反，他主张攻击日军的左翼。他要领着113团打一场速战速决之战，右翼多石山丘陵，一旦冲锋受阻，便有可能会功败垂成。

毕竟解困战和对攻战不一样，后者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而前者需要尖刀一样，猛地刺入敌人阵地，只要救出被围的英缅军，就等于完成了任务。

史莱姆最后同意了孙立人的攻击路线，孙立人的军事才华，让史莱姆开始相信，中国远征军中也有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

孙立人借着夜色，派人渡河到仁安羌去打探情报，情报很快被送了回来。首先是日军基本的布防情况，被孙立人摸清，再接下来就是，日军连日追击英缅军，只打得英缅军望风而逃，故此日军33师团，全都成了骄兵傲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河对岸的113团会敢于对他们发起攻击。

孙立人结合日军布防漏洞很多、士兵和军官大意疏忽的特点，连夜布置了解困的战术，那就是利用113师的训练优势——以连排班为单位，快速闪击，发挥近战的威力，让日军的先进武器无法发挥作用。113团虽然人数没有日军人数多，但只要113团的将士们敢打敢冲，相信一定能在日军的阵地上撕开一个口子，打赢这场解困之战。

第二天凌晨4点半，拼墙河上还飘着乳白的晨雾，日军还没从酣睡中醒来。而休息了一夜、精力充沛的113团官兵一个个摩拳擦掌，就等着孙立人下总攻的命令了。

孙立人一身戎装，手里握着手枪，威风凛凛地站在113团的一辆水车面前，他对着全团的官兵，说道："弟兄们，强渡拼墙河，开始攻击！……"

113团三营营长张琦担任了主攻营的营长，全团的轻重机枪，都被刘放吾派给了张琦，张琦对身后的士兵和军官吼道："子弹打到胸口是英雄，子弹打到屁股上是狗熊，跟着我，往前冲！"

战争开始的时候，枪炮声响成一片，为保证113团的指挥官的命令能够传达，张琦的身边跟着一个携带不同信号旗的旗手，通过旗语指挥士兵们发起进攻。

张琦一声令下，传令兵就举起了冲锋的旗帜，排在三营最前面的机枪手一起开火，密集的子弹飞蝗一样，疾风暴雨似地扫向了日军的阵地，113团攻击之前，史莱姆早已经通过电报，和斯科特约定好了里应外合的时间，现在的形势是，113团往里攻，而英缅一师往外打，战场上的形势原本是英缅军被包围，现在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逆转，变成了中国远征军和英缅军里应外合，合力夹击日军33师团的作间部队。

作间部队的指挥官作间乔宜在睡梦中，猛地被枪声惊醒了过来。他原本以为，英缅军被围在没有水源的仁安羌油田，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用不了一两天，就会被全部歼灭，他的升官美梦还没等做醒，那密集的机枪射击声，让他惊得倒吸一口凉

气，莫非有增援的大部队前来解困不成？

作间乔宜急忙抄起了电话，接连下了两道命令：1．立刻弄明白进攻的是哪支队伍；2．炮兵立刻向解围的部队发动炮击。

很快消息就被报了上来，进攻日军、解救英军的是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但现在都已经打乱了套，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由于113团的将士们冲得太快，日军炮兵发出的炮弹，竟全都落在了中国远征军身后的阵地上。

随着113团凌厉的攻势，日军也被打蒙了，33师团战力虽然凶悍，但在战场上却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老话，叫“横的怕愣的，愣的也怕不要命的！”

113团以班、排、连为单位，化整为零的冲锋，远了枪打，近了丢手榴弹，贴身就用刺刀，而且身轻体灵，在沙砾和沟壑间，快比旋风，孙立人这些年对士兵们进行的山地战训练，确实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13团冲锋的同时，英军一师的官兵们也从包围圈的核心部位，开始往外冲，因为事关个人生死，故此，也是一改绵羊般、被人追着赶的形象，英军一师的重炮和坦克，因为属于重兵器，已经无法随着撤退的队伍一起突围了，故此，他们在突围开始时，将剩下的炮弹，全都倾泻到了日军的阵地之上。

孙克刚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这部书中，曾经记录了这场激烈的战斗：

> 第三营长张琦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拼出“弟兄们，杀呀！”的呼声！弟兄们眼看着自己的长官壮烈地倒了下去，心头热辣辣地默念着他最后所发出的口令，含着眼泪，前仆后继地拼死冲杀上去，一直冲上了油田，山坳里、油田边，都积起了一堆堆的尸丘，这一场火网中夹杂着白刃肉搏的大战……

113团冲锋的队形是个倒三角，并用轻重机枪开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厉害的精兵和武器都摆在前面，先声夺人，打得日军缓不过气来。很显然，孙立人排摆的攻击阵型是正确的，日军所设置的三层包围圈，被冲开了两道，从早晨4时半开始到下午2时许，113团已经杀到了日军位于敦贡村北的501和502高地前。最后

被高地上密集的火力给阻住了。

这两个高地，就是仁安羌地区最高的两座小丘陵，如果是在山地作战，这样的小丘陵根本可以忽略，但在平地作战，只要占据了这两个高地，便可俯视和控制整个仁安羌战场，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中国远征军和日军围绕着501和502高地，展开了拼死的争夺。最后，经过三失三得，中国远征军以钢铁般的意志还是战胜了日军的凶残和顽固，这两个高地，终于被孙立人牢牢地掌握到了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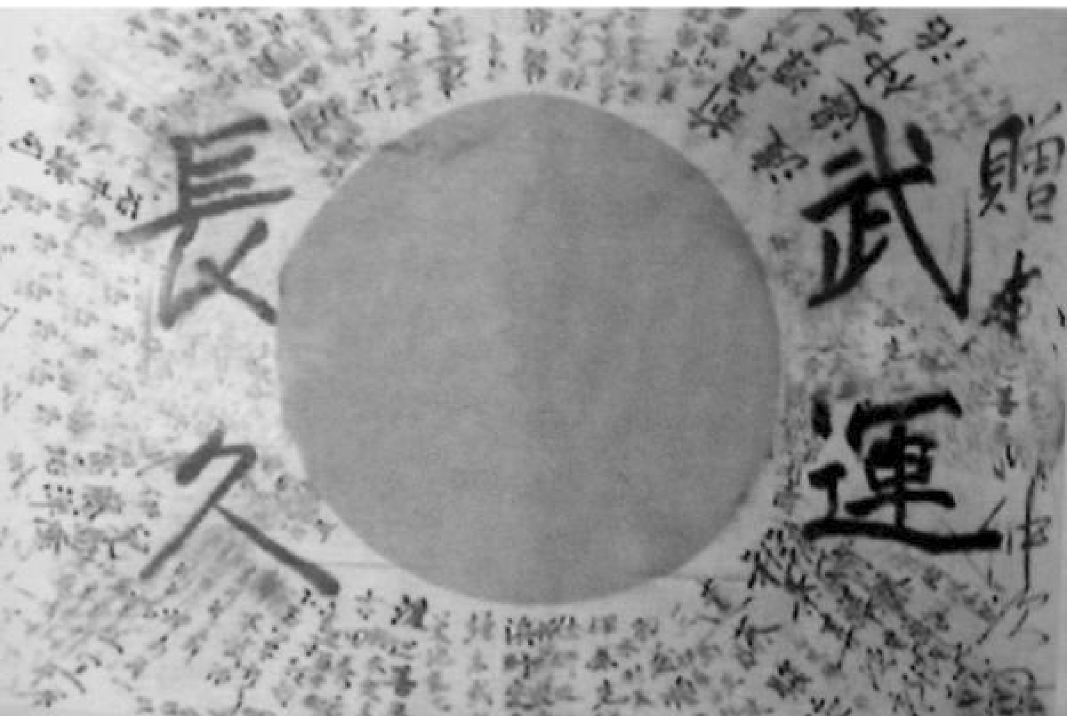
激战一直进行到下午6时许，113团就像一把尖刀，在日军围困英缅军的三层防线上，硬是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英军沿着大口子，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逃了出来。

被困三日的英军，本以为除了缴械投降，绝无第二条选择，谁承想新38师的113团，硬是用鲜血和生命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逃生之路，其喜悦的心情，自然溢于言表，他们有的人高呼着——中国万岁！中国军队万岁！有的干脆也不顾危险，猛冲上来，兴奋地抱住113团的战士，一个劲地大喊——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谢谢你）。当然有更多的人，冲过来找113团的官兵讨要中国面包——夹着咸菜的冷馒头，充饥解饿，填充五脏庙。

英军老兵上尉菲茨帕特里克当时就是被孙立人解救的对象，他回忆起那段峥嵘的战争岁月，也是充满了感慨。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了那段峥嵘的岁月：1942年3月5日，他所在的英军第一师退到仁安羌，并在那里被日军包围，而菲茨帕特里克所属的步兵营也从原先500人锐减到120人。

1942年4月19日，中国远征军第113团的突然参战令局面为之大变。当时，菲茨帕特里克看到从远方开来多辆斯蒂庞克牌汽车，每辆车上都载着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根据参加过仁安羌老兵的回忆，当时113团官兵并没有汽车），他们一下车就投入战斗，目标是歼灭突入仁安羌油田里的日军，为英军突围打开缺口。当中国军队向油田进攻之际，日军阵地上的步机枪火力顿时强化了，这说明日本人也在拼

命堵截，不希望“煮熟的鸭子（被围英军）飞了”。中国军人靠着灵活的战术和英勇的冲杀，逐渐瓦解了日军的抵抗……



仁安羌大捷缴获的日军军旗。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名受伤的中国士兵，在接受包扎时仍紧抓着步枪不肯放手，这种“枪不离手”的严格纪律与战斗意志，令菲茨帕特里克至今仍感钦佩。

前英军上尉杰拉尔德讲述获中国远征军解救的经历时候，曾经这样说：“（他们）像一部适合缅甸中部地形地貌最完美的作战机器在运转，是如此地纯熟，简单有效，干净利落。”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档案战报》记载113团将士共解救英缅第1师7000余人，英军俘虏及美传教士、随军记者等500余人突围，为了取得这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唯一一次胜利——仁安羌大捷，113团共阵亡兵员204人（长官15

人、士兵189人）、伤318人（长官24人、士兵294人），生死不明20人，伤亡总计500多人。

其中日军共伤亡1400余人，伤亡人数为中国远征军的两倍，而英缅军在此次战斗中四个车载步兵营、一个坦克营、两个炮兵营遭受毁灭性打击。

孙立人在仁安羌取得胜利的捷报传到了瓢背盟军司令部，司令部中立刻便被欢乐的气氛所笼罩了。史迪威兴奋得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作为缅甸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了。

要知道在这段战火纷飞的日子，史迪威的心情沮丧之极，英缅军节节败退，中国远征军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战绩，史迪威正发愁不知道如何向中美两国的总统汇报“战况”的时候，孙立人竟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胜仗，史迪威兴奋地叫道：“好得很，这家伙太有种了，又不怕打仗，一个货真价实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孙立人，我希望英国人永远记住孙立人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亚历山大作为英缅军的总司令，孙立人解仁安羌之围，救7000英军于水火，他自然要表示一下，1942年5月3日，亚历山大给孙立人发出了一份至谢函：

孙师长将军麾下：

谨代表我军第一军及其他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诚襄助及贵师英勇部队援救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致谢忱。本人奉英皇陛下命赠阁下以“英帝国司令（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勋章”尤感欣慰。因阁下受命掩护贵国第五军之故，未得盘亘，殊以为憾！

谨祝阁下及无比之贵新38师康泰百益

缅甸作战区统帅：亚历山大上将

史莱姆将军作为仁安羌之战的直接参与者，对这场战争的凶险，自然要比亚历山大有更深的体会，故此，他的感谢函就写得更加情深义重，答谢的意思表现得更加真切。史莱姆在信中这样写道：

孙师长将军勋鉴：

欣喜亚历山大上将已代表英皇赠阁下以“英帝国司令”荣誉勋章，借兹表扬。

阁下对鄙第一军无价之援助，为此敬请接受本人及鄙军全体官兵之衷心感谢敬贺。在未将该勋章奉上之前，谨先将该勋章之绶带奉呈，敬乞佩戴为祷。谨此再申谢忱，并代表全体官兵致意。

史莱姆中将（签字）

五月三日

相对于“激动不已”的史迪威，还有“谢字在口”的英缅军的将军，罗卓英和杜聿明都表现得“甚为纠结”，孙立人此役虽然获胜，但却属于私自领兵，擅自作战，说句好听的话，孙立人是自愿承担责任，说句不好听的话，孙立人就是违抗军令，蔑视长官。

蒋介石来缅甸视察的时候，就曾命孙立人一定要死守曼德勒。孙立人虽然救了7000名英缅军，但113团的将士，也是损伤一半。英缅军在缅甸战场，除了逃跑和撤退，实在看不出他们能做出什么对中国远征军有利的事情。

113团用阵亡204人伤318人的代价，换来了美英两方的赞誉，对此战绩，罗卓英和杜聿明都觉得不值。但碍于史迪威和亚历山大的面子，两个人也不好说什么，当即拟电报，将仁安羌大捷上报给了重庆的蒋介石。

罗卓英在电报中，只是叙述了这场战斗发生的过程，以及取得仁安羌胜利的经过，至于孙立人“擅自”行动，领着113团的官兵，去仁安羌解围的经过，作为蒋介石嫡系的杜聿明，也已经在暗中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也需要一场抗日战争的胜仗来撑门面，故此，他并没有责怪孙立人，并在不久之后，奖给孙立人“四等云麾勋章”一枚。刘放吾获得了“六等云麾勋章”、阵亡的三营营长张琦亦被盟军追赠“银星勋章”一枚。副师长齐学启、参谋长何均衡等和各营营长分别获得嘉奖。

国民政府的军职勋章共分6种，即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宝鼎勋章、忠勇勋章、云麾勋章、忠勤勋章。首先看一下排在倒数第一的忠勤勋章的颁给条件：此

章颁给陆海空军军人，凡服军职十年以上未兼外职，其服务成绩在近十年内……即可获得。云麾勋章排在倒数第二位，只比忠勤勋章强了那么一点，可见蒋介石对这场震惊世界的“仁安羌大捷”的“重视”之程度。

正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代表英皇乔治六世向孙立人颁发“英帝国司令”勋章。英国勋章分五级，司令勋章（Commander，简称“CBE”），排在第三。

孙立人后来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国会勋章”（国会勋章是美国国会根据1862年的国会法而设立的，授予美国军人的最高级别奖章，第一位获得者为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罗斯福在颁发颂词中写道：“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的指挥歼灭强敌，解救英军第1师之围，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移，于千辛万苦之中，转战经月，从容殿后，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国内《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众多报纸，以及英美等国际大报，都以头版头条对仁安羌大捷以及这场胜利的指挥者孙立人，给予溢美非常的报道。

孙立人的头脑是冷静的，他没有被那些溢美的报道冲昏头脑，他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原因，做出了非常中肯的分析：“敌寇与英军作战几个月，英军只是后退，从不对敌施行一次强烈抵抗，养成敌人骄气，忽于此同一战场同一时间，遇我军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使敌军突然转居被动地位，一时莫知所措，只有挨打！而我官兵在国内已经一年余的严格训练，一般战斗技术都能发挥典令精神，早已跃跃欲试；而干部都是经千锤百炼的战士，得心应手的手足，个个都知耻近勇，逢此千载一时出国远征作战的机会，当然紧紧把握，毫不放松，故士气异常旺盛，人人争先，以战胜为志，甚至以战死为荣！”

根据孙立人的一位下属回忆，《中央日报》随军记者戴广德、《大公报》记者吕德润，他们采访孙立人的时候，曾经谈到勋章的事情，孙立人感叹地说：这个勋

章，是我弟兄们用血肉换来的哟，我一个人赏受荣誉，我心实在难安呀！



孙立人

这里有个事儿需要强调一下，那就是按照国军的惯例，战役的胜败是长官负责制，如果孙立人没有去仁安羌，那么这场战斗的失败和胜利的责任就由齐学启负责，如果齐学启不在，那么就由刘放吾一个人负责。这场战争，在当时99%的人看来，绝对是必败的一战，孙立人挺身而出，来到仁安羌前线，替齐学启和刘放吾承担了压力，让113团的官兵轻装上阵，孙立人是冒着去职，甚至是上军事法庭的重责，才打赢了这一战，故此，仁安羌之战的胜利，主要功劳算在他的身上，这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事情。

曾在38师当过翻译官的梁家佑回忆，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兵说，他们看到的总

是“印度人的手（举手投降）、英国人的屁股（逃生）和中国人的尸首”。

在当时的国内，由于日军挥舞着侵略的魔爪，铁蹄一路狂奔，国内一半的领土都已沦陷，不管是民众、士兵还是高官，他们的心里都弥漫着化解不开的恐日情绪。仁安羌一战的胜利，其胜不在杀伤多少日军，也不在救出了多少英缅军，而在于以少击多，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孙立人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他眼关全局，目光深远，他用仁安羌之战的胜利，取得了英缅军队对中国远征军的高度认可，并为第二次缅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仁安羌大捷，让中国远征军，获得了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普遍尊重，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中的地位。中国就是大国的观念，获得了英美等国家不同程度的认同。



在正面战场上，没有哪支军队像新一军这样历尽波折，大起大落；也没有哪支军队像新一军这

样战绩辉煌，在国门之外扬我国威。

第四章　转进印度，卧薪尝胆学勾践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蒲松龄

第一次缅战面临着失败的结局，中国远征军除了撤退，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当时，关于撤退的路线，孙立人和杜聿明却产生了争执。

杜聿明的意见是，中国远征军应遵从蒋介石以重庆政府军政部的命令，必须撤回国内。而孙立人的意见是，取道印度，在印度就近练兵，保存火种，积蓄力量，为第二次缅战，创造有利条件。

其实，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印度条件再优，也没有“回家”对中国远征军的官兵们有吸引力，孙立人也知道，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会有什么后果，但现实的情况是，日军第56师团已经占领了腊戍，中国远征军的退路已完全被切断，杜聿明为了归国，他率领精锐的新五军，开始翻越野人山，可残酷的事实是，新五军两万人进山，大多葬身于恐怖的原始森林，仅2千多人出山生还。

孙立人撤往印度，保存了新38师完整建制，究竟撤往印度是对是错，孙立人在撤往印度的途中，又遇到了哪些险阻？孙立人在印度建军，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1．撤兵，败军亦是可言勇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过零丁洋》

曼德勒大会战，因为部队的调动不到位而最后成了充饥的画饼，可是腊戍的失守，却让中国远征军无路可退。孙立人爱兵如子，如果选择撤回国内，绝对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但他怎么能忍心让自己手下的弟兄去拿生命铺平回国的道路，他决定转进印度，他决定在那里训练出一支精兵，为第二次缅甸会战做准备！

与其战于城，宁战于郊，这是兵书上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与其守城等着敌人来战，还不由主动寻找有利时机，将敌人消灭在城外。孙立人对这句兵家名言有很深的感悟和理解。

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古代，只要粮草充足，可以据城坚守多年，随着火炮坦克等攻城利器的大量使用，守城已经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蒋介石坚守曼德勒的策略，孙立人虽然满口答应了下来，可是面对凶悍的日军，能不能守得住曼德勒，他的心里也是没有谱。

孙立人经过了仁安羌之战后，他的新38师划归了第5军，目前杜聿明是他的顶头上司。孙立人率领113团打了日军33师团一个措手不及后，中国远征军士气高涨，孙立人决定暂不守城，而是调李鸿的114团、陈鸣人112团到伊洛瓦底江，会同刘放吾的113团，歼灭日军33师团一部，斩断侵缅日军的一只魔爪，并努力扳回中国远征军在西线被动挨打的劣势。

孙立人的计划虽然可行，新38师的官兵作战的勇气高涨，但现实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英缅军已经被日军吓破了胆，他们一心想撤回印度，根本就不想和日军打仗。

孙立人的作战命令刚发出去不到半个小时，陈刘两位团长就先后来电话报告：部队已经进入阵地，十分钟后，便可发起对敌之进攻……就在这剑拔弩张、战斗即将打响的一刻，英缅军的罗伯特上尉坐车来到了孙立人的师部，并向他传令：立刻

取消这次进攻计划，火速带领部队，向巧克柏当聚集，为打赢巧克柏当会战做准备。

巧克柏当在曼德勒以南200多公里处，是一个不大的小镇，距离孙立人刚刚血战过的仁安羌只有不到一百里的距离。可以这样说：巧克柏当就是拱卫曼德勒的前哨阵地，守住了巧克柏当，就等于守住了曼德勒，打赢了巧克柏当会战，就是打赢了一半曼德勒会战。

孙立人对于进攻日军33师团的战斗，心里还是有取胜把握的，因为根据具体的情报分析，虽然日军33师团从总人数上超过新38师，但日军作间联队刚刚吃了败仗，士气低落。113团刚刚打了一个胜仗，虽为疲师，但战斗的勇气仍在，112团和114团没有捞到仗打，他们满腹都是渴战的情绪，故此，这场战斗，38师从精神和气势上都占了优势。

孙立人经过仁安羌之战后，他对日军的作战风格、单兵实力以及整个联队的战力，都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他相信，只要新38师在夜间发起攻击，打一场最擅长的夜战，完全有可能击溃日33师团。

只可惜新38师作为中国远征军中的一个师，孙立人虽然可以为113团弟兄们的生命考量，并冒着抗命的危险率队去解仁安羌之围，但他却不能不听从调动，要知道，一旦耽误了巧克柏当会战，那可就是影响整个缅甸战局的大问题。

孙立人无奈之下，只有挥师撤兵，日军33师团的谍报人员，早已经探听到了孙立人部移师伊洛瓦底江的情报，该师团的官兵，正在紧张地做着被攻之前的准备，新38师突然撤退，真是让樱井省三感到疑惑不解，日军33师团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新38师撤走，他们还以为这是孙立人的疑兵之计，故此，他们并没有胆量随后追击。

由于仁安羌之战失利的缘故，战斗的直接指挥者作间乔宜大佐遭到了降职的处分，孙立人部队离开了仁安羌地区后，日军随后将该地区占领，仁安羌大捷所能带来的实际战果重新归零。

孙立人率领新38师来到了巧克柏当后，便开始抓紧时间构筑阵地，可是不久之

后，孙立人便接到了英军总部的命令，让他放弃巧克柏当构筑的阵地，全师向北撤退。

军令难违，孙立人只得领兵撤到伊洛瓦底江的北岸，进驻色格，掩护英缅军一师和中国远征军新五军的撤退。

要知道在一场战争中，掩护大部队撤退的队伍，一般可以被视为舍卒保帅的弃子。孙立人的新38师战力雄厚，他怎么会甘心去做弃子？随后，孙立人在杜聿明新五军军部中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他对当前缅战的形势，做了一次深入的分析。

孙立人说道："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味撤退，撤退就意味着挨打，我们应该主动寻找战机，针对发动双重钳形攻势的日军，寻其弱点和纰漏，借机歼灭日军，以求在战争中，改变缅战的局面，并乘机收复仰光，打通滇缅公路！"

日军在缅甸战场上，用的是双重钳形攻势，想要弄明白双重钳形攻势，首先要明白钳形攻势究竟是什么。

"钳形攻势"以蟹之两钳，来比喻两路用兵。其主要形式是以一只蟹钳（明兵）来吸引钳制对方，以精锐的另一钳（暗兵）来实施截击、包围和歼灭敌军。这种"钳形攻势"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成熟的用兵方式！

"钳形攻势"比较有名的三个战例是亚历山大所惯用的"打铁战术"；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完胜了八万人的罗马军团；最后一个是德国战胜法国的"施利芬计划"。

而双重钳形攻势指的是，日军以三只蟹钳对中国远征军以及英缅军作战，一只蟹钳（明兵），日军以18和55师团攻占同古，进逼曼德勒，吸引中国远征军主力；另外两只蟹钳（暗兵）东路日军第56师团进攻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归国之路，西路日军第33师团追击英缅军到卡内瓦，切断英缅军退往印度之路。

如果日军不是派出第56师团和第33师团去断英缅军、中国远征军的后路，恐怕曼德勒会战早已经打响。孙立人的意思是，中国远征军和英缅军需要和追兵周旋，而且缅甸所谓公路，多为颠簸狭窄的铺石土路，根本不适合大兵团快速撤退，再加上敌机轰炸，中英两方军队撤退的速度一定会大受影响，而日军56师团和33师团这

两只蟹钳（暗兵），一定会抢在中英两方军队完成撤退任务之前，断掉双方的退路。

孙立人的意思是，与其到时候被包围，不由现在就变退为进，兵分三路，一路借中路日军，攻势不急的态势，对之予以适当之抵抗，延缓其进军的速度；一路兵进卡内瓦，联合英军消灭日军33师团，最后一路为中国远征军主力，应急速北进回师，歼灭奇袭腊戍之日56师团，借以巩固大后方，为将来的大反攻，做先手的准备。

可是孙立人的计划，却遭到了杜聿明的忽视。他说道："三路进兵的计划干系太大，不仅需要报盟军指挥部，而且需要报委员长批示！……"

也许杜聿明觉得，孙立人对缅战战局分析得太过悲观，严守腊戍的张轸手中握有两个师的重兵，而且是以逸待劳，早就修好了坚固的碉堡和工事，即使日军56师团的攻势很猛，也不会那么快就丢掉腊戍要地吧？

孙立人歼敌的计划，太过冒险，仁安羌一战，孙立人冒险得胜，如果失败，盟军的最高指挥部不追究孙立人指挥不利的问题，恐怕南京的军事委员会，也得追究孙立人擅自行动的责任。杜聿明要是按照蒋介石拟定好的计划，开始领兵从缅甸撤退，他即使损兵折将，回到国内，也是首功一件，可真要是按照孙立人的计划进攻，即使杜聿明将日军全部消灭，收复了仰光，他拿着打通滇缅公路的功劳到重庆去见蒋介石，他也会因为不听蒋总裁的命令，而会永远地失去宠信！

孙立人一见劝说不了杜聿明，他在4月30日，又去找英缅军的总司令亚历山大，他向其建议道："请英方配给新38师一些重炮和坦克，只要有了这些武器，新38师就可以向准备占领卡内瓦、切断英缅军退路的日军发动进攻！"

亚历山大对孙立人的建议，连连摆手，说道："此建议非常好，但英缅军已经在实施撤退的计划，那些重炮和坦克，一无炮弹的供给，二无汽油可以开动，实在无法配给贵军了！"

孙立人两方献计，无功而返，只能继续做他在中英两方面撤退中的掩护工作，

由于西路日军未遇抵抗，全速前进，终于早在英缅军撤往印度之前，占领了清德温江的渡口卡里瓦，英缅军的辎重、坦克、大炮等武器，全都未及渡江，便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孙立人率领38师，成了中英军两方撤退所共用的掩护部队，经常走马灯似的被调来调去，在新38师一路战斗、一路掩护的途中，曾经发生过三件事，从这三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新38军所处境遇之艰苦，以及孙立人屡次让全师官兵履次化险为夷的高超指挥才能。

第一件事，可以看出孙立人的胆气。1942年4月27日下午，为掩护英缅第一军第17师，以及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安全撤退，新38师的两个连队，负责垫后掩护。孙立人不放心这两个连的安全，他便跟随这两个连队走在了后面。

当时孙立人领着一个连队，穿村而过，上了村后一座四米宽的大河桥。走在后面的连队，连长就是叶英周，他的队伍被紧追不舍的日军追上了，两方开始交火，因为日军进攻很猛，叶英周的连队一时间无法撤退。

英缅军第17师的一名上校指挥官，早已经被身后传来的日军密集的枪炮声吓破了胆，他指挥手下的士兵，将两麻袋炸药摆在了桥中间，便要不顾后面打掩护的叶英周连一连官兵的生死，准备“轰”的一声，将这座水泥桥炸掉。

孙立人“嗖”的一声，拔出了手枪，他用手枪指着英军上校的脑门，大声斥道：“我的军衔比你高，是你的上级，我的话就是命令，你若敢新38师战士的安危于不顾下令炸桥，我立刻一枪打死你！”

英国上校一是理亏，二是被孙立人的一顿正义凛然的训斥给吓住了，他诺诺连声，接下来转身便逃，孙立人双手叉腰，站在头顶子弹乱飞的桥头，岿然不动，叶英周连激战半个小时，这才找个日军攻击的间隙撤了下来，当满身硝烟的官兵们全部撤过大桥后，孙立人这才将手一摆，发出了炸桥的命令。

孙立人为了一连士兵的性命，竟甘愿冒着被炸的风险，这份胆气，在国军的队伍里可不多见，将惜兵，兵爱将，官兵团结，如臂使手，如手使指，这样的军队的

战斗力就会非常惊人。

第二件事，可以洞见孙立人临危不乱的指挥才能。

孙立人部在掩护中英两路军队撤退的过程中，112团陈鸣人率领队伍在后面打掩护，在蕴藻镇的郊外竟被尾随的日军给包围了。包围陈鸣人一团人马的日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有8门重炮，8辆坦克，形势紧急，危如累卵。

孙立人决定杀个回马枪，将112团的弟兄们救出来，孙立人命114团原地转身，向刚刚经过的温澡镇急行而去，当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开到温澡镇的时候，他们还以为面对的是一座空镇，谁曾想114团的官兵怒吼一声。杀了出来，当时就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114团官兵用集束手榴弹，干掉了几辆耀武扬威的日军坦克，坦克后面的日军立刻便被114团官兵枪口射出的子弹打得抱头鼠窜。他们真的不会想到，原本被日军追得一路撤退的中国远征军，竟然还有一战的能力，更让这些日军想不到的是，114团的官兵，不仅有一战的能力，而且不论单兵的作战能力，还是整个团的集体的战斗力，都超过了同等建制的日军。

孙立人已经通过无线电，和112团的陈鸣人约定好了时间，他在温澡镇开始发动攻击的同时，112团的官兵也开始了突围作战，两方面同时打响，一场里应外合的恶战过后，不仅112团解困突围，凶悍的日军亦横尸八百。

温澡镇一战过后，随后紧追不舍的日军，也就知道了孙立人的厉害，他们再也不敢追得过急了。

第三件事，可以见识到新38师的军人之魂。

齐学启湖南宁乡人，生于1900年，他是新38师的副师长，在仁安羌战役之后，孙立人率队分别为中英军队打掩护，齐学启奉命去新五军军部联络工作，因战事突发，军情紧急，一度与新38师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只得随同第五军军部一起撤退。

因为在转战的过程中，齐学启收容了十余名新38师在卡萨一战中掉队的伤兵，因行动迟缓，而又与新五军失去了联系。1942年4月23日，齐学启领着众伤兵在转

移的过程中，遭遇日军，齐学启拔枪战斗，并对负伤的官兵说："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

一场激战，齐学启中弹昏迷，被日军所俘，日军从军服上，识出齐学启为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便立刻为其包扎伤口，并将其送至荷马林旅团部。

齐学启苏醒后，怒斥日军旅团长等人："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速枪毙，勿多言。"

日军经过多次劝降未果后，便将齐学启送至仰光监狱，关押了起来，1944年5月，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派陆军部长叶蓬等一行12人，前往缅甸劝降，遭到齐学启的怒斥，1945年4月，齐学启将军腹部被日寇买通的奸细刺伤，因其不肯向日寇投降，直到5月13日晚10时30分，伤口溃烂发炎而至牺牲。

1945年5月14日，《大公报》仰光特派员黎秀石，在重庆《大公报》的仰光专电中，这样报道了齐学启将军去世的消息：

齐将军的确是中国的伟大军人，他是中央监狱里数百战俘中最受人爱戴与最能给人援助的人物，在英美袍泽的眼里，他是黑暗时期的光明与鼓励的源泉……有一位解放了的盟军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在解放前夜被谋杀了，这是最惨不过的事，但我向你保证，齐将军将长留在我们的心里，他是我们最黑暗的日子中最伟大的友人。"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结果，孙立人以敏锐的眼光，早就预料到了，日军用双重钳形攻势，同时断了中国远征军与英缅军的后路，现在的情形是，中英两支军队，同时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英缅军既定的撤退路线是渡过清德温江（亲敦江）的重要渡口卡里瓦，从那里直接去印度，日军虽然最后占领了卡里瓦（今葛礼瓦）渡口，但这时的英缅军已经大多从卡里瓦渡江成功了，还没有来得及从卡里瓦渡江的英缅军，只得另找其他渡口渡江，清德温江是伊洛瓦底江最大的支流，全长880公里，渡口众多，英缅军从其他渡口渡江，照样可以西去印度。

也可以这样说，日军的兵力再多，也无法控制住清德温江所有的渡口，故此，英缅军从其他渡口渡河，虽有伤亡，但在中国远征军的全力掩护之下，还是成功地退到了印度。

1942年5月10日，孙立人带着新38师主力继续为主力部队的撤退断后，可是随后传来的消息，却让他感到了一阵阵的心寒。

1942年4月29日，渡边正夫率领的日军第56师团，开始全力进攻腊戍，驻守腊戍的张勋虽然有两个师的兵力，但根本就不是日军56师团的对手，他们只是坚持了3个小时左右，便彻底崩溃，腊戍——中国远征军设在缅甸的最大的后勤基地，就这样被日军轻易占领了。

腊戍就是中国远征军回国的必经之地，如今此地失陷，就代表着中国远征军回国的道路，彻底断掉了。

这时，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在缅甸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卓英、杜聿明、孙立人等人，当然史迪威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有三个议题，一是总结前一段入缅作战的经验教训，二是通报目前危险的形势，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商议撤兵的路线。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杜聿明拿出了蒋介石的密电，电文上是这样写的：

> 蒋委员长密电，转史参谋长、罗长官：
>
> 滇缅公路惠通桥已西被敌占领，速向密支那和片马转移，勿在犹豫停顿。
>
> 1942年4月30日

杜聿明很直接地表示，他要撤兵回国。虽然腊戍已经落入敌手，但密支那（距离国内仅50公里）和片马等地区还未被日军占领，即使这两个地区出现变故，从这两个地区再往西，还有漫长的高黎贡山脉，只要翻过了这座山，日军断掉中国远征军退路的计划，就将彻底落空了。

罗卓英和史迪威都不同意杜聿明的撤兵路线，他们想走英国人走过的道路，首

先渡过清德温江，然后找个背靠印度边境地方扎下军营，只要摆脱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至于以后，是乘飞机回国，还是到印度去借地练兵，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了。

罗卓英是一位儒将，脾气好、有休养、文化高，蒋介石任命他成为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实在是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史迪威个性强，讲话直言不讳，很多人认为他尖酸刻薄，故此送给他一个绰号，叫酸性子乔。

如果在杜聿明和罗卓英之间做一个选择，蒋介石会更看重杜聿明，但杜聿明脾气不佳，如果让他担任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势必和史迪威吵翻了天，罗卓英和史迪威却不会吵架，而且能够很好地合作。

杜聿明看着孙立人，他用眼睛一个劲地鼓励这位军中的实力派发言，只要孙立人能够支持自己，翻越高黎贡山脉的想法便有可能变成大多数的意见，最后落在实处，就会变成具体行动的方案。

可是孙立人却明着和杜聿明唱反调，他说："我赞成西去印度的撤退路线！"

孙立人告诉杜聿明，翻越高黎贡山脉应该可以回到国内，但有一点，那就是缅甸的雨季即将到来，一旦雨季来临，翻阅高黎贡山脉，所面临的困难势必成倍增加。

缅甸如果按照雨季分，可以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下缅甸以仰光为中心，雨季从4月10日左右开始，大概10月止；中缅甸以首都内比都为中心，雨季从4月25日左右开始，大概10月止；上缅甸以曼德勒为中心，雨季从5月10日左右开始，大概10月止。

一旦到了雨季，雨水连绵，山洪频发，林无干柴，粮食发霉，兵无住所；再加上雨湿路滑，荒山野岭，树木丛生，瘴气弥漫，翻山归国，千里迢迢，势必会困难重重，凶险万分。

中国远征军如果选择距离最近高黎贡山系的野人山翻越，这段路程也有千里之遥，而中国远征军距离印度的边境，只有三百里，孙立人的意思是，请杜聿明批准

38师在完成任务后，取道印度的大吉岭，然后经过印度境内回国。

史迪威和罗卓英官职比杜聿明高，杜聿明拿他们没办法，可是他见孙立人公然和他唱反调，却非常气愤，他当即表示，中国远征军应该同进同退，只有通过野人山，返回国内，才是唯一的正确撤退路线。

这次会议后，也就是5月8日，史迪威和罗卓英领着司令部的人马，共114人，他们经过靠近唐都的渡口渡过清德温江，然后徒步去了印度，他们到达英帕尔的时候，是5月22日，一共走了14天。

据资料记载，史迪威严格按照西点军校的行军操典走路，即每小时行军50分钟，然后休息10分钟。虽然很多人对史迪威多有怨言，但他却兑现了出发前的承诺："所有的人必须无条件跟着我走，我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活着出来，包括妇女！"

最后，114人全部到达印度，无一死亡。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这样说道："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

蒋介石得到杜聿明的电报，不由得怒气冲天，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了不说，史迪威和罗卓英竟要去印度，孙立人也要步两个人的后尘，他们拿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也太不当一回事了。现在的缅战已经打乱了套，蒋介石根本就无法联系到自己曾经倚重的史迪威，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愤然写道：

> 史迪威擅自令我华军赴印度，而彼且离开队伍，先行赴印。并无一电请示。此种军人，殊非预想所及。然此乃余考察无能与信人太过之罪，而于人何咎！

孙立人因为在撤兵的军事会议上，和杜聿明的意见相左，故此，他领着38师撤军的时候，被第5军夹在了中间，可是戴安澜的200师在一次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过程中，该师为吸引日军，故意向第5军行动相反的方向撤军，一场战斗结束，200师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杜聿明为摆脱日军的追击，孙立人的部队又一次被起用，

新38师继续担当起掩护中国远征军撤退的任务。

为了阻击紧追不舍的日军55师团，杜聿明竟令几乎减员一半的113团去卡萨（卡沙）阻击日军，虽然刘放吾团长完成了阻击的任务，但经过这场激战，113团弹尽粮绝，几乎丧失了战力，113团完成了任务后，退守卡萨以西之山地，四处打听新38师的消息，苦苦寻找着归队的机会。

新38师的113团在卡萨战斗中，已经和新38师失去了联系，而孙立人率领的112团和114团，也和杜聿明的新五军失去了联系。但新38师连番激战，掩护的效果显著，杜聿明的第五军，已经撤到了相对安全的地点。

孙立人掩护的任务完成，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不效法杜聿明，去走翻越野人山的死路，而是折路向西北行进，准备渡过清德温江，然后直奔印度，再从印度绕路回国。

孙立人率领着两个团，虽然是在撤退，但却是一边寻找战机，一边消灭追敌的有生力量，故此，尾随的日军吃尽了新38师的苦头，他们被打痛了之后，也不敢迫得太紧，112团和114团的撤兵之路，虽然紧张，但不慌乱，甚至可以说是从容不迫。

在缅甸撤兵的队伍中，还有一支队伍也是撤出了水平，这支队伍就是廖耀湘的新22师。

在同古失守后，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的廖耀湘也需要在后面，为主力部队打掩护，他就摆出了一个滚筒撤退的大阵，滚筒撤退是法国军队在实战中创立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撤退方法，是将一支部队分成甲乙两个单元，甲部队在前面战斗，后面的乙部队挖工事，掩护甲部队撤退，甲部队撤退到乙部队身后，继续挖工事，掩护乙部队撤退，双方互相交替掩护，使撤退所受的伤亡最小，但成效则最大……廖耀湘就是用此阵，在斯瓦硬拖住了日军21天。为主力部队的后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也大大地显示了一次中国远征军指挥官卓越的指挥才能。

新38师在缅甸的密林中，折路向北后，很快就甩掉了日军的追击。孙立人脱离

了危险之后，就分别给66师的师长张轸、中国远征军的司令罗卓英，还有重庆的军委会拍电报，申请去印度的命令，可是这三份电报，根本就拍不通。

最后，孙立人的电报拍给了在印度的史迪威，不久之后，史迪威回电：同意新38军赴印！

史迪威是中英美盟军的“最高”指挥官，有了他的命令，孙立人终于能安心地移师印度，不用再担心重庆的军委会跟他秋后算账了。孙立人在出发之前，他不忘给113团拍了一份电报，可是却始终也无法联系到刘放吾团长。

虽然113团减员严重，但刘放吾足智多谋，相信一定能带领全团的官兵在缅甸战火纷飞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孙立人随后命令112团和114团官兵，避开敌军主力，首先翻越野人山系南端的巴豆开山（巴特开山），接着横渡清德温江，最后取路直奔印度的英帕尔（因帕尔）。

孙立人新38师的两个团，经过日夜兼程，虽因道路不熟，也曾迷路，但在缅甸向导的带领下，他们在5月16日，到达了刊帝，从刊帝往前，就进入到了缅甸的山区，横在新38师官兵面前的，全都是陡峭的高山，山上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林内荆棘丛生，藤萝缠绕，别说是人，就是猿猱，都难以腾挪转身，翻山而过。

幸而沿着山涧深谷，可以涉水而上，谷中之水，浅处及膝，深处过腹，38师的两团官兵，在孙立人的带领下，趟了几乎一天一夜的水，这才走出了深山，当大家上岸后，官兵们都有一种从鬼门关脱身的感觉，一个个喜笑颜开地祝贺，幸亏时间还没到缅甸的雨季，否则全师的官兵恐怕就得葬身在滚滚的山洪之中了。

孙立人整理队伍，全师的官兵只是简单地吃了顿饭，稍事休息了一下，然后他讲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渡江。由于清德温江上游地处山区，西路敌军主要集中在卡里瓦一带，而地处山区的渡口日军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孙立人选择旁滨（Paungbyin）和南先庆（Nawngsankyim）为渡河点。相信一定能出敌不意，渡江成功。

38师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终于在5月18日的下午，来到了清德温江左岸的旁滨

渡口。孙立人果然估计得不错，旁滨并没有日军的主力，只有敌人第五纵队出没，宽阔的江面之上，不时还有日军巡江的炮艇虚张声势地开过。

孙立人一边让战士们大张旗鼓地砍来竹子，扎制竹筏，以作渡河的工具，他一边派人去找当地的县长。孙立人让手下去找县长的同时，还让两团的官兵们，在旁滨渡口热火朝天地筑起了工事。

由于日本便衣特务的反动宣传，缅甸当时的老百姓不仅反对英国殖民者，对于中国远征军也是充满了抵制，孙立人一眼就看出，贼眉鼠眼的县长就是一个“缅奸”，孙立人之所以要找他过来，就是要让他看一眼新38师的实力，然后让他给日军负责守护旁滨渡口的第五纵队送信，孙立人不仅来了，而且在江边筑起了坚固的工事，谁要想捣乱，那就得仔细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孙立人备战筑工事，磨刀霍霍的态度，确实吓得日军第五纵队没敢轻举妄动，虽然有不少鬼头鬼脑得“缅奸”到江边探看动静，但瞧着新38师战士黑洞洞的枪口，一个个也是吓得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地离开，然后用电台向自己的日本主子汇报情况去了。

孙立人修筑工事，防范后面追击敌人进攻是虚，他真正的目的是给渡江赢得时间。只是新38师渡江用的竹筏原始落后、没有机械化动力不说，也没有像样的船桨，用这种落后的竹排渡江，不仅费工、费力，而且渡江的效率也不高。

孙立人当晚站在江边，镇定地指挥着大部队加紧渡江，38师的官兵面对滔滔的江水、宽阔的江面，他们原本渡江成功的信心不足，可是看到了孙立人坚定的身影，不容置疑的话语，他们就获得了渡江成功的勇气，果然经过一夜的强渡，38师大部分的官兵们都已经渡过了清德温江，黎明的时分，孙立人在梁砥柱为营长的官兵的掩护下，顺利地到达了江对岸。

孙立人刚刚渡江不久，日军主力的先头部队，就携带着两门速射炮，追到了旁滨渡口，这时候，岸边修筑的坚固工事发挥了作用，留作掩护的一营官兵，立刻猛烈地开火，日军连夜追来的先头部队，被打得狼狈后退，不仅丢下了两百多具尸

体，梁砥柱手下的官兵，还一并救出了被俘的友军和英军官兵三十余人。

这时候，天降大雨，借着雨幕的掩护，负责殿后的官兵们纷纷登上竹筏，一阵急划，便渡过了清德温江，日军被打退的军队又追到了岸边，那两门速射炮，向着38师官兵渡河的方向，一个劲地“通通通”地乱射，盲目乱射的炮弹，在雨幕中完全失去了目标，变成了欢送38师渡江成功的礼炮声。

孙立人站在清德温江西岸，一直等着给部队打掩护的梁砥柱营长，梁营长率领着最后的一竹筏官兵上岸，孙立人的脸上这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听着江东岸日军爆豆般的枪炮声，他的目光执著而坚定，因为他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领兵回来，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之耻，他一定会报的！

新38师横渡清德温江，虽然获得成功，但还是有30多名官兵，因为江宽流急，操作竹筏不当，以至于竹筏翻覆，竹筏上的官兵最后被无情的江水吞噬。

清德温江旁滨渡口的东岸是一片开阔地，而西岸则是陡峭的山脉。孙立人领着官兵开始翻山越岭的时候，孙立人拿出了一张地图，他指着地图，告诉38师的官兵们，前面有一道险峻的山脉，孙立人给那道山脉起名——西天界，只要过了西天界，就好像不惧十万八千里，到西天求取真经的唐玄奘师徒四人一样，等于功德圆满，到了印度的地界了。

西天界虽然山高岭险，但却并不能阻挡新38师的脚步，当孙立人站在这座山的山巅之上，他望着落日余晖下，莽莽苍苍的印度的国土，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只要新38师能在印度这片广袤大地站稳脚跟，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计划就会最终实现。

新38师官兵翻越了西天界之后，就来到了一片无人区，他们经过艰难地跋涉，最终通过了这片无人区，来到了一条直通印度英帕尔的土路，可是这条偏僻的土路之上，现在全都是躲避战乱，由缅甸向印度逃难的华侨和难民。

新38师的官兵，经过千辛万苦，来到印度，辎重给养基本都被丢得差不多了，面对这些逃难的华侨和难民，孙立人还是命令全师的官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要为对这些华侨和难民提供必要的帮助。

新38师的官兵，有的将自己的一丁点口粮给了快要饿毙的华侨，有的搀扶走不动的难民继续赶路，而师部的医疗队，对生病的难民也提供了必要医疗帮助。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宣传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一支仁义之师的名声，都是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中建立起来的。

当时正值雨季来临之前，天气潮湿闷热，瘟疫横行，孙立人从旁滨渡口开始撤退之前，便对38师的官兵，下了一道严令："宁愿饿死、渴死，绝对不准取喝山中生水，有违者立刻枪毙！"

正是这道看似不近人情的命令，拯救了38师全师的性命，当时孙立人率部穿越野人山时，只有一个炊事兵口渴难耐，偷喝了几口山涧中的生水，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因为疟疾发作而丧命。

当时如果没有孙立人这道命令，口渴难耐的38师全师官兵在瘴疫区的命运，可就真的不好说了！孙立人在美国军校学习，他不仅学来了练兵的方法，他对防疫学、卫生学在练兵、行军和打仗中的实际运用，也是深有研究，总之，崇尚医学和科学，就能带出一群健康之兵，兵强则军壮，军壮战斗力就强。

孙立人双脚踏上印度的国土，他一路行来，一路为英印军松懈的防卫摇头。他原本以为，日军将英缅军从缅甸赶到了印度，驻扎印度的英印军应该接受教训，提高警惕，并在清德温江的重要渡口，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上，都应该派驻大批荷枪实弹的英印军才对，可是他一路行来，却发现英缅军的惨败，并没有引起英印军的注意，旁滨渡口通向英帕尔的道路两侧，竟连担任警戒任务的英印军小股部队都没有。

也许在英印军指挥官的脑袋里，是这样预想的：日军只是对缅甸感兴趣，他们不会侵略印度，抑或有清德温江当天堑，有崇山峻岭和无人区当屏障，再加上漫长的雨季就要来临了，故此，英印军还处在一种优哉游哉的"老爷兵"状态。

新38师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在5月27日，到达了距离英帕尔东南十八英里的

普拉村，孙立人率领中国的远征军进入印度，为了避免与英国驻印军闹误会，他就命令新38师在普拉村安营扎寨，严禁进入战略要地英帕尔。

从5月28日开始，印度的英帕尔地区便开始进入了雨季，新38师的官兵们，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已经用了一天的时间，砍来树木和竹子，搭起了能遮风挡雨的草棚，新38师的官兵住在干净的草棚中，一个个看着外面瓢泼般的大雨，无不交口称赞孙立人，他千里转进在时间点的把握上，恐怕只有诸葛亮才能与之相比吧！

孙立人率领新38师的官兵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印度，他无法预测英印军对待中国远征军的态度，故此，扎营之后，便四处加派了岗哨，并在村后的山地之上修建了坚固的工事，随后派人和英印边防军进行了交涉，孙立人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首先，新38军来此的目的是借道回国，请英印边防军以友军相待、勿生敌意；接着，以中英互为盟军、理应相助的理由，向英印军提出了补给的要求；最后，孙立人讲出了自己的底线，如果有人对吾不利，38师将奋力一战。

2．立足，整军经武蓝姆迦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

孙立人率领38师进入印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先行到达印度的英帕尔，接着转道大吉岭，经康藏之路，曲线回国。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却对中国远征军勇敢顽强的精神非常欣赏，他便向重庆政府军委会提议，成立中国驻印军，孙立人的38师就被暂留印度。

印度当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印当局对于孙立人这支队伍，也怀有深深的忌惮。很快，新38师崭露头角的机会就被等来了，英印军要在新德里举行一场联合国纪念日的大阅兵，孙立人派出的阅兵队伍一举夺冠，新38师的战斗力终于获得了英印当局的认可，随后新38师就被派往雷多进行训练，其实英印当局也在背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让新38师帮着自己戍边！

英国对印度的早期殖民掠夺，可以追溯到1600年至1757年之间，当时，英国殖民者通过不平等的贸易，直接对印度地区进行经济掠夺。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本无法填平英国殖民者贪婪的沟壑，英军在1763年至1818之间，对印度直接进行过30次兼并土地的战争，直到1858年后，英国政府终于完全控制了印度。

英国东方警备军军团长艾尔文将军，很快就得到了中国远征军38师来印度的情报，艾尔文在前一阶段，曾经带队接应过英缅军的败兵，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英缅军，如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互相搀扶着，难民一般从缅甸退到了印度境内。

从这些军容不整，丢盔弃甲的英缅军败兵身上，艾尔文可以想见中国远征军的狼狈程度。艾尔文并没有和中国远征军打过交道，他对中国军队的印象，完全停留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清兵被英国兵追得满城乱跑的旧时代。

艾尔文便向印度总督韦维尔递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这样说："准备将这些中国'草鞋兵'全部缴械！"艾尔文认为，这些中国"草鞋兵"，已经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军需给养全都丢弃后，他们来到印度，为求生存，只能对百姓又杀又抢，形同

匪盗，与其让为非作歹，还不如将其武器收缴，送到集中营，以绝后患。

印度总督韦维尔曾经做过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中东英军司令部总司令，他还在战争实践中发明了“特种战争”，为英国的战争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从这些不一般的从军经历，可以看得出来，韦维尔绝非一般人物，他接到了艾尔文的报告，经过考虑，正准备签字批准的时候，住新德里的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急匆匆地登门求见。

亚历山大已经得到了艾尔文对中国远征军态度不友善，准备将孙立人38师的官兵缴械的消息。亚历山大见到了韦维尔，忧心忡忡地说：“总督阁下，听说您准备下令将孙立人部队缴械，我想此消息是误传吧？”

韦维尔一时间弄不明白亚历山大的意思：“印度是英属的印度，我自然不会同意一支外国军队不请而至，而且他们还带着不友好的武器！”

要知道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印度的民众，被英国视为贱民，贱民也就是“DALIT”，又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意思是，只要看了贱民一眼，就会脏了英国人高贵的眼睛。而华侨在印度的地位几乎等同于贱民，他们干最累的活、吃最破的饭、穿最烂的衣，这些华侨即使上街，都不许十个人以上同行，因为英国殖民者，害怕他们聚众闹事，参与印度的独立运动。

孙立人一个师的人马，而且手中都握有致命的武器，可以想见，英国殖民者对于中国远征军的态度了。

亚历山大连连摆手：“总督阁下，我想您一定是误会了，孙立人的新38师，纪律严明，绝非一般部队！”

亚历山大接下来，便将孙立人如何率领38师，血战仁安羌，掩护英缅军和中国远征军撤退，还有一路转移，但却秋毫无犯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他表明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新38军非但不能缴械，而且对于这支抗日的队伍，还应该以礼相待，军需给养更不能吝啬！

韦维尔也被亚历山大给说愣住了，新38师真的军纪严明，战斗力让日军都甘拜

下风吗？韦维尔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正在英帕尔养病的史莱姆也闻讯来到了总督府。

史莱姆在缅甸战争中，是前敌的指挥官，他对新38师的真实情况最有发言权，听完史莱姆绘声绘色的讲述，韦维尔也有些被打动了，但他担心地说：“印度有不少华侨，如果当局不对新38师缴械，那么，印度的华侨有可能借着新38师的力量，开始争权闹独立，那将是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

史莱姆和亚历山大之所以上门，一半是报答孙立人在缅甸救下英缅军新一师，并掩护英缅军大部队撤回印度之恩，另一半，他们也不想刚刚撤回印度，印度地区再燃起中英双方的战火。

史莱姆严肃地告诉韦维尔，首先，中英双方是盟军，英印军打不过凶悍的日军，而凶悍的日军还曾被新38师揍得抱头鼠窜，韦维尔手下的英印军，哪里会是孙立人的对手，与其到时候吃亏，还不由对新38师以礼相待，交孙立人这个朋友。

韦维尔对新38军缴械的决心，也被亚历山大和史莱姆给说得摇摆不定，他随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亲自去一趟普拉村，检验视察一下孙立人的部队，如果真如他们二人所说，就给孙立人以方便，如果对方是一群乌合之众，那就直接派人缴了他们的械，送他们进难民营，以防将来突生变故。

韦维尔随后派人通知孙立人，他将于第二天一早，到普拉村检阅新38师。5月29日是一个晴天，韦维尔和英印边防军司令格鲁伯一起，乘坐汽车，来到了新38军的驻地。

普拉村只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子，在韦维尔的印象中，该村子和印度的其他农村一样，荒僻、泥泞、遍地都是垃圾，可是汽车来到村口，韦维尔不由得一愣，只见村子的街道干干净净，而且出出进进的村民，脸上的神态从容随意，很显然，村中住着几千名中国远征军，并没有引起他们的不安。

村容整齐，村民正常的生活秩序没有打乱，很显然，这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新38师的军纪严明，绝非一支松散的队伍。

孙立人得知韦维尔前来的消息，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列队受检的是特务连的官兵，特务连是新38师指执行特殊任务的分队，经常执行如侦察、警卫、工兵、通信等任务，这一连的官兵，也是新38师的精兵，虽然这支队伍经过渡江翻山，长途跋涉越过无人区，他们的军装上大多打着补丁，但上面却一个皱纹都没有，那笔直的裤线，竟是用热水壶当熨斗熨烫出来的，他们手中的武器，保养得极好，队伍的旁边，还摆放着一列60炮和重机枪，这支受阅的队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当他们列队通过检阅台的时候，战斗口号喊得震天响，这哪里是一支移防的队伍，分明就是一支立刻可以拉出去上前线，随时都能打硬仗的常胜之师！

韦维尔和格鲁伯面对这样的劲旅，不由得一起点头说——好。

孙立人在一边说道："请总督和司令阁下随我观摩一下新38师的阵地！"

孙立人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一是防止日军的追击，二是预防英印边防军前来缴械，他在临近普拉村的山坡之上，已经围绕水源，构筑起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阵地，韦维尔和格鲁伯看着那些枪上膛、刀出鞘，隐身在战壕中，随时准备歼灭东边来犯日军，也警惕着英印军的新38师官兵，格鲁伯不由得连竖大指，韦维尔说道："新38师是一支出色的劲旅，值得英印军学习！"

韦维尔和格鲁伯检阅完新38军，他们的态度立刻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暗自庆幸，养尊处优的英印军没有前来缴械，否则冒犯了新38师这支虎狼之师，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竟发现了一支可以帮他们抗击日军的精兵。

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承诺，并要以盟军的待遇，立刻为新38师提供给养，但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孙立人部需帮他们驻守英帕尔，一旦日军渡江来攻，新38师可予以歼灭之。

孙立人明确地表达了借道回国的想法，当然，歼灭日军，绝对是新38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他却不能接受英印军的指挥，要想让他打日军，必须要重庆的军委会下命令才成！

孙立人的操守和立场，以及带兵的勇武和谋略，不仅让韦维尔和格鲁伯重新认识了中国远征军，也让他们对中国将军的固有的成见，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改观。

随后，英印军的后勤部门，派来了几辆汽车，给新38师运来了大米、白面、蔬菜、鱼肉、帐篷和武器弹药等军需给养，而且这些给养，是超量供给，新38师的官兵，终于可以一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局面了。

新38师来到了印度，史迪威和罗卓英等人欣喜不已，第一次入缅战争的失利，这已经让他们很没有面子，但孙立人领着两个几乎完整建制的团来到印度，透过新38师官兵坚定的眼神、不屈的态度，让他们仿佛又看到了明日收复缅战失地的希望。

史迪威和罗卓英等人和孙立人在印度见面后，孙立人便向自己的两位“顶头上司”询问如何回国的安排，史迪威告诉孙立人，缅战新败，新38师缺兵少将，人困马乏，武器和给养亦短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休整，至于如何回国，还需联系重庆的军委会，再做统一安排。

孙立人是个聪明人，他从史迪威的话里话外，已经听出了不愿意让38师回国的口风，但新38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久留印度，无仗可打，这绝非长久之计，而且还会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会说孙立人“不守军令、脱离战场，为英印军当枪使”等等的闲话。

孙立人对史迪威的建议，表面上同意，但回到军营后，便开始用电台暗地里联系重庆的军委会，一开始，孙立人的电台的功率小，无法穿越几千里，联系到国内，并获得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命令，后来，他在新38师中，发现一个在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的毕业生，经他改装后的大功率电台，终于联系到了重庆的军委会，重庆军委会随后给孙立人发来了第一份命令——让他寻找从野人山回国的杜聿明部队。

孙立人和杜聿明一起到缅甸参战，不仅同族同宗，而且互为袍泽，新5军目前已经被杜聿明带进了野人山，孙立人对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主力部队，哪能漠不关

心。

孙立人白天带领新38师的弟兄们训练，晚上回到帐篷，每当他躺在床上，想到同为袍泽的第五军官兵兄弟，还在被称为死地的野人山中挣扎，他真有一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感觉。孙立人几经思考，将心一横，那就是去找英印军的实权人物，请他们出动军机飞到野人山上空，帮忙寻找第5军的下落。可是英印军的高层军官，却不想为一支困在野人山，并无大多大战斗力的中国远征军出动飞机，他们不是搪塞便是拖延……这天，孙立人来到了蒙巴顿勋爵府。蒙巴顿目前可是一位实权人物，1943年8月，美英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蒙巴顿勋爵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司令官。

蒙巴顿勋爵听完孙立人的请求，他惊诧地说："孙将军，根据我获得的情报显示，你的上司杜聿明将军，跟你的关系并不和睦，而且你公然违背了他的命令，你让我派英国飞机，到野人山中寻找第5军，你难道不怕杜将军回来对你进行报复吗？对您的这份请求，我真的不能理解！"

孙立人看着蒙巴顿勋爵蓝色的眼睛里，露出的疑问神色，他正色回答："尊敬的勋爵阁下，我和杜将军虽然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消灭日军，打通滇缅公路，现在中国远征军几万名弟兄，被困野人山，我怎么能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坐视不管？"

孙立人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做人做事，总要光明磊落，不要鬼鬼祟祟，因为老天有眼！"心中有敬畏，肩膀上才有担当，孙立人做事的风格、诚恳的态度，也将蒙巴顿勋爵感动了，他当即答应，以后将轮番派飞机去野人山搜寻被困的中国远征军官兵。

蒋介石为了能找到杜聿明这位嫡系爱将，便派遣联勤总司令俞鹏飞到印度，敦促美国空军出动飞机，低空寻找杜聿明和第五军的下落，美国空军的军机，虽然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上空曾多次低空飞行，但却没发现第5军的蛛丝马迹，无线电通信，也根本联系不上杜聿明，在茫茫野人山林海，第5军就好像水汽一样消失在

原始丛林之中。

美国飞机为了向蒋介石复命，还曾盲目地在野人山中，投下了一些给养和通信器材，但做这些无谓的努力究竟有没有用，那就只有天知道、地知道了！

杜聿明往北，孙立人往西，两人走的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但杜聿明却没能从密支那回国，因为杜聿明赶到之前，密支那已经被一支不足3000人的日军联队占领了。

这支日军联队因为长途奔袭，不仅武器弹药不足，更是一支疲师，他们也怕杜聿明领着两三万名中国远征军来闯关，便虚张声势地用无线电，向外界发布了日军“重兵”占领密支那的消息。

杜聿明一路挨打，一路撤退，早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他并有胆量敢去和密支那的日军“硬碰硬”，15军随后折师北上，来到了胡康河谷，准备翻越野人山回国。但事实上，杜聿明至今也未回到国内，他领着部队竟消失在了野人山中，这真是让孙立人没有预料到的。

野人山，缅甸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该山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就是喜马拉雅山区，野人山山峰重叠、密林如海、沼泽深潭、猛兽横行、瘴疠蔓延，那绝对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

野人山最高的山名叫本帕本山，海拔3411米，野人山长1000公里，宽200公里左右，当时，杜聿明面对地图，他也许是这样认为的，如果部队进山，一天即使向北走上10公里，20天后，第五军就能走出野人山，回到国内了！

可是野人山自然条件之恶劣，完全超出了杜聿明的想象。这些困难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野人山的沼泽。该山地表及地表下层土壤因为经常降雨，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湿性沼泽，这种沼泽的上面，不是落满了树叶，就是生满了低矮的植物，人一踏上去，经常会陷到了大腿根部，即使是一名身强力壮的年轻士兵，一天在沼泽中，走不上十里路，而可怕的沼泽中，还有吸人血的蚂蟥，很多15军的官兵，在穿越沼泽

时，都被蚂蟥钻入了身体，这些蚂蟥在人的体内大量繁殖，并寄生于人的肾脏和心脏，很容易使人丢了性命。

野人山的原始森林。由于没有人类的活动，森林里生长的全都是几百年的巨树，树冠蔽日，甚至一个星期，也难以见到太阳，人在丛林中，就好像走进了黑夜，十几步之外难见人影。有些巨树，因为雷劈或者飓风，倒在陡峭的山坡谷地上，想要翻越过去，真是非常困难，巨树的下面，除了茂密的灌木，就是密如渔网般的藤萝。第5军的官兵，想要穿越野人山，必须要斩掉这些拦路的天然障碍，然后一点点开路前行。

缅甸连绵不尽的雨季。杜聿明的第5军官兵，进野人山不久，便赶上了可怕的雨季，因为缺少必要的防雨用具，他们身上的衣服，几乎没有干过，他们干粮袋中的粮食，无不发霉变质，最可怕的是，暴雨经常会引发山洪和泥石流，这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真的是让第5军官兵的生命变得脆弱不堪。

野人山的可怕的沼泽，密不透风的森林，还有让人畏惧的暴雨，经常会让第5军的官兵们迷路，杜聿明手中的那张军事地图，在野人山中，基本上难以发挥指引方向的作用。

上面的这些困难，只能叫困难，在野人山中，最可怕的却是瘴疠和瘟疫。野人山中，枯败的落叶、动物的腐尸，在暑热、湿气交蒸中，会形成瘴疠之毒，这种毒素弥漫在空气中，让人无处可躲。而由于蚊虫叮咬，而传播的霍乱、痢疾、猩红热、登革热和回归热等等的瘟疫更是让人防不胜防的杀手。

李明华（女）在第5军政治部曾任干事之职。她是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性，在《野人山历劫记》一文中，曾经这样惨烈地写道：

> 近几天雨越下越大，我们的行程一天比一天困难，沿途的尸体也越来越多，溪边、路旁、树下随处可见，终日被雨水浸泡，胀得不像人形，生满了蛆使人看到就反胃。这些人多由于饥饿疲惫以及被蚊蝇、蚂蟥吮叮致病而死，也有的误食毒果中毒死亡。有一次溪水突然暴涨，卷走了溪边12个同伴……那种惨绝人寰的景况，比神怪小说中描述的十八层地狱尤有过之。活的人长久受此种环

境影响，普遍产生了极端绝望的情绪。

我曾见吃了野芋和野芭蕉根的人全身浮肿而亡，因此我和汉君都不敢尝试，只得天天用大叶子接些雨水充饥，地上的溪中的水因浸泡过腐尸也不敢饮用。有时运气不错，在猴子窝里找到一些野果，判断猴子能吃人也一定能吃，我俩就分而食之。这天上午雨时下时停，政工队和华侨队有十多人赶上来，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只要一落伍就凶多吉少。

第5军作战参谋邹德安经过千辛万苦，最终在野人山活了下来，他后来回国，记录下了当时惨烈的情形。

人们说，“生”是一个伟大的过程，那么“死”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过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死亡”和“尸体”都是具有极大神秘力量的有生命的东西。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

再往后，队伍里就出现自杀的人，开始是把枪口放到下巴下面，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这是部队崩溃的前兆。后来是上吊死的，因为枪都扔了。尸体挂在树上随风飘动，很可怕的。有许多是准备修筑滇缅铁路交通工程局的工程师，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苦？……

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心回国，他选择了野人山这条路之前，就下了一道命令，要全体官兵，丢掉一切可以放弃的辎重，然后留下药品和食物，轻装进山，进山之前，杜聿明取出了一瓶自己舍不得喝的红酒，说：“远征军的将士们，这瓶红酒，是蒋委员长送我的饯行酒，我没舍得喝，今天我们把它喝下去，因为，我们穿越的是九死一生的野人山。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野人山，既是我们通往国土的生路，也是我们走向死亡的鬼门关，祝大家好运。”

第5军在进山之前，杜聿明下令，将无法带进山的军车和辎重全部烧毁，可是官兵们看着第五军的宝贵家底，谁也舍不得上前点火，他们纷纷叫道：“军长，这可是我们的宝贝啊！”

杜聿明痛苦地叫道：“烧吧，如果不烧，就便宜给了日本人！”

燃烧的火把被投掷过去，淋满了汽油的军车和辎重立刻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杜聿明的座驾林肯轿车燃烧时，突然喇叭发出了“嘀……”地一声悲鸣，那揪心的声音，真的让人不忍卒听。

最让人伤心的不是烧辎重，而是留在堪迪医院1500多名伤患官兵自焚身亡，这些伤患官兵，为了不拖累大部队，宁可自焚，也绝不落入敌手而受辱，如此的悲壮之举，确实是可歌可泣。

杜聿明进山的部队只带了5天的粮食，在他们看来，野人山既然被称为无人区，野兽、蟒蛇、野菜和蕈子一定很多，可是并没有在无人区行军经验的5军入山之后，这才发现他们想得有些错了。

野人山上，确实是野兽众多，可是几万大军入山，这些飞禽野兽早就吓得跑没影子了，山上的无毒的蘑菇不少，但哪里够几万人食用，更可悲的是很多官兵，因为误食毒蕈而丧命。

唯有一些胆大的猴子，经常爬在第五军官兵头顶的树枝上窥视，猴子中枪后落地，成了官兵们口中的粮食，可是猴子肉又骚又酸，难以入口，更让人发怵的是，杀那些没断气的猴子时，猴子们发出的凄厉的惨叫声，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恐怖。

在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下了他率领部队，翻越野人山的痛苦经历：

>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

在谈及第5军为了归国，进入死地野人山的行动，当年曾经随着第5军走进野人

山，后来在缅甸定居的老兵杨伯方，一边哽咽一边这样说：我们的心中除了想家，不会怨走错了路，都是为了抗日！

“抗日”两个字，真的重逾千斤，这两个掷地有声的字，就是这段悲壮历史的最终、最重也是最有力的答案。

杜聿明指挥过昆仑关战役，并取得闻名全国的大捷，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被公认是最有才华的将军之一，他之所以一次次犯错，带领部队走入“死地”野人山，唯有两个字在作怪，那就是对蒋介石的“愚忠”。

孙立人从旁滨渡口到达印度的普拉村只用了15天的时间，而杜聿明的第五军却在野人山丛林中整整行走了114天。

而戴安澜的200师与主力失散，他们也进入了野人山，但戴安澜却在1942年5月18日，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因为野人山地区，缺医少药，最后伤重不治，以身殉国，200师的官兵只有少量走出了野人山……

最让杜聿明窝火的是，第5军共有两万多人进入野人山，他们虽然在生和死的战线上苦苦挣扎，可是最后努力的结果，不仅没有回到国内，更是没有走出野人山……天不绝第5军，一架路过野人山的美军运输机的机组人员，最后发现了困在崇山密林中的第五军，并空投下来大量救急的食物、药品等物资，这些物资算是救了第5军残部官兵的性命……

在美军运输机空投下来的物资中，有一部大功率的电台，杜聿明原来的电台，因为潮湿雨淋早已经损坏，他利用空投下来的电台，立刻与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蒋介石在地图上确定了第5军的位置，便给杜聿明下了一道命令：西去印度雷多修整待命，为第二次缅战做准备……

这道命令，对于杜聿明来说，绝对是充满了浓浓的讽刺意味，杜聿明不想借道印度，而执意想翻越野人山回国，但一番努力之下，还得复回印度，第5军很多的官兵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了野人山，他们死得真是委屈、冤枉和不值！

孙立人接到重庆军委会发来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他得知第5军的下落，不

由得大喜过望，当即组织手下的官兵，用英印军支援的汽车，满载着食品、药品、担架和军装等物资去接应第5军。

在陈立人所著的《缅甸、中日大角逐》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第5军）于8月4日才走到印度边境雷多，清点人数，第5军在撤退中伤亡人数，大大超过在缅甸作战中的伤亡人数，而且存活的官兵面黄脚肿，军服破烂，像是逃荒的饥民一样，情况非常狼狈！……

第5军来到雷多，刚开始的时候，英印军拒绝为其提供给养，孙立人便将平日里结余的粮食、药品给他们送了过去，可是新5军却不领情，反而骂亲美的（孙立人）有好果子吃，他们一心回国，却成了没娘的苦孩子！

杜聿明在缅甸战场上，一个劲地和史迪威唱反调，故此，他来到印度，很快便遭到了排挤，蒋介石以重庆军委会的名义，给杜聿明发了一份电报，催促他回重庆述职。

杜聿明没有办法，只得回国，他在临行之前，将自己的佩枪留给了廖耀湘，伤感地说："收复缅甸，消灭日军，还有寻找第5军留在野人山中遗骨的任务，就拜托给你了！"

杜聿明作为中国远征军副司令，第一次入缅损兵折将不说，他强行翻越野人山，属于重大战略失误，致使那么多官兵葬身异国的原始丛林，但蒋介石并没有让他丢官罢职，他被雪藏半年后，蒋介石就让他担任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从一个失败将军的身上，确实可以反衬孙立人不走野人山，直接转进印度的正确性。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对兵败缅甸，甚有微词，他认为，自己误走野人山，不仅史迪威、罗家英和亚历山大都有责任，孙立人虽然取得的仁安羌大捷，但却使战线拉得过长，也是导致中国远征军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罗卓英却是一位恂恂儒雅的人物。他信奉的两句格言是"扬善公堂，规过私室"。他对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并没有过多的推脱和解释。

史迪威在笔记里，曾经这样气愤地写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却由“腐败无能的政府和愚蠢胆小的指挥官”率领着。1943年，史迪威美联社采访团的记者招待会上，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处决一百名高层领导人。”

史迪威作为缅战的最高长官，却在战场上放弃了10万名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将士，而率领着司令部的114人去了印度，这恐怕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法军纪中，都说不过去，都得被追究，后来，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他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失误，反而以抗日英雄的身份，大笔一挥，写出一大张中国远征军将领的黑名单，其中包括甘丽初、张轸、陈勉吾、刘伯龙、马维骥等人，史迪威要求对他们“从严惩处”。

也许当时抗日的情形太紧急，他们都没有时间反省自己的在缅战中所犯的错误，而现在，因为客观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也无法十全十美地为他们的功过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但这些缅战的参与者，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驱逐日寇，打通滇缅公路。

史迪威有他抗日的目标，孙立人有他抗日的想法，而杜聿明和罗卓英也都有其抗日的目的，虽然他们的目标一致，但是他们手段高低优劣却不一样。

说句人人都同意的公道话，只要在抗战中出力的官兵将士，那就代表着正能量，只要是人，失误就在所难免，面对沉重的历史，还是让大家轻装上阵，为了抗战的胜利，放下包袱，卸去负担，不要过度纠缠失误，毕竟抬头向前才是历史的主流！

杜聿明的第五军，已经被蒋介石派驻印度，孙立人的新38师自然不用再从印度绕路回国了。随后不久，就到了联合国纪念日——6月14日。

为了庆祝此非同寻常的日子，英印军的司令魏菲尔（Wavell）决定邀请孙立人的新38师，可派兵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参加阅兵大典。

参加这次阅兵大典的有中、美、英和苏等11个国家，英印军之所以在联合国纪念日搞一次盛大的阅兵，展现实力的同时，也有向侵缅日军示威的意思。

孙立人留在了普拉村的驻地，到新德里参加阅兵的代表是罗卓英，新38师用一个排的人马，组成了参阅的队伍，这支参阅队的队长就是王东篱，阅兵队的总教官名叫谭展超，谭展超毕业于意大利加里波第骑兵学院，他在新38师，负责的是军官骑术和仪仗队的训练。只有专业人才，才能训练出专业的仪仗队。这一个排的人马，经过谭教练的精心训练，实力绝对是超乎一流。

罗卓英领着参阅的队伍坐火车，信心十足地直奔印度的新德里而去。

6月的新德里，气温40多摄氏度，虽然参阅的中国远征军因为高温而鼻孔流血，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夺冠的信心。在军乐的伴奏声中，庆祝联合国纪念日的阅兵正式开始，参加阅兵的一共有11个国家，各国的军队通过主席台的次序是这样的：美国、中国、（前）苏联、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芬兰、冰岛，英印军垫后！

当时中国远征军的一个排受检的方队，在王东篱队长的带领下，他们头顶闪闪发亮的德式钢盔，身穿整齐的军装，而且都干净利落地扎着绑腿。

经过参阅国的11位大使提出的意见，以及英印军方评价，大家一致认为新38师这一排军容最整齐，步调最划一，精神最旺盛。成为了当日阅兵之冠。

韦维尔随后在总督府中，宴请了罗卓英以及夺冠的新38师受检的官兵，当地的报纸也随后对孙立人部大肆宣扬：意思是有中国远征军帮英印军协防印度，日军必无可乘之机云云。

新38师借着新德里阅兵，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参阅的官兵们，用自己旺盛的斗志、整齐的军容、协调的步伐，在其他10国军队面前，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新38师的受检官兵技压其他10国，凭过硬的军事实力夺冠，当地的华侨听到消息，无不欢欣振奋，王东篱领着受检的一个排人马，回转普拉村，他们在路过加尔各答转火车的时候，当地的政府破例允许6000多名华侨上街欢庆游行。

枪杆子等同于腰杆子，战斗力和实力画等号。新38师夺冠，真的让当地的华侨

扬眉吐气，有新38师这样的军队，华侨就不是下等公民。

史迪威借助新38师夺冠的机会，也在为新38师在印度的地位而奔走。

史迪威是一位很有美国西部牛仔作风的将军，他对缅战的败绩耿耿于怀，如何赶走日军，并将滇缅公路夺回来，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心愿。孙立人在仁安羌的表现，让史迪威注意到了38师，孙立人能在移师印度这件事上，跟他保持一致，这让他进一步肯定了新38师，而孙立人在庆祝联合国纪念日阅兵式上取得的成绩，终于让史迪威看到了收复缅甸的希望曙光。

别看史迪威在当时，只是一个近乎“光杆司令”的美国将军，但他和五星上将马歇尔将军私交甚厚，而且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故此，他代表的力量不可轻视。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财大气粗，但在二战的战场上，只是美国的小兄弟。赫尔曼·沃克曾经写过一本《战争与回忆》，在这本书中，形容夹在美俄之间的英国，是美国鹰和俄国熊之间的一头老瘦驴。英国不仅在军事上需要美国的支持，而且在国际事务上，也需要美国的帮助，故此，史迪威的话，在印度的英印军司令，以及印度总督面前，还是有分量的。

印度总督韦维尔和英印军的统帅魏菲尔经过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新38师驻守的普拉村，靠近印度的战略要地英帕尔，如果长留孙立人在印度，就不能让新38师占据这么重要的地方。

这两位印度的实际掌权者，经过研究，终于在印度最东北的阿萨姆邦，即毗邻野人山地区的东北端，找到了一个名叫雷多（英文名为Ledo，中文译名又称“利多”）的小镇，该镇不仅极其偏僻，而且经济也相当落后，只有一个茶叶种植园、一个煤矿和一个砖窑。除了茂密的丛林，还有一些土著村庄。这两位印度高官，让孙立人去雷多练兵，真正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借助新38师的力量，守住日军想要进攻印度的门户——胡康河谷。二是让孙立人师远离华侨，防止中国远征军为华侨的独立运动推波助澜。

他们二人还为调孙立人去雷多，想出了一个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让孙立人就近从胡康河谷，迎接第五军以及22师的官兵弟兄。

孙立人也想去雷多练兵，因为重庆军委会对他有“不允许干涉印度局势”的命令，而且练兵还需要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雷多别看偏僻，但它却是印度一条极其重要的铁路的终点站，从加尔各答开来的火车，可以源源不断为其送来各种需要的物资。

孙立人来到雷多练兵之前，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刘放吾团长率领113团官兵的归来。刘放吾团长在仁安羌一战中，全团减员一半，接下来在打掩护的时候，竟和主力部队失散了。

刘放吾有一次率领部队渡河，因为部下不小心，电台掉进了河水里，虽然捞了起来，但有几个零件因沾水损坏了。没有了电台，113团也就彻底和38师失去了联系，刘放吾团在辗转和战斗的过程中寻找零件，最后修好了电台，然后联系上了孙立人。

刘放吾目前粮食断绝，缺衣少药，弹药消耗过大，无法得到正常补给，基本已经无法与日军再战。孙立人讲明了新38师在印度普拉村的位置后，刘放吾团长即带领着全团的官兵，向清德温江进发，可是他们来到这条宽阔的大江旁的渡口，却发现渡江的环境，远比新38师渡江时的环境还要恶劣，不仅江面上日军的炮艇来回穿梭巡逻，渡口上更是布满了敌人的守卫部队。

刘放吾率领部队，隐蔽在竹林中，急忙用电台联系孙立人，孙立人得知情况，便给他们想出了一个计策——首先沿江诱敌，引敌急追，待敌离开渡口之后，迅速回撤，便可争取到渡江的时间和机会。

刘放吾依计而行，果然引开了敌人，待日军发觉上当，转身回追的时候，刘放吾率领着113团的弟兄们，借着夜幕的掩护，利用竹筏已经渡江成功了。

113团沿着新38师另外两个兄弟团走过的路，他们穿过了无人区，过了西天界，虽然一路跋涉艰难，但毕竟甩掉了日军，安全地来到了印度。

孙立人得知113团渡江成功的消息，他急忙携带着给养前来接应，当刘放吾和孙立人的四只大手，牢牢地握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真的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是一时间，却不知道从何讲起。

刘放吾最后激动地说："师长，我带着弟兄们回来了！"

孙立人拍着刘放吾的肩膀说："回来就好，反攻缅甸的日军，我们还要一起战斗！"

杜聿明的第5军和廖耀湘的第22师分别从野人山来到雷多，他们的情形绝对比刘放吾师还要惨上几倍，这些官兵，衣衫褴褛，身虚体弱，手中拄着棍子，一个个形如乞丐，但有一点，他们的心中，无不燃烧着复仇的怒火，就是这股怒火以及求生的欲念，才支持让他们从死人堆里走了出来，并一路来到了雷多。

但让孙立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于雷多来说，只是过客，不久之后，他们即将奔赴下一个训练基地——蓝姆迦！陌生的蓝姆迦，又有什么情况在等待着新38师的官兵？

第五章　铁血抗日，第二次入缅作战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北朝民歌 《木兰诗》

1944年5月1日，来到蓝姆迦进行训练的新38师、第20师以及第5军，被改编为中国驻印军，第1、第6两个军共5个师。经过一年的苦练，中国驻印军变成了一支虎狼之师，重振军威，消灭入侵缅甸日军，打通中印公路的战役即将打响。

中国远征军已经有过第一次入缅战役的失败教训，第二次入缅作战，真的不能再失败！

中国驻印军这一次不仅在蓝姆伽换装了美式装备，而且加强了丛林生存和丛林作战的本领。在国内“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大批热血青年，踊跃参军，他们被飞机空运到蓝姆迦之后，大大提高了原来国军整体的战斗力。

1943年3月，为了开辟新的抗日物资的转运渠道，新38师的114团即先行开进野人山区，掩护中美工程兵部队修筑自印度雷多到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

1943年10月下旬，随着缅甸雨季停止，新38师和新22师和主力乘车到达胡康河谷边缘，驻印军缅北反攻战的序幕正式拉开，一场血战之后，新38师于1943年12月29日攻克于邦。在新38师的掩护下，新22师于1944年3月5日攻克孟关。孟关即克，后来两师合作又攻下了瓦鲁班……

1．劲旅，诞生中国驻印军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唐·王昌龄《出塞》

史迪威虽然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之中，难逃指挥失误之责，但在成立中国驻印军这件事上，其功却不容抹杀。1943年7月，中国驻印军正式成立，下设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下辖三个师：新38师、新22师和新30师。孙立人因第一次缅战有功升兼中将副军长，38师还归他指挥，廖耀湘任新22师师长，新30师的师长是胡素。

但史迪威却和孙立人等人的立场不同、想法迥异，他们在用人、练兵和中国驻印军的调配上都发生过争执，酸性子乔——史迪威，真的会向孙立人妥协吗？



孙立人

杜聿明回国后，果然没有放过孙立人，他向蒋介石汇报完孙立人阵前抗令，转道赴印的事情后，蒋介石也是甚为生气。要知道在蒋介石心中，有一个用人的标准，那就是“忠不忠”，而非“能不能”，更非“成不成”。孙立人即使再能打仗，如果不忠于自己，而是和史迪威一个鼻孔出气，那么这员“悍将”，就应该尽早拿下，然后换成自己的亲信，以防留下尾大不掉或者变生肘腋的后患。

蒋介石随后让军政部给孙立人发电报，命他坐往印度运兵的飞机回来述职。孙立人早就料到杜聿明会有这一手，他回到国内，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后，便开始义正词严地向其陈述事情的经过：新38师去印度之前，他曾经用电报请示重庆的军政部，可惜电报不通，最后，他奉史迪威之命，转赴印度，而绝非自作主张。史迪威曾经是中缅战场上的总指挥，他的命令，在当时的缅战中，基本可以当作是第二号“圣旨”。

史迪威想要一雪前耻，打赢第二次缅战，他就离不开孙立人，有他向蒋介石做证明，蒋介石这才放过了“不听话”的孙立人，孙立人毫发未损地离开了总统府，他望着天空中毒辣辣的太阳，也是出了一口长气。

张晶英在孙立人回国前，已经接到了电报，她借着丈夫回国述职的机会，在重庆和孙立人短短地团聚了几日。

孙立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留在家乡金牛镇的妻子龚夕涛，自从抗战爆发后，跟随胞兄龚意农来到抗日根据地。龚意农投身革命，龚夕涛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后来任合肥东乡青龙厂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她虽然和孙立人“抗日”的目标一致，但走的路却是迥异。新中国成立后，龚夕涛回到合肥和母亲、兄嫂生活在一起。1981年12月8日，龚夕涛在合肥病逝，享年80岁。2010年被评为“合肥百年最有影响的女性”。

史迪威在第一次缅战失败后，为了说服美国政府能给中缅战区派兵，他曾做了一个《收复缅甸计划大纲》，在这份大纲中，收复缅甸的计划，概括起来有以下五条细则：

1．在印度完成中国驻印度军两个军6个师的重新装备和训练工作；同时，重庆政府也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并在云南完成中国10个军30个师的装备和训练工作，夯实反攻缅甸的前期准备工作。

2．由英国3个师、美军1个师、中国驻印军两个师组成联合兵团，从印度的英

帕尔出发，渡过亲敦江，攻取缅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等被日军占领的一干战略要地。

3．从中国国内出发的20个师组成滇西远征兵团，他们进军的路线是，从滇西强渡怒江，直取腊戍，攻击日军，此之谓北路作战兵团。

4．中国驻印军组成的西线兵团开始由曼德勒南下，待会攻仰光时，英国的海军和空军应迅速攻占安达曼群岛，确实控制该海域和孟加拉湾。

5．中、英和美三国联合兵团，收复了缅甸之后，为求一劳永逸，彻底粉碎日军妄图“将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连成一体”的邪恶构想，联合兵团应着手进行将日军赶出泰国和越南的作战计划。

此项作战计划后来被称为“西太平洋对日作战计划”。史迪威提出的这份作战计划，想要成功，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中、英和美三国定要精诚团结、戮力同心，否则第一次缅战的失败，就是三国军队的前车之鉴。

不管史迪威收复缅甸的计划如何完美，美国军方因为太平洋战争吃紧，他们除了把美国第10航空队重新划归史迪威指挥外，暂时并没给史迪威派来可供调遣的地面部队。

英国只想赶走日军，维持缅甸和印度等殖民地的现状，为此，他们在第二次缅战中，表现得并不积极。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日军早晚会被美国给打败，只要日军一败，他们就能轻易收回缅甸。

相比英国，中国和美国方面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缅甸失陷后，为了解决滇缅公路中断、国际救援物资无法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难题，中美两国首先合作开辟了“驼峰航线”，这条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等山脉，全长500英里，终点为中国昆明机场的空中通道，虽然能暂缓中国国内抗日战场战备物资的极度匮乏，但却无法立竿见影地解决中国抗日战场上巨大的军用物资消耗的需要。故此，史迪威发起第二次缅战的作战计划，引起了蒋介石的

极大兴趣。

史迪威在面见蒋介石的时候，他雄心勃勃地描绘了这样一张蓝图：他要在蓝姆迦训练中心，建成用美械装备武装起来的，代号为“X”的10万驻印军；而重庆政府要在美国的配合下，于昆明建立起代号为“Y”的30个师的滇西远征军，“X”和“Y”部队两路夹攻，并在美英联军全力配合下，定能迅速收复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史迪威的作战计划，也让蒋介石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这项计划很快就获得了重庆政府的支持！

史迪威返回印度后，又开始游说印度的总督韦维尔，韦维尔也觉得史迪威的计划对英国收复缅甸有利，他最后同意将雷多地区的蓝姆迦镇交给孙立人全权使用，并可在该镇建立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基地。

蓝姆迦位于印度东北部，是比哈尔邦的一座偏僻小镇，距离加尔各答约300多公里。该镇的四周，全都是荒山野谷，难觅人烟。穷乡僻壤的蓝姆迦因为无人打扰，确实适合练兵，而且在这里练兵还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先天条件，在小镇的镇外有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英军曾经关押过两万名意大利战俘的战俘营。战俘营里面有现成的房子，正好可以当兵营使用。

蓝姆迦镇在印度的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名字，别看蓝姆迦镇外荒凉，但镇子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当年看管战俘营的英军为了调剂枯燥的生活，他们还在镇子上建成了酒吧、游泳池和电影院等娱乐场所。

孙立人领兵进驻蓝姆迦后，他首先让弟兄们修缮英国人留下的集中营当营房，他发现营房的床位不够，就命新38师的工兵们日夜加班，沿着公路的周围造出了一批砖墙、瓦顶、一律白色墙壁的新营房。营房建成后，镇内的酒吧、游泳池和电影院等娱乐设施又重新开张了。

1943年7月，中国驻印军正式成立，史迪威担任总指挥，美国人柏特诺任参谋长。史迪威为了挤走了罗卓英，他曾经多次跟蒋介石通电话，并连打罗卓英的小报告，说：“罗长官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等等，并还煞有介

事地列举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

蒋介石为了团结友邦，争取更多的美援，他几经斟酌，同意调回罗卓英，并将郑洞国派往印度。郑洞国接替罗卓英担任副总指挥，并任新一军军长，副军长为孙立人，新一军下辖新编第38师、新编第22师和新30师。师长分别是孙立人、廖耀湘和胡素。

史迪威趁着郑洞国不熟悉中国驻印军的机会，他想将中国驻印军的军权牢牢地抓到手中，他竟然出了大招——用史迪威的话解释：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更不要中国将领。他准备将该部队的营以上的军官，全都换成美国人。



孙立人将军与新一军

中国驻印军是中国的军队，营以上的军官都换成美国人，这支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岂不是成了美国的“雇佣军”？史迪威的提议，遭到了中国驻印军全体将士的反对，可是史迪威是该军最高的领导者，更多人是敢怒不敢言，最后选择了沉默。

孙立人不仅敢怒更敢言，他操着流利的美式英语，就开始和史迪威大吵，吵架的最后，史迪威终于妥协了，那批300多人的美国军官，并没有真正掌握中国驻印军的军权，而是下到各营和各团当了联络官。

在当时的印度蓝姆迦训练基地，因为驻印军吃的是美国的（英方给中国驻印军提供的食品等物资，美国承诺以后会以别的方式偿还），用的是美国的，正所谓吃人家的嘴短，用人家的手软，故此，驻印军在史迪威面前，想伸直腰杆有些困难，史迪威在驻印军的地位近乎于“太上皇”，连带着他手下的美国军官也有些颐指气使。

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为了节省编制，他突发奇想，竟想让看护兵学习驾驶的技术，一旦战争爆发，这些看护兵在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开汽车，上阵杀敌。

孙立人对蔡斯的提议，极力反对，他说：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美国人，每个都能开汽车。最后蔡斯只得放弃自己的主张。



英国在印度是殖民者，英印军在印度代表的自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一次，一个英印军的少将，去见孙立人的时候，竟然没敬军礼，失礼的少将遭到了孙立人的训斥，那位少将只得乖乖地补礼。

根据丁涤勋回忆，英军派到新38师的联络参谋是马丁上校，非常傲慢，办事不尽责，还跟孙立人顶嘴，孙立人命令马丁立正，并抡起鞭子，狠抽了他的小腿五六鞭，这位马丁上校挨了打，这才知道了孙立人的厉害！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兵当街调戏妇女，妇女被两名驻印军官兵救下，那名美国兵虽然被揍了一顿，但却撕下了一名驻印军的军官服号，史迪威拿着证据来找孙立人，让他找到凶手，并要将其送上军事法庭。孙立人早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认真地说："请总指挥先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办我一个督军不严之罪吧！"

史迪威听孙立人话里有话，忙问事情的经过，待他得知实情急忙赔礼，回去严管自己手下的美国兵去了！

从这三点便可看出，孙立人不媚外，不崇上，坚持国格，敢于和小看中国驻印军的外国将领斗争的一贯作风。

史迪威和他调来的一帮美国军官，虽然浑身上下弥漫着一股"骄傲"的美国牛仔的作风，但他们却有一样好处，那就是务实，肯和驻印的中国官兵们打成一片，在中国驻印军中，设有一个训练中心，该中心的主任就是美国麦凯布准将，总教官为阿姆斯上校，这两位美国的高级教官，虽然眼高于顶，但每到训练，绝对是一丝不苟，中国士兵遇到枪械、操典等不会的地方，他们就手把手地教，直到中国士兵完全掌握了为止。史迪威为了彰显自己一定要打赢缅战的决心，他还将儿子小乔和女婿布鲁克也都调到了蓝姆迦，这种"全家兵、齐上阵、共杀敌"的剽悍做法，也让孙立人等中国驻印军的高级军官都对史迪威另眼相看了。

史迪威想抓权，而蒋介石则对中国驻印军打起了另外一番主意，中国的战场

上，急缺炮兵，他想通过史迪威，将中国驻印军分成九个炮兵营，每日加强训练，待他们发射火炮的技术成熟后，然后乘飞机回国，加强国内抗日战场上炮兵的力量。

中国驻印军这支部队被当成炮兵训练了几个星期后，史迪威就开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反攻缅甸的任务，比为中国国内的抗日战场训练炮兵还要紧迫，最后中国驻印军跟炮兵训练彻底说再见，他们又重新恢复了步兵的身份。

在蓝姆迦训练基地，最为中国驻印军操心、出力的便是孙立人，据新一军军医处长薛庆煜回忆：

> 蓝姆迦疟疾横行，每到半夜，孙立人就惦记着中国驻印军的官兵防蚊的情况，他经常半夜让司机开车，抽检某个营地，如果战士们的蚊帐没有掩好，他会仔细地帮战士掩上，如果战士们的手脚露在外面，他就轻轻地将其推回，而第二天，对战士睡眠情况重视不足的长官，就会被严厉训斥。
>
> 当时，在野战医院中，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失眠，有一位姓姚的军医为了让战士们摆脱失眠的痛苦，他就萌发出想学催眠术的念头，孙立人就利用关系，从国外为姚军医买来催眠的书籍，以及催眠的道具，姚军医学会催眠术后，就可以帮那些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的伤员安睡和休息了。

郑洞国能成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指挥官，并和孙立人搭班子，完全是蒋介石要迁就史迪威的结果。

蒋介石曾有过这样一个打算，他想派邱清泉去接任罗卓英的职务，可是邱清泉脾气暴躁，眼睛里不容沙子，蒋介石几经斟酌，最后还是换上了脾气温和的郑洞国。

在丁涤勋和王伯惠合著的《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据说蒋介石选择郑洞国将军出任新一军军长，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因为孙、廖二位师长在学历、资历、功绩方面都不低。上面又有个连蒋介石本人都不大买账的史迪威，所以该军长确实不好当。而且蒋介石又不能任命一个非其嫡系的将领去外国指挥一个战斗实力很强的军。挑来拣去最后选中了既是嫡系（黄埔一期）又性格宽容、厚重、耿直，因而能与孙、廖二人融洽相处的原新八军军长郑洞国将军。

后来的事实表明，郑洞国将军的为人确实富有宽容、厚重、正直的美德，完全不像某些“天子门生”那样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同孙将军私交不浅。孙将军历来看不惯那些不是凭本事而是靠“关系”爬上来的人，却对郑将军相当尊重……孙立人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平生有最尊重的两位老长官，一个是宋子文，另一个就是郑洞国。

郑洞国也是一位很有指挥才能的将军，但因为是蒋介石派来的，故此不受史迪威看中，但这并不妨碍他忍辱负重，做“不受待见”的新一军的军长。但郑洞国在缅甸绝对是尽职尽责，在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蓝姆迦集训的描写：

蓝姆迦营地设有一些训练场，每个训练场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部队，士兵在各训练场轮流接受美国教官的训练，美国人训练军队和中国传统练兵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把训练场当工厂，把士兵当原料，训练的分工很细、要求严格，但动作却很简单，美国自持有强大的空军和炮兵，故对建城作业和夜间作战不很重视，至于对官兵的精神教育就更谈不到了！

孙立人自然不认同美国教官的练兵方法，他和廖耀湘都在缅甸亲身经历过和日军的实战，当时，中国远征军的武器落后，纵有火炮，亦无炮弹供应，更别提强大的空军支援。故此，中国驻印军的练兵方法，应该从实战出发，不应该照搬美军的步兵操典。

孙立人一再叮嘱中国驻印军的官兵，训练一定要结合实际，缅甸是个多雨的森

林国家，公路的等级不高，重炮和坦克等武器难以大面积地展开，故此，练兵要以战胜缅甸的日军为目标，任何主观不贴近实战的练兵方法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孙立人利用早晚的时间，将部队拉到暗无天日、潮湿阴暗和虎啸猿啼的原始森林里，训练手下的官兵渡河、爬树、登山、丛林战和夜战等科目。



孙立人在训练场

经过孙立人的训练，驻印军的官兵不仅个个能上树攀岩，泅水渡河，很多士兵也都成为了丛林战的高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方供应驻缅军的弹药充足，驻印军的官兵们实弹射击的机会大大增加，故此，单兵射击的精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美国教官对于孙立人的练兵方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样做只是让士兵更疲

劳，在实战中并不会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只有美国大陆军作战方法——首先呼叫飞机轰炸，接着重炮猛轰，然后士兵横推过去的“三板斧”的战术，才是最经典最正确的战斗方法。

军事总长何应钦有一次乘飞机到印度的蓝姆迦视察，他虽然知道美国教官的训练方法有些不切实际，但他还是在背后告诫孙立人，蒋委员长尚且知道忍耐，你也应该以大局为重，切莫造成不必要的冲突！

孙立人没法改变美军的练兵方法，但他却可以在一早一晚，即美军军官的正常练兵之外，对中国驻印军的官兵“吃小灶”，刻意对他们进行丛林战和夜战的强化训练。

孙立人在蓝姆迦练兵，经过实践验证，绝对是卓有成效的，孙克刚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中，曾经记录下何应钦在印度访问期间，视察中国驻印军，一个名叫王敬的机枪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经过：

> 王敬是一个轻机关枪射手，当他正在向假想的敌军阵地瞄准射击掩护步兵攻击时，何总长蹲在他的背后，眼看着步兵已经接近对面高地目标还不到十步的距离，王敬的机关枪仍然在“格格”的狂叫，子弹从步兵的头上擦顶飞过，落在目标上扬起阵阵的灰尘，何总长恐怕打伤了攻击前进的步兵，立刻命令王敬停止发射，王敬似乎没有听到似的，依然继续射击，一直等到他看见步兵投出的手榴弹在目地物上爆炸时，他那挺机关枪“格格”的声音才停止。他这才不慌不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何总长敬了一个礼，何总长很高兴地说他很好，和他握手，并且说回到重庆去一定颁发一个奖章给他，两个月后，王敬胸前果然挂起一个光荣的奖牌。

从王敬打机枪的精确度、娴熟度、对步兵冲锋时间的把握，以及不可动摇的信心上来看，孙立人对驻印军的训练，已经达到了一个让对手生畏的程度。王敬胸前的奖牌，如果分成十份，有两份是来自美国武器的先进，有三份来自他的努力，有五份来自孙立人对他的培养。

一开始时，美国教官对中国驻印军从战场上得来的土经验不屑一顾。由于当时翻译紧缺，美国教官的美军教学法，也得不到驻印官兵的认同，因双方无法沟通，故此，两边摩擦不断，后来，这些优越感十足的美国教官，也明白了美国步兵的东西在大洋彼岸的缅甸实战中，确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教学的双方达成了理解的共识后，蓝姆迦训练基地的教学，这才走上了快车道。

当时中美英三国对蓝姆迦训练中国驻印军的建制分工是这样的，中国负责兵源和军队的组建，美国教官负责训练和提供军械，而英国负责后勤和补给。

英国人提供的伙食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他们一味地为中国驻印军提供大米和面粉当主食，副食各种肉类罐头，中国士兵们天天吃这种单调的食物吃到反胃，后来有的士兵受不了，便拿着充裕的军饷，经常去镇上的饭馆去打牙祭。

中国驻印军在印度是不允许募兵的，新一军的兵源全部来自国内，中国驻印军的精兵善战，引起了英印军方面的妒忌，他们想将中国驻印军划归到英缅军的序列，可是计划很快落空，他们就又起了“幺蛾子”开始限制中国国内每天往蓝姆迦空运兵员800人的计划。

后来经过中、英和美三方面紧急的磋商，中国往蓝姆迦空运兵员的人数被限制在400人。可以想见，孙立人等中国驻印军所面临的环境，基本等同于石板下面的小草，想要存活，只有顶着压力一点点地成长。

但英印军的刁难，却挡不住国内青年参军的热情。

当时日军在缅甸断了滇缅公路，抗日战争到了最艰难的阶段，李贺的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已经不是课本上的一堆文字，而是变成了“投笔从戎”的号角，成为了“百战杀场终不还”的报国理想。

根据《近代史研究》等期刊上的论文所载，1943年11月13日，在救国家于危难等口号的鼓舞之下，四川绵阳县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申请从军远征。接下来，全国知识青年报国参军，入缅作战的热潮便一发不可收拾，先是成都、川西，接下

来甘、陕、湘、赣等省份的大学纷纷响应，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当时联大有三位常委，他们为了支持抗日，决定以身作则，有两位送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去印度参军：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中国驻印军当军事译员。

张锡祜后来在空战中牺牲，他在给父亲张伯苓的信中，曾经这样写过一段，至今读之仍令人心情澎湃的话：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西南联大曾经有1100多名学生入伍到印度参军。

当时这些"投笔从戎"的学子们，需要从国内昆明的飞机场乘坐飞机，经过驼峰航线，飞赴蓝姆迦，加入中国驻印军的行列，他们在临上飞机之前，都会有一批年轻的女学生，要为这些有志报国的入伍青年送行。

当那些送行的女青年，将代表期盼和希望的花环，挂在他们脖子上并说出胜利后再见的话时，其中一个青年用坚定的声音，讲出了一句简单的四个字的话，让当时所有送行的人全都泪流满面，这句话就是——来世再见！

远赴异国，并和号称世界最"精锐"的日军交战，基本上是一条"不归路"，出国参战，镀金归来，骑马当官，这只是难以企及的幻想罢了，用热血融化子弹，以胸膛抵挡刀枪，明知道"古来征战几人回"还要争着去做"无定河边骨"，这样的慷慨和勇猛，任何的感动、任何的褒奖都不为过了。

为了保证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力，当时美国的军医进驻昆明，他们对这些报名参军的青年检查非常严格，身患传染病、脚气和痔疮都算不合格，可一旦检查合格，这些美国的军医，就给他们盖一个蓝色的合格戳，然后凭戳上机，一路顺利，再无拦阻。



作为新一军的“军魂”，孙立人对待士兵既爱护又严苛。

这些学生兵们大多数是第一次坐飞机，飞机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机身颠簸剧烈，机舱内寒冷异常，这些青年们身穿单衣，虽然机舱里有御寒的军毯，但也是难以抵御喜马拉雅山上空的酷寒，飞机在运兵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学生兵们为了御寒，劈开机舱中的弹药箱，在机舱中烧火取暖的可怕事情，幸亏机长发现了机舱中的浓烟，及时灭掉了明火，这才制止了一场机毁人亡的大悲剧……但在这800公里的航线，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敌机不时出没，飞机在强气流中上下颠簸，让很多学生兵都体验到了在“鬼门关”转一圈的感觉。

这些学生兵们下了飞机之后，立刻洗澡消毒，身上穿的衣服全部烧毁，随后，由美国教官给他们分发了近乎“奢侈”的军需品。这些军需品包括：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上衣一件，棉织内衣内裤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

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橡皮垫褥、水壶、手电、遮风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

美国政府虽然暂时没有派遣陆军部队到印度，但却为中国驻印军，慷慨地装备了全套的美制武器。每个驻印军的战士，都配备了一支火力强大的美制M 4 汤姆式冲锋枪、防弹钢盔一顶，并配发进攻型手榴弹若干。而且每个班都配备轻机枪若干挺，重炮装备到营，而且一旦发生战斗，天空还有强大的美军飞机进行火力支援。

缅战老兵张克任有一段回忆，以前国内的教官训练战士卧倒，都是人先倒地，护住枪支。可是在蓝姆迦基地，美军教官却大方地告诉受训的士兵，卧倒时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管人不管枪，枪坏了，随便换一支新枪就好了！

中国驻印军的单兵训练，包括队列操练、体格训练、战术理论、武器操作等等，而军官的训练就相对要复杂得多，不仅囊括以上的内容，而且包括战术指挥、沙盘演练、无线电、步炮协同等的课程。

蓝姆迦训练基地，基层训练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同时，高层的权力之争，经常以赤裸裸的对抗形式出现，史迪威一时无法将中国驻印军的高级军官全都换成美国人，他就想利用那些美国教官，全力打造自己在驻印军中的最高权威。

中国驻印官兵究竟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还是要“不蒸馒头争口气”？孙立人明确地告诉手下的官兵，中国驻印官兵虽然身在异乡，但一定要有国格，对于友邦必须尊重，但任何人都不许奴颜婢膝。

驻印军的官兵有孙立人撑腰，果然对美国教官的盛气凌人开始了反击，经过了几次明争暗斗，甚至拔枪相向，那些盛气凌人的美国教官这才明白，中国驻印军是有底线的，中国虽弱，但中国军人的人格更需要理解和尊重。

驻印军中的权力争斗，比较直接，也容易解决，但是政治层面的明争暗斗，却如冰河下的暗流，汹涌不休。史迪威对蒋介石早已经心存芥蒂。他甚至给蒋介石取了两个绰号“花生米”和“小响尾蛇”。前一个绰号，是指蒋低能，后一个绰号是说蒋爱跟他吵架。

当时新一军有位副参谋长温鸣剑，因为有事，他没有请示史迪威，而是直接和重庆的军政部通了一次电报。史迪威得知后，立刻大怒，当即强令他回国。

孙立人、廖耀湘和郑洞国一起对史迪威提出抗议，要知道，中国驻印军毕竟是中国的军队，绝非史迪威或者是美国政府的雇佣军，温鸣剑往国内拍电报，办的是公事，合理合法，将其遣返，实在是于理不合。

史迪威面对众人的群起而攻之，这才悻悻然收回了成命。史迪威对自己的三位中国“伙伴”，其待遇是完全不同的。他基本是“忽视”了郑洞国的存在，而对廖耀湘，更多的是下命令，而中国驻印军有什么事情，他都喜欢去找孙立人商量，两个人在谈事的时候，基本是讲英语，一旦孙立人不同意史迪威的建议，他们就开始大吵，孙立人用英语回击史迪威，而史迪威却用中文试图说服孙立人，他们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这也是中国驻印军中的一个奇景，但两个人吵过架后，反倒能互相体谅，并能更好地合作。

孙立人在蓝姆迦训练期间，还获得了两次荣誉，一次是上文提到的受获“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这枚勋章是在1943年1月2日，印度的传统节日“达巴尔日”上正式获得的。当时仪式之隆重，确实非常轰动。

另外一件荣誉是，孙立人在从缅甸移师印度的途中，曾经救下了一位断腿的中校医官，这位医官就是锡金王国的一位王子，锡金国王为了表示对救子之恩的感谢，册封孙立人为锡金的荣誉国民。

蓝姆迦练兵是卓有成效的，从1942年开始，到1944 年年末，先后有10 万名中国士兵，曾在这里接受培训，而国内师以上高级指挥官，也有三分之一在蓝姆迦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在蓝姆迦整训的新一军，当时有两个终极的任务：一是打通滇缅公路；二是取得第二次入缅对日军作战的胜利。目前，整条滇缅公路都已被日军占领，想要将日军从缅甸彻底赶走，很显然，此任务并不好实现。

再看驼峰航线：该航线需要飞越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本是一句

梵语的音译，意思是雪域。雪域山系纵横陡峭，气候寒冷，气流多变，更兼之空气稀薄，让其变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

根据资料记载，1942年至1945年，有500多架飞机飞越“驼峰航线”时失事或失踪，损失人员1600多人。虽然损失巨大，但空运的物资，还是无法满足国内抗日战争的需要。

这时，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便向重庆政府建议，再修一条公路——中印公路，将国际支援中国的战备物资，转道印度运往中国，用中印公路，替代被切断的滇缅公路。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经过权衡利弊，仔细考虑，最后统一意见，即同意了中印公路的修建。

不久之后，修建中印公路与第二次入缅作战，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了。第二次缅战震惊世界，而同期修建的中印公路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其实，蒋介石对于中印公路的修建早就有预案，只不过一直未有机会使其付诸实施而已。

早在“七七事变”发生之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就清晰地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天长日久的消耗战，以日军凶恶狡诈的特性，他们很有可能会出兵缅甸，切断当时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日的生命线——滇缅公路。



孙立人

滇缅公路一旦被切断，是否有修建一条中印公路，代替滇缅公路的可能？为此，重庆政府连派两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从国内出发，深入北缅，从胡康河谷一直摸索到新平阳一带，最后认定，在不毛之地的胡康河谷一代修路，只要科学规划、措施得力、人员到位，中印公路的修建也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中印公路的修建，确实经历了一波三折，该公路的修建，最早可以追溯到1941年初，交通部向行政院提交了详细的“中印公路”的计划书。随后国内便派出了工程师，展开了实地勘测，但英国人却不愿中印公路被修通，没有英国人的支持，途经

西藏等地区的测量工作难以开展，1942年1月2日，勘测队自印度返回昆明，“中印公路”第一次筹修工作宣告流产。

1942年2月，蒋介石赴印度参加“新德里会议”，会上提出了修建“中印公路”的建议，但驻防西康的刘文辉，因不愿配合修路，又加之第一次缅战失利，政府无暇他顾，第二次修路计划也随后搁浅了。

前两次修建中印公路的失败，并不能阻止这条新运输“生命线”的修建，1943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东亚战区会议，并制订了修建中印公路的计划，史迪威当时也列席会议，一场会议开罢，他乘飞机兴冲冲地回到了蓝姆迦训练基地，并向郑洞国、孙立人和廖耀湘等驻印军的高级军官，传达了重庆政府修建中印公路的命令。

孙立人等中印军的高级军官，早就摩拳擦掌地等待着此命令，要知道，作为军人，如果不能雪第一次缅战兵败之耻，他们就不能在军界中扬眉吐气，他们从军的生涯，就将留下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

中印公路印度的起点在雷多，经过缅甸的新平洋、胡康河谷、孟拱一直到密支那，再经八莫、南坎，在畹町与滇缅公路会合，这条公路除了一小部分在印度，大部分都在日军设有重兵的北缅地区。

孙立人在蓝姆迦卧薪尝胆地练兵的时候，日军为了守住北缅，他们更是丧心病狂地在北缅的各个战略要地，都修建了犬牙交错的工事，以及异常坚固的堡垒。

想要建成这条公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拦路的日军统统消灭，用敌人的血肉，当成筑路的基石，用射向敌人的枪声，当成筑路奠基的礼炮。

修建中印公路，有近期和远期两个好处。近期的好处是，随着中国驻印军进攻缅北，公路也会沿着军队的脚步，一路推进，不仅援兵能顺利到达战场，而且战备物资，也可以通过汽运，很方便地送到前线；远期的好处是，一旦驻印军收复北缅，那么中印公路，将与国内的滇缅公路相贯通，国际社会援华的物资，以及重庆政府自购的军用物资，就可以从印度源源不断地送回国内，这等于绕开了被日军占

领的缅南和缅中的滇缅公路，为重庆政府极度“贫血”的运输线做了一个高超的“搭桥”手术。

但修建中印公路，有好处，自然也有坏处，坏处就是，此战只能胜，绝对不能败，如果失败，日军就会沿着修好的中印公路，一路追来，不仅雷多和蓝姆迦训练基地会失陷，中国驻印军也将沦入到万劫不复之地。

当时世界上的舆论，都不看好修路的中国工兵，他们一致认为，以中国人落后的设备，外加日军的阻拦和破坏，这条路很难被修建成功。英国人对修建中印公路，表面上支持，其实暗藏的却是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印公路一旦贯通，将对英国殖民印度产生不好的影响，基于这种自私的想法，他们一个劲地强调，中美双方修路的时候，日军一定会派兵破坏，或者出动飞机轰炸，这都是中印公路难以修成的客观条件。

1942年12月25日，这天是西方传统的圣诞节，中印公路在这一天开始动工，担任护路的队伍是孙立人最精锐的新38师。

中印公路全长1724公里，起于印度东北部的雷多，穿越缅北的广大地区，终点为中国昆明。在印度境内的长度为61公里，在缅甸境内长为1031公里，中国境内长632公里。

当然，缅甸境内的1031公里，是最难修建的一段路，这段公路，不仅要跨越高达十多座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峰，还要穿越胡康河谷这样环境异常恶劣的无人区，而且沿途还有穷凶极恶的日军充当“拦路虎”。

工程一开始，中国驻印军工兵第十团是这只修路队的主力，李乐中上校指挥着手下的官兵，他们用最原始的十字镐、铁锹、簸箕和抬筐，开始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路，一段时间之后，美国的两个黑人工程兵团开赴雷多，加入了修路的大军，这两个团的总指挥，就是皮克准将，皮克曾经修过密苏里水坝，他绝对是工程方面的专家。

皮克的手下不仅有专业的工程兵，而且还带来了大型的修路设备，随着推土

机、压路机、混凝土搅拌机还有空气压缩机等大型现代化设备的使用，修路的速度也就大大加快了。

修路开始时，中国的工兵团共投入了2500人，而美国的两个黑人工兵团是6000人，还有一万多名来自印度等地的劳工，到后来，人数越来越多，皮克准将指挥人马，紧跟在一线战斗部队后面修路，随着中印公路，每天以1.6公里的速度延伸，日军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竟悄悄地派兵，偷袭了印军的几个哨所，并占领了中印公路两侧几个重要的山头。

孙立人得知情况，当即派114团李鸿部，对日军进行了反击，经过一个月左右的争夺，李鸿部重创了日军，让日军破坏修路的计划成了泡影！

现在的情况是，孙立人领着部队在前面跟日军开战，他刚刚收复了一块北缅的土地，后面修建的工程兵部队就会跟上，中印公路就会在硝烟味还没有散尽的异国土地上，不停地、倔强地、顽强地延伸。

中印公路的修建，堪称修路史上的奇迹。中印公路工程的建设，从1942年12月25日圣诞节，至1945年1月通车，用时两年零三个月。不仅中美两国都派出了成建制的工兵团，而且还动员了近20多万名中印缅三国的民工。大家携手并肩，共同完成了这条令人叹为观止的“天路”工程。

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在考证这条公路时，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为修建印度、缅甸境内的公路，美军投入的工程兵是1.5万人，死亡1133人——正好是一英里两座墓碑。

修建这条公路的劳工，所面临的疾病、塌方，敌机轰炸等恶劣环境，要比美国的工程兵还要严苛，根据云南保山地区档案馆的资料，天灾人祸死亡的筑路劳工达3000余人，工伤致残12000余人。

这条全天候的混凝土公路修建的同时，铺设三条与公路并行的中印油管的任务也随之展开。要知道，汽油是工业必不可少的血液，更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催化剂。在抗战时期，曾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可见油料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

战争的作用。

在以前的滇缅公路之上，来来往往最多的车辆便是运油车，这些运油车在陡峭狭窄的道路上行驶，而且还要面对敌机的轰炸，不仅容易翻车出事，而且运输这些油料的汽车，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汽油。西南抗战史学家胡文义在《中印油管》中，曾经这样悲壮地写道：“自川西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重型轰炸机‘空中堡垒’，因缺乏足够的储备汽油，难以随时出击。轰炸日本的飞机用油，须先从印度运到四川西昌，运输机从印度起飞时，油舱已装满汽油，减去来回自身消耗后，等于运输的汽油只剩下20%—30%，一架飞机要往返印度一星期才能运来够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一次之用油……”

中印油管的起点，选在印度的中心城市之一的加尔各答，加尔各答靠近胡格利河，水运发达，油船一旦靠港，国内紧缺的油料，即可以注油入管，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

修建中印油管，虽然前期投资巨大，但这条长达3218公里的输油管，在1945年6月到1945年11月，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为抗战提供了18000吨的成品油，并在半年的时间里，总共提供了10余万吨的成品油的输运佳绩。中印油管全长3218公里，创造了油管铺设最长的纪录，而且至今没有被打破。

1945年1月“中印公路”胜利打通，这条以中国人为主导，以美国的帮助为基础，双方共同修建成功的公路，被称为“抗战生命线”，这条被称为最难修的公路，成功地为中国抗日战场输运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并为中国抗战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蒋介石在庆祝公路贯通的仪式上宣布：“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包围。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蒋介石后来迫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而又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手腕。蒋介石将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

公路，这也算为史迪威在缅战的贡献略作补偿，以慰其心。

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善意”之举，并不买账。

2．反攻，缅战枪声重打响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明·戚继光《马上作》

第二次反攻缅北之战，终于打响，兵家有句名言——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作为新一军尖刀部队的新38师，如何打好兵出雷多的第一战，确实很有讲究。

由于当时史迪威去参加开罗会议，而孙立人也飞回国内，到重庆办事，史迪威的参谋长柏特诺却根据错误的情报，竟荒腔走板地派112团孤军深入，进攻于邦，致使112团被围重围，形势万分危险。孙立人得到消息，他急忙飞回印度，面对危局，孙立人能否指挥若定，在于邦打一场漂亮的战役。

194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有蒋介石在埃及首都举行了开罗会议。在这次著名的会议上，三巨头讨论了中国和缅甸的军事形势，并签署了“开罗宣言”。宣言规定，三国旨在剥夺日本自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所占的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并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国驻印军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制订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该作战计划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中国驻印军从雷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接着翻越野人山，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八莫、腊戌等战略要地，最终使中印公路，与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融为一体，担负起国内“运输大动脉”的任务。



孙立人在训练场

由英美出动5—10个师，在印度正面发起进攻；而中国云南提供15—20个师，从云南向缅甸发动进攻；盟国提供3—4艘战列舰和6—8艘航空母舰，进攻缅甸附近的安达曼群岛以掩护盟军登陆仰光，这即南北夹击，两栖作战收复缅甸的“安纳吉姆”的作战计划。

可是该计划却遭到了丘吉尔的反对。罗斯福一直有心让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战后的四强，可是丘吉尔担心的是，一旦中国成为四强，势必影响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将英印军过早地卷入战火是不理智的行为。

“安纳吉姆”的作战计划搁浅后，取而代之的是“茶碟”计划，该计划使英印军在反攻缅甸战役中承担的义务减少，他们的军队只负责协助，而收复北缅的重担，就大多落在了中国驻印军的肩头之上。

日军占据了缅北地区之后，他们对于在蓝姆迦练兵的孙立人，一直甚为忌惮，

为了防止驻印军收复缅北地区，他们便依山靠岭，借关倚隘，修建了大量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

1943年，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部，一是为了修路的方便；二是为了反缅战争所需，便从蓝姆迦基地，前迁到了雷多。

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等人在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孙立人也从印度雷多飞回到重庆，到军政部汇报工作。这时，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权，就掌握在史迪威的参谋长柏特诺手里。

柏特诺参谋长在远征军的训练中，曾经讲过一句让中国远征军老兵不能忘怀的话：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担心武器损坏，一支枪在美国的生产线上，几分钟就造好了。

但后来的军事学家，评论这位参谋长的指挥才能时，都说：柏特诺打仗，既不懂中国人的战法，也不懂日本人的战法，他只懂美国人的战法。

柏特诺为了向开罗会议献礼，他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命令新38师的112团，兵出印度，占领新平洋，准备向于邦一带发动进攻。

新平洋位于野人山和胡康河谷之间，是缅甸一片非常少见的平地，当时112团的搜索连连长潘德辉，领着一连人马，在行进的过程中，碰巧和日军第18师团，驻守新平洋的荒木中尉率领的日军相遇了。荒木中尉刚刚发出作战的命令，便被潘德辉手下官兵迎面一阵冲锋枪，打成了蜂窝煤，300名日军赶忙卧倒在地，用落后的武器三八式步枪（三八大盖）还击，潘德辉将手一挥，几门迫击炮就是长达半个小时的猛轰，日军伤亡大半后，搜索连的官兵端起冲锋枪一顿狂扫，这队日军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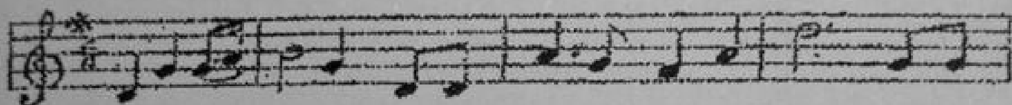
消息传来，不仅新平洋地区的日军震惊了，侵占缅甸的18师团的日军也被打蒙了，这是一支什么部队，竟能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干净利落地消灭了300名精锐的日军。当他们得知中国驻印军兵出雷多，日军18集团军的军团长田中新一，还有驻缅日军的总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他们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场漂亮的歼灭

战，让他们明白了一件事——第二次缅战终于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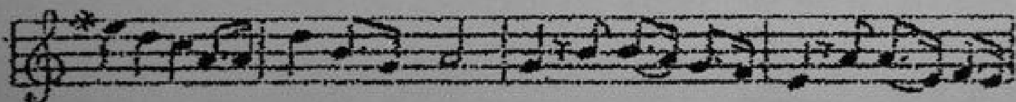
当年在印缅战场威震敌胆的抗日劲旅

新一军军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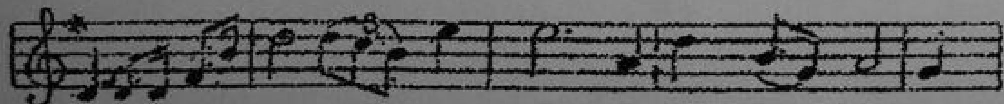
孙熙泽 词
应雪痕 曲



吾军 欲 发扬 精诚 团结 无欺 罔 矢志
第一 体 要壮 筋骨 锻如 百炼 钢 暑雨
道德 要 提倡 礼义 廉耻 四维 张 谁给
大任 一 身当 当仁 于师 亦不 让 七尺



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 方不怕刀和枪要把敌人
无怨伤寒冬不畏冰雪 霜劳苦是故常饥咽粃与
我们饷百姓脂膏公家 粮步步自提防忍纵勿贪
何昂昂常将天职记心 上爱国国必强爱民民自



降亲上死 长效命 疆 场 才算 好 儿郎
糠卧薪何 妨胆亦 能 尝 齐学 勾 践王
脏长官榜 样军国 规 章 时刻 不 可忘
康为民保 障为国 栋 梁 即为 本 军光

孙立人父亲孙熙泽为税警总团第四团所作军歌，其后成为新一军军歌。

新平洋之战，可以被看成是第二次缅战的开场锣鼓，新一军用300名日军的血祭旗后，这支复仇之旅的战斗号角，终于雄壮豪迈地吹响了。

柏特诺也算一位“中国通”，他曾经在中国的军队内，以情报员的身份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之所以命新38师的112团，向于邦地区发动进攻，主要是基于英国人向他提供了一份不准确的情报，这份情报显示：于邦只有少数土人缅军组成的搜索队，间有一两个日本军官配属和士兵“三数百人”驻守。

新38师112团是新38师的主力团，团长为能征惯战的陈鸣人，此战虽为攻坚战，但以新38师一个团精兵，去进攻三数百人的日军，很显然是必胜之战。

柏特诺给陈鸣人部下的命令是，不需携带重炮等武器，轻装前进、快捷闪击、以求速胜。新38师112团1943年10月24日出兵雷多，该团的作战计划如下：

大龙河西岸，有胡康河谷重要的几个土寨，于邦和临滨等，由第一营负责攻取；第三营进攻的目标是拉家苏；第二营在战场上作为预备队，第一和第三营一旦攻击受阻或遇险，则第三营负责给予火力和兵力上的支援。

112团的实力，确实没有让柏特诺失望，第一营在29日攻到了新平洋。第三营只用了7天，即在11月1日，便占领了拉家苏。

可是接下来的战局，却是柏特诺预料不到的，112团在新平洋留下一个连担任警戒守卫，以第2营为前卫，第5连为尖刀连攻击于邦。可是部队在大龙河和于邦一线展开后，却被蜂拥而来的日军给团团包围了。包围112团的是日军18师团第55联队和第56联队。

日军第18师团现在的建制，已经和第一次缅战时大不一样了。原来该师团是两个旅团编制的甲种师团，总兵力约3万人，经过第一次缅战后，为适应山地和丛林作战的需要，整编为三个步兵联队，即第55、第56和第114联队，并大幅增加了炮兵的编队，即每一个联队，下辖两个炮兵中队，总兵力共两万多人，虽然人数照以

前减少，但山地和丛林作战的能力，却有了更进一步的增强。

大龙河是胡康河谷重要的天然屏障，于邦位于大龙河的西岸下游，它是大龙河一带重要的土寨，于邦三面是森林，另一面靠河，可以说是扼守战略要地大龙河的重要门户，112团只有拔下这颗钉子，才算是取得了兵出雷多的开门红。

112团知道于邦的重要性，日军的指挥官更要守住战略要地——于邦，面对112团的凌厉攻势，日军第18师团以114联队守密支那，以第55联队、第56联队向于邦前线增援。

这两支日军王牌联队的先头部队，一出手，他们就调集了4门山炮，对包围圈中的112团展开了狂轰滥炸，但幸运的是，由于通往于邦的道路狭窄泥泞，炮弹供应困难，日军的炮火一开始先声夺人，非常猛烈，但一股冲劲儿过后，炮击就变得稀稀落落了。112团是新38师的主力团队，他们虽然没有重炮，但却一水的美械装备，虽然处于下风，却临危不乱，他们借助地形，修筑了阵地，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仍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战斗。

李克己营的官兵（因为战线长达300里，李营官兵被分散使用，进攻于邦的这支队伍只有130多人，属于一个加强连的编制）一开始是压着驻守于邦的日军在打，因为一无援军，二无炮火支援，后期形势逆转，他们被增援的日军反包围后，便成了一支浴血奋战的孤军。

日军18师团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叫丛林战之王，此绰号绝非浪得虚名。只是新38师的官兵经过一年多的苦练，个顶个都成为丛林战的好手，究竟是日方强一些，还是中国驻印军更厉害一些，今日终于能见个真章了。

孙立人在蓝姆迦训练驻印官兵丛林作战的威力，在于邦的战场中，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出来。日军在白天占不到李营官兵的便宜，他们就在夜晚偷偷渡河，对一营的阵地展开突袭，可是精于夜战和丛林战的李营官兵，早就准备好了重机枪，日军被打得尸横两岸，血水飘河，并没有捞到一点好处。

日军一见偷袭无效，他们就改为炮火压制，渡河强攻。机枪连的官兵面对敌人

疯狂的炮火，展开了顽强的反击，机枪连的连长吴谨，亦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日军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最后渡河成功，700多名日军将不到130多人的李营官兵，团团包围在了大龙河的西岸。

李营官兵被围，新38师三营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面对敌众我寡，日军又有重炮等进攻性武器的不利局面，三营营长陈耐寒和连长赵振华在激烈的战斗中相继牺牲，士兵们伤亡严重，形势已经到了一发千钧的状态，112团作战失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孙立人急忙乘飞机回到了雷多。

112团的官兵们鏖战多日，已属疲师，孙立人想领兵支援，可是柏特诺却摇头拒绝，他给出的理由是：于邦一带，并没有大股的日军，112团如果按照计划作战，完全可以肃清当地的日军，而孙立人领兵去救，后勤补给将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柏特诺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睿智的参谋长，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指挥错误。而且还将112团被围的责任，归结为中国驻印军不肯战、不敢战，并将其上报给了开罗议会。

中国驻印军“耍熊”的战报，曾经让在开罗出席会议的蒋介石很没有面子，史迪威也觉得事态严重，他坐飞机回到印度，到雷多亲自指挥战斗来了。

孙立人当着史迪威的面，开始投诉指挥失当的柏特诺，但史迪威为了维护美国高级军官的面子，一个劲儿地让孙立人尊重柏特诺参谋长，孙立人气愤地道：“柏特诺根本就不是让112团去作战（不带重炮等进攻性武器），他那是让112团到于邦去接防！”

两个人大吵了一阵，孙立人一见吵不出结果，他就拉着史迪威登上了美国飞机，这架飞机在雷多机场起飞，直奔于邦的上空飞去。

于邦虽然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但却是胡康河谷重要的门户，孙立人想攻取胡康河谷，必须占领于邦。

孙立人和史迪威乘坐飞机，飞临胡康河谷的上空，胡康河谷位于亲敦江上游，

由达罗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组成，达罗盆地面积有310平方公里，新平洋盆地面积约有2480平方公里，而在这两个盆地之间有四大河流，它们分别是大龙、大奈、大苑和大比河，每到雨季，河水就好像四条发狂的银龙，汹涌咆哮，倒灌的河水，会让胡康河谷变成一片无法进入的汪洋泽国，缅语称这里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其实这句话说错了，魔鬼都不愿意在胡康河谷这块死地居住。

只有到了旱季的时候，人们才可以涉水而过，进入河谷，日军为了阻挡驻印军反攻的脚步，他们依靠河流之险、山川之恶，在高处修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可以说日军在第二次缅战之前，便已经完全抢占了地势之力。

孙立人和史迪威透过飞机的舷窗下望，透过密密匝匝的森林，林隙间隐约可见四条河水的身影，由于飞机的马达发出了巨大的轰鸣，于邦战场上的枪炮声，飞机里面根本听不到。

日军两个联队，已经将112团的官兵分割包围，从林内的112团阵地上，不断升起的硝烟的数量上，孙立人和史迪威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包围112团官兵的日军，绝非是一股小部队，而是一支正规军。

孙立人和史迪威乘飞机回到了雷多后，史迪威当即将柏特诺批评了一通，可是面对孙立人等人递上来的处理柏特诺的报告，却被史迪威以“柏特诺是一位正直的军人，他只是贪求表现，好心办了错事”等借口压下了。

史迪威接下来，同意了孙立人领兵解围的请求，孙立人立刻点兵，亲率第113团、114两团及第2山炮营，他们从雷多启程，全副武装，沿着刚刚修建的中印公路，艰苦地行军二十多天，才到达了胡康河谷，112团被围的地点。

112团第一营李克己营长率领队伍，被日军包围后，日军便开始利用重炮，对着李克己的阵地进行猛轰。

战斗一开始，第一营的官兵因为没有坚固的阵地，吃了大亏，后来，他们利用日军炮火炸折的大树，围起了一个工事，一个班的官兵守在据点里面，粗大的树木，不仅可以当掩体而且防弹，官兵们躲在后面，还可以大量地杀伤敌人。因为道

路泥泞，日军的重炮缺少炮弹，后来零星的炮击对树栅工事也难起破坏作用。

这样的据点，李营的官兵一口气就做了八个，一个班守一个，各个阵地之间，可以互相掩护，一旦敌人从哪方面进攻，其他的阵地，便可以组成交叉的火力，对日军进行打击。

最让人称道的是，李克己发现阵地的北面有一棵粗大的榕树，他便命一个班战士，在树下建了一个机枪阵地，因为有茂密的榕树树冠作为掩护，敌人的子弹和炮击对茂密的大榕树难起作用，而且树上可以放瞭望哨，瞭望哨一旦发现敌人，树下机枪齐扫，确实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后来，有研究缅战的专家，称此战役为大榕树之战。

李营的官兵，为了滞缓敌人的冲锋，他们在阵地的前面，埋上了大量的鹿砦，为了防止日军利用黑夜偷袭，他们还在鹿砦下面用拉线的手榴弹做成的绊发地雷，总之，丛林作战的杀敌点子，都已经被李营的官兵应用到了极致。

但目前最紧迫的是，因为连日的战争，第一营的官兵的给养基本已经用尽，如果天不下雨，他们就没有水喝，最后逼得没有办法，官兵们只得砍芭蕉根取水，饿了就只能眼巴巴地等美国运输机在空中补给，有时候，日军的对空火力很猛，或者遇到下雨、起雾等恶劣的天气，美国的运输机一连几日不能来，被围的李营官兵就只有任由肚子“咕咕”地唱戏了。

总之一句话，新38师第一营的官兵，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但他们用树木做成的据点，并用最少的子弹坚守了34天，确实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战争结束，第一营官兵坚守的地方，竟被叫成了李家寨。

李克己孤军作战，为何能有如此大的信心？他的信心首先来自孙立人在蓝姆迦训练营对他们的灌输的三个信念：相信自己经过努力一定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陷入困境，相信上级一定会来救援和帮助；面临危险时，相信本师友军一定会尽力前来营救。

萨苏大作《突破缅北的鹰》一书中，曾经援引了井上咸著《死谷胡康的持久防

御战》中一个含血带泪的片段，相信只要看完该情节，也就明白了驻印军的士兵坚守的信心，究竟来自哪里：

（日军）在大奈河支流的战斗中，曾俘获了一名重伤的中国兵，看起来他还完全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素以豪毅自诩的岛田中尉走到他的身边，温和地（用中国话）说：你辛苦多多的。

那名中国兵没有回答，口中只是喃喃地道：中国，中国……他的目光一直望着东方，重复着这两个字，直到气绝。

归国返家，中国远征军还有后来的驻印军战士，他们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永恒而坚定的愿望，那就是归国返家。

只有打赢了缅战，才能归国返家，才能去见妻儿父母，才能无愧于列祖列宗，如果埋骨异乡，那一切都将变成空谈！是归国返家这个最真实、最迫切的愿望支撑着李克己营长，率领130名官兵，守住了李家寨，硬拖住了日军一个700多人的大队，还有一支山炮部队。

当时，负责进攻李家寨的日军丸山房信大佐，在战后写给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的战情报告中，写道："中国军队的变化是惊人的，希望能引起师团长阁下的重视……"

当田中新一得知坚守李家寨的这支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孙立人手下的精兵时，他便对日军部队中的狙击手们，传下了一道密令：狙杀孙立人，孙立人体貌特征：身高，体瘦，脸白，白头发（指少白头），喜穿黄马靴。

可是胡康河谷的日军狙击手们，对照孙立人的体貌特征，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孙立人，孙立人极其注重自己的军容，他经常特立独行地歪带美国钢盔，带子勒住下巴前部，而且衣领上用两块纯金片做成的军衔，凸起的两颗将星，时常金光闪烁……

但孙立人在第二次缅战之前，曾经立下誓言：不攻克孟关，绝不刮胡子！

攻克于邦之战中，指挥作战的孙立人下巴上生满胡子，而且像印度的旁遮普绅

士一样，用一条白绸带将自己的胡子从腮部和下巴兜起来。现在的孙立人完全不是一副白面书生的形象，也难怪日军的狙击手失去目标，让任务彻底失败了。

根据缅战老兵的回忆，日军的阻击手枪法精准，他们隐身在原始丛林的高大树冠之中，专射驻印军军官的头部，实在让人防不胜防。驻印军的连长赵振华、江晓垣，排长刘治等，都是因为大意，而牺牲在日军狙击手的枪口下，后来，驻印军战士发现日军隐蔽在树冠内的狙击手后，先是端起冲锋枪，迎面就是一顿疾风暴雨般的子弹扫过去。

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绰号“短鼻子”，又称“战场扫帚”，因为射速快、威力大，深受美国黑帮的青睐，如果日军狙击手面对泼水一样的子弹侥幸不死，驻印军的官兵就干脆直接呼叫炮兵，几颗炮弹打过去，日军狙击手隐身的树木，在炮弹“轰轰”的爆炸声中，树身偃倒，树干折断，藏身在树上的日军狙击手便会掉在地上，直接摔成肉泥。

根据家住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的缅战老兵唐清荣的回忆，当时，日军士兵犯了军纪，日军当官的，就会给他们一把枪，并将他们绑在树上当狙击手，但绑在树上的狙击手，一旦被驻印军发现，那基本上就是有死无活了。

田中新一没有想到孙立人蓄须明志，他更没有想到，中国驻印军的实力竟强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很快，孙立人便让田中新一，知道了中国驻印军的厉害！

孙立人率领着113团和114团的增援部队随后赶来，从雷多至新平洋，距离将近200公里，从新平洋到于邦有35公里，500里的距离，如果道路畅通，坐汽车也就半天的时间，而部队急行军，也就两三天的路程，可是孙立人领着两个救援的主力团，却足足走了20天。

中国驻印军基本没有汽车，有汽车在未修通的中印公路上也无法行驶，孙立人领着部队走得全是原始森林，新平洋别看名字挺洋气，其实就是胡康河谷入口处的一处蛮荒之地，从新平洋到于邦基本无路，林中除了豺狼虎豹，就是蚂蟥和毒蛇，想要前进，必须用军刀开路强行，部队行进的速度，甚至比蜗牛都慢，从新平洋到

于邦这七十里的路程，孙立人只看到密不透风的林子里有一座腐朽的茅屋，连个土著居民的影子都没瞧见。不是孙立人部队训练有素，区区20天的时间，绝对赶不到于邦的战场。

依照史迪威的急脾气，孙立人的两个主力团赶到战场后，应趁敌未觉，立刻展开攻击，救出被困的李克己等一营的官兵，然后兵合一处，对于邦之敌，展开绝地反击。

孙立人用兵，却求一个稳字，要知道，新38师来到胡康河谷，属于攻坚作战，军队的给养、弹药以及后援全都接济不上，如果新38师贸然进攻，导致失败，必将影响驻印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的最终胜利。



孙立人将军与新一军

孙立人首先在距于邦阵地仅一里地的临干萨坎设立了指挥所，接下来，派出精干的情报人员侦察敌情，孙立人正在面对地图、苦思破敌之策时，一份重要的敌情布防图，就被情报人员送到了孙立人的面前。

这份布防图，来自一个被打死的日军排长。日军18师团，驻扎缅北，他们为了

在战争中掌握主动，也在积极训练丛林战术，丛林战碍于地势一般不宜大规模整兵团的推进，日军为了将丛林战的效果发挥最大，他们就将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排班为单位，在丛林中穿插突击，以求灵活快速地对驻印军的官兵发起攻击。

悲催的日军排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了孙立人主力团的先头部队，当场就被打死，很显然，这份日军布防图，绝对不是引诱驻印军上当的诱饵。

孙立人根据这份布防图，发现围困李克己营官兵的日军主力，布防并不严密，孙立人经过斟酌，决定从日军防护的最薄弱处发动进攻。

孙立人为了对史迪威表示尊重，特意等到他到前线指挥所，并请史迪威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新38师两个主力团接到进攻的命令后，十六门重炮一字排开，摩拳擦掌的炮兵在炮营营长苏醒的指挥下，黑乎乎的炮口对着日军的阵地，炙热的炮弹，流星一样地飞出，炮弹以每30米为一个弹着点的梯次，疾风暴雨般向日军的阵地倾泻而去。

114团的团长李鸿借着饱和式炮击的掩护，带领部队急速穿插到了于邦守敌的背后，苏醒炮兵营发动了第二轮炮击后，李鸿和李克己部一北击、一南击，对日军之敌发起了猛攻。

孙克刚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中，曾记录下了这段："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的歼灭战。

12月21日，孙立人将军亲率114团赶到前线。23日起，剧猛的血战展开，我们的炮兵开始活跃起来，步兵跟着炮弹冲了过去，被挡了回来，再冲过去，冲破第一道，又冲第二道，于是，双方发生了战壕肉搏战，许柄新连长将前线阵地的日军完全消灭了，日军主要阵地跟着发生动摇，湛茂棠连长立功心切，一马当先，冲进了最坚固的桥头堡阵地，第一排牺牲了，第二排又伤亡殆尽，最后他带着第三排抢得了阵地，但他自己又不幸饮弹成仁了。步兵的伤亡太大，炮兵的火攻接着而来，炮弹掘土机似的，把敌人整个阵地都翻过来，阵地里面再也无法躲藏了，残敌纷纷向树林里、河涧里逃命，被李营预先埋伏好的机关枪和追击部队猛烈的火力，统统给

歼灭了，没有走脱一个。这一场经过七昼夜的歼灭战，驻印军在敌人火网之下，步步跃进，前仆后继，伤亡了官兵230多人。敌人的死伤更大，总计比驻印军多出七倍，而且99%都是阵亡，伤而未死的仅有13人，都被驻印军活捉过来，阵亡的重要敌酋，有55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和大队长管尾少佐。

后来，孙立人的新38师渡过大龙河以后，发现沿途逃跑的日军，为了活命，他们竟在路边留下了许多字迹歪斜的纸条，上面用哀求的口气写着："中国弟兄不要追吧。这一次我们打败了，孟关再见！"等等。

如今的日军，已经不是第一次缅甸战役时，追着中国远征军打的"牛狂之师"了，什么大和民族、天皇战士、武士道精神，在生死面前，全都被抛在了一边。

中国驻印军进过蓝姆迦一年多时间的整训，不仅单兵的素质、超过了日军整体的战力，甩日军两条街，而且武器装备上，也让日军羡慕不已。

在1942年2月初，日本第5军团司令饭田祥二郎率领第18、第33、第55及第56等师团，他们以十万之众，兵分海陆两路，进攻缅甸，战争初起，日军的武器，并没有英缅军的装备好，但是英缅军畏敌如虎，大量的飞机、重炮和坦克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利用缴获的武器，经过对自己军队的武装，他们在战后，武器装备也有了一个质量的飞跃。

中国驻印军在蓝姆迦训练期间，他们得到了全部的美式装备，每师除了三个步兵团之外，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连等现代化军队的配置一应俱全，其中每个团还设有两个山炮营，一个榴弹炮营，十公分五榴弹炮12门，七公分五山炮24门，十公分五迫击炮36门，重机枪108挺，轻机枪360挺，甚至还有火焰喷射器、火箭发射筒等高精尖武器若干。

日军久留米师团第一次缅战时的师团长为牟田口廉，第一次缅战胜利后，他被调升为第十五军军团长，而田中新一成为了久留米师团的师团长，久留米师团虽然是日本的王牌部队，但形势比人强，现在他们的炮没有新38师多，枪没有新38师好，士气也没有背水一战的新38师高。

举一个让日军第18师团炮兵都只有膜拜的例子：在中国驻印军和日军打阵地战的时候，双方相距仅25米，可是新38军的炮兵，却能准确无误地将炮弹射入敌人的战壕，而且延伸后的炮弹坑，竟能做到比插秧苗还要整齐，驻印军的步兵有了炮兵的强力配合，简直如虎添翼。

日军第18师团面对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剽悍的军队，真的不甘心失败，要知道，该师团当年攻占新加坡的时候，曾以3万的兵力，迫使8万多英军缴械投降。接下来第18师团转战中国，不管是在淞沪会战，攻占南京还是进攻广东，乃至后来的第一次入缅作战，他们都是追着中国军队在打，现在风水轮流转，精锐的驻印军竟开始追着他们打，不可一世的日军反倒成了可怜受气的童养媳。

1943年12月29日，驻守于邦的日军在新38师的前后夹击下，进退失据，乱成一团，很快，他们留下了一地的尸体，最后狼狈地撤出了战略要地于邦。

第18师团的56联队第2大队，在缅北于邦战役中，几乎被驻印军第38师的两个主力团全歼，第55联队藤井小五郎联队长被击毙，大队长尾管少佐亦被击毙，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日军官兵2500余人成了缅甸战场上的亡魂新鬼，新38师长取得了缅北反攻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

大龙河西岸的日军，已经全部被肃清，而大龙河东岸的日军的心理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孙立人新38师的名字，简直就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向他们的头顶猛砍下去，日军昔日的不可一世，早已经丢到了九霄云外，为了保命，他们也只有固守堡垒，负隅顽抗，不敢再随便进攻了。

史迪威得知于邦大捷的消息后，他离开了在新平洋前线司令部，带着他的长子小乔、女婿伊斯特布鲁克等人，乘坐军用吉普，来到了“李家寨”视察，李克己营长，向他报告完34天的艰苦战斗过程后，史迪威连声说：“你们是真正的英雄，我要给你们记功！”

孙立人还将缴获的藤井小五郎大佐的指挥刀，亲手送给了史迪威，史迪威连声说，这是他过完圣诞节后，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史迪威已经从于邦大捷的背后，看到了一雪前耻、收复北缅的曙光。孙立人为了使柏特诺彻底服气，让这位参谋长大人知道于邦确有敌人的大量正规军，他命战士们将缴获来的日军山炮，推到了柏特诺的面前，看到真实的物证，柏特诺再也无法辩驳，他只得默然认错。虽然后来，柏特诺离开印度，被调回国内，但很多缅甸老兵，还是很想这位美国参谋长。柏特诺在蓝姆迦训练基地工作时非常认真，而且很能和驻印军的官兵打成一片，用浅显一点的话说，简直比以“喝兵血”为乐事的国军军官强上很多倍。

于邦大捷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证明了中国驻印军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日军精锐的18师团，这虽然是一个局部的胜利，但却为驻印军的第二次入缅之战，开了一个好头，于邦大捷更是为了以后的“奏捷凯旋”，奠定了“头阵胜，阵阵胜”基础，也是坚定了驻印军战士“将军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强大信心。

孙立人指挥新38师，攻下战略要地于邦后，新一军的另外一个主力师——廖耀湘的新22师也到达了新平洋。

新一军的军长郑洞国虽然也跟随部队来到了新平洋指挥部，但他却没有具体的前敌指挥权，史迪威与孙立人和廖耀湘经过开会，定下了兵分两路、进攻孟关的计划。

廖耀湘为右兵团，渡过大奈河后，从正面对孟关发起猛攻，史迪威考虑到日军在孟关屯有重兵，故此为廖师配属了战车一营，作为攻坚的主力。

孙立人为左兵团，他们的任务是做曲线包抄，歼灭太柏家之日军，绕路瓦鲁班，切断孟关之敌的退路，前后夹击，将驻守孟关的日军消灭在胡康河谷。

孙立人领了穿插迂回的任务后，便开始了积极的准备。胡康河谷之中，有四个战略要地，它们依次是于邦、太柏家、孟关和瓦鲁班。孟关不仅是胡康河谷上的战略要驿，而且还是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的所在地。

于邦已经被中国驻印军占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攻下太柏家，然后左右两路驻印军直攻孟关，取得这场胡康河谷战役的胜利。

孙立人部想要攻下太柏家，需要先行拿下大龙河对岸的乔家。乔家和于邦隔河相望，日军兵败于邦后，残兵败将都逃到了乔家和太柏家，为了阻止新38师的追兵渡河，乔家的日军虎视眈眈，机枪重炮全都架在了河边，准备给渡河的新38师以绝大的杀伤。

大龙河波涛滚滚，水宽流急，孙立人师渡河的设备并不先进，只能用森林里的木材和毛竹，扎制成简易的渡河工具，面对日军强大的炮火，如果强攻渡河，势必会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1944年1月11日，孙立人命令新38师一部为疑兵，让他们在大龙河的西岸砍木为舟，伐竹为筏，鸣枪放炮，铆足了劲儿大做渡河前的准备工作。

果然，大龙河东岸的日军就被新38师的这路疑兵，牢牢地吸引到了河边，他们并没有想到，孙立人已经派113团的官兵，绕道大龙河的另外一个渡口临滨，已然笑傲渔夫，悄悄渡河成功，113团渡河成功后，根本没有去打乔家渡口的日军，而是直接攻占了乔家日军身后的大班卡。

大班卡被驻印军攻占的消息传来，驻守巧家渡口的日军立刻军心不稳，乱成了一锅粥，孙立人随后开始率队渡河，巧家之敌在驻印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仓皇逃窜，死伤无数，侥幸未死的全都龟缩到了太柏家。

《孙子兵法·势篇》有云："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强弩，节如发机。"这句话粗解一下就是：运兵之道，趁热打铁，一鼓作气，不给敌人留下喘息的机会。

太柏家之险，不仅险在了地势险要，更有一条湍急的孟洋河，可以作为太柏家的天然屏障。如何攻下太柏家，已经成为摆在孙立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日军18师团以"菊"字为徽号，菊花为日本皇室标记，可见该师团的战斗力不仅一流，而且其指挥官，亦绝非庸才。孙立人在乔家与敌交战之际，曾在被击毙的日军55联队室隅大队的一名军官身上，搜查出了一份密令，这份密令来自18师团的师团长田中新一。

孙立人率领新38师增援被困的112团时，田中新一已经通过情报人员，知道了消息，他为了消灭新38师的增援部队，竟定下了阴险的围点打援、绕路偷袭的诡计——他暗中派了两个大队，准备绕过孟洋河，偷袭新平洋。

可是他的穿插绕路、偷袭的计划，还没等实施，便被孙立人发起的猛攻彻底打乱了阵脚。现在孙立人攻取战略要地太柏家，他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要对太柏家的日军，打一场更为精彩的迂回歼灭战。

孙立人这次是兵分四路，一路还是从太柏家正面佯攻，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其他三路分别是：

李鸿率114团在右，从大奈河的康道渡河，围住太柏家的右翼。

赵狄的113团在左，穿越密林，将太柏家的左翼牢牢控制住，而112团的2营的任务是断了太柏家的后路，让太柏家之敌，完全陷入到新38师的包围圈之中。

孟洋河作为太柏家的屏障，日军一开始采取的是固守的政策，孟洋河北岸的阵地上，战壕如蛇，地堡似龟，114团的官兵渡过孟洋河之后，团长李鸿一声令下，114团便向日军的阵地发起了进攻。

日军借助地利，负隅顽抗，李鸿采用分割穿插、逐一歼灭的作战方针，开始拔除日军的据点，但日军怎肯丢失阵地，往往李鸿手下的官兵，刚刚夺下一块日军的阵地，日军的指挥官便会组织一波日军进行疯狂地反扑，如此反复的拉锯战进行了20多日，孟洋西河岸的日军才被彻底肃清。

这一战，114团的官兵毙敌600余人，击毙宇生和窒隅两名大队长，以及其他级别日军军官多人。日军在和驻印军作战的过程中，有一个共性，日军即使身负重伤，也鲜有投降者。那些失去战斗力的日军，不是开枪自尽，就是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以自杀的形式来向天皇“效忠”。

日军的“愚忠”确实让人生畏，萨苏在《突破缅北的鹰》一书中，曾记录过一个可怕的情节：1944年底，从蓝姆迦出发到战场实习的青年军军官，曾在拉加苏附近丛林中发现一名日军狙击兵并将其俘虏。其时，此人并未进行任何反抗，包围他的

时候，中国士兵们发现这名日军骨瘦如柴，身患严重的疟疾，已经无力行动，只有眼睑还能颤动，表明他仍然活着，日本兵当时竟然保持着持枪准备射击的姿势，枪中的子弹已经上膛。此时，距拉加苏之战结束，已经足有十个月了！

再举一个发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真实故事，小野田宽郎是日本和歌山县海南市人，人们称呼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军人。1945年2月28日，美军在菲律宾的卢邦岛登陆，大部分日军战死后，小野田宽郎被他上级命令要潜伏卢邦岛，坚持和美军打游击。

小野田宽郎的同伙在游击战中纷纷死去，而小野田宽郎却足足坚持了28年，直到1974年3月10日，小野田的老上司谷口义美来到了卢邦岛，小野田宽郎才奉“上级”之命，正式向当地的警察局投降。

小野田宽郎回到日本，他将自己这段疯狂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中国的译本为《玉碎不可》。小野田不管是在书中，还是面对记者，都是一口咬定：“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

小野田宽郎事件绝非特例，他的想法就是当时日军普遍的行动“指南”，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能在战场抓到战俘，那绝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葛琪是江苏南通市海安人，他在转战印缅期间，曾任新38师特务连长、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抓住四个日本人战俘的情节：

> 其中有个（日本兵）开枪反抗的被击毙，活捉得四（抓住四个日本兵），余皆逃之。我连夜审问，想弄清驻地那里还有他们的人（日兵多识中文），他们拒不回答，只指指我手枪，指指他们的头，表示宁死勿屈，真有种。从他们的身上搜到两面日本旗，上面签了很多名字，据说是他们出征时，家人、亲友、邻居赠送的祝辞，如武运长久、得胜荣归……个个日本兵的身上都有护身符，或妻子儿女的照片，使我不忍伤害他们，而解去军部……

中国驻印军抓住日军战俘，甚为优待，可是残暴的日军，他们在北缅烧杀抢劫，往往与禽兽无异，缅战老兵唐清荣有过这样一段回忆：记得在一个叫“路林河”的地方，有两三百个女娃儿（兵败之后，日军有杀死慰安妇的先例，死的这些女娃，很有可能是慰安妇），被日本兵强奸后，全部杀死在河滩上。我们收的尸，直流眼泪啊，太残忍了……他们捉住中国兵，放“人风筝”，很残忍。就是把大楠竹弯下来，像农村杀年猪一样，捅进俘虏的肛门，连着大肠，再一放把人弹上去，一下把内脏都拉出来……

不管日军有多么“愚忠”，终抵不过驻印军官兵的摧枯拉朽之势，孟洋河天险一失，太柏家的日军阵地就立刻暴露在新38师面前，112团的2营、113团以及114团首先对外围敌人进行肃清，随后包围圈完成，现在太柏家的敌人，已经变成第二次缅战餐桌上的一盘菜，就等着驻印军如何下口了。

太柏家的日军，有很多是从于邦、乔家等地逃回去的溃兵，这些日军，早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首先面对孙立人将敌阵一块一块地分割包围，接着一片一片地进攻，最后一层一层地歼灭的“剥蕉战术”基本上就是不打自溃了。

这些溃兵的畏战情绪，基本上代表了当时驻守太柏家阵地日军的普遍心理。要知道，在驻印军第二次入缅战争中，日军并没有制空权，美国人的飞机，经常会飞到日军的阵地上，然后投下重磅航空炸弹。日军的山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也没有驻印军的数量多，两方炮兵在对阵时，往往驻印军一顿炮火猛射，日军的炮兵就会被揍成了哑巴。日军这仗不管怎么打都是一个输！

驻印军在攻克太柏家之前，曾经抓到过日军的俘虏，从口供中得知，日军军心动摇，他们便印发了大量传单，想让日军投降，可是却没有一个投降的日军，隔日清晨，歼灭太柏家之敌的战役终于打响。激战一天后，太柏家之敌被全歼，胡康河谷的战略要地太柏家归了驻印军，驻印军不仅一脚踹开了久留米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孟关的大门，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药品的补给。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

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这句名言语如果引申一下，就是攻坚是灾难，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日军对太柏家阵地经营年余，碉堡坚固异常，战壕密如蛛网，如果从道理上讲，即使驻印军占据战略战术以及武器和单兵素质的优势，从80%损伤率算来，新38师杀敌600，他们至少也应有480名减员才对，但是新38师的战斗减员，始终控制在极低的8：1左右。

新38师能将减员率控制得如此之低，孙立人自然有他的诀窍——就是中美结合，走科学化的丛林作战之路。

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孙立人就研习过美军丛林战的战略和战术：首先飞机轰炸，接着炮火狂轰，炮火开始纵深的时候，地面部队平推过去。如果将其精华浓缩一下，就是——炮火平推！

美军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有点“二愣子”的剽悍做法，完全得益于国内强大的军工业基础。不管多么精锐的日军，在饱和性攻击的航弹和炮弹的面前，都是灰飞烟灭的下场，面对经过炮火梳理过的丛林，步兵最后平推过去，对伤重不死的日军进行补枪，这就是美国奉为经典的丛林战术。

美国的丛林战胜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后勤的弹药供应是否充足，要是弹药供应充足，确实有很大的把握打胜仗，一旦弹药供应不足，那就难以达到既定的目的。

孙立人的丛林战法是：前面诱敌，后面部队大范围纵深穿插，断掉敌人后路，后路一断，就等于粉碎了敌人坚守的信心，接着借助美国飞机大炮的威力，对日军阵地进行饱和轰炸。趁敌人从阵地上逃走的机会，大量歼灭日军有生力量。

王楚英在《军碑·1942》一书中，曾经这样记录下了新38师，对敌完成了穿插包围后，借助强大的炮火，消灭日军的战争场面：

1944年1月25日拂晓时分，官兵们在晨曦中迎来了甲申年（猴年）的正月初一，在一

声“战斗开始”的命令下，12门81毫米迫击炮和36门60迫击炮、16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以及其他轻重武器，便从四面八方射击阵地上不约而同地向敌阵地猛烈射击，爆炸声、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敌军乱作一团，伤的伤、死的死，极少数幸存的敌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又被我射手举枪射击，打倒在地，极少数日军官兵则跳入河中逃生，也被我水性好的战士跳入河内将其捉住，多达26人……

孙立人的战法，吸收了中美丛林战的所有优点，虽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让自己的损失最小，但也有一个短板，那就是搞纵深穿插极其费时费力。

孙立人手下的军队虽然连战连克，但因为用时过久，竟被人送了一个绰号叫“慢慢地”，对于孙立人“慢慢地”作战的作风，后世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贬低他的声音说：孙立人不会打仗，只是一味地借助美国的炮弹开路。褒奖他的声音说：孙立人爱兵如子，他是小兵之父。

孙立人确实可以被称为是“小兵之父”，在他的部队中，没有死刑，曾经有一个少年兵，上前线的时候，因为畏死，开了小差，被抓回来后，理应枪毙，可是孙立人只是给他记死，算作惩罚，并让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孙立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能把每一个弟兄活着带回家！

反正美国炸弹大大的有，能用为啥不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不叫胜利，应该叫消耗。既然谈到消耗，那就要一以博十，将己方的消耗压到最低。

史迪威人送绰号“酸性子乔”，脾气火暴，但对于孙立人“慢慢地”打仗，虽然嘴里不说，但心中不悦，他为了催促孙立人尽快结束某一场战斗，便会头顶钢盔，斜挎着卡宾枪，领着卫兵到新38师的前线指挥所，不言不语，看着指挥战斗的孙立人一坐好几个小时，除非得到战斗胜利的准确消息，否则脾气倔强的瘦老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史迪威全副武装地出现，起到的绝对是鼓舞人心的作用，史迪威喜欢称中国官兵为“我的孩子们”，而中国官兵都喊他乔大叔。

史迪威也知道孙立人是驻印军中最能打的中国将军，为了能打胜仗，故此，他对于孙立人“慢慢地”打仗的做法，也只有忍了，但只要孙立人开口，要飞机有美国飞机，要炮弹有美国炮弹，军火不是问题，时间也不是问题，吵架也不是问题，只要能打胜仗，总之一切都不是问题。

第六章　纵横驰骋，缅甸上空的蓝鹰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杜甫《画鹰》

第二次入缅战争，驻印军开局良好，接下来的战斗任务是如何攻取孟关，如何扫荡孟拱河谷的日军。

孟拱河谷是两面高山，中间地势如蛇般的细长河谷。一旦雨季到来，谷中河水暴涨，是一个无法作战的死地。日军在孟拱河谷的库芒山上，修建了大量的工事，这些工事，掩蔽在树丛和密林之中，美军的飞机发现不了日军的工事，几乎无法从天空投弹并命中目标。

但是孙立人的新38师，不等不靠，他们连用纵深穿插、迂回包抄的丛林战术，让日军在后路断绝之下，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可是驻缅的日军不甘心失败，他们兵出英帕尔，企图用围魏救赵之计，减轻北缅日军的压力的同时，妄想切断我刚刚进入孟拱河谷的新一军的补给交通线。

1943年，继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式，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准备将新一军从孟拱河谷撤回，力保英帕尔乃至印度安全的决定。

孙立人和史迪威对蒙巴顿的决定，都做了积极的抵制，但史迪威为了表示一下态度，他还是将作为预备队使用的新三十师调回印度，加强了伊帕尔铁路沿线茅马铺和曼尼坡（Manipur）地区的防御，这才有效阻挡住了日军对英帕尔的进攻。

新一军要以敌之道，还敌之身，他们也要围魏救赵，攻取北缅重镇密支那，这两场围魏救赵，究竟哪方玩得更漂亮一些？

1．奇谋，刀光剑影妙争先

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六韬·军势》

新一军在攻克于邦，攻克太柏家的时候，已经叠连用到了穿插迂回，这次攻克重要的战略要地孟关，是否能采取这一战术？孙立人的新38师，又如何与廖耀湘的22师配合，攻占了日军第18师团的指挥所所在地——孟关，并取得虏获该师团关防印信的不朽战绩？

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一直有个想法，他要真正统领一支中美联军，在缅甸战场上纵横驰骋，将日军统统歼灭，以雪第一次缅战失败之耻。

雪中送炭的事儿一般人不会做，但锦上添花的活儿很多政治家都抢着干。1943年，魁北克会议召开，罗斯福和丘吉尔为尽快结束缅战，并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经过商议，决定成立的一支特别部队——麦瑞尔突击队。这支部队的成员，需要抽调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有丛林作战经验的士兵。

麦瑞尔突击队很快便被组建成功，并迅速开赴到蓝姆迦。麦瑞尔突击队简称麦支队，该队的长官是法兰克·麦瑞尔准将。这支突击队的任务是：协助中国驻印军，扫荡驻扎北缅的日军。

这支部队共有2900人，兵源分别来自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这群美国志愿兵来到印度后，被分成了六个小队，经过了两个月的丛林作战训练，1943年3月，便被正式派到了北缅战场。

麦支队从史迪威手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潜入日军后方，切断敌军的供应及交通线，从侧面配合中国驻印军对日军的军事行动。

现在摆在新38师和22师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孟关。史迪威考虑到新38师一路过关斩将，恐成疲师，便将正面攻取孟关的任务交给了廖耀湘的22师，并为廖师配备了战车一营。而新38师的任务是沿着大奈河东岸，做侧面迂回穿插，攻取瓦鲁班南的战略要地沙都渣，切断孟关之敌的退路。

孟关的地势，比不过于邦和太柏家之险，而孟关的天然屏障南彼河的水势，都逊于大龙河与孟洋河。史迪威相信22师在战车营坦克的配合之下，攻取孟关的任务应该很顺利地完成。

但史迪威却没有料到，日军第18师团的师团长田中新一，率领55和56联队日军的坚守孟关的决心，简直固执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要知道，第18师团是菊师团，于邦和太柏家的丢失，已经让日军陆军本部震惊不已，如果田中新一不能在孟关挽回一些面子，他真的难以对上峰交代了。

史迪威还有一点没有想到，他的军事计划中，进军次序也有问题，要知道，沙都渣和孟关之间，还隔着一个瓦鲁班，孙立人即使率领38师攻占了沙都渣，产生的也是隔靴搔痒的效果，并不会让田中新一有种后路被断的危机感。

孙立人以“不攻下孟关不剃须”明志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已经有一个成熟的腹案，即攻打孟关之前，必须暗中派兵取下瓦鲁班，只要取下瓦鲁班，则孟关守敌必乱，可是史迪威的命令，让孙立人的作战计划，暂时落空了。

战争开始后，一个让孙立人担心的局面出现了。虽然22师的人数比孟关的日军占优，22师的重炮也能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来，战车营的坦克也肯奋不顾身地为22师的官兵们开路，但是田中新一率领55和56联队的日军，负隅顽抗，拼死战斗，绝不后退。

再看双方辎重的供应：驻印军的官兵在前面进攻，中美联合修建中印公路的工程兵部队，随后跟进修路，皮克准将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那就是要把中印公路修到距离前线不到一天路程的地方。故此，驻印军对日作战，军火给养沿着修成的中印公路供应得非常及时，这也为孙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队，打赢这场复仇之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可是孟关的日军后勤供应，却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一是运送辎重的路不好走，二是美军飞机占据着制空权，两相比较：廖师不缺弹药，手下驻印官兵的数量也超过了孟关的守军，而且天上有美军的飞机，地上还有坦克的配合，廖耀湘觉

得攻不下孟关，就对不起史迪威的信任了。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中国人爱取绰号，不仅给个人取结合性格和外貌特点的绰号，而且也给某一地域文化群体共性取概括的绰号，譬如：京油子、卫嘴子等，给湖南人起的绰号就是——湖南骡子。

湖南人脾气火暴，认死理，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蒋百里先生曾发出了这样的盛赞：廖耀湘为蔡松坡（即蔡锷）以后湖南军人之第一人。

原新六军的参谋长舒适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谈廖耀湘，道：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杯，不斟第二杯，唯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

在驻缅军的队伍里，除了孙立人，就属廖耀湘敢跟史迪威吵架，不管怎么吵，史迪威对廖耀湘都是隐忍，酸性子乔为何会忍耐，原因只有一个，廖耀湘非一般地能打。

廖耀湘进攻孟关，先借用飞机轰炸，接着重炮开路，随后，22师的官兵端起冲锋枪，跟在坦克车的后面，“嗷嗷”地怪叫着杀向了日军的阵地。

22师再能打，打得毕竟是攻坚战，廖耀湘一口气狂攻了日军阵地七日，可是除了损兵折将，日军的阵地就是铁板一块，竟然连个口子都没有撕开。

田中新一为了打赢这场防守战，他不仅苦心经营阵地，而且还调集了很多狙击手埋伏在前线，这些狙击手躲在暗处，专门负责对22师的军官进行精确射杀。7日的血战下来，22师负责进攻的三个团，不仅士兵牺牲了很多，55名冲在第一线的连排级的军官，也都成了亡命在异国的英烈。

孙立人率领新38师的官兵，已经一路攻占了沙堡卡、沙干卡等战略要地，打先锋的113团正在赶往沙都渣的时候，廖耀湘猛攻孟关无果，损兵折将的消息，就传到了孙立人的耳朵里。

两军列阵，一攻一守，如果攻方长时间没有取得既定的战略目标，一旦攻势减弱，那么守方就有可能变为攻方，攻守易换后，那么22师的处境可就不妙了。

如果按照国军的惯例，孙立人完全可以遵照史迪威的命令，不顾22师的死活，新38师占据沙都渣之后，开始养精蓄锐，只等22师和驻守孟关的55和56师团两败俱伤，全都无力再战后，孙立人领兵一鼓作气攻下孟关，不仅得名，而且得利，而且攻下孟关的功劳，全都会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但孙立人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乌七八糟争名夺利的思想，他只想着如何能够帮助袍泽友军尽快攻下孟关。孙立人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命112团继续向沙都渣正面进攻，而113团立刻以急行军的速度，直取瓦鲁班。

孙立人的决定，虽然对22师的正面战场有以立竿见影的实效，但却冒着绝大的风险，要知道在战场上不执行上级的命令，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一旦弄不好，脑袋都会搬家。

113团的原团长是刘放吾，1942年6月，刘放吾率团归队，他因为身体的原因，曾经在印度的医院住院2个月，他出院后，发现新38师拖欠部属的军饷（新38师初到印度经济困难），刘放吾负气之下，于1942年10月飞回重庆发展去了。接替刘放吾的是赵狄团长。

赵狄率领着113团，直奔瓦鲁班而去，113团本是新38师的主力团，可是仁安羌一战后，因为减员严重，故此，该团一直作为预备队在使用，随着第二次缅战开始，113团的兵员得到了及时的补充，但该团一直也没有捞到硬仗打。

不仅赵狄心里憋着一股火，113团的官兵，心里也是不服劲儿。今日他们被往瓦鲁班，执行突击的任务，一个个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地方，拿下战略重镇瓦鲁班，让另外两团的弟兄们看一下，113团的官兵们，个顶个都是好汉子，113团还是新38师的主力团。

赵狄率领113团的官兵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终于在3月5日来到了瓦鲁班附近的拉干卡，赵狄随后将113团兵分三路，一营作为预备队，二营直攻瓦鲁班东、南

两个方向，而三营负责切断瓦鲁班日军的退路卡盟。

瓦鲁班作为孟关的大后方，孟关一旦失守，日军只有从瓦鲁班这一条路可以逃走。田中新一对瓦鲁班这处战略要地，派驻了精锐的日军。瓦鲁班的日军发现了113团之后，立刻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可是113团并没有给瓦鲁班的日军展示武士道精神的机会，经过炮轰枪打，一夜激战，日军死伤惨重，没死没伤的全都逃进了原始森林。113团官兵清点战场时，发现日军尸体共有757具，缴获的四五个巨大的弹药仓库，里面的枪支弹药堆成了小山。

瓦鲁班被孙立人的新38师占领后，消息通过日军的电报，很快就被田中新一知晓了。就好像一个炸雷，劈在了田中新一头顶上，他当时就蒙了。

田中新一的心乱了。廖耀湘正愁无法攻下孟关，当得知孙立人分兵拿下瓦鲁班的消息，他兴奋地一拍指挥所里的桌子，叫道："拿下孟关，此其时也！"

瓦鲁班失守，退路断绝，并没有击溃驻守孟关日军的心理防线。可是孟关之中，粮食弹药，存量很多，但却有一样东西供应不上，那就是水。因为瓦鲁班失守，孟关日军急需的饮用水随后断绝。人一旦没水，一般坚持不过三日，这和是否信奉武士道无关。

22师的官兵并没有给驻守孟关的日军喘息的机会，全师官兵在美制M4作战坦克的掩护下，便向日军的阵地发起了异常猛烈的进攻。驻印军使用美制M4中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开发、制造的主战坦克，通称谢尔曼坦克，该坦克搭载一门75mm的短管低初速主炮，火力强大。

日军使用的94式战车，日文名称为"九四式軽装甲車テケ"。テケ是日文"特別なトラクタ"的简称，翻译一下就是"特别拖拉机"，或者叫豆战车，而日军18师团使用的九五式和九七式战车，虽然比豆战车在武器和装甲方面强上一些，但也强不到哪去。

日军在缅甸战场上，使用这种轻型坦克是有原因的，因为只有这种车身狭窄、重量较轻的坦克，才可以在缅甸雨后树林的泥泞中安全行驶。

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德国的虎式坦克，打谢尔曼坦克就好像用铁锤子敲核桃，但在缅甸战场上，谢尔曼坦克揍日军使用的九五式和九七式战车，就好像用锤子砸鸡蛋那样容易。

谢尔曼坦克高大的车身，正好可以掩护后面的驻印军冲锋，为了宣示制敌的决心，谢尔曼坦克的身上，还被战车营喷上了“突击”两个大字。日军军心动摇，面对22师的狂攻，立足不稳，很快就开始了全线溃退。田中新一因为走得匆忙，竟将第18师团的关防印信遗落在孟关的指挥所中，能代表王牌师团的重要印信，被22师的官兵缴获，最后也就成了新一军的战利品。

蒋介石得知消息，他兴奋异常地给廖耀湘拍来了贺电，一张大大的电报纸上，只写了三个字——中国虎。

新一军从新平洋开始，直到攻占了瓦鲁班结束，一共用了三次迂回穿插、断敌退路的战术，并取得了于邦、太柏家和瓦鲁班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中国驻印军最终攻占了第18师团的指挥部所在地——孟关。

38师和22师原本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针对日55和56师团的歼灭战，可是最终的战果是，只是消灭了断后的56联队第二吉田大队的日军，田中新一率领着大股的日军，竟从“伐开路”偷偷逃走了。

田中新一老奸巨猾，他战前即认为孟关不一定能守住，便命工兵们在孟关旁边的原始丛林中，伐木为径，修了两条直通瓦鲁班以及孟拱河谷的山路，日军称之为“伐开路”，因为路上面的树冠刻意被保留，故此，美国的飞机也没能发现这两条密径。田中新一就是在孟关失守前，领兵从这两条“伐开路”偷偷逃走的。

孙立人是一个有心之人，他非常善于归纳和总结，从一开始被动地迂回穿插，到后来有计划有目的地迂回敌后，再到后来寻机借势，主动地穿插取胜，次次占先，场场取胜。孙克刚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中，分析下了此战法的六大好处。

根据孙将军在缅北森林中作战的经验，认为丛林战攻击最有效的办法，即用适

当兵力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而以主力从森林中开辟新路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先截断敌后方联络补给线，阻止敌后方部队增援，然后对正面之敌，施行包围夹击，便很容易收歼灭战的效果，即孙子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开路迂回便是以奇兵制胜。但迂回部队必须开辟新路，因为原来所有的道路，敌人一定都设有埋伏，不但容易受袭击，也容易暴露我军的实力和企图，这种开路的迂回战法有下列几点好处：

一、截断敌后方道路，使敌军的粮弹补给断绝，失去持续作战的能力；

二、阻止敌后部队增援，使其陷入孤立，感受精神威胁，消失战斗意志；

三、除敌特别构筑的独立四面作战的据点外，一般阵地，通常后方工事薄弱，易于攻击突破；

四、我军主力迂回到敌军后方，迫使敌军炮兵后撤，不能直接支援其正面部队的战斗；

五、截断敌军后路，使伤兵敌兵无法救护后运，增加敌阵地内的惨象，动摇其战斗情绪，这就是垓下楚歌的办法；

六、正面逐点攻略，旷日持久，消耗兵力，而迂回战却可以减少伤亡，争取时间，又是孙子所说的“以迂为直”和“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敌也，功而不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战法了。

新38师攻克瓦鲁班之时，还有一个插曲。麦支队作为史迪威的“近卫军”，自然得到了他多方面照顾，这支部队在印度接受了美国教官两个月的强化训练后，便被派到了缅甸战火纷飞的战场进行实战锻炼。

史迪威分派攻取孟关任务的时候，廖耀湘部负责正面强攻，孙立人部负责侧后迂回，而麦支队的任务是一个“俏活儿”，即深入敌后，对日军的交通、辎重和通信线路，进行破坏，史迪威如此安排，一是出于对自己这支“近卫军” 的爱护，二是让麦支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得到快速的成长。

法兰克·麦瑞尔准将率领的麦支队的正式番号是第5307临时混编支队，麦支队

也译作梅列尔突击队，或者梅支队。这是一支临时招募的队伍，里面既有美国老兵，也有年轻的战士，皮肤有黑有白，年龄有大有小，高低胖瘦，更是参差不齐，他们唯有一样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丛林作战的经验。麦支队的战斗力，还是有一些的，但要跟精锐的日军比，前者还是尚显稚嫩。

新38师的113团在进攻瓦鲁班的路上，正好巧遇迂回到这里，准备寻机对敌后交通线进行破坏的麦支队，麦支队还以为113团是敌军，不分青红皂白，迎面一顿乱枪，竟误伤了八名战士。当误会解除，麦支队急忙呼叫美军的救援飞机，并将八名受伤的战士空运到后方的医院进行治疗。麦支队得知113团攻打瓦鲁班的消息后，他们当即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请战。

赵狄也觉得遇到盟军支援，这是好事，双方商定，两支部队赶到瓦鲁班之后，113团负责由正东进攻日军，而麦支队进攻的方向在东北，两支部队呈蟹钳形，一举攻占瓦鲁班。

可是攻击开始，113团如同猛虎下山般，一鼓作气攻下瓦鲁班，但却连麦支队的影子都没有看见。麦支队并没有当逃兵，他们只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战实力，他们来到瓦鲁班的外围阵地，还没等对瓦鲁班发动进攻，便被驻守瓦鲁班的日军发现了，日军一个冲锋，麦支队就招架不住了，他们边打边撤，一路退到了卫树卡，接着又退到了西高卡。

要知道，麦支队的武器，可比中国驻印军的武器还要精良：比如，中国远征军用的是美国产水冷式M1917式重机枪，而麦支队用的武器是风冷式M1919重机枪。后者不仅比前者火力强大，而且重量轻、灵活度高，战争中离不开先进的武器，但有了先进的武器，也不见得就能赢得战争。

麦支队被日军打得丢盔弃甲，情况危急，孙立人得知情况后，电令113团和112团随后赶来，一场激战，日军被赶走，麦支队终于安全地获救。

瓦鲁班之战，可以说一箭双雕，不仅收复孟关，胡康河谷日军最大的补给基地瓦鲁班，也被驻印军占领了。史迪威对新38师和22师取得的丰硕战果，甚是满意，

并当场奖给22师战车第一营营长赵振宇一枚美国银星勋章。

史迪威心中虽然对孙立人不顾军令，擅自攻打瓦鲁班不满，但胜利就是一块最好的免责牌，丰厚的战果还是牢牢地堵住了史迪威的嘴巴。

新一军取得的巨大胜利，也惊动了蒙巴顿勋爵，他紧跟史迪威的后，来到了前线，除了必要的慰问和鼓励之外，他还承诺要锦上添花，即派英国远征突击队，来协助中国驻印军进攻孟拱，争取早日收复北缅，打通中印公路。



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右）专程飞赴缅北前线向孙立人（左）祝贺新**38**师攻克瓦鲁班，胡康河战事的胜利。

英印军在第二次缅战的开始阶段，基本上处在坐山观虎斗的状态，面对中国驻印军一路势如破竹、战绩恢宏的情况，他们真的不能淡定了，要知道，种果树的时候不出力，躲在一边看他人耕作算耍小聪明，但到了下山摘桃子的时候，却不能不来，不来那就叫愚蠢。

只可惜英印军的战斗力太差，帮忙打仗是好事，他们有时候帮倒忙、扯后腿，那绝对是让人万分头痛的事儿。

史迪威虽然表面上没有责怪孙立人，但以后派兵，他就有意让22师做正面攻击，而38师只能在侧背做迂回穿插，虽然在战场上挑肥拣瘦是不对的，但一场战争胜利后，功劳自然要算到担任主攻队伍的头上。孙立人的部队流汗淌血没功劳，这

就是不听话、擅自行动的“下场”。

胡康河谷之战在孟关战役胜利后，基本上胜局已定，但还没到收官阶段，因为还有一个沙都渣掌握在日军的手中。

沙都渣是胡康河谷最后的一个要隘，过了该关口，就是孟拱河谷，孙立人没时间和史迪威算细账，这几场战斗的胜利，只能算开场的锣鼓，接下来就是攻取沙都渣，进军孟拱河谷的大戏，就要在战鼓隆隆声中开台了。

沙都渣也是一个易守难攻之敌，如果从正面强攻，损兵折将的孟关之战就是前车之鉴。但史迪威对38师的命令是：22师在正面南下，进攻沙都渣，而新38师的113团全团官兵，外加一个山炮连为辅攻，他们需配合麦支队，一鼓作气，从另一路直攻沙都渣，不让沙都渣的日军有喘息的机会。

史迪威对孙立人的迂回穿插的战术虽然没有批评，但却不愿肯定，他始终认为，驻印军的迂回穿插，就是在“拖延时间”，就是消极避战的借口。孙立人的部队，每一次拒不执行他的命令，而采取耗时费力，但牺牲较小的穿插迂回等战术，他的心底就会连画问号，这是不是重庆的蒋介石，又给新一军传下了保存实力、拖延时间、等待美国在太平洋的战场上打败了日军，然后重庆政府可以不费力气地下山摘果子的命令？

若论武器装备，以及强大的后勤保障，美国确实强大到了没有对手的地步，但若论兵法，美军除了喜欢用钢铁猛砸之外，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点子。孙立人分析形势，斟酌对策，向史迪威又一次提出了迂回穿插的战术——由113团为主，麦支队为辅，两支部队一起，进驻卡盟地区，直接断掉沙都渣的后路。

史迪威虽然同意了孙立人的建议，但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两路人马，要以麦支队为主，其中麦支队的二、三两营，兵出山兴洋，负责断掉沙都渣日军的后路，而赵狄的113团，需跟在麦支队一营的身后，由拉干卡翻山越岭，对沙都渣日军的后路进行包抄。

沙都渣之战，很快就有了分晓，113团官兵费尽千辛万苦之力，在原始森林里

冒死开路前进，终于在预订时间，断掉了日军的退路，廖耀湘的22师开始了正面进攻，而113团和麦支队主攻沙都渣的后背，两面夹击之下，沙都渣之敌就被包了饺子。

沙都渣战斗刚刚结束，便传来了麦支队二营求救的消息。麦支队二营兵出山兴洋地区，他们占据了银坎卡塘公路后，本来应该断掉公路，修建工事，用以阻击日军。可是麦支队二营一是轻敌，二是对日军的作战能力估计太低，结果从胡康河谷溃退下来，准备逃往孟拱河谷的日军前来闯关，麦支队二营没有阵地，支撑不住，节节后退，最后被这股日军围困在了大奈河东岸，虽然麦支队的三营前去相救，可是因为战斗力的关系，麦支队三营却一连五天也没有解决麦支队二营之围。

麦支队二营的官兵被困的形式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孙立人派112团1营出手，1营的官兵来到山兴洋之后，他们立刻发起了猛攻，麦支队打过不日军，但112团1营的官兵却是日军的克星。1营的战士一个冲锋，便占了高南卡敌军的阵地，第二个冲锋，日军就阵脚大乱，第三个冲锋，日军就开始狼狈败退，这场让麦支队二营全军覆没的危局，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麦支队的麦瑞尔准将连发两份电报，对孙立人表示感谢，曾和112团并将作战的麦支队的队员有感于驻印军的神勇，他们还发出这样感慨：我们和新38师一起打仗，便什么都不怕。

麦支队入缅抗日，协同驻印军作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参与了大小三十几次战役，虽然叠遇险情，但都在驻印军的援手下，远离了危险。

麦支队在战后，改编为美军第75步兵团，1973年，美军决定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危机。美陆军参谋长下令在第75步兵团基础上组建游骑兵部队，当年麦支队的与驻印军一起并肩战斗的徽章也保留下来，作为游骑兵的军徽，以纪念那段入缅作战的历史。美军游骑兵部队的座右铭是：协同作战、以少胜多、先锋作用。

美国有三支特种兵劲旅，它们分别是：三角洲部队、海豹突击队和游骑兵部

队，直到今天，游骑兵部队在每年的年会上都要展示孙立人将军的照片，以示对那段历史的纪念和缅怀。

沙都渣被驻印军占领后，代表着反攻缅甸的第一阶段的首个节点的战役完美收官，接下来，驻印军就要扫清孟拱河谷之敌。

早在1943年3月，日军为了维护在缅甸取得的战果，便成立了河边正三中将为司令的缅甸方面军，下辖牟田口廉也为司令的第15集团军，樱井省三为司令的第28集团军和本多政材为司令的第33集团军。

其中第33集团军下辖的18师团负责守护缅北。可是缅北危急的形势，让河边正三中将也是深感不安，要知道，一旦孟拱河谷不保，那么北缅的战略重镇密支那就将承受战火，一旦密支那丢失，日军在北缅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就将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

日军陆军大本营为了挽救缅北的危局，于1944年1月7日以“大陆指第1776号”的指令，下达了代号为“乌”号的英帕尔作战计划，即驻缅甸的日军第15师团出兵印度，攻占战略要地英帕尔，并依此作为跳板，为将来占领印度做准备。

1944年3月8日，绰号小东条的牟田口廉也，率领第15集团军的3个师团共约8.5万人的兵力，先在卡萨集结，随后渡过清德温江，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地直奔英帕尔地区杀来。

日军选择进攻英帕尔，不仅因为英帕尔是印度一个巨大的战略物资储备库，而且距离英帕尔不远的地方，就是东印度的阿萨姆铁路，这条铁路是通向雷多的生命线，一旦日军切断了这条铁路，美国的军援就将无法送到雷多地区，在胡康河谷作战的中国驻印军，就将面临给养断绝、攻势受阻的巨大困境。

日军驻缅甸军队的高层，确实是深谙兵法，摆出的围魏救赵之计，不仅阴毒，而且狠辣。

领兵进犯英帕尔的日军指挥官名叫牟田口廉也，他是日本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七七事变”时，他曾下达了向中国守军开火的命令，他就是挑起“七七事

变”的罪魁祸首。

牟田口廉也在英帕尔战争打响之前，他曾经当着3个师团的官兵，踌躇满志地发表了一番战前动员，其中有一句最疯狂的话是这样的：说起大东亚战争，那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下令开第一枪的是我，因此（作为间接责任人），我必须设法尽早解决这场战争。

日军发起的这次英帕尔之战，绝对是一次非常勉强的战役，因为日军虽然不乏兵员，但是缅甸地区作为大后方，却无法为赴印作战的一线日军提供充足的给养。

在英帕尔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日方第15集团军小畑参谋长以后勤不继为理由，反对发动此次危险的作战。牟田口廉也狂妄地回答：没有补给，就不能打仗？那怎么能行！日本军队能够忍受任何艰难困苦，粮食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

可是战争就是战争，日军渡过清德温江之前，还赶着大批的活牛和活羊作为军队的补给，他们走进了荒凉的无人区，这些牲畜、随身携带的粮食被食光后，他们便向牟田口廉也的司令部，发出了一封要求补充给养的电报，牟田口廉也立刻给出了一个蛮横的回答：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草食民族。你们被那么茂密的丛林包围，居然报告缺乏食物？这算怎么回事！

日军进攻英帕尔的军队，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向驻守在那里的英印军发起了进攻——当时的英印军防卫松懈，他们直至看到日军的军旗之前，还固执地认为，奔腾咆哮的清德温江，难以翻越的崇山峻岭，还有瘟疫横行的无人区，就是拒日军于千里之外的天堑，可是他们不愿意想的是，我能往，敌亦能往，当初孙立人能率领着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翻山越岭地经过无人区来到英帕尔，日军为什么不能随后进攻英帕尔？

英印军面对凶悍的日军一触即溃，根本无力抵抗，身为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的蒙巴顿勋爵，当时慌了手脚，对他来说，驻印军能否打通中印公路，取得缅北反击战的胜利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印度不能丢，印度地区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是种植鸦片的重要基地，还可以为英国提供廉价的原料，只要英国手中握有印度这张

王牌，大英帝国就是世界大国，就是世界强国，一旦丢失印度，大英帝国就好比落日夕阳，很快就将风光不再了。

英国的政治家，曾一直强调“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基于这种自私的本位思想，蒙巴顿勋爵做出了一个决定——速调新38师和22师回印，抵挡日军的侵略，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利益护航保驾。

蒙巴顿勋爵的决议，立刻遭到了孙立人等新一军将士的抵制，要知道，日军盘踞在孟拱河谷的兵力，多达四个步兵联队、炮兵一个联队，再加上从胡康河谷的溃兵，共约两万多人。

如果新一军回师，只留下少量的部队坚守胡康河谷，孟拱河谷的日军一旦反攻，孙立人等远征军官兵取得的战果，就将付诸东流。

日军“围魏救赵”的计策，不仅孙立人看得出来，史迪威也看得出来，但史迪威觉得，日军进犯英帕尔，阻敌之事，理应由英印军自己承担起来，但为了有所表示，他就找来新30师师长胡素，命他分兵帮英印军去抗日。胡素是江西省清江县人，他也有留学日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后来在日本陆军大学第13期正则班毕业的经历。

胡素的新30师在胡康河谷，一直作为新38师和22师的预备队在使用，预备队虽然在二线作战，但却为中国人在跟日军作战，去英帕尔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是为英国人作战。胡素虽然不愿意领命，但军令难违，他只得将一个团的步兵，以及第二战车营派往英帕尔地区。

这两支队伍赶到英帕尔之后，他们迅速沿铁路一线的茅马铺和曼尼坡地区修建阵地，并展开了防御，日军对阿萨姆铁路的攻势，终于被暂时阻挡住了。

日军兵出英帕尔，利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大肆向驻印军施压。其实史迪威也很睿智与老辣，他早在1943年初，为配合中国驻印军对北缅地区作战，便向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建议：

1．马上组建滇西远征军，收复滇西地区，并沿滇缅公路南下北缅，与中国驻

印军协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逼日军撤出缅北地区。

2．加派50师和14师空运到印度的雷多，这两个师主要担负胡康河谷后方的警戒任务，防止新一军对缅北的日军进攻时，日军渡过清德温江沿着大洛盆地偷袭胡康河谷。

蒋介石召集重庆政府的军政高官，经过对北缅形式的分析和研究，一致认为中国驻印军训练精良，武器先进，士气高涨，一旦展开胡康河谷之战，必定会占据胜势，如果重庆政府组织一支精锐的中国滇西远征军，沿滇缅公路南下，并与驻印军前后夹击，就会取得北缅地区的胜利，为最终打通滇缅公路，收复缅甸全境做前期的准备。

1943年2月1日，重庆政府正式任命陈诚为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28日，第二次滇西远征军司令部在楚雄正式成立，1943年8月，滇西远征军的5个军编练和装备基本完成。陈诚因病辞职，卫立煌继任中国第二次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副司令为黄琪翔，萧毅肃为参谋长。

宋希濂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第2、第6、第71军和第200师的长官分别为：王凌云、黄杰、钟彬和高吉人。

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54军，霍揆彰为第20集团军总司令，第53、第54军的军长分别是：周福成和阚汉骞。

第8军直属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何绍周任第8军军长，李弥任第8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

第二次中国滇西远征军紧锣密鼓地组建的时候，滇西远征军的第50师和14师先头部队，已经陆续空运到印度的雷多。

英帕尔前线吃紧，蒙巴顿勋爵随后就打起了54师和14师的主意，他想将这两个师调往英帕尔前线，可是这份调令却遭到了史迪威、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将领们的严厉抵制。

用史迪威的话来讲：英印军有自己的军队，守卫英帕尔根本不需要外人假手。

英缅军在缅甸和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并肩”战斗的历史，确实是令人不齿，往往中国远征军在前线和日军交火，英缅军便在后面悄悄地撤退，英缅军还对自己拆台的行为，给出了一个“堂皇”的解释——他们怕中国远征军泄露了英缅军撤退的路线和计划。

史迪威讲出“自己的活自己干”这句话的目的，不能浅显地理解为报复英缅军当时的不齿行为，要知道，英国就有这样一句俗语——依靠别人总要后悔，史迪威表达的意思很明白，英国在印度拥有大量的军队，保卫印度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为好！

史迪威虽然没有答应蒙巴顿勋爵调中国军队的要求，但他还是在“驼峰航线”的美国C-47“达科他”运输机抽调出一批，帮助蒙巴顿勋爵往英帕尔地区快速调集军队。

英国军队可以撤出缅甸，但却不能撤出印度，印度对英国殖民者实在是太重要。蒙巴顿勋爵和英印军的高官们，都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战落败，日军长驱直入，那么印度丢失，蒙巴顿勋爵就得领着大家，手拉手一起去跳印度洋了。

英印军第4军、第5军以及第33军，以圆筒阵的形式在英帕尔和柯锡马一路排开，三支英印军一共15万人，他们以近乎2：1的兵力，在美国飞机的配合下，以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英帕尔保卫战。

当时日军前线士兵早已经断绝了军需给养，每日在印度的雨水中战斗，实在是苦不堪言，他们甚至为牟田口廉也起了“鬼畜”牟田口的外号，鬼畜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像是魔鬼牲畜一样残酷无情。

英帕尔战役从1944年3月8日开始，直到1944年7月10日，一共经历了4个月零3天，这场战役以日15集团军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英帕尔战役日军共有8.5万人，战争结束后，约有5.3万人死亡或者失踪，没有回到缅甸。只剩下将近3万人的15集团军已经溃不成军，英印军之说以能取得如此

巨大的战绩，大体上有三个因素：

1．背水一战，并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

2．获得了有中国驻印军、美国武器辎重的大力支持。

3．中国第二次滇西远征军和驻印军，牵制住了日军在北缅的兵力，让日军不能倾缅甸之兵，全力一战。

中美英三国盟军在英帕尔阻击日军15集团军的时候，孙立人和廖耀湘率领着驻印军的孟拱河谷战役，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2．百战，穿插迂回神威显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出塞》

孟拱河谷之敌，正磨刀霍霍地等着新一军的官兵。孙立人擅长迂回穿插，已经被敌人熟知，该战术能否在孟拱河谷得到更完美的应用？其实在孟拱河谷，孙立人除了日军，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雨季，一旦到了雨季，孟拱河谷就会变为一片汪洋，孙立人等驻印官兵所面临的局面，就将更加危险了！

孟拱河谷在胡康河谷的南面，两条河谷之间，隔着一座高达1200米，长约60多公里的杰布班山，该山的北麓山高坡陡，南麓较为平缓，山顶有一个隘口，从胡康河谷翻越隘口，便会来到北边的孟拱河谷。

孟拱河谷之东，便是库芒山，库芒山比之杰布班山还要雄奇险峻，日军在库芒山向着孟拱河谷的一侧修建了纵深形网状的水泥混凝土工事，而且这些工事和碉堡，全都隐藏在山上高地浓密的树荫中，驻印军不仅从山脚下向上极难攻取，而且还给美军进行投弹轰炸的飞机提高了命中的难度。

在孟拱河谷中，有一条南高江（上游叫南高江，下游叫孟拱河），南高江就好像一把曲折蜿蜒的水剑，将孟拱河谷一劈为二，缅北从4月至9月进入雨季，此江在雨季的时候，江水暴涨，水漫江岸，孟拱河谷就会变成一片泽国。

日军为了阻挡新一军的进路，他们已经在杰布班山的隘口之上，布设了重兵，黑洞洞的枪炮口，全都指向了胡康河谷方向，很显然，新一军如果发动强攻，不仅会损兵折将，折戟沉沙，兵败杰布班山都有可能。

1944年3月15日，22师官兵在廖耀湘的带领下，官兵怒吼，战车开路，机枪狂扫，大炮猛轰，开始向杰布班山的隘口发动了佯攻。日军被牢牢地吸引在隘口的方向后，孙立人为了攻下这座险要隘口，他决定两路迂回出兵：

新38师113团从库芒山脉左翼开始穿插迂回，112团1营在更远的地方实施绕路到杰布班山侧后。相信两路迂回，总有一路人马能够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任务。

田中新一作为18师团的师团长，他对库芒山脉和杰布班山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两座山处处是崇山峻岭，入目皆为悬崖峭壁，特别是库芒山脉，在当地的土人口中，被唤作无顶之上，意思是不可到达的地方。

当地土人都不可到达，驻印军没有肋生双翅，自然也不可能翻越。田中新一可以自信地说，孙立人在胡康河谷战役中管用的迂回和穿插，在孟拱河谷根本就用不上。

可是田中新一的判断绝对有误，因为他无法感受113团的官兵为了抗日卫国，打赢缅战，尽快归国回家的迫切心情。现在，中国驻印军113团的官兵，已经开始翻山越岭，执行着开路迂回的作战任务。

行动刚开始，官兵们牵着驮有山炮的骡马艰难前行，可是异常陡峭的山路，让20多匹骡马先后摔死在了山涧中，战士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上山抬马头，下山扯马尾，人抬肩抗，即使一步步地挪，也要将这些攻打杰布班山隘口所必须用到的重武器搬运到杰布班山的山后去。

杰布班山山中无水，此次穿插迂回，又是秘密任务，美军的飞机无法为他们空投给养，113团的官兵忍饥饿、耐干渴，他们用了14天的时间，终于征服了猿猱不可越、苍鹰不可渡的崇山峻岭，并在28日，一举攻占了日军的据点拉班。

1944年3月29日，新38师113团的官兵，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杰布班山的背后，田中新一接到驻守杰布班山隘口守将的报告，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虽然想不明白，113团的官兵是如何迂回成功的，但为了保住杰布班山隘口要地，他急忙让隘口的日军，调转炮口，对着新113团的官兵一阵猛轰。

杰布班山隘口的后背是一片缓坡，日军从未意识到危险会来自背后，他们防御的力量，修筑的阵地，全都集中在隘口之前，如今身后突然出现了一股生力军，这真是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

22军师长廖耀湘攻打多日，损兵折将却无法拿下杰布班山隘口，心里面早就憋着一股气，他在电报中得知，新38师113团的官兵，已经穿插迂回成功，并发动了

攻势，廖耀湘一声令下，对隘口的守敌，又一次展开了正面的猛攻。

驻印军22师和113团的官兵经过前后夹击，杰布班山隘口被歼日军近6000人，剩下未死的敌人狼狈地逃进了深山，开始体验一场恐怖的“野人山”之旅，至于他们能否从茂密的原始丛林中走出来，那就只能祈求天皇保佑了。

史迪威以前的时候，对孙立人迂回穿插的战术，还心中存疑，认为那是逃避战争的消极战法，随着驻印军取得了一连串辉煌的战果，他最后也是认同了这种神奇的战法。

其实，田中新一从第二次缅战开始，就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那就是太相信缅北险恶的地势可以抵挡住驻印军凌厉的攻势，他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可以改变战局的策略，那就是——出击。

要知道，缅北的地势虽然险恶，但不管多么险恶的地理环境，也阻挡不住新一军官兵为袍泽战友报仇雪恨的心，以及那种打完缅战，就可以归国回家的急迫之情。

世界上真的没有一处攻不破的堡垒，田中新一将自己设定为被动挨打状态，那么失败只能拉着他的手，一起走向灭亡。

田中新一是陆军中将，他更是一个典型的将战争扩大化的人，比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田中新一和总参作战课长武藤章联手反对石原莞尔，他们认为石原主张不对中国军事扩大化是极端错误的，石原莞尔在斗争中失败后，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迅速升级；再比如：1940年10月，由于非法进入印度支那事件，田中新一代替富永恭次任参谋本部第1部长，强硬主张对美英开战；田中新一做的最剽悍的一件事：就是为瓜达卡纳尔岛上日军补给的问题，他冲到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办公室，当面大骂东条是混账，结果被关了15天禁闭，后调任到缅甸成了第18师团的师团长，从此远离陆军的权力中心。

田中新一在第二次的北缅之战中，面对上峰的排挤、严苛的形式，他一改初衷，变得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如果自己再失败，他就将再也

没有退路了。

可是田中新一却遇到了孙立人“棋高一着缚手缚脚”的对手，日军18师团修建的阵地，全都是一面倒，为了达到阻止驻印军进攻的目的，田中新一竟连山里的干沟、马蹄形池沼，皆加以利用，他根本没有想到，孙立人会从后面悄悄地迂回上来，让他费尽苦心修的阵地，统统成了摆设。

田中新一虽然丢失了胡康河谷，但他却没有失去胜利的信心，因为18师团的55和56联队原本已经减员殆尽，无力再战，可是在孟拱河谷，这两个联队重新获得了兵源的补充，业已恢复了战力。除了实力的恢复，田中新一还有一个隐形的救兵，那就是缅甸的雨季。田中新一认为，按照新一军攻击的速度，即使进展神速，在雨季来临之前，孙立人等驻印军的官兵，一定会被阻挡在孟拱河谷中部的战略要地加迈（又译卡盟）之前。

田中新一对新一军的进军速度判断，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22师正在孟拱河谷的马拉关一带和日军苦战，已经历时20多天，仍无较大进展……

1944年5月，中国滇西远征军于强渡怒江成功，随后进入高黎贡山地区，滇西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变成了两只铁拳，一只铁拳由南往北打，另一只铁拳由北往南打，两只反攻的铁拳遥相呼应，对北缅的日军已经形成了夹攻之势。

孙立人为了接近前线，更好地指挥孟拱河谷作战，他便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到了西丁克林村，而史迪威的指挥机关就搬到了瓦鲁班。孙立人的新38师目前的任务是从侧翼迂回到加迈，与22师一起，拿下加迈这座攻取孟拱河谷的“绊脚石”。

孟拱河谷中，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便是孟拱，加迈位于孟拱河谷中心的地带，而西通就在加迈和孟拱之间，穿谷而出的一条路，将加迈、西通和孟拱就好像项链上的珠子一样串到了一起。

孟拱之所以重要，表现在这里有红玉和琥珀等矿产资源，它还是缅甸国内最大的玉市。从交通位置上看，它是东出孟拱河谷的门户，密支那—曼德勒铁路由此经过，还有公路直通印度。

孙立人和廖耀湘在孟拱河谷战斗的同时，史迪威为了尽快取得缅战的胜利，他决定对日军实施多点攻击，他命新一军50师师长潘裕昆，30师师长胡素，率领着各自的部队，出胡康河谷，绕路库芒山区，这两师人马与美军麦支队组成了中美突击队，并在麦瑞尔准将的率领下，向北缅的战略重镇密支那发起了突袭。

当时，孟拱河谷的战役尚未结束，中美突击队越过前线，直插日军的战略要地密支那，这完全就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跳蛙战术。

中美突击队首先夺取了密支那的机场，机场到手后，美军的运输机，不仅可以从空中为中美突击队输送兵员，而且还能保证粮食、弹药等的军需物资的及时补给。中美突击队以机场为跳板，接着便向密支那的日军，发动了攻击。

当时，驻防密支那的日军只有1000多人，但他们却凭借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中美突击队本来是想打一场突击战，新一军在孟拱河谷“割草”，他们在后面“开花”，一举攻下北缅的战略重镇密支那，可是中美突击队的实力不强，又加之日军的抵抗过于激烈，还有日军的援兵不断到达等原因，竟将一场突击战，打成了持久战。

中美突击队是一支孤军，进攻密支那时间拖得越长，日军的援兵聚集得就越多，中美突击队的处境就越危险。

廖耀湘的22师正在马拉关一带的战果也不容乐观，因为久攻不克，22师也和日军打起了持久战，孙立人率领手下的官兵，一边攻山头、拔据点，一边向加迈的后方穿插迂回，他这些天，一直在思考，如何能突出奇兵，迅速打破这胶着的局面。

要知道，那时已经是5月，缅北可怕的雨季即将来临，孟拱河谷中的日军，一直在咬牙坚持，他们就是在苦苦地等待雨季的来临，一旦缅甸可怕的雨季到来，孟拱河谷就将变成泽国，盟军的飞机无法出动，驻印军的给养供应链条立刻便会断掉，凶猛的瘟疫，可怕的毒虫，缺医少药，没有了弹药和粮食供应，不用日军来攻，驻印军自己都会垮掉。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的，新38师的一部官兵在攻取一座山头阵地时，当场

击毙了一名补充兵大队的指挥官野恒光一，他们从野恒光一的身上搜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加迈守军的步兵指挥官相田俊二。

相田俊二的信中，充满了抱怨的口气，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驻印军有一支不到百人的部队，迂回到加迈日军的后方，对其补给线进行破坏，相田俊二要求本兵团长指挥官迅速赶来，与自己一起，对这股驻印军展开攻击，可是本兵团长指挥官却迟迟未到）

初意贵官不及候本职已先至第一线，当即率司令部人员30名，赶至第一线……然就第一线全员之疲劳，且缺乏给养，尚需与敌死斗思之……倘判明贵官等不足靠时，本职决心率领本部官兵30名，突袭敌阵。

孙立人看完信后，经过估算加迈日军的兵力，以及他们的补给状况，断定这封信内容属实，从这封信的内容上，可以推断出以下一些非常有用的军事情报：

1．日军士兵给养不足，已经是疲惫之师。

2．日军加迈高级指挥官对取胜的信心不足。

3．加迈第一线作战的日军兵员缺失，需要指挥部门派文职人员助战。

结合这三条有用的情报，孙立人又得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推论，日军困守加迈，后面的战略要地西通的兵力应该更为空虚，原因是：为了守住加迈，西通日军的士兵和给养必定会最大限度地输送到吃紧的第一线。

孙立人随后大刀阔斧地做出了一个破局的计划，那就是以一个团的人马，作为奇兵，兵出西通，彻底打破这种胶着的战场局面。他定完计划，坐上吉普车直奔瓦鲁班的驻印军的总指挥部。

史迪威听完孙立人的计划，他诧异得连连摇头，敌酋一封充满了抱怨口气的信，不至于推断出西通守军薄弱吧？孙立人实在大胆，他竟认为只需投入一个团的兵力，便可夺取西通，近乎天方夜谭的计划，真的让史迪威不敢相信。要知道，以22师一整师的作战能力，尚且被日军阻挡在马拉关一带，一旦孙立人估计错误，奇

袭西通的一个团的人马就将一去不返，孟拱河谷的日军受到鼓舞，整个缅西战局的走向，将变得更加变幻，更加不可捉摸。



孙立人

孙立人只得继续和史迪威吵，他告诉史迪威：“如果我们不能迅速破局，一旦缅甸的雨季来临，那么留给驻印军的必将是被拖垮的命运！”

史迪威最后被孙立人说动了，他希冀地问：“给你3天时间，你们能否拿下西

通？”

孙立人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解释道：“此去西通，直线距离是100公里，沿途多是悬崖峭壁，幽深河谷，3天太少，至少也需要6天时间！”

当时的柏特诺参谋长还未离职，他觉得孙立人的作战计划很对自己的胃口，他也决定凑个热闹。中国国内为新一军输送了不少新兵，再加上麦支队还有一支人马留在瓦鲁班，他决定组织另外一支中美混合部队，走相对好走的东线，攻取西通。

孙立人将奇袭西通的任务交给了112团，112团团长陈鸣人亦勇敢地接受了任务。

因为是奇袭，故此112团不能携带山炮等重武器，他们的干粮带足了6天的量，随身除了要携带战斗的武器和一个基数的弹药外，就是军毯水壶等一干必备的行军物品了。

1944年5月21日，112团在西线开始行动，经过多次执行迂回和穿插的任务，112团的官兵全都成了丛林战的高手，此次穿插迂回作战，112团一团的官兵，要在崇山峻岭中，经过很多日军沿途设置的据点，险峻的自然环境是112团的一个亟待克服的困难，而不让日军据点内的侦察兵发现则需要高超的行军技巧。

当时是112团1营2连连长的孟化新，写过一篇《偷渡南高江之役回忆》的文章：

> 112团于当天下午2时由瓦兰地区开始行动了：一、把有疾病，尤其是患咳嗽的官兵留下；二、每个官兵携带7天（份）的英制纸盒的干粮（每盒中有8片粗面粉制的饼干、一小包花生米、一小包牛奶、一块巧克力、4粒水果、一小包茶叶、两支香烟）；三、全营官兵不许问要做什么。
>
> 部队指挥，白天用手势，晚上各连各排都以一条白绳子，官兵手牵绳子跟着走……当时下山时候，孟化新腿跌伤了，可是他连叫一声都不敢！

也许缅甸的天气，是要检查112团奇袭西通的毅力，或者是要考验他们雨季作

战的本领，从22日开始，大雨倾盆而至，滚滚的雷声，呼啸的暴雨，奔腾的山洪，缅甸的山区，一下子就成了龙王爷的世界。一连下了四天的暴雨，掩护了112团官兵开路行进，同时也让龟缩在据点中的日军，并没有发现112团官兵的行踪。

陈鸣人遵照孙立人的指示，不仅行动隐秘，他还一天三遍用电报向孙立人报告部队的行进位置，5月26日午夜时分，112团的官兵已经来到了南高江的东岸，南高江平时的时候，江宽五六百米，因为雨季的到来，江水咆哮，江面陡增至一两千米，现在这条奔腾咆哮的大江，成了陈鸣人率部奇袭西通的巨大障碍。

陈鸣人面对这道天堑，急忙给孙立人发报，孙立人随后发来指示：若能渡江，则于拂晓之前完成任务，如果渡江失败，立刻返回，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渡江只是丛林作战的一部分内容，112团的官兵早已经掌握其要领，战士们虽然砍来了竹子，并迅速将其做成了竹筏，但在漆黑的雨夜，渡过如此宽阔的江面，意想不到的危险和困难绝对会层出不穷。

112团官兵悄无声息地将竹筏制成后，便开始了百舸争流地横渡南高江，并在拂晓5点渡江成功，孙立人得到报告，立刻发出了命令：112团应迅速展开，切断西通到加迈的公路补给线，并修筑坚固的据点，防止来自两面敌人的反扑。

112团立刻断调西通连接加迈的道路，并在断路处修建了阵地和据点，陈鸣人马不停蹄，领兵急进，向西通的日军发起了猛攻。西通的日军面对雨季的来临，还以为已经高枕无忧，他们正在“呼呼”地睡大觉，112团神龙见首不见尾地出现，并立刻投入了战斗，中国驻印军射出的飞蝗般的子弹，当时就将这些日军给打蒙了。

孙立人为了让陈鸣人能迅速攻下西通，他乘坐吉普车去找史迪威，让他立刻派美军的运输机，为112团空投山炮等重型武器，史迪威听罢孙立人的要求，他惊诧地道：“112团真的已经攻到西通了吗？”

孙立人说道：“千真万确，目前112团就缺山炮，只要有了山炮，西通指日可下！”

史迪威担心孙立人军情不实，最后孙立人也急了，他让美国运输机立刻携带山

炮直飞西通，如果情况属实，就给112团空投山炮，如果情况为虚，飞机就直接飞回来，孙立人再办112团谎报军情之罪。

史迪威一见孙立人如此有信心，他急命美国的运输机，携带着几门山炮直飞西通。运输机飞到西通，果然发现了112团已经对西通发动了攻击，飞机的驾驶员，便将山炮空投到了地面的T字布上面，112团有了这些山炮的帮助，官兵们如虎添翼，很快便占领了西通，陈鸣人此战，不仅取得了毙敌第12辎重联队900人的战绩，而且获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食、汽车和骡马。

在这里有一个事儿不能不提。那就是——林旺。

林旺不是人，它是一头大象。当时日军在北缅的战场上并没有制空权，他们设在胡康和孟拱河谷的简易公路，经常会被美军的飞机炸断，为了往前线运送辎重，他们就成立了象队。

一只大象可驮250—300公斤的物资，并能在道路曲折的密林中穿行，由100多头大象组成的运输队，就是日军为前线提供给养的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虽然林旺被驻印军解救出来的具体地点已经无法查找，但大体上应该在驻印军占领西通之后。



孙立人与林旺，摄于**1947**年



孙立人与林旺，摄于**1947**年。

林旺是一头公象，经过训练，变得非常听话，它不仅可以为驻印军运输物资，孙立人只要冲它一喊，大象林旺就会跪下并乖乖地听命。

后来，孙立人领兵回国，大象林旺也就离开了缅甸，来到了广州，抗日战争胜利后，林旺又去了台湾，孙立人最后将它送到了台北的圆山动物园。台北圆山动物园还给林旺找了妻子——马兰（圆山动物园唯一的一头母象）。

孙立人将林旺送走后不久，即被蒋介石下令软禁。开始了他长达33年的被囚生活。

2002年10月12日，54岁的阿兰心脏衰竭去世，2003年2月26日凌晨林旺去世，享寿86岁，林旺为所记载的最长寿的亚洲象，没有之一。

西通能有100多头大象组成的运输队，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西通就是加迈日军最大的辎重和补给仓库，西通失守，从拉马关到加迈立刻全线动摇。日军为挽回

颓势，立刻兵分两路，分别从东面加迈和西面孟拱两个方向，气势汹汹地向西通杀来，企图一举夺回西通，重新稳定被动的局面。

两路夹击陈鸣人112团的日军竟是他们的6倍，可是112团1600多名官兵稳如泰山，他们面对疯狂压过来的近万名日军，奋勇还击，经过六日六夜的苦战，终毙敌2700人，取得了这场阵地战的胜利。

此役是孟拱河谷战役中最为激烈的一战，陈鸣人因为固守阵地，稳如磐石，故此被《大公报》送了一个绰号——拦路虎。

日军从加迈和孟拱两个方向抽兵合击112团，按照兵家用兵的原则，孙立人应该增兵西通，牢牢守住得来不易的战略补给要地，可是孙立人用兵有奇招，他针对日军出兵两路进攻西通，加迈和孟拱兵力空虚的形势，决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12团坚守西通不动，吸引住两路敌人的进攻，而113团随后开始进攻加迈，而114团以锥形阵法，翻山越岭直逼孟拱。

112团攻占了西通后，拉马关的日军因为给养断绝，立刻陷入混乱，22师一番激战，攻取拉马关，随后，廖耀湘领兵立刻直逼加迈，113团和22师本来要实行前后夹击战术，一起进攻加迈，可是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113团决定提前行动，他们首先以重炮猛轰日军设在南高江对岸的阵地，然后500多名官兵乘坐着美国的橡皮艇，很快渡江成功，113团冲上江岸，迅速歼灭了残敌，并占领了加迈南侧的617高地，经过半日苦战，即将加迈的日军肃清，彻底粉碎了田中新一想将驻印军阻挡在加迈之外，让缅甸的雨季拖垮新一军的臆想。

新38师114团2000官兵，他们以钢盔为灶，巧布疑兵之计，一路向孟拱挺近，让沿途据点的日军都以为是驻印军的大部队到来，全都退避三舍，不敢应战，114团官兵一路攻占了单般卡，最后占领了距离孟拱12里的巴陵杜高地，并在高地上修建了坚固的工事，114团现在就像一把利剑，不仅腰斩了孟拱到密支那的铁路交通，也截断了孟拱河谷残敌的退却之路。

孙立人分兵两路之计实施之后，孟拱河谷的战局，基本已经云开雾散，胜利已

经被驻印军牢牢地抓到了手里。

孙立人的新38师官兵，屡建奇功，再看柏特诺参谋长派出的中美联合部队，他们奇袭西通的目标确实很远大，可是这队人马在深山里转了三天，最终却迷路而返。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蒙巴顿勋爵为表示对驻印军大破胡康河谷的支持，他也曾经派了一支英印军到北缅参战。

这支部队的番号是第3师77旅，两个月前，英国派飞机，将其空降到孟拱和卡萨铁路的间隙中，如今他们竟被日军包围在孟拱东南3公里处。经过多日激战，目前只剩下不到500人了。

114团的团长李鸿得知情况，急忙拍电报向孙立人请示是否派兵去救，英印军虽然作战不利，但中英毕竟是盟军，盟军被围遇险，中国驻印军焉有不救的道理。

孙立人当即给李鸿回电，命他立刻派兵解围。李鸿接到命令后，当即在6月18日晚上，命彭克立的六营强渡白浪涛涛的南高江，打了日军一个出其不意，日军被打散后，六营官兵将被围的英印军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彭克立六营的一个排的战士，竟做出了一件让500名被救的英印军瞠目结舌的事儿。

薛庆煜先生作为军医，曾亲自参加第二次缅战，在他编著的《孙立人将军传》中，这样写道：

> 我军与英军77旅也取得了联系。114团1营3排奉命去接替英军77师约500人的战斗任务。此举使英军官兵大为惊骇，以为我军是在把作战当成儿戏。但实际上，李鸿团长和彭克立营长完全是根据当时作战的地形及英军失利的教训而决定只让一个排去作正面攻击的。
>
> 李团长和彭营长等发现，英军部署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于冲锋队形过于密集，这相当于以一营英印军的兵力攻击敌军正面只不过25公尺左右的阵地，而每次炮轰之后，英军就以密集队形向前猛冲，简直像赶一大群绵羊那样往敌军的火网冲撞去，此种战法焉能不招致重大伤亡？伤亡越惨重，士气就越低落，而指挥官就越发急躁，更不顾利害，一味驱赶士兵蚁附而上，以为缩小正面，增大一线兵力，就可以突破敌阵，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造

成伤亡累累，寸土未得。

所以114团以一个排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进行冲锋，反而使冲锋的战士可以充分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又充分利用了轻机枪和60毫米迫击炮的支援，一个漂亮的冲锋就迅即拿下了英军一个旅久攻不克的敌军阵地，该排的火线“表演”把后撤休息在旁边观战的英军官兵看得目瞪口呆。

由此可见，打仗不仅要勇敢，而且要睿智，更要用头脑，如果一味的蛮干，除了失败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114团的秘密行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坐镇孟拱的缅北日军最高指挥官田中新一的重视，他为了解密支那之围，还派53炮兵联队长率领1000多名日军，携带山炮、榴弹炮和重炮多门，去密支那驰援。

当114团开始在孟拱城外拔营夺寨，先后攻下了马哼、瓦铁、建支、汤包、来生和来鲁六个据点。田中新一这才知道军情紧急，赶忙给53炮兵联队长拍电报，让他们立刻放弃支援密支那的计划，速返孟拱城，先保住自己的老巢要紧。

53炮兵联队长急忙率队往回赶，可是这支回防的日军部队，与114团第9连代理排长彭新民相遇了，彭新民手下只有40多名驻印军的战士，但他们根本不畏强敌，彭排长当即领着战士，迎着53炮兵联队就猛攻了上去。

40名战士，如果换在第一次缅战期间，还不够1000名日军塞牙缝的，但是，现在日军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听到枪响，便怀疑是遭遇了驻印军的大部队，一场交火，他们竟被彭新民打得抱头鼠窜，丢枪弃炮，狼狈不堪。53炮兵联队长高见量太郎亦被彭新民领兵当场击毙。

1944年6月23日，114团的开始对孟拱发起了进攻，孟拱虽然有6000日军驻守，可是114团的两个主力营，将孟拱城撕开了一个口子后，便与守城的日军展开了巷战，日军队伍被驻印军战士分割包围，一一消灭，两日之后，孟拱河谷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孟拱，就被驻印军占领了。

田中新一坐镇孟拱城中指挥，他一见大势已去，便急忙领着亲信的下属，从城中的密道逃出了孟拱……至此，日军第18师团，基本已被驻印军消灭，曾经攻破南京，并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王牌师团，就这样被消灭在了北缅的战场上，久留米这三个字，在日军的序列里，被一笔勾销了。新一军的官兵歼灭日军第18师团，也算是为南京那些冤死的30万国人，报了血海深仇。

在网上曾经有孙立人活埋了1200名日军战俘的段子，而且流传得很广，根据考证，当时在缅战的战场，一次能活捉如此多战俘的战役，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而且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尼吉亚军校，受过正统的军事教育，这样严重违反国际法，并且会产生极其恶劣影响的事情，孙立人作为一员儒将，是绝对不会干的。

驻印军杀俘虏的出处是1995年黄山书社出版的《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作者为戴广德。戴广德曾经做过驻印军的战地记者，后来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他用笔这样记录下李鸿团长，下令在缅甸战场枪毙日本战俘的事情。

> 26日，孟拱市区内凭借断壁残垣作零星抵抗的残敌，也被肃清，孟拱的命运业已决定。李（李鸿）团长安闲地率领一群新闻记者在火车站附近参观战场。
>
> 刚刚回到团指挥部，电话铃响了。
>
> “报告团长，又捉到四个俘虏！”
>
> “问他们淞沪会战到过南京没有？没有到过中国的送团部来，到过南京的就地解决——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复仇！”
>
> 电话机挂上，李团长对记者说：“敌人在中国造孽万端，无辜民众死于暴敌枪口下的岂止千万，现在，我们分别其罪恶轻重‘公平’处置。”
>
> 说着，他拿出一包“大日本帝国”牌军用香烟，分赠参观的记者。
>
> 自古善恶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日军在缅北的末日，真的可以说一天天的临近了。
>
> 如果将骨牌按照一定间隔摆在一起，然后推到第一个，一长串的骨牌，便会连带着一个个地倒下去，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形式比人强，这句话如果换一种方式说，那就

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孟拱河谷战役的胜利，代表着第一阶段的第二个节点的战役胜利完成，只要攻下了密支那，那么第二次缅战的第一阶段的胜利才算真正地到来。

第七章　胜利会师，北缅已尽归吾手

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李白《杂曲歌辞·出自蓟北门行》

驻印军杀出了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下一战就应该是攻取密支那。可是攻取密支那的战争早已经打响，这场战争的总设计师就是柏特诺参谋长，柏特诺派出的中美突击队，一开始奇袭密支那的西机场成功，控制了跑马地，并袭占了锡塔普尔，战况进展非常之顺利。

驻守密支那的日军，是第114联队第1大队的部分人马，共计1200余名日军，多数来自日本九州矿工，极其善于挖掘坑道工事，他们修的工事，交通壕也是纵横交错，而且碉堡坑道相连，其隐蔽的火力点遍布城市的各处。

麦支队的指挥官麦利诺准将是一个对日军战法不熟悉的指挥官，如果他能听信部下的合理化建议，迅速展开对密支那守敌的进攻，并果断切断日军对密支那补给的交通线。那么这场战争早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他分散兵力，切断密支那的交通补给线也做得不彻底。

随着日军第114联队第2、第3两个大队，第56师团步兵团水上源藏团长等率兵增援，致使密支那的日军守军数量猛增，竟一度达到了3600余人。

本来一场中美联合作战部队，从火力、人数和信心都占优势的奇袭战，最后因指挥不利，而打成了消耗战……密支那以后，还有八莫，八莫之后还有腊戍，这一场场的硬仗，都在等待着驻印军的官兵去啃、去拼、去厮杀！

1．重镇，血雨腥风密支那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陈陶《陇西行》

攻下密支那，则中国驻印军距离归国回家之路便又近了一步，可是水上源藏为首的驻守密支那的日军，负隅顽抗，让我驻印军官兵蒙受了巨大的伤亡。胜利天幕上的晨曦，竟都是鲜血所染，通向和平的鸿沟中，填埋得都是烈士的身躯。中美联合突击队在密支那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艰难和险阻？

密支那为缅北重镇，该城市之名为缅语的音译，密支那在缅语中是大河之滨的城市之意，该城市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为纵贯穿缅甸仰光—密支那铁路的终点，南连八莫，西通孟拱，北达孙布拉蚌和葡萄（坎底），更是北缅地区水陆的交通枢纽。

密支那周围被生满了夜合欢、罗望子和紫檀木的群山所包围，在密支那附近出产的香米称作khatcho，被认为是缅甸最好的香米。密支那还是翡翠的重要产地。但随着1942年5月上旬，日军占领密支那，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日军目前已经在密支那的西北两个方向，各修建了一座机场，西机场为日军常用机场，北飞机场设施不完善，需要修缮才能够使用。

中美联合突击队已经来到了密支那的城郊，因为正值缅甸的雨季，进攻密支那的战斗任务一直在往后拖，延迟进攻计划的道理很简单，要知道，中美联合突击队是一支孤军，他们的任务是首先占领密支那机场，让后续部队乘坐飞机从天而降，接着集中优势兵力，对密支那发动进攻。

如果雨季来临，美国的飞机是没法起飞的，贸然攻下机场，不仅打草惊蛇，而且还会引来密支那日军的反扑，所以这场突袭战的战斗命令，与其说是由人，还不如说是由天气决定的。

1944年5月17日下午，大雨初晴，随着三颗信号弹在密支那西机场外面升起，中美联合突击队先是一顿炮弹猛轰，接着士兵们端着机枪就冲了上来，停在机场的

8架飞机，已经先后中弹起火，在机场防卫的日军也被这支突然“冒”出来的队伍给打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他们抵抗一阵，随后惊慌失措地退出了机场，逃到密支那城中，向负责密支那防务的114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报告情况去了。

中美联合突击队不辱使命，开局顺利，很快便控制了机场。他们占领了密支那的西飞机场后，先将跑道上的飞机残骸，地面油污清理干净，并升起了指示飞机降落的风幡，随后发出了约定好的密码电报——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这份电报所代表的意思是：我军已占领机场，运输机可以降落。

史迪威接到电报，当即命令在机场待命的新30师第88团、第14团及炮兵、工兵等部队，自当日下午3时起，陆续乘坐C-47运输机空运到密支那。

新30师的官兵只是一支新军，虽有战斗力，可是却不强。而麦支队的组成人员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岛屿巴拿马、千里达和危地马拉等地有丛林作战经验的美军，看似非常正规，其实麦支队的大多数人，都是被长官从各自队伍中挑出来的酗酒、滥用暴力和严重违反军纪的士兵。从麦之队拿不到台面的绰号——马尼尔劫掠者，也就知道这支部队的真实情况了。

新30师第89团，第50师的150团随后赶来，他们全都是美械师，他们头戴钢盔和手持美制M1卡宾枪，下面打着绑腿，虽然他们的战斗力不及22师和新38师，但是乘飞机赶到密支那，亲自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却认为，中美联合突击队不管从兵力和火力都远超日军，攻占密支那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孟拱河谷战斗正处于胶着状态，22师在马拉关一带与日军激战，20天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史迪威让帕特诺参谋长制定了对密支那实施的“跳蛙之战”，目的是攻取战略重镇密支那，震慑缅北的日军，彻底打破战争的胶着状态。

史迪威认为，这次实施的“跳蛙之战”，属于兵出奇招，一定能超过孙立人穿插迂回的战术。

可是孙立人派兵迂回西通取得了成功，帕特诺的“跳蛙战术”却是乱跳，以至于攻取密支那之战，由突击战，最后打成了损失巨大的消耗战。

密支那之战的时间，是在孙立人攻取加迈、西通和孟拱之后，密支那“沉重”的胜利，并没有对孟拱河谷之战起到帮助的作用，反而是孙立人在孟拱河谷取得的胜利，动摇了密支那守敌坚守的决心。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换句话说，迂回穿插和跳蛙战术不是谁都能用的，一旦用好了，会取得胜利，一旦用不好，那就会拖累部队，让部队付出更多的牺牲。

密支那战役一开始，史迪威就做出了以下的进攻部署：

1．麦支队和驻印军88团负责阻断铁路和陆路交通，防止孟拱等地的日军向密支那增援。

2．驻印军89团负责扫荡西机场附近残敌，稳固攻取密支那运兵和补给的大后方。

3．驻印军150团进攻火车站，来一个先声夺人，为后续部队的进攻打前站。

150团的2营和3营官兵，并不熟悉密支那火车站一带的地形，敌人的兵力部署更是不得而知，他们凭着一股勇气，直奔火车站攻杀而去。

缅战老兵唐清荣在回忆这场战斗的时候，哽咽地说：“我们向前冲锋的时候，火车站前面的烂泥坑，就是那些炮弹、1200磅的航空炸弹（炮火覆盖）炸出来的，那些坑深得很，多得很。陷进去就动不了，动不了呀，动不了，死了好多战友，实在太惨了。”

日军占据的密支那火车站虽然被攻下，可是这两个营的官兵，随后便陷入到了被日军反包围的噩梦之中。

第18联队的日军，多是日本九州矿工，对于挖掘坑道工事，那是绝对的行家里手，他们躲在四通八达的工事内，以及坚固的碉堡中，对包围圈中的150团的两营官兵展开了袭击。日军的山炮打得厉害，一般一响就是五发覆盖，弹着点竟能打出五瓣梅花的模样。

因为150团两营官兵的通信线路被敌人的炮火炸断，致使无法呼叫美军的炮火支援，他们在火车站坚持了两日，终因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凭着刺刀开路，杀出重围，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灰头土脸地撤回到了西飞机场。

在这场战斗中，150团的2营、3营官兵损失严重，第三营营长郭文轩在火车站的这场战役中牺牲了，麦利诺准将受此打击，心脏病发作，被飞机送回后方医院抢救，1944年5月23日，史迪威再次乘飞机，偕新一军军长郑洞国、新30师师长胡素、第50师师长潘裕昆等人来到了密支那，史迪威任命柏特诺参谋长接替了前线总指挥之职。

而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分别为潘裕昆和胡素进行指挥，郑洞国负责对中国驻印军进行监督。

柏特诺参谋长若论计谋，应在麦利诺准将之上，若论实战经验，前者和后者就基本上没法比了。柏特诺对中国驻印军的战法素来抱有成见，又非常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他对中国驻印军将领的合理化进攻方案不屑一顾，每天对日军的进攻方案非常单调，即：先是一阵炮击，炮击过后除了进攻就是冲锋。完全就是照搬美军“炮火平推”的一贯做法。

经过了一个月的进攻作战，中国驻印军的官兵损失严重，但密支那的战况却非常不理想。柏特诺坐在指挥部的帐篷中，冥思苦想就是想不明白，战壕中的日军，难道是金刚不坏之身，面对可以将战壕炸平的航弹和火炮的饱和似攻击，他们为何能够安然存活，难道焦土轰炸对日军不起作用？

很显然，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驻印军“逡巡不前、作战不力”，柏特诺为了严肃战场纪律，甚至将胡素撤职，并遣送其回国。

柏特诺真的错了，他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并不知道火线激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坐在办公室里，不可能想明白日军是如何在焦土轰炸下生存的。

由于柏特诺断路打援等措施做得不到位，原本有1000多名日军驻守的密支那，经过几路日军的增援，目前的日军数量已经增至到了3600人。日军第56师团水上源

藏少将已经接替丸山房安大佐，成了密支那的最高指挥官。

密支那的得失，决定着缅北整个战局的走向。日军大本营对其非常重视，曾传闻在缅甸吃了一名英军俘虏的肝脏、素有魔鬼参谋之称的辻政信，给水上源藏发出了一份严苛的命令——必须死守密支那。

水上源藏为了减少日军死亡，他早就摸清了中美联合突击队“炮火平推”的作战规律，在每日雷打不动的炮击之前，水上源藏命令驻守阵地的日军，只留少量的狙击手，其余日军全部撤离阵地，等炮击过后，日军再快速从隐蔽处回到阵地，参加战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日军随身还带着一根管子，一块钢板，一旦攻击的炮火，强大到炸平阵地，并将他们埋于土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躲在钢板下面，用管子探出土里呼吸，等炮声一停，他们就像鼹鼠一样，从土中钻出来，接着再战。

最让人头痛的是，日军在火车站竟将火车车头和车厢排在一起，构建起了一座火车阵地，如此怪异的阵地，竟让驻印军的机枪和大炮全都失去了效力。

消耗战打的是时间，拼的是消耗。日军被中美联合突击队围困在密支那这座孤城之后，每天苦战，3600名日军经过减员只剩下了1500人。

因为弹药奇缺，水上源藏不得不限制日军火炮每日限发6炮，手榴弹每人两枚，遭遇驻印军，可打白刃战便不许用子弹解决战斗，水上源藏为了补充兵员，甚至派人摸出密支那，到距离不远的瓦扎日军野战医院，找回400名伤兵，让他们到密支那参战。

水上源藏面对困局，一直在咬牙坚持，缅甸日军的最高司令官河边正三，为了保住密支那，他再调日军53师团128联队，还有炮兵53联队的2000多名日军，对密支那增援而来，孙立人的新38师，这时已经收复了孟拱，他得到日军增援密支那的消息，急忙派113团和114团布下了口袋阵，一番血战，并将这路增援的日军全部消灭。

日方援军被全歼的消息，让水上源藏立刻感到了绝望，守城的日军的军心也开始了动摇。

日军的战壕，大部分都被盟军的炮火摧毁，日军冒雨在战壕中战斗的时候，浑浊的泥水都已经漫到了胸前，因为痢疾横行，很多参战的日军士兵竟然赤裸下体，连裤子都不穿。而驻印军也好不到哪里，根据当时参战的美国老兵回忆，战场上根本没有干净的饮水，他们只得用搪瓷缸子舀泥水解渴，等不及卫生丸在泥水中融化，往往将泥水和卫生丸一起喝下。

被疟疾、痢疾、回归热还有伤痛折磨的士兵，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史迪威当时在给自己妻子的家书中，这样写道：雨雨雨，泥浆泥浆泥浆，然后是各种疾病的名称，谁都不知道战争将如何结束。

缅甸的雨季，实在是让交战的双方都感到万分头痛。

在1944年7月，美军一天出动127架飞机共投下754吨炸弹，郑洞国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命令炮兵在7月7日以后，展开了更加凶悍的轰击，日军的战壕和工事基本全部被摧毁，密支那整座城镇根本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屋，甚至连直立的电线杆都找不到一根。日军构建的碉堡工事，已经残破不全，日军坚守的信心，随着孟拱河谷的失守，基本上变得荡然无存。

孟拱河谷的战役结束后，新一军经过短暂的修整，新38师第113团、第30师第90团也先后赶到了密支那，至7月27日，日军已经被强大的中美联军压缩到密支那城市中心。

密支那的日军，确实是在拼死抵抗，若论北缅战役中抵抗最激烈的日军，首推密支那莫属。第30师的上校参谋唐泊三，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并减少伤亡，他向长官建议，应向着密支那的城市中心，纵深挖三条平行共进的蛇形战壕。

工兵在战壕中作业，弹药手用竹竿挑着炸药包，并将其频频送进敌人工事，机枪射手在战壕中步步跟进，对前面拦路的敌人进行扫射，1944年8月3日，中国驻印军基本占领了密支那的全部市区。

水上源藏并没有对手下展示那份死守密支那的命令，在密支那即将丢失前，他同意了丸山大佐率领幸存的800日军突围的要求，1944年8月4日黎明，日军突围

后，水上源藏于城外河岸的一棵榕树下，拔枪自尽了。

水上的副官逃回军团司令部，他在报告战况时，辻政一边对其殴打，一边怒骂：“不是叫你们死守吗？为什么你们还有脸回来！……”

1944年8月3日，密支那光复。中美联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驻印军共牺牲972人，伤3184人，美军死亡272人，伤955人。一共伤亡5383人。而日军共伤亡了3500人。

这场战争，胜得太艰难。中美联军用2：1的惨重代价，最后惨赢了这场本来该速胜的战役。这场消耗战，不管是兵力、武器还是制空权中美联军都占优势，可是却打成了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的窝囊仗，如果第二次缅战，都照这样打下去，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驻印军就消耗殆尽了。

驻印军和日军在缅甸战场上兵戎相见，单兵作战的素质重要，整体的实力很重要，而指挥官的能力则更重要。如果让孙立人指挥新38师来打这场密支那之战，相信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伤亡，也不会拖那么久的时间，更不会付出那么重的代价。但不管怎么说，密支那战役毕竟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密支那的胜利，代表着中国驻印军在北缅反攻第一阶段的完全胜利，密支那战役是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开始的，即使作为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勋爵都不知道情况。

谈及原因，有史学家说史迪威是为了军事行动的保密需要，但是国内的一位战区司令的分析，更接近实情，他说：真正的原因是，如果计划没有实现，或者不收效，史迪威不想让任何人有理由说他遭受了失败。

中国驻印军与盟军麦支队并肩作战，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以毁灭性打击，以歼灭日军2万多人的战绩，洗雪了第一次兵败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孙立人因为在第二次缅战中的优异表现，被盟军誉为中国卓越的军事人才，他也被送了一个绰号——东方隆美尔。

第二次缅战第一阶段的完全胜利，代表着北缅的抗日形势发生了逆转，可是就在这时，中国国内抗战的形势却遭遇到了一次“滑铁卢”，日军调动了一百多万军队，实施了一号作战计划，在随后爆发的豫中会战和常衡会战中，我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区相继沦陷，蒋介石为了挽救危局，本想调一部分驻印和滇西远征军回国驰援，可是史迪威借着胜势，想将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指挥权，全都抓到手里，蒋介石却对此予以拒绝。

史迪威手里掌握着美援，他为了达到目的，竟威胁重庆政府，竟要将手中的美援送给延安的抗日武装。

史迪威看似不合理的要求，却有着合理的成分，他想改造中国驻印军，并将其训练成一支精兵，消灭北缅的日军，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让历史能够记住的成绩！

史迪威的傲慢态度，让蒋介石非常恼火，他以强硬的口气，致电罗斯福，请求调换总参谋长，并言，如果调换的总参谋长，与其不能合作，中国人也可以不依靠美国，而自力更生云云……罗斯福为了缅战的大局着想，便剥夺了史迪威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派魏德迈将军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由索尔登中将接任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

1944年史迪威回国后，罗斯福当即晋升他为四星上将，坐镇第六军区。但对于第二次入缅作战，史迪威到美国后，仍放心不下，即给孙立人将军发来一封告别信，电文如下：

亲爱的孙将军：

我已经被调离中缅印战区，也必须离开你了。在我们长时间合作后，这对我来说是件很难过的事。我一直都认为中国军队在适当的配备和训练下，会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一样好……你已经创立了一个新而有效的国军，有了这个先例，中国可以组织一个使你们自由而强盛的军队，你应该以你的成就自豪。希望你忘记我们之间的以往任何误会和意见的冲突，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和中国之友。

从史迪威电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驻印军的不舍，他对政治的无奈，史迪威光明磊落，目的明确，根本不知拐弯和变通，他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以他的脾气，无法取得蒋介石的好感，但这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军人。他对第一次缅战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无法释然，他魂牵梦系的是，如何打赢第二场入缅之战，一雪前耻，让兵败缅甸的污点，从自己的军旅生涯中彻底中抹去，但此目标，也只能靠孙立人帮他实现了。

后来，史迪威曾要求再次访问中国，却遭蒋介石拒绝。史迪威失望之余，给出的解释是：“（蒋介石）不希望我踏上亚洲的大陆……可能认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

从1943年3月，新38师114团开赴野人山区，掩护中美工程兵部队修建中印公路开始，直到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已经一口气打了一年多时间的仗，早已经人困马乏，重庆政府随后发来命令，新一军在修整的同时，中国驻印军原来的编制做出了以下的调整，以新38师和22师为班底，扩建为新一军和新六军。

新六军军长为廖耀湘，下辖22师和第14师，22师师长由李涛接任，原14师师长龙天武职位不变。

孙立人为新一军军长。新一军下辖3个师，分别是30师、38师和50师。

30师长唐守治、副师长文筱山，该师下辖三个团，分别是88团、89团和90团，团长分别为：胡英杰、曾琦和项殿元。38师师长李鸿、副师长是陈鸣人，该师下辖三个团，分别是112团、113团和114团，团长分别是梁砥柱、赵狄（先）王东篱（后）、王东篱（先）彭克立（后）。

50师师长潘裕昆，下辖3个团，分别是148团、149团和150团。团长分别是王大中、罗锡畴和王云生。

孙立人每一次面对整编，都是他大兴练兵、整军经武的重要机会。他认为，军队想打胜仗，光想着武器先进、练兵手段科学、后勤保障有力是不够的，一定要做好政工工作，要让士兵知道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才成，新一军的政工工作，孙

立人委托葛南杉在一手主抓。

葛南杉和孙克刚一个是孙立人的亲信，一个是孙立人的侄子，葛南杉开口说话先脸红，而孙克刚书生气十足，一副知识分子形象，在新一军中，曾经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但这两个人，上了战场，敢打敢冲，没有辜负孙立人对他们的期望与信任。

通过葛南杉的政工教育，新一军的官兵都知道了肩负的责任，以及自己的使命，上了战场不仅作战勇猛，敢和日军拼命，而畏缩不前、开小差等现象，基本上被杜绝了。

为了排遣驻印军官兵想家的情绪，孙立人还在部队中设立了鹰扬京剧团，他从国内请来了几位名角，又让这几位名角从部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演员，训期或者战斗的间歇，轮流给团、营部队演出，演出的剧目全是清官节吏，抗击侵略的曲目，比如：八大锤、王佐断臂、擂鼓战金山，或是包青公的戏，鹰扬京剧团不仅深受官兵们的欢迎，还能鼓舞部队的士气。战士们在战斗的间歇，还可以听听京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高级的战场待遇了。

新一军的官兵在前线打仗，中弹受伤在所难免，为了让伤员们得到及时的救治，孙立人在后方大力筹建野战医院，并建立了伤员第一，任何人都不许怠慢的原则，使新一军伤员的救治工作，一直在军队建设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瑞沃汀准将曾经做过新一军野战医院的院长，20世纪30年代闻名于世的瑞沃汀氏植皮术即由他首创，他手下的美国军医，全都是医疗手段高超，而又对工作负责的好大夫。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当地有很多的华侨，孙立人为了弥补战乱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影响，他在攻克北缅的许多城镇之后，还抽时间为华人子弟建了二十多所华夏学校。

孙立人还力所能及地利用木板、铁皮等材料，为因战乱失去房屋的华侨修建了多座华侨新村，让他们先有安身之所，并将部队结余的粮食、降落伞布等物资送给

这些华侨，暂缓他们缺衣少食之苦，使他们生活能够逐步走上正轨。

孙立人领兵到北缅参加抗战，目的是打通中印公路不假，但他更是用实际行动，在华侨和祖国之间，开拓出了一条连心之路。

孙立人和廖耀湘成为第一和第六军军长的命令下达后，郑洞国便率领舒适存参谋长等幕僚乘飞机回国，史迪威驻印军总指挥的位置由美国将军索尔登接任。索尔登以正直和忠诚而著名，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工程师，还是一位修建防御工事的能手，他在科罗希多岛上建造的防御工事从未被日军突破过。

索尔登和史迪威不同，史迪威是驻印军中的大小事务全不放过，而索尔登却是驻印军中的大小事务基本不管，全凭一线的作战指挥官做主。这就为孙立人放开手脚，指挥部队与日军残敌作战，带来了巨大的方便。

密支那战役打响之前，1944年4月14日，滇西远征军接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命令，随后，怒江战役的序幕就徐徐拉开了。

滇西远征军第20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从长达150公里的江面上的12个渡口开始强行渡江，渡江战役很快以胜利结束，滇西远征军并没有遭到特别激烈的抵抗，接下来，滇西远征军兵分多路，翻越高黎贡山，直奔腾冲和龙陵发动了攻势。

滇西远征军虽然在这两个地方，遭到了日军的顽抗，最后还是攻下了腾冲和龙陵，就在国内乃至世界正义的舆论，都对滇西远征军寄予厚望的时候，且不知，滇西远征军已经中了“魔鬼参谋”辻政信的“断作战”的诡计。

滇西远征军的主力攻到龙陵之后，辻政信命令第18师团的113联队的松井秀治大佐（后来，松井秀治大佐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为松山最高的指挥官）死守松山，扼断滇西远征军的粮草和军火供应的咽喉要路，然后日军其他师团集结起来，打滇西远征军一个歼灭战。

松山，一座海拔2200米，位于怒江上惠通桥西北约12里的一座并不著名的小山，经过松山战役后，这座小山竟一下子成了国内乃至世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1942年5月日军进驻怒江西岸后，他们便在松山之上，建立了进攻、防御和支撑点三位一体的坚固阵地，山上不仅有40多座可以相互策应的子母堡群，而且隐蔽的地下交通网四通八达，日军的工兵除了在阵地前埋设了不少的地雷外，他们甚至还将第一次中国远征军丢弃的T-26坦克埋在山顶阵地的泥土中，当成了坚固的火力支撑点。

当时日军的防守松山兵力为1340人，他们为显示自己的武士道精神，在战斗之前，他们纷纷给家里写信，信封中装的都是自己的指甲和头发，表示了自己战死的决心。松山战斗打响后，经过从1944年6月开始，到9月结束“十战松山”的战役，在不足10平方米的山头上，滇西远征军共投入兵力6万人，日军1340人除一人突围外，全部被歼灭，滇西远征军伤亡官兵共6763人。

松山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辻政信的“断作战”的诡计，滇西远征军初步取得了怒江战局的胜利。

2．回国，班师齐唱凯歌还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李白《越中览古》

第二次缅战，即将接近尾声，孙立人以犁庭扫穴之势，迅速解决了八莫和腊戌之敌，随后中印公路终于通车了，新一军赴缅作战的任务完成，随后就踏上了归国的道路，他们要回国抗日，因为没有国就没有家……

1944年10月，桂柳会战打响，白崇禧兵败桂林，关内抗日的形式危矣。新六军被调回国内，参加抗战，以挽救重庆政府岌岌可危的抗日危局，而在缅北歼灭日军的任务，就全都落在了新一军的肩头之上。

第二次缅战第一阶段战役至密支那结束，为了让中印公路尽快通车，孙立人必须要尽快地实施第二阶段的反攻计划，在他的反攻计划单上，有这样几个战略要地的名字：八莫、南坎还有一个就是腊戌。

关于实施第二阶段的反攻计划，孙立人早就为中国驻印军、英印军和麦之队，各自定出了在北缅的战区和作战任务：从加迈东至萨尔温江的曼邦，以此为线，南为英印军的战区，北为新一军的战区；而且关于指挥权，孙立人还做了这样一个规定，总指挥部必须通过军部，才能指挥中国的军队，索尔登将军再想像以前那样，通过一个联络官，便可以指挥中国驻印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孙立人计划实行第二阶段的反攻计划，是从1944年10月中旬开始到1945年5月31日结束，时间约为8个月。

孙立人为了避免各参战部队再犯密支那消耗战的错误，他这样对新一军的高级指挥官分析了形势。日军一开始确实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切断滇缅公路，以及后来的中印公路，但随着北缅战役以及英帕尔战役的展开，日军节节失利后，目前缅北日军只有四个不够建制的师团，即：49、56、2和18四个日军残师，为了防止缅南和缅中的日军派兵支援，各路军队除了统一行动，而且要快速出击！

孙立人将率领战斗力最强的38师攻占八莫，30师攻占南坎，38师攻占八莫后，

立刻进兵，占领腊戍。50师独立团协同英印军，东渡伊洛瓦底江，肃清前面日军零散之敌。麦支队作为预备队，一旦哪里出现险情，立刻补上。

八莫是缅甸的北部城镇，属克钦邦，缅北军事要地，华侨称它为“新街”，据考证，八莫在汉语语音中，意思为“不毛”的意思，传说中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指的这里。该镇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及其支流太平江汇口附近，距中国边境很近，向东可到云南的腾冲，南通我国的畹町，目前，日军共有第2师团搜索联队，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和一个工兵大队，盘踞在八莫镇里，他们借助坚固的工事，准备和驻印军打一场城镇保卫战。八莫的指挥官原好三大佐接到了上峰的这样一个命令：一定要坚守两个月！

日军实在是不能让中国修通了滇缅或者中印公路，要知道，第15集团军的司令长官牟田口廉也（日方称其为猪突猛将，以作战勇猛不重视后勤闻名），曾经这样讲过：

> 云南公路打通后，美军进驻及实行援华，中国军得以转移攻势，折断南方军之联络线，轰炸日本本土，梦想屈服日本。欲阻止敌人计划之实施，需相当之力量，敌全般状况未陷于不利时，无论两年、三年，或牺牲五万、十万，皆所不顾。

从牟田口廉也的讲话，可以看出日军对控制缅北、断掉中国的滇缅和中印公路的决心之大，甚至战死十万人之巨亦不管不顾的极度疯狂状态。

坚守两个月的背后，隐藏着日军的一个盼望，那就是期盼着缅南和缅中的日军，能够挥兵东进，早解缅北日军穷途末路之围。

八莫若论人口，只有密支那的一半规模，日军之所以坚守，还是有一点底气的，因为这里有一支精兵——第2师团搜索联队，这是一支类似今日的摩托化的军种。统领这支精兵的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原好三大佐。

搜索联队因装备了汽车和战车等现代化运输工具，故此，非常适合远距离奔

袭，但让之驻守，却非长项。原好三率领3000名守军，将整个八莫经营得碉堡林立，战壕纵横，甚至战车也被当作火力支撑点。总之一句话：原好三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甚至是拼命的打算。

孙立人兵分两路纵队，攻取八莫的作战计划如下：

西路纵队由英印军36师组成，他们要沿密支那和曼德勒铁路前进，占领卡萨，如果遇到增援八莫的援敌，当阻击歼灭，确保八莫歼灭战顺利进行。

东路纵队由新38师组成，负责八莫歼灭战的完成。

新38师兵强马壮，气势如虹，攻克八莫基本已无悬念，关键是攻占时间的长短，以及部队所遭受损失的多寡而已。孙立人在第一次缅战，他面对的情况可以说多方掣肘，让他有能力却无法改变战局，第二次缅战开始，孙立人虽有想法，但想付诸事实，必须和史迪威去吵，如今他手握前线的指挥权，孙立人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实施既定的作战计划了。

想要攻克八莫，首先要渡过太平江，孙立人部队在10月29日，首先扫清太平江北岸的全部驻守之敌，接着寻找日军江岸防线的薄弱点，并在11月8日夜晚，基本以无伤亡的代价渡江成功。

随后112团、113团和114团兵力展开，三个团首先扫清了八莫外围的日军据点，随着莫马克、卡旺和曼西等战略要地被驻印军攻取，八莫就被驻印军的官兵团团包围了起来，一场歼灭战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日军修在八莫的工事和碉堡，其坚固的程度，比密支那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日军坚固的碉堡，是用合抱粗细的巨树，中间再加上钢筋和混凝土一层层地堆积而成，这样的碉堡即使1200磅的航弹直接击中，也是无损。驻印军的爆破手，为了炸掉可以藏得下一连人的大碉堡，他们就用集束手榴弹实施爆破，手榴弹被拉线后，爆破手盯着十几个弹柄同时“嘘嘘嘘”冒起的青烟，算计着时间，眼看就要爆炸的时候，爆破手就将集束手榴弹一下子塞进这些大碉堡中，这种玩命似的爆破方法，绝对有效，但也是万分的危险。

孙克刚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中，曾经给我们还原了当时激烈的战斗场面：

> 因为后方没有将弹药及时输送上去，步兵的子弹打完了，整夜和敌人拼刺刀……在窄狭的战壕里，一切的武器连冲锋枪都无法施展，大家都拿着刺刀肉搏，一个轻机枪兵被敌人戳死了，预备枪兵陈云兴右胁下也挨了一刀，他手无寸铁，只有两只手，急忙用左手顺着来势把敌人刺过来的枪按在地下，右手迅速的抓住敌人的咽喉，他的五个手指，立即变成了五支钢钩，戳通了敌人的喉管，最后他用力一扯，连敌人的舌头都从喉管里抽了出来……攻城战进行到12月14日，南北两大据点，都被我军占领，最坚固的陆军监狱，宪兵营房和老炮台，也都拿了下来，攻城大军乘胜沿着江岸马路，直捣腹部阵地，混战中，打死了原好三大佐，“擒贼先擒王”，指挥官一死，敌军便纷乱一团；当晚，我军实行夜间攻击，残敌见大势已去，也想趁着黑夜突围逃命，因此，两下都用出最大的火力冲杀，演成我军占领八莫前最惨烈的一幕；恶战到天亮，残敌除掉极少数的六十多人，漏网跳江外，其余全部消灭，八莫市区于15日正午12点完全归入我军的掌握。

原好三曾经定过一个计划，那就是利用八莫的太平江、外围工事和城市防御体系，各抵挡驻印军一个月，可是38师只用了28天的时间，便取得了八莫歼灭战的胜利。让原好三固守八莫3个月的梦想，随着太平江的江水，全都流进了印度洋。

八莫一战，共歼敌2400多人，缴获弹药物资如下：虏获零式战斗机两架，战车10辆，压路机及牵引车8辆，轻重机关枪95挺，步枪1273支，各种口径大炮28门。

为了纪念这场胜利，盟军最高指挥机关，将莫马克到八莫市区的一段路定名为孙立人路，将八莫市区中心马路，更名为李鸿路。

38师在攻取八莫的时候，孙立人还接到了盟军总部传来的一道命令，命他歼灭八莫之敌后，迅速占领南坎，为中印公路开通扫清障碍。

孙立人打仗绝对有全局观念，他派往南坎的情报人员，已将当地日军的情况报给了他。驻守南坎的日军第18师团、第2师团之残敌，几经猬集，再加上从朝鲜调

过来的第49师团，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0人，如果让他们从容调动和布放，修建坚固的碉堡和工事，攻克南坎之战役，其难度必将成倍增加，如果趁他们立足未稳，派一支精兵去攻，有可能收到出其不意、快速取胜的效果。

12月3日，新38师在攻取八莫的同时，孙立人命唐守治率领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0师，沿着公路向南坎急进，像一支利箭般，对南坎这座日军屯有重兵的城镇发起了进攻。

南坎位于八莫的东南，两地相距124公里，这里曾经是明代木邦宣慰司直辖的土地。南坎这两个字是掸语地名，即“金江”之意，南坎位于瑞丽江南岸，因古人称瑞丽江为大金沙江，故而得名。南坎虽然是缅甸掸邦西北部的一个镇，但却拦路虎一样，“蹲踞”在中印公路的正前方，想要修通中印公路，必须要迅速打通该障碍。

南坎的地形是一个狭长的谷地，四周都是高山，因为土质松软，除非用混凝土，否则难以建造坚固的工事，可以这样说：想要攻取南坎，首先必须攻占南坎四周的高山阵地，只是，日军南坎的指挥官山崎四郎大佐也深谙用兵之道，他早命人在南坎四周的高山上，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阵地，虎视眈眈地等着驻印军来攻。

从八莫直奔南坎，自马丹阳开始，一路崇山峻岭，地势越来越高，直到卡的克，地势才开始逐渐下降，故此，卡的克就成了八莫地区的门户，卡的克左右各有一个险要之地，一个是左边的5338高峰，另一个是右边的蚌加塘高地，这两个险地，就好像南坎的两扇大门，日军为了守住这两个门户，他们已经在山峰和高地上，修筑了工事，储存了粮食，正在磨刀霍霍、剑拔弩张地等待着驻印军的到来。

新30师的主力部队在唐守治的率领下，兵至马丹阳，即刻兵分两路，左路军的主力为88团的1、3两个营，外加90团第1营附山炮营等官兵，他们的任务是夺取蚌加塘高地，歼灭高地之上的敌人。

右路军以90团的2营、3营为主力，附带山炮第一连以及工兵，他们的任务是占领5338高峰，为进攻南坎，肃清门户。

孙立人用兵，果真是“料敌先机”，完全打乱了南坎的指挥官山崎四郎从容布置

的时间，按照日军调兵的既定程序，八莫失守后，山崎四郎为守护南坎，才会往蚌加塘高地和5338高峰增兵，可是让山崎四郎没有想到的是，驻印军在进攻八莫的同时，竟分兵来攻南坎。

山崎四郎得知新30师的官兵来攻南坎的消息后，立刻仓皇调集人马，亲率55联队，56师团146联队等部队，一路征尘地向卡的克杀来，山崎四郎率队亲征的目的有三个：

1．保住蚌加塘高地和5338高峰，就等于保住了南坎。

2．趁驻印军立足未稳，对南坎地形不熟，打新30师一个歼灭战。

3．此次山地歼灭战成功后，全力向曼西进军，解八莫之围，扭转北缅被动挨打之困局。

孙立人的用兵之道，要远超山崎四郎许多，山崎四郎领兵来到5338高峰之下，却发现这里的战斗已经结束，5338高峰已经易主，峰上的日军已经被歼，新30师的右路军牢牢地占领了5338高峰。

5338高峰之战，原本应该是日军重兵死守，驻印军为取得该战略要地，强行猛攻，最终导致死伤惨重的一场战斗，却因孙立人棋高一着，让战争的形势演变成了驻印军的官兵牢守5338高峰，日军处于仰攻劣势，最后损兵折将的有利局面。

山崎四郎为了重新夺得5338高峰，他集中150重炮两门，山炮8门，平射炮16门，首先对着5338高峰就是一阵猛轰，日军借着硝烟还未散尽的机会，沿着山间溪流旧道，兵分四路，对驻印军的阵地进行偷袭。

可是很快，这四路偷袭之敌，便被驻印军的官兵发现并据险击退了。

12月16日，山崎四郎将进攻的主要突破口，转移到5338高峰右翼，并丧心病狂地向90团第3营阵地，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虽然3营阵地几乎被炸平，营长王礼宏殉国牺牲，但官兵们却打退了日军的15次冲锋，毙敌1263名，缴获大炮、机

枪、步枪和卡车等大量的战利品。

新30师右路的官兵毙敌建功的同时，左路军88团的官兵也攻占了蚌家塘高地，随后他们开始积极扩大战果，卡龙等战略要地，经过争夺，亦归我手。

5338高峰争夺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孙立人一边指挥攻克八莫，他一边让陈鸣人领着112团这支生力军，秘密地直奔南坎的右后方而来，经过激战后，112团首先取得垒允，接下来继续前进，并迅速占领南坎北部一带的高地。

1945年1月5日，八莫歼灭战已经结束，驻印军已经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随后，新38师的114团，也投入了南坎的战斗之中，他们在89团的后面，占据了南坎西南角一带高地，可是这两支部队，迂回到瑞丽江边时，却天降大雨，驻印军的勇士们，并不畏惧暴雨带来的寒冷和泥泞，89团将南坎西南面的缺口堵住，114团便向南伸展，截断南坎以南的公路，彻底断掉了敌人的后援和补给。

南坎四周的高峰和高地，最后都被89团、112团和114团夺得，位于低洼之敌南坎城内的敌军调动，以及工事碉堡的布放情况，都已经尽收驻印军的眼底。

1945年1月11日，新30师的官兵从正面突破了茅塘的敌军阵地。1月15日，晨雾初起，90团的主力从南坎背后，89团的主力从侧面直攻南坎，至中午十一点半，浓雾消散，南坎之敌基本被肃清，阻碍中印公路建设的又一个障碍，终于被打通了。

新一军攻下南坎之后，只剩下最后一个阻碍中印公路通车的障碍——芒友。现在滇西远征军已经占领遮放，正在进攻畹町，如果不能尽快地攻取芒友，那就不能完成中印公路最后贯通的任务。

孙立人早在南坎之战胜利之前，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既令人振奋也让人感到焦急的消息。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装在105辆卡车上，这些卡车的后面，还拖着中国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重炮和山炮，目前这些美援设备，已经在雷多集结完毕，一旦中印公路开通，这批援华的物资，立刻会通过中印公路，源源不断地运抵国内。

战争不等时间，运输任务就是命令，现在敌56师团和49师团186联队的残部，

正躲在中印公路最后的一个障碍——芒友的工事里，一边瑟瑟发抖，一边期盼着日军的援兵，能从腊戍或者其他地方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增援。

孙立人不会留给日军增援芒友的时间，新38师肃清了南坎之敌后，随即向南进军，截止到1月19日，已经收复了色兰、般鹤、般叉来等日军的据点，新38师的前锋部队，业已逼近了芒友。

新38师来到了芒友的外围，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敌情。日军55联队被远征军打得丢盔弃甲，目前已经退守到6000米以上的老龙山。

孙立人觉得，派兵攻占芒友，打通中印公路，这项艰巨的任务，理应由战斗力最强的新38师完成，随后，孙立人就定了一份四路出兵的计划：

113团担任直取芒友的主攻任务；112团负责扫荡芒友西侧一线之敌；114团率领山炮一营，负责迂回穿插，断芒友之敌后方的公路；而清缴老龙山之敌的任务，就交给了新30师。

日军负责芒友防务的就是第56师团长松山中将。松山手下虽然都是残兵败将，但他认为，如果协调得力，布置有方，在芒友据险苦守一段时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令他想不到的是，114团涉河流、逾高山，于1月26日，在芒友的背后的130公路的路碑处，一举切断了芒有日军的退路。

断路的狠招，打得松山痛到了骨髓里，虽然他组织五路大军，妄想疏通被断之路，可是除了被114团打得尸横遍野，竟没有占得任何一点便宜。

芒友随后被113团攻克，老龙山之敌也被新30师肃清。这时候，滇西远征军正在围攻畹町，战斗打得难分难解，114团在芒友130路碑处，将公路断掉后，畹町的日军觉得形势不妙，他们便从畹町主动撤了出来。滇西远征军随后占据了这座从国内至缅甸必走的咽喉城市。

这些从芒有和畹町败退的日军，共有11000多人，他们已经成了困兽，惶惶然不知道将往哪里逃，虽然腊戍之敌派第4联队前来解救，但新38师并没有给他们留下解围的机会，一场激战，被围的日军死伤一片，没死没伤的全逃进了深山老林，

1942年，日军曾经逼迫中国远征军进了野人山，1945年孙立人也逼日军进了一回“野人山”。

后来有资料记载这群被逼走野人山的日军，他们只有一小部分逃出了活命，但浑身褴褛，惨如鬼魅，下肢和睾丸全都水肿，距离地狱只有一步之遥了。

缅北的日军虽然还有一部分盘踞在腊戍等地，但大部分地区的日军都已经被肃清。现在缅北天空上的阴霾都被胜利的东风吹散，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即将在芒友会师了。

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定于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并一起庆祝中印公路的通车典礼。这不仅是一个盘点胜利的时刻，这也是一个国内，乃至世界上反法西斯国家，共同关注的一刻。



芒友会师，卫立煌（左）与孙立人两位抗日名将紧紧握手。

为了这次胜利会师，不管是第一次中国远征军，还是中国驻印军，乃至于后来的滇西的远征军，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马革裹尸、百死不悔，并用正义的力量捍卫了北缅战场的胜利。

新38师负责胜利会师的会场设计和搭建，因为战争还未结束，故此，这次会师大会的基调就是简单和热烈。会师会场的正中是一座礼台，礼台前正对着两根高大的旗杆，而礼台上覆盖着有颜色的降落伞布，台前还写着一个代表胜利的红色的大“V”字。

台前的空地上，站立着威风凛凛的两团健儿，身穿黄色咔叽布军装的是新一军38师的114团人马，而身穿灰色棉布军装的就是十一集团军的一团战士。

将近中午的时候，卫立煌、索尔登、孙立人三位将军分别乘坐吉普车赶来，李鸿师长高喊一声立正后，全场的官兵全部立正，并行注目礼，三位将军随后登上了观礼台。

随着中美两国国旗升起，中美两国的国歌亦同时奏响，接下来，卫立煌将军开始致辞：今天的会师，是会师东京的先声，我们要打到东京在那里会师，开庆祝会。滇缅战场中美的合作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同盟国不但在战时要合作，在战后更要合作来共建世界的和平……

接下来，索尔登将军也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不仅表扬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英勇，而且还对孙立人指挥有方、义勇忠诚给予了非常溢美的盛赞。

这次会师典礼场面如此热烈，如此令人心情激动，到场庆祝的官兵，他们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孙立人的心，越过中缅的万水千山，甚至可以感觉那汩汩流淌的汽油，正通过中印油管，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昆明；孙立人的眼睛，沿着中印公路，依稀可以看到，那些装满抗日战场急需物资的卡车，正在中印公路上，日夜不停地开往国内的情形……



孙立人与国际友人进行军事交流

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还有滇西远征军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终于架起了一条直通胜利的桥梁。在芒友举行的会师大会，被后代的史学家，称其为“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胜利的奠基礼”。

这次胜利的会师，最后在全场高呼——“打到东京去”的口号中结束，滇西远征军在会师典礼之后，他们就开始分批撤回国内，参加抗日，而新一军接下来还有重任，那就是肃清缅北的腊戍之敌。

腊戍虽然并不能影响中印公路的贯通，但那里盘踞的日军，始终是这条公路畅通和安全的威胁。

腊戍承载着第一次中国远征军败走野人山的耻辱，因为日军抢先占领腊戍，让10万入缅作战的远征军官兵，只剩下了四万名，那些牺牲的六万名将士，甚至都无法马革裹尸，返家安葬。

这样的奇耻大辱，孙立人一直牢记在心，他不能不报这个血仇，如果不能收复腊戍，他对那些牺牲在野人山的远征军官兵的冤魂，都将无法交代。

想取腊戍，必须要占领腊戍的两个门户，贵街和新维。

孙立人对腊戍的作战计划是如此安排的，即：新30师负责攻取贵街和新维，新38师负责攻取腊戍。新38师当年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占领了腊戍，而鞭长莫及，如今将其从日军的手中夺回，绝对是这支军队莫属。

为了配合新38师进攻腊戍，新30师首先展开行动。新维地势狭长，四周皆山，南图河是其天然的屏障；贵街位于新维北32公里，河流纵横，丘陵起伏，地形稍显复杂。新30师在2月14日对贵街发动了攻势，贵街守敌，纵然凶悍，但却难敌新30师猛烈的进攻，战斗很快结束，贵街首先成了新30师的囊中之物。

新维的日军不甘心失败，他们凭着四周的高山，还有南图河之险，妄想负隅顽抗，可是新维日军的螳臂当车之举，很快遭到了迎头痛击，新30师借着2月20日大雾弥漫之机，一举攻下了新维，不仅歼灭了750余名日军，而且还缴获了一大批军车、坦克和枪支弹药等物资。

新30师打开了腊戍的两个门户，新38师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直奔距离云南边境仅185公里的缅北重镇杀了过去。

进攻腊戍之战，就是一场痛打落水狗之战。新38师兵分三路，中路为112团，

配备坦克和重炮，他们沿着公路直进，右路和左路为新一军的另两个主力团，这两路人马作为奇兵，迂回前进。三支部队，如同三支利箭，腊戌之敌，根本就不是新38师官兵的对手，两方一经交手，敌人的火炮，便被新38师的重炮轰成了哑巴。

日军的坦克，面对新38师雨点一样的炮弹，也全部被打瘫，从2月24日，新38师向腊戌挺进开始，到3月8日腊戌之战结束，驻印军官兵攻下这座缅北重镇之战，仅仅用了13天。

而新38师的主力团对腊戌发起总攻，到最终攻取腊戌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用了一天而已，腊戌的工事碉堡，绝对要强过八莫等地，为何新38师用如此短的时间，便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驻印军的气势如虹，而日军的军心早已经涣散和崩溃了。

新一军的官兵接下来，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肃清了滇缅公路之上的康沙、芒岩地区及瑞丽江地区之敌，至此，北缅之敌已经完全被肃清，孙立人的新一军终于不辱使命地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

孙克刚在《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中，曾经这些总结了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还有后来的滇西远征军，三路人马，总共20万之铁血健儿，他们以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异国的战场上，与侵略缅甸的日军血战3年零3个月的战绩：

> 缅甸之战……和中国军队对垒的日军有第2、18、49、53和56五个师团，及第34独立旅和其他特种兵部队，中国军队击毙日军7.4万人，其中包括3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击伤日军75499人，共计歼灭日军甲级作战师团108581人。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日军几乎全军覆没，新一军伤亡1.7万人，新一军和日军伤亡的比例是1：6。虏获的战利品有：步枪7938支，轻重机关枪643挺，大炮186门，汽车552辆火车机车及车厢453节，坦克车67辆，飞机5架，仓库108所，金属器材2万余吨。占领公路646英里，超过由重庆经贵阳到金城江的西南公路，占领铁路161英里，约等于京(南京)沪铁路。解放敌占领区在5万平方英里以上，比日本各岛面积的总和略小，意大利全国的面积略大。确实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中国军的战绩能和新一军相比。在1942年4月到1945年4月3日的三年对日作

战中，新一军获得全胜。军长孙立人因此赢得“东方野战之狐”美誉，被盟军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前线指挥官。

新一军不仅完成了北缅抗日，以及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而且在同盟军面前，大扬军威，展示了独特的风采，并在世界列强面前，重塑大国之形象，还间接地获得了大量的国际性援助，并对国内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的军队入缅作战，成功牵制了日军10个主力师团，使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大为减轻，不仅粉碎了日军东进印度，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且也让日军与德军会师中东的计划彻底落空。

中国远征军入缅之战，不仅是一场胜利之战，更是一场正义之战，同时也是让新一军声名鹊起之战，可是人怕出名，新一军剽悍的战斗力，早已经让国内很多的军阀眼红，孙立人跟美国人走得很近，这也让蒋介石的心中，产生了深深的猜忌。

缅北滇西作战要图

1943年10月上旬—1945年3月下旬

- 中美英军集结地
- 中国驻印军一期、远征军进攻方向
- 中国空降部队
- 中国驻印军二期进攻方向
- 英军进攻方向
- 英军空降部队
- 美军进攻方向
- 远征军防御阵地
- 日军集结地
- 日军防御阵地
- 日军退却方向

1:3 800 000

缅北滇西作战要图

第八章　落日夕阳，挥手萧萧班马鸣

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李白《赠韦侍御黄裳其一》

1945年5—6月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孙立人接受了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到欧洲战场参观考察。

当时，美军虽有对日本本土使用原子弹的计划，但投掷原子弹，能否会使日军投降，这实在是难以预测，也是无法预测的事儿，甚至有可能，美军对日本实施原子弹攻击后，反而会激起日本人更大的反抗。而对日本本土用兵，必须要使用中国军队，而在同盟国的眼睛里，率领这支军队将领最佳的人选，自然是孙立人。

艾森豪威尔的意思很明显，他邀请孙立人访美，不仅要和他探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如何减少伤亡的问题，也有中国军队将来如何协同盟军作战的问题……可是孙立人从美国归来，蒋介石却用充满醋意和悍怒的口气责问：“艾森豪威尔邀请你，他为何不邀请我？”可是最终，新一军对日本本土作战，却并未发生……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回了广西南宁，他随后接受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进攻海南，反攻广州，对盘踞在那里的日寇进行清算。可是时局正在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和变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7日，孙立军率军进驻广州，接受日第23军投降。日军投降后，孙立人还命600名日军战俘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让他们修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

可是时局的发展，真不是孙立人能够预料的。蒋介石竟悍然挑起内战，孙立人的新一军，随后坐船直奔秦皇岛，开始深陷东北内战的泥潭当中。

1．东北，内战毁掉新一军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指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为非正义一方，以中国、美国、英国、（前）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为正义的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这场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的战争，最终在1945年结束了，正义的一方终于获得胜利，这时候的孙立人的新一军该何去何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开始，大致经过了德意日进攻、相持、防守和溃败，而同盟国防御、转折、进攻和胜利这几个阶段。1945年的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日军在太平洋占据的海外诸岛，悉数都已经被美军占领，美国的B-29超级空中堡垒，也开始针对日本的城市、军工基础设施和码头进行了正义的轰炸。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但让美国深深忌惮的还是盟军登陆日本的地面作战，日军与美军曾经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兹拉格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等太平洋海域展开了多次交战，虽然美军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日军也给美军以极大的杀伤。根据资料记载，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死亡12.5万人。

孙立人在缅战期间，曾经以迂回穿插等战法，用较小的牺牲，获取了歼敌之数较大的胜利，故此，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对孙立人独创的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过索尔登中将，向孙立人发出了邀请函，邀请孙立人参观欧洲战场。艾森豪威尔想通过参观，让孙立人获知美军打击德国的战略战术、兵员配置、最新的武器装备使用等等的情况，这不仅对孙立人在国内抗日的战场上打仗有一定的学习和借鉴作用，而且将来美国一旦实施对日本的本土作战，艾森豪威尔将会邀请中国出兵，而他心目中领兵赴日作战的指挥官，自然首推孙立人。

很快，由美国陆军部批准，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发出的邀请函被送到了缅甸，

孙立人接到了邀请函，他将前线的战事安排好之后，就乘坐飞机直飞当时的陪都重庆。

GENERAL SUN LI JEN'S TOUR OVER EUROPEAN THEATRE



孫立人將軍由緬北飛渝轉赴歐洲。圖為孫將軍赴歐時在重慶九龍坡機場留影。
General Sun returning from nothern Burma to report on his contemplated tour in Europe, seen at Kiulungpo Air Fields, Chungking.

孙立人由缅北飞重庆转赴欧洲。图为孙立人赴欧洲时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的留影。

孙立人见到蒋介石，首先汇报缅甸前线的战况，接下来就提出了到欧洲战场上观摩和学习的请求，蒋介石闻言非常不悦，孙立人并非黄埔毕业，更非他的嫡系，他在缅甸战场上取得的战绩，已经让很多“黄埔门生”都显得暗淡无光，孙立人虽然还未达到功高震主的地步，但他和美国人“异常友好”的关系，也让蒋介石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蒋介石虽然一脸愠色，不想让孙立人去欧洲战场观摩学习，但他不能不给到重庆开会的索尔登中将的面子，在索尔登的游说下，蒋介石勉强同意了孙立人的欧洲之行。

但蒋介石为了拉拢孙立人，他得知张晶英现住尼姑庵，便送给了孙立人一大笔钱，让他买一座宅子，并将夫人接回来，孙立人拒绝了这笔钱，他给出的理由是：夫人笃信佛教，如果买宅并将其接回来，反而不便。

孙立人乘飞机回到缅甸，将新一军军长的职务交给副军长贾幼慧代理，他将军中的事物安排好之后，便领着英文秘书衣复得上校，两个人由印度的加尔各答登上美国的飞机，一路辗转，经新德里、开罗、那不勒斯和马赛，最后飞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

孙立人和衣复得来到巴黎时，艾森豪威尔（当时正在德国办理受降事宜，暂时抽不出身来陪孙立人）还派出了一辆豪华礼车，专为孙立人提供贵宾服务。此车是一辆顶级装备的房车，车身上不仅悬挂着用金属镶嵌的英国勋爵的铭牌，还有美军元帅的标志，这辆贵宾车的服务对象除了英国的蒙哥马利，就是法国的戴高乐将军。

艾森豪威尔是按照对待一个国家最高军事统帅的标准接待的孙立人。由此可见，他对孙立人这位名传大洋彼岸的中国将军的格外看重。艾森豪威尔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一是出于对孙立人的敬意，二是向蒋介石传达了一个信息，希望重庆政府

应对孙立人有足够的重视，并委以相应的高级职务。

孙立人一路乘车转机，最后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位于德国东部的奥得河畔，1945年5月8日24时，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仪式，曾经在柏林正式举行，昔日不可一世的德国，如今已经沦为战败国，德国的全境已经被盟军占领，正所谓好战者必亡，正义终归战胜了邪恶。

孙立人来到法兰克福，他发现旷日持久的战争，给这座世界名城，带来了残垣断壁、市容萧索，被战火殃及的很多市民都生活艰难、无家可归……当时孙立人来到下榻的宾馆，看到过这样一幕，使他深有感触——一个衣着得体，看样子受过相当教育的德国人，正捡起地上的烟头，往嘴里送。

那个捡烟头的德国人，迎着孙立人诧异的目光，不由得一脸苦笑。

希特勒穷兵黩武，不顾国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不仅使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受到了伤害，也使德国人民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战争绝对是一只凶恶的怪兽，一旦将其放出囚笼，其后果异常凶险，绝非人力可以控制。

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设在法兰克福一家化学公司，孙立人在盟军司令部所在地，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艾帅，两个人虽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外界所能得到的资料匮乏，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又涉及很多的隐私，故此，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那些想起来，都觉得一定非常精彩的谈话，也就让人无穷知晓了。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战局，以及两个人特殊的身份，他们的谈话应该包含以下的一些话题：1．双方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对战后军事构建的问题。2．盟军如何登陆日本本土作战，彻底打垮日军的问题。3．孙立人在缅甸发明的穿插迂回战术，如何在实战中应用的问题。当然除了这些问题，还会有一些更为敏感的话题，可是随着双方当事人的先后去世，这些谈话内容，也就更不得被外人知道了。



孙立人与巴顿的合影

孙立人和艾森豪威尔会谈后，便开始正式参观欧战战场，以及德国Ｖ1和Ｖ2导弹的生产厂，德喷气式战斗机的生产厂，他还会见了美军辛普森中将、参谋长穆尔少将和巴顿将军等高层，并检阅了法国第五装甲师、第四山地师等先进的部队。孙立人接着离开了法德，乘飞机直奔美英参观访问，在美英他参观了英国参谋大学、英国皇家军事学院，还在美国参观了多家军事学校，以及后勤补给中心等地。

孙立人此次欧洲之行，不仅开阔了视野，增进了与盟军高级军官的友谊，更是学得了不少有益的军事理念，还有盟军军队先进的建军方法等。

孙立人欧洲考察之行结束后，即向艾森豪威尔辞行，在7月中旬，乘坐飞机，一路辗转飞回了缅甸。这时候的新一军，已经分别乘坐飞机、汽车或者徒步从缅甸归国了。

新一军归国后，开始向广西集结，并正式编入张发奎部的第二方面军。孙立人本想着凭借新一军的实力，在国内的抗日战场上，给日寇以迎头痛击，可是他率领新一军开赴雷州湾，准备歼灭那里的日军，接应美军陆战队登陆的时候，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日本政府接受了波斯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新一军军营中欢呼声立刻响成了一片，孙立人从组建税警团，到淞沪会战，再到赴缅抗战，几番喋血厮杀，几番战火洗礼，几番生死离别，苦苦等待的就是——抗日胜利的这一天。

新一军的军营中没有鞭炮，更没有庆祝胜利的礼花，但这里有可以让官兵们表

达胜利心情的子弹、曳光弹和信号弹，孙立人下达了庆祝的命令后，官兵们在统一的指挥下，开始用冲锋枪“哒哒哒”地对空扫射，并用曳光弹和信号弹，交叉射击，在空中屡屡绽放出代表胜利的V字。古语有云：歌者不足舞之，舞之不足蹈之，但不管是歌声还是舞蹈，都无法表达新一军官兵此刻愉悦万分的心情了。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一军也奉命停止对雷州的攻击。他们接下来的新任务是——转路到广州受降。

根据中国驻印军特务连连长的葛琪回忆，新一军进驻广州，受到了广州市民极其热烈的欢迎，葛琪这样写道：

根据我们到达南宁后，公路尚未修复，改乘船东下赴广州，接受日军投降，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大街小巷到处旗海，街道两旁挤满了市民，拍手欢呼，欢迎我们的来临。那时，我们都是青年，穿着黄呢子衣、黑皮鞋，全副美式装备，是广州市民从未见过的。我们所受到的如此热烈的欢迎，是我一生第三件忘不了的事情。

回忆当年回国后，所经之敌，如昆明、贵阳、南宁、广州……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是他们爱国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女学生。主动陪伴看电影、跳舞、上餐馆，争相结交。我们开着小吉普，手里又都有一些印币（相当于港币）。出手阔绰，很多同事都交上了女朋友，快速结婚了。当时，语言并未造成阻隔，每天都有好几对结婚的。可怜的是，他们去到台湾后，双双对对都被打成“匪谍”，累及妻女，锒铛入狱。那些“胜利夫人”也遭到刑囚。

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在9月6日来到了广州，侵占广州的日军是第23师团，这支日军主力师团在中国的战场上横行多年，骄横跋扈，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将前来受降的队伍瞧在眼里，但随后，他们也被新一军整齐的步伐，雄壮的军威震撼了。

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后，随后发布受降令，命侵占广州的日军第23师团，于9月16日之前，放下武器，对新一军投降，并离开广州，到珠江的男营集中管理。广州城被日军侵占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日军投降，新一军进驻广州的期间，广州城虽有一些杂牌部队，以及一些流氓地痞，他们趁机打砸商铺，掠夺日本

仓库，但随着新一军接收广州后，这批人员很快便被镇压和打掉了，广州城的治安也就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侵占广州的日军第23师团全部放下武器，并在广州中山堂，举行了受降仪式，广州则由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孙立人代表新一军在场观礼。

后来，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他把一口六百年前的日本皇家指挥宝刀，亲自送给了孙立人，冈村宁次表达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承认不敌蒋介石，或者输在英美国家的手下，他只承认败于孙立人将军阁下，故此，他才将六百年前的宝刀亲自送给孙立人。

这把很有纪念意义的宝刀，后来跟随孙立人来到台湾地区，并被放在他书房内，一尊武士头盔的一双鹿角之上，可是郭廷亮案之后，这把宝刀便被当局搜走，至今也未见归还！

受降仪式结束后，孙立人便开始着手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将沙本租借地的日本人驱离，收回了这块被殖民的土地。第二件事是——修建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

这座公墓的墓址设在广州白云山马头岗，而修建这座公墓的工人则是600名日军的战俘，孙立人在修建公墓之前，特意对这些战俘进行了训话，说："你们让我们流血，我要罚你们流汗！"

这些日军俘虏，当年在战场上，曾经大肆屠杀中国人，可是他们被新一军打服了之后，一个个老老实实，在修建公墓的时候，抬土板砖，垒石挖沟，任劳任怨。

修建这座公墓的费用绝对是一笔巨款，但孙立人并没有挪用政府的公费，孙立人动员新一军5万将士们，大家共同捐出了一个月的军饷，用以购买马头岗10多公顷的一片土地。广州市的一众贤达，听说孙立人要修建新一军牺牲将士公墓，他们便主动捐献了约合35.5公顷的建设用地。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在广州建立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公墓纪念碑上的雄鹰标志是新一军军徽。

这座公墓是1945年11月5日开始兴建，直到1946年9月6日落成，共用约11个月的时间，在公墓的大门处，立有一块青色的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上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铜鹰。

这只铜鹰重达一吨半，是用废弃的炮弹壳融化铸造而成的。这座铜鹰不仅是新一军的标志，更是象征着新一军冲锋陷阵、抗日争先的不屈精神。在纪念碑的四周，还修建了四根大石柱，这四根大石柱则代表着新一军义勇忠诚的精神。

孙立人还为安葬在此的4543名新一军烈士题写了一副挽联：立马望南方，故垒迷离，每怀野火残烽，战血长随伊水碧；提师归故国，疮痍满目，忍看孤儿寡妇，忧思独共白云深。

新一军纪念碑的碑文上，孙立人这样写道：

……溯缅北为沼岭森林之区，洪荒未辟，蟒兽潜滋，敌酋以精练之众扼险恶之道，意谓我劳师长袭远，胜算难操。然诸将士茹苦含辛，执锐攻坚，二年以来，步行转战15000余里，历大小700余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卒竟全功，其间叠克重镇，规复土地六万平方公里，毙敌官兵74000人……

孙立人还亲笔撰写了墓志铭：

蕞尔岛夷，入寇邻邦；我军衔命，长征遐荒。同心一德，挞伐用张；备历艰险，收复缅疆。浩然正气，声威远扬；大哉成仁，万古流芳。黄花岗畔，白云山阳；义勇忠诚，八极永张。

在缅战中因为抗日牺牲的新一军官兵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墓地以及纪念碑，他

们的英灵永在，真的能够安息了。在公墓纪念塔东侧，孙立人特意也为自己预留了一块长3米宽1.5米的墓地。他曾留下话来：死后不进国家忠烈祠，要与印缅抗日战亡将士葬在一起。

孙立人在完成了广州受降的任务后，1945于11月9日飞临重庆，觐见蒋介石，并递上了一份欧洲考察的报告。

孙立人在这份报告中，主要谈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1．如何遏制来自（前）苏联势力的扩张；2．如何发展与美国等欧洲强国的关系等。

蒋介石很显然，对孙立人的这份报告并不感兴趣，他明知故问：“谁叫你去的？”

孙立人答道：“报告委员长，能够一看他们的参谋本部，幕后策划以及庙堂胜算的究竟，这是我们外交武官得不到的资料，机会难得，故大胆应允美英的邀请，同时有电向钧座请示！”

蒋介石并没有抓到孙立人的把柄，不等于这件事就轻轻地过去，孙立人在第一次缅战的后期，并没有向杜聿明一样奉召归国，而是奉史迪威之命去了印度，蒋介石早就对孙立人心生芥蒂，这样对自己“不忠”之将，能力越大，将来所产生的危害也就越大。

在蒋介石的思想中，赴欧参观，艾森豪威尔最应该邀请的是自己，其次才是何应钦、陈诚等重庆政府军政高官，孙立人只是一个军长，在重庆的军界，比孙立人资格老的军长一抓一大把，孙立人已经抢了很多人的风头，在蒋介石的眼里，孙立人已经是骄功和僭越了。

但不管怎么说，孙立人去欧洲考察前，蒋介石没有明令反对，而且还口头答应，故此，这次他暂时拿孙立人毫无办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蒋介石要想算计谁，此人的下场一般会很悲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保证世界之长久和平稳定，经中、美、英和（前）苏联代表共同洽谈商议，终于制定了联合国的宪章，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条的规定，组建军事参谋团，参谋团由安理会常任五位理事国的参谋总长或代表组成。

1946年1月，孙立人带着英文秘书衣复得上校，去伦敦参加联合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战败国占领军的分配名额，对受害国的赔偿，以及如何惩罚战犯等的问题。

此次中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是商震上将，孙立人参加这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时候发现，英国开会的代表团成员，则有很多孙立人在缅甸并肩作战的战友，如盟军军官亚历山大、史莱姆等人，而美国参会的葛柔将军、辛普森中将等，也大多是孙立人在欧洲战场上参观时候认识的新朋友。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月后，联合国的会址要迁往美国，孙立人便同代表团一起，飞赴美国的纽约继续去开联合国参谋长联席会。

1946年1月30日，驻扎广州的新一军接到了一份密令，这份密令的签发人是何应钦，何应钦命令新一军的副军长贾幼慧，新一军需在2月10日前集结九龙，集结完毕后，预订在2月15日之前，搭乘美国的登陆舰，前往秦皇岛。

新一军的将领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但新一军低级的军官和士兵并不明内情，当时他们登船的一刻，都是极度兴奋，他们还天真地以为，此次要坐船去进攻日本的本土，那个“富士山头扬红旗、樱花树下醉胡妾，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门楣生辉笑白发，闾里欢腾骄红颜，国史明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的一刻，终将快要实现了。

经过几日的航行，当美国的登陆舰在秦皇岛靠岸，当很多新一军的官兵，得知此行的目的地不是日本，并不是要他们去东京去报国仇家恨，而是要去东北打内战的时候，一时间，很多官兵都哭出了声！……

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在东北大地，兵戎相见，战火已经席卷了东北的全境。

东北今日之战争形式的形成，需要从1945年2月早春的时候谈起，（前）苏联

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有一个雅尔塔地区，当时的俄、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地区秘密召开了一个会议。

罗斯福和丘吉尔经过磋商，最后同意了斯大林“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中丢失的对华权利”的要求。俄、美、英三国便签署了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1945年8月6日，美国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前苏联远东红军为了使日军尽快投降，他们在8月9日零时，兵分东、北、西3路，突破日军和伪满3000公里防线进入东北。开始进攻占据中国东北的日军。



东北战场上的孙立人

（前）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出兵东北的胜利，如何接管前苏联军队控制下的东北地区，却成了摆在蒋介石面前的一道难题。

蒋介石为了破局，他任命蒋经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二人从重庆坐飞机直飞长春，可是他们刚走下飞

机，（前）苏联的军人就对这两位接收大员来了一个“下马威”。荷枪实弹的前苏联士兵，先将蒋经国等人“请”上了军车，然后直接将他们送到了一个伪满大臣的家中。

（前）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三省的好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的中共领导随后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杨家岭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改变南下意图，并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奔赴东北；中央同时决定，由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同志立即乘飞机到东北组建东北局，并急调去山东途中的林彪率领部队转赴东北，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并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后不久，便正式改名东北民主联军，这支人民的军队，随后便开始在东北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蒋介石急于得到东北，悍然命令国民党军队对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进攻。

1946年2月下旬，新一军最先乘坐美国登陆舰来到秦皇岛的是30师的148团，虽然他们出发地广州已经是春风送暖了，但在秦皇岛却依然是白雪皑皑、寒风料峭。

30师的官兵，只想去日本杀敌，故此，他们听说要打内战，有的战士不由得哭出了声。可是军令如山，他们下船后不久，就接到了东北司令长官的命令，让他们进军锦州，驱散占据锦州的（前）苏联军队，然后直奔沈阳，解救被困在沈阳的接收大员。

（前）苏联红军也是为了抗日而来，故此，是友非敌，不能滥用武力，新一军沿着铁路一路急行，一路驱散前苏联红军。3月24日，30师占领铁岭，3月30日，50师攻占了开原。

3月31日，新一军开始兵分三路，进攻沈阳，几天之后，沈阳城便被新一军占领，城内的（前）苏联红军，基本已经被驱除干净了。

东北民主联军目前已经解放了四平，四平距离沈阳196.2公里的路程。新一军很快就接到了东北长官部的命令，新一军为左接防兵团，沿着中长铁路，向四平方

向推进。

而新六军为右路接防兵团，他的进发方向是辽阳，而52军为中路接防兵团，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抚顺。说起四平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弘历巡幸吉林途经四平（老四平）时，见此处地势平坦，四望无垠，不由得大声感慨，因此以“四平”名之。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四平后，为扩大在东北的战果，开始沿着中长铁路，直奔沈阳的方向南下而来。4月8日，新一军的50师在藉家岭和红山堡地区相遇，新一军和东北民主联军正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4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阵地，回守四平城区，四平城外，全为一马平川的稻田，东北民主联军为保护胜利的果实，借助四平城逐渐上升的地形，修建了依此梯次排列的阵地，新一军虽然炮火猛烈，但面对隐蔽在堡垒和工事中东北民主联军，几番攻击过后，除了损兵折将，并无任何建树。



1946年双十节，孙立人（右三）与部署在长春励志社会餐。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面对四平攻坚已成胶着的态势，心里焦急，他知道东北的保安副司令郑洞国曾经担任过新一军的军长，便将郑洞国派到前线督战，可是郑洞国却没有完成攻下四平的艰巨任务。

当时，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正在北京养病，他得到四平之战，毫无进展的消息后，便向蒋介石进言，不如调孙立人回国，指挥四平之战，相信定能有所斩获。

杜聿明在第一次缅战之时，便因孙立人公开抗命，对其齐心生芥蒂，杜聿明这次通过蒋介石之手，调孙立人来东北攻取四平，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而蒋介石对孙立人在缅甸取得的军功，早已经深为忌惮，他本有心裁撤“天下第一军”的军长，可是一直苦无机会，要知道，孙立人的威望不仅在新一军将士的心中根深蒂固，而且孙立人背后还有美国人的支持，杜聿明调孙立人从美国回国，到东北履职，如果攻下四平，蒋介石也是乐观其成，一旦攻不下四平，他也就有了裁撤孙立人的理由。

故此，杜聿明提出调孙立人的要求后，蒋介石不仅立刻响应，而且给孙立人连发了四份催促的电报。

孙立人当时在联合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开完，但为了东北的战况，他只有提前回国。孙立人在5月13日飞抵南京，他简单地向蒋介石汇报完参加联席会议的情况后，便乘坐“美龄”号专机，直飞沈阳。

孙立人在沈阳见到了养病归来的杜聿明后，杜聿明便向孙立人详细地介绍了四平的战况，东北民主联军共有七个纵队，他们手中的武器，大都来自在缴械投降的日军，战斗力非常顽强，而且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孙立人需要打一场攻坚战，他的穿插迂回等等的战术，在四平几乎派不上用场。

这场攻坚战开始后，新一军依靠猛烈的炮火，曾经一度将东北民主联军的工事

夷为平地，可是东北民主联军拼刺刀的近战能力，还是让新一军无法踏进四平半步。

战争最终的结局是：由于本溪失守，南满之新6军，第52军第195师，第71军第88师被东北保安司令部调往四平……孙立人指挥的新一军居中，陈明仁的71军在左，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右，一共十个师的兵力，向四平压了过来，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不仅在兵力上处于劣势，而且还有其他几个不利的因素：

1．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时间不久，尚未打过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部队相互配合，攻防衔接做得不够好。

2．虽然东北民主联军的士气高涨，但是新一军等军队的炮火异常猛烈，打仗的胜负虽然不能“唯武器论”但武器有时候也会在战争中起很大的作用。

3．东北民主联军为应对三面夹击的不利形势，战线拉长五十多公里，以至于兵力稀疏，火力单薄，逐渐趋于劣势。

1946年5月18日下午，东北民主联军在兵力、火力都不占优，部队伤亡较大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了四平阵地，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结束，当时，孙立人开着坦克车，第一个冲进了四平市，可是得到的却只是一座空城。

2．练兵，尽为他人作嫁衣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其一》

孙立人和杜聿明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在东北的战场上，新一军绝对是被杜聿明当作“炮灰”的角色在使用，随着孙杜两个人的矛盾升级，孙立人被蒋介石削掉了新一军军长的兵权，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的虚职，随后，孙立人被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新一军随后在东北的战场上“烟消云散”，1947年秋，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台，并开始在凤山训练新军。



孫立人將軍檢查鳳山受訓員兵之 香港脚情形。

孙立人检查凤山训练营官兵的“香港脚”情形

长春为吉林省省会，（前）苏联红军撤走后，这座城市就被我东北民主联军接管，长春曾是伪满时期的政治中心，位于东北松辽平原腹地，西南和四平市相连，

东南与吉林市相依，东北同黑龙江省接壤，是东北地区天然地理中心，东北亚几何中心，东北亚十字经济走廊核心。故此，极具战略重镇的地位。

新一军接到命令，随后开始进攻长春。面对敌众我寡的态势，中共中央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宣布：我军于22日24时全部自动撤出长春。我们采取此一步骤，并不是我们没有防卫长春的力量，而是由于我们希望以自动撤出长春的让步，看国民党在东北是否有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诚意……

新一军刚刚进驻长春，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立刻命令第六军军长廖耀湘为长春警备司令，并奖励占领长春的第六军东北流通券100万元，新一军“攻占”长春的功绩，很显然，已经被一笔抹杀了。

孙立人和杜聿明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睦的状态，在新一军一路攻四平，占长春的行动中，一点点地显露了出来。

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论及孙杜两个人的关系，这样昭示道：

> 孙立人将军是一位治军严整、才华横溢的优秀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以卓越战功闻名中外。新一军开入东北不久，他应英皇之邀，前往伦敦授勋，以后又去美国游历了一番。蒋先生对此事曾大为不快，但考虑到同美国人的关系，一时对他也无可奈何。在四平会战后期，孙氏方回到部队，很想借攻占东北名城长春使新一军扬威东北，却未想到杜将军把攻击长春的任务划归了新六军，因而心中十分不满。孙将军一向认为新六军廖耀湘部，是杜聿明将军的基本部队，怀疑杜有偏心。这次事情未能如愿，便不大高兴，不愿积极执行杜将军的命令……
>
> 孙立人将军赶来见我们。他仍以部队作战过久，必须整补为由，当面向杜提出宽限追击期限。杜将军压住火气，向他详细分析了北满战场情势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希望他能遵令率部向长春追击前进，并提醒孙说，50师孤军深入，倘在长春附近遇敌反扑，必遭覆没，应当迅速前往接应。我亦从旁多方规劝。无奈孙氏坚持不肯前进。这时时间已到正午，杜将军见反复劝导均无结果，不禁勃然变色，站起身厉声对孙说：“现在廖耀湘、陈明仁两部进展极为顺利，并未遇到敌人有力抵抗。新1军应迅速照令前进，否则长春攻不下，部队遭受损失，你是要负责任的！”孙氏见势成僵局，才怏怏回部，但始终未按杜的命

令行事，只是担心北进的50师受梨树方面解放军的袭击，曾派遣一部前往扫荡。当晚，我们接到新1军的报告，说“梨树之敌经派队扫荡后，已向辽河北岸撤退，正面50师到达辽河南岸附近”。素以办事强硬果断著称的杜将军，此时也只有长叹一声，别无他计了。

郑洞国私下里向杜聿明抱怨：新一军孙立人回来后，反不由他不回来好指挥！

四平和长春被新一军、新六军等军队占领，这绝对不是胜利的开始，而是蒋政府在东北走向失败的起点。由于我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放弃了东北的一些中心城市，国民党军队防守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我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农民闹革命等号召，在东北的农村，开辟了众多的根据地，并同时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因为孙立人和杜聿明的矛盾不断，新一军的部队竟被杜聿明一直当“炮灰”在使用，最后，孙立人和杜聿明终于闹翻了，蒋介石经过权衡，觉得特立独行的孙立人真的无法取代杜聿明，他巧运政治手腕，来了一个明升暗降，首先剥夺了孙立人新一军的军权，接着让孙立人“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



1948年夏初，孙立人“调升”东北保安副长官，将新一军军长印信交与新任军长潘裕昆。

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纯属是一个傀儡，新一军的指挥权，最后落到了因坚守德惠成名，黄埔出身的第50师师长潘裕昆的身上，新一军将士因为气不顺，心就不齐，仗越打越糟糕，昔日的“天下第一军”在东北战场上，竟变成了“吃菜要吃白菜心，要打就打新一军”的废军弃师。

1946年8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孙立人调到南京后，赋闲了好一阵子都没事可做，他每天不是踱步，就是逛玄武湖，就连他的随从参谋逛湖都逛得絮烦了。

孙立人最牵挂的就是他的新一军，可是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去了东北之后，他将新一军的建制拆散，组成了新一军、新七军，而新一军的番号被新50师使用，而新38师则被改为新七军，军长为李鸿，新七军奉命驻守长春，1948年10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之战中，李鸿率领部下放下了武器。

新一军在缅甸战场抗日的时候，能够越战越勇，最后打出了“天下第一军”的金字招牌，可为什么在东北战场上人越打越少，仗越打越孬？

主要原因只有一个——人心所向。日军侵略缅甸，以断我滇缅公路以及后来的中印公路、灭亡中华为目的，入缅作战的健儿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们不怕流血、奋勇杀敌，可是在东北战场上，大家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甚至新一军的士兵，一边打仗，一边在心里暗问：“我们赶走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仗，这个仗究竟在为谁打？”



新编第**38**师军容（此为孙立人将师长交卸给继任师长李鸿时所摄）

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顺应形势，他们率先在东北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并得到广大农民的最坚定的支持，同时也获得了人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东北的人民，成了东北民主联军最坚定的后盾，东北的子弟，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最广泛的兵源，此消彼长，最后新一军失败，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新一军之败的次要原因，败在高层不和、互相掣肘，特别是孙立人被无故调离了新一军后，新一军失去灵魂，战斗力也随之流失殆尽。

孙立人来到南京赋闲了一阵后，蒋介石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是让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另一个是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权衡利弊，觉得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私家花园，属于铁板一块，他便选择了后者。

孙立人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并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南京政府陈诚、何应钦等高官们，为了庆祝孙立人荣升司令，便轮番对其宴请，当

时，任总务的李秾就劝说孙立人，应当回请一下，目的是融洽关系、广泛结交，为将来的仕途铺路。

孙立人这样回答：请他们干什么，他们有的是好东西吃，我办训练的钱还不够呢！

孙立人任陆军训练部司令也并非完全傀儡，至少他还有选择新兵训练基地的决定权，因为当时国内的解放战争风起云涌，不少解放区已经逐渐连成了片，如果选择在国内的大城市练兵，训练基地不仅要受到战争的影响，而且新兵训练完毕，将其用交通工具送往前线，因为道路需通过解放区等问题，也让国内练兵成为了鸡肋。孙立人几经选址，后来相中了台湾地区的凤山，这里毗邻高雄港，日军撤离时候，还遗留下了不少的房子，凤山远离国内政治斗争的"暴风眼"，可以让孙立人安心练兵，新兵一旦训练完毕，可以在高雄港就近上船，直接输送到东北、华北等战场，可以说非常的便利。

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答应了孙立人的请求。孙立人来到凤山，开始组建自己的练兵班底，贾幼慧原是新一军副军长，他被孙立人请调过来，成了陆军训练部副司令，被杜聿明去职的唐守治，就成了陆军训练部的参谋长。

孙立人联络郭廷亮等几十名税警总团老干部，跟随他到台湾练兵，他还并挑选了400名教导总队毕业的学生作为示范教官。

既然在凤山练兵，就得有兵可练，孙立人训练的新兵主要是从台湾征召的青年学生，从大陆逃往台湾的零散军队，以及在上海、广州、北平和武汉招募到的7000多名适龄青年。

孙立人为了吸引台湾地区的青年学生，自愿报名参军训练，他还将凤山练兵的过程拍成了纪录片，然后放到戏院里，同免费的电影一起播放，当时，很多年轻的学生，走进影院，他们在观看免费电影的时候，就顺便看到了凤山练兵的纪录片，凤山训练营整齐的军容，科学的练兵方法，确实对当时的青年人非常有吸引力。

孙立人凤山练兵，纪律严格，根据受训的老兵回忆，孙立人在凤山的办公室门

口，挂着一面镜子，官兵有事见他，必须先整理衣冠，然后喊报告才能进入办公室。孙立人养有一头高大的军犬，平时蜷伏于地，孙立人外出之时，这条军犬就寸步不离地随行，俨然警卫员一般。

蒋介石曾经对孙立人有一句评语：你打仗不成，练兵还成。很显然，这句话是蒋介石故意贬低孙立人，为剥夺他的兵权找借口，孙立人在凤山短短的几年间，共训练军中干部士兵多达466342人，凤山练兵，这也是他继海州、都匀、蓝姆迦之后的第四次大练兵。

但孙立人在凤山练兵，而国内的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着推翻压在人民头顶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解放战争。

这场解放战争，从1945年8月开始到1950年6月结束，一共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

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是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阶段。从1947年6月开始，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是战略决胜阶段，我人民解放军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战场上的主力，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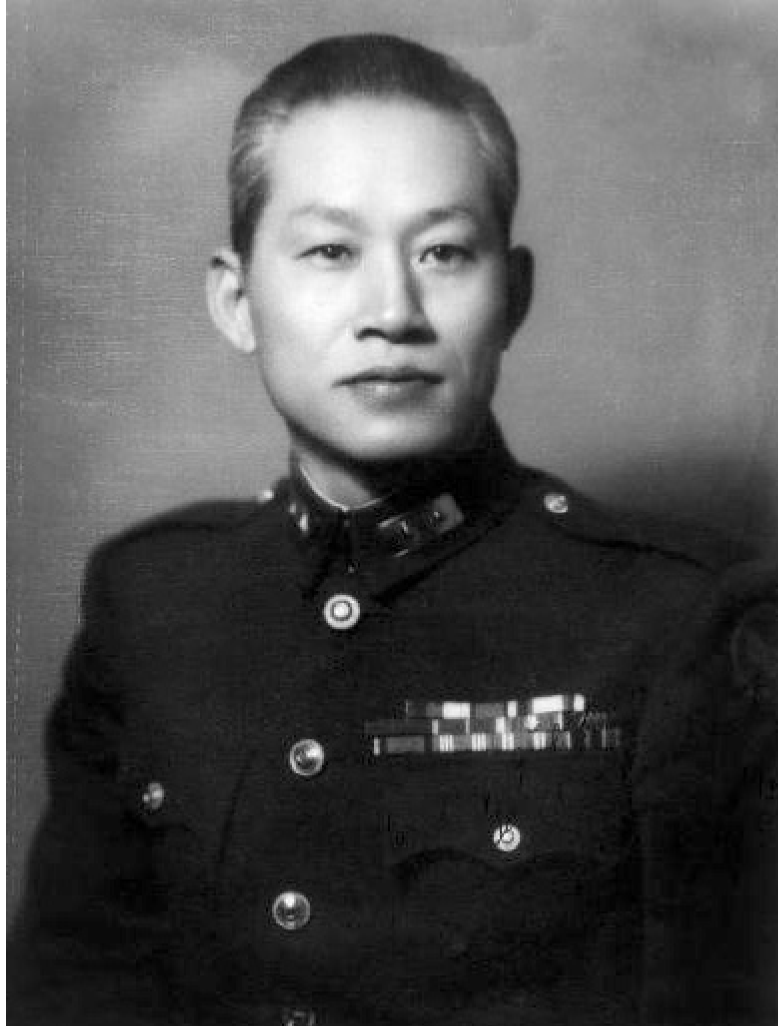
这场旷日持久的解放战争从一开始，蒋介石共有军队860万人，而我人民解放军连地方部队在内只有区区的120万人，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1948年6月，蒋介石手下的军队降为565万，而到了1949年6月，则人数降为了149万人。

而我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人数也越来越多，1948年6月时，部队的人数增加到280万人，而到了1949年6月，人数猛增至400万人。



1948年德惠之役后，孙立人为官兵颁奖。

1949年4月21日，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强兵百万，横渡长江，南京解放，蒋介石在1949年4月25日，离开家乡溪口，让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催泪对宫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1946年的孙立人

当时，国内有很多人士预测，蒋军一路溃败，将会利用四川崇山峻岭的天险，来保留一息实力，即使最后退出大陆，也会以海南岛作为最后的退路。

不管四川还是海南，这些退路都曾经是蒋介石的“救命稻草”，可是目前，他却看中了另外一条退路，那就是去台湾（地区）。

蒋介石选择去台，据说是地质学家张其昀跟他建议的，张其昀这样认为：

1．台湾（地区）与大陆之间有天堑台湾海峡相隔。

2．台湾（地区）物产丰富，可以为蒋介石养兵提供充足的钱粮。

3．有效法先人郑成功，占据台湾（地区），复大明国之先例。

4．台湾（地区）容易建立政权，再退一步说讲，假如该地区失守，蒋介石也容易逃往海外。

5．台湾（地区）距离美国驻琉球群岛和关岛的军事基地更近一些，如果有美国肯为蒋介石撑腰，蒋氏政权就会高枕无忧了。

还有一点，张其昀没有看出来，孙立人正在凤山练兵，有人、有兵、有枪杆子，才会有台湾（地区）的政权。

1948年12月28日的时候，蒋介石为退守台湾（地区），就曾经布下了第一颗“棋子”，即电令陈诚去台岛，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于1949年1月5日到台湾地区就职，并开始主持台湾（地区）的一切政务。

当时，蒋介石坐在美龄号飞机中，依依不舍地绕着上海的天空兜圈子，虽然他听不到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枪炮声，但隔着飞机的舷窗，却能看到地面上升起的一团团的硝烟，虽然那时正是夏日，但他还是觉得浑身上下，充满着凉意。蒋介石慌忙摆手，命令飞机掉头，自马公飞冈山，然后转高雄寿山，蒋介石的座机在高雄降落。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的蒋介石，被“吓”得却不肯走下飞机，并一个劲地问：“这里安全吗？”

孙立人晚年亲口告诉史学家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有我在，不用怕！”蒋介石这才惊魂普定，在蒋经国的搀扶下，缓慢地走下了飞机。

蒋介石为了让台湾地区的政权继续下去，他开始着手做了四件事情：1．为稳定台湾地区政权，不惜发布戒严令；2．改组军队，重新设立军队政工制度；3．完成土地改革，努力做到“耕者有其田”；4．牢牢地抓住枪杆子，让台湾地区的军队都姓“蒋”。

蒋介石在蒋经国的帮助下，很顺利地完成了前三项任务，1949年8月，蒋介石

为了争取美援，他违心地任命孙立人为台湾（地区）防卫司令。

蒋介石在日记中，曾经写下了委任孙立人为防卫司令的疑虑："对任用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亦颇费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属辞修（即陈诚）信任之。"



陪同蒋介石视察防务

孙立人任台湾地区防卫司令后，他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经其训练的青年军，组成了二○一师，并被调往金门前线，并由师长郑果指挥。

1949年10月，随着金门战役打响后，二○一师在金门战役中，曾经让登陆作战的解放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孙立人练兵有术，他为稳定台蒋政府摇摇欲坠的政权，确实起到过一阵"柱石"的作用。

中国香港《世界晚报》曾刊出一篇《台湾的王牌——孙立人》，署名是皇甫光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孙立人治军有方，骁勇善战，可是知道孙立人秉性的人，都知道，孙立人傲慢清高，桀骜不驯，他在出任陆军总司令的时候，甚至每周的军事汇报，他都从未准时出现在会场，原因有一个，因为当时周至柔是国防部参谋总长，他来早了需要向周至柔敬礼，而来晚了因为有蒋介石在，敬礼就可以免了。

若论打仗，孙立人当属是台军的王牌，可是若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孙立人恐怕连杂牌都算不上。但蒋介石为了美援，为了保住最后这块"立命"之地，也只有借力于孙立人了！

可是孙立人的"直性而行，率性而为"，不仅得罪同僚，得罪高官，他甚至总是

在不经意间批了蒋介石的逆鳞。

孙立人在凤山练兵时，“国防部”和参谋部经常会派人来检查，有的高官在晚上要条子（妓女），接待人员就来找孙立人想办法，孙立人给出的回答是：爱上哪儿嫖就上哪儿嫖，我这里不搞这一套。

蒋介石有一次主持召开师级以上主管会议，他在会上，分别让各军种一级主管，将各自年度特支费（相当于招待费）使用情况汇报一下。

空海两位总司令都纷纷诉苦，连说自己亏空百万，联勤总司令黄镇球竟讲他亏空140万之巨。可是孙立人每个月5万元的特支费，大都用在了增加陆军士兵营养、改善伙食以及扶危济困之上，不仅没有亏空，反而盈余36810元。

孙立人的清廉，无疑是断了大家的财路，军中同僚，岂有对其不恨之理？

上海解放前，汤恩伯率领残兵败将溃守台湾地区，接待的任务就落到了孙立人的肩膀上，但是孙立人却不肯将训练营空出来，让给汤恩伯残部居住。

蒋介石责孙立人自私，孙立人讲道：“我自私？你才自私，谁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是您的嫡系部队，如果共X打过来，您能往哪里去？只能往太平洋里跳！”蒋介石听后脸色大变，不是侍卫长俞济时出来打圆场。当时的场面一定不可控制。

1949年2月12日，美国远东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对孙立人伸出了橄榄枝，他派其少将副官专程赴台，邀请孙立人飞往东京，共商“防卫台湾”大计。两个人见面，一番谈话后，麦克阿瑟发出了这样的暗示：“我们不能让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落到共产党的手里，所以有意请阁下负责巩固台湾，而由我们美国全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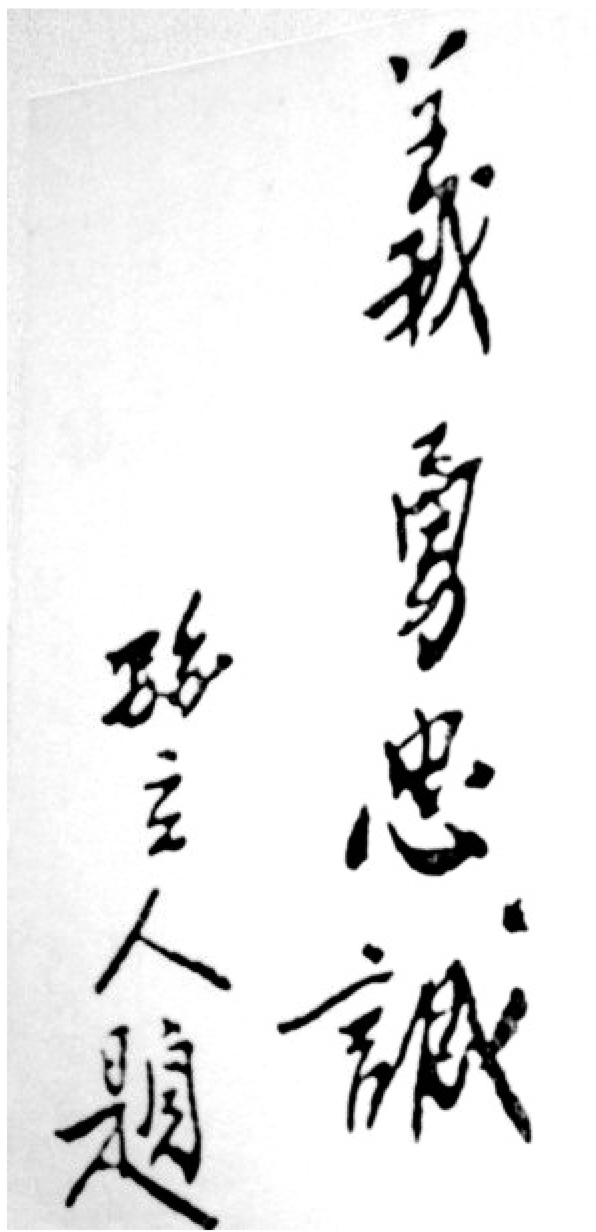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临走，还送给孙立人一个密码本，如果孙立人有什么情况，可以立刻给麦帅打密码电报进行联系。

但孙立人并没有响应麦克阿瑟的暗示，他做出了由下的表示：“我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不会领导‘反共’”，并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

孙立人建在广州的新一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上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铜

鹰。这只铜鹰不仅是新一军的标志，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这只铜鹰也代表着孙立人，在纪念碑的四周，还修建了四根大石柱，这四根大石柱则代表着——义勇忠诚的精神。

后来，孙立人被蒋介石囚禁，便有人说，就是“义勇忠诚”这四个字，限制了孙立人的飞翔，并让一代“军神”成了折翅鹰。



孙立人题字

孙立人绝对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他打仗和练兵的成绩优秀，但在政治斗争的圈子里，成绩却不及格。孙立人回到台北后，他将此行的经过向陈诚做了汇报，并将密码本上缴，还请陈诚向蒋介石转达。

孙立人的坦诚，不仅没有让蒋介石放心，换来的更是蒋介石的不安。蒋介石早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吴（国桢）、孙（立人）屡屡挟外（美国）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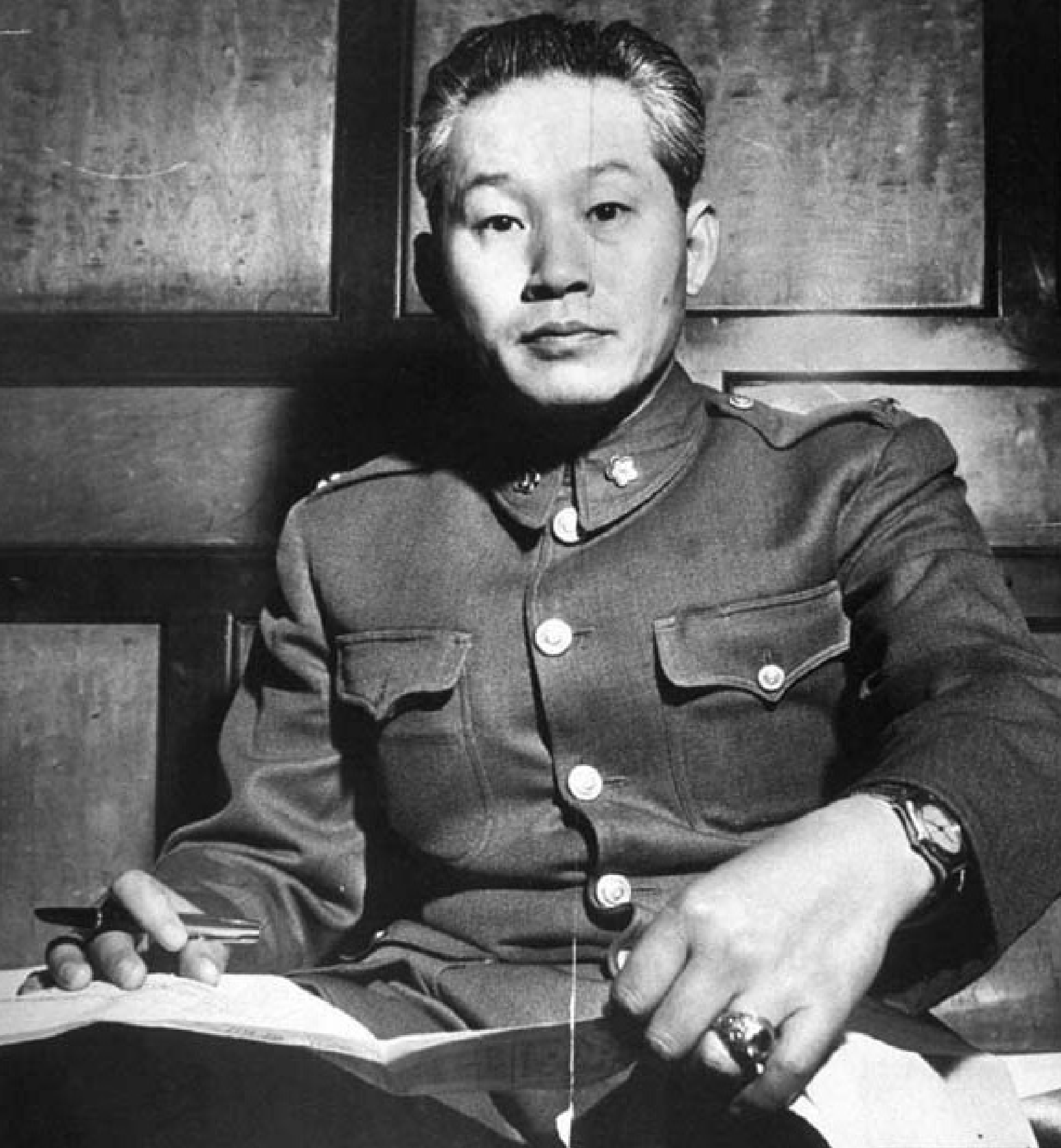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继任“总统”之后，台岛三军的司令，分别是：周至柔任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海军司令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而孙立人就成了“陆军总司令”。

1950年3月17日，蒋擢升孙为“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三天后又加台湾防卫总司令，可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孙立人的英文秘术黄美之和姐姐黄钰，便被冠以莫须有的“泄露军机”罪名逮捕，判刑十年。接着，孙立人的旧部李鸿、陈鸣人、彭克立等人也以“匪谍”罪被拘捕。



1952年1月，何应钦、白崇禧、孙立人、陈诚（自左至右）等在台北林口校阅军队。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美国的利益，对兵败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并不买账，他刻意扶持孙立人等人，盘算着有一天能够去蒋而代之。蒋介石虽然性格刚愎，但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1953年，杜鲁门卸任，同年，艾森豪威尔上台，随着美国对台的政策转变，孙立人在台湾地区的日子，就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担任台湾“陆军总司令”时期的孙立人。

第九章　整饬被囚，遭遇人生“滑铁卢”

凄恻近长沙，地僻秋将尽。长使英雄泪满襟，天意高难问——杨冠卿《卜算子·秋晚集杜句吊贾傅》

蒋介石溃守台湾地区后，当时的岛内弥漫着一股“必败”的论调，就在蒋家父子忧心忡忡，不知道如何“破局”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来，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台湾地区暂时“安全”了起来，蒋介石终于可以从容地干自己该干的事儿了。就在蒋介石暗中磨刀，准备向孙立人下手的时候，君子坦荡荡的孙立人，却没有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地向自己临近。



1949年孙立人在台湾

孙立人不善政治斗争，可是却偏偏处身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他重建陆军军事学校，建立兵役制度，整训大陆撤台部队，训练幼年兵，甘愿充当台蒋政权的“马前卒”，可是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在台湾地区的地位，并为以后蒋经国即位扫清障碍，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大网，终于劈头盖脸地向孙立人兜头罩了下来。

台湾地区的特务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捏造了郭廷亮“匪谍”案，并依此为罪名，于1955年8月20日，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X匪”等罪名，革除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孙立人接下来，在当局“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被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33年……

1．坦荡，问心无愧对天地

雷填填兮雨冥，猨啾啾兮狖夜鸣——屈原《九歌·山鬼》

孙立人来到台湾地区，他除了一心一意地在凤山练兵，他还做了很多对蒋家政权有益的事情，比如重建陆军军事学校，建立完善的兵役制度等，甚至最得罪人的整训大陆撤台部队的事儿他都做了，但孙立人却不知道，在他前进的路上，一个阴谋的陷阱早已经为其悄悄地挖好了！

从1947年11月开始，在凤山地区开始练兵，要知道，任何一个能够带兵打仗的将军都精于此道，但孙立人在高雄的凤山练兵，练兵的方法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孙立人认为，想要训练好士兵，首先要训练好军官，凤山干训总队对合格军官的培养，绝对是不遗余力的。要知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好的军官，便能带出一群好的士兵。



1952年1月，孙立人陪同蒋介石检阅台湾新兵实弹训练。

训练一个好的士兵，不仅要在体能、射击、格斗、操典上下功夫，更要在“义勇忠诚”上下功夫，最后，孙立人给受训的官兵，定出了六大戒条：戒赌、戒嫖、戒贪、戒虚伪、戒扰民、戒骄惰。

孙立人还结合自己数十年带兵的经验，写了一册《统御学》，这里面包括军队统御的原理原则，平时和作战时带兵的注意事项，古今名将的语录以及孙立人带兵打仗的有用经验等。

孙立人重建了陆军军事学校，他还做出了这样的规定，高中毕业后的优秀青年学子，即可考取这所陆军军事学校，经过四年的军事化学习后，授予学士学位，此举不仅可以为军队培养有学历的基层军官，而且还可以改变军队中军官的学历结构。

随后不久，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装甲兵、陆军参谋学校、伞兵工兵和通信兵

学校也逐一地建立了起来。

孙立人还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即：第一，实施储备预备役军官训练，学习一年后返乡退伍，战时可以迅速成为军队中的军官；第二，实施军士储训制度，训练军事业务熟练的有经验的军士，为战时做准备；第三，对适龄的青年进行训练，以备战时成为合格的士兵。

孙立人为台湾地区的军事建设尽职尽力，他所做的工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与权责。但蒋介石却对孙立人并不放心，有一次，蒋介石邀请孙立人在士林官邸共进午餐。酒席进行了一半，蒋介石突然对孙立人说："有人跟我讲，你野心很大。"

孙立人这样回答："我是一个军人，只知道带兵打仗，保国卫民，不懂政治，何来野心？"

有人说孙立人亲美，可是军方有很多"不亲美"的高官，他们一见到美国顾问团，无不点头哈腰，一副献媚的神态，而孙立人却能正颜凛色、不卑不亢，美国顾问团中军衔比他低的官员，见到孙立人无不老老实实、毕恭毕敬地给他行礼。

中国香港《七十年代》刊，曾经刊发过《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关于孙立人受到排挤一段，是这样写的：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孙立人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蒋中正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

当时台蒋政权的海军司令为桂永清，桂永清不仅是黄埔一期毕业，而且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更重要的是，他很得宋美龄的赏识；再看孙立人，他虽然没有政治野心，但恃才傲物，将不该得罪当权高官都得罪遍了，他平素的作风是认真干事，更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以"诚"与"拙"自许，反对以小聪明奉承上级，对人际关系则是两眼朝天，甚至周至柔和桂永清找孙立人结拜，都被孙立人直接拒绝，蒋经国过年给他拜年，都被他避而

不见。



孙立人与蒋经国

孙立人一向不买黄埔系的账。他有一句话这样说：管他什么黄埔绿埔，只要能打仗就是好埔。国民党的军队中，黄埔毕业的军官占据大多数，孙立人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引以为傲的是，他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校长，如果引申一下，看不起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不是就等于看不起校长蒋介石？

孙立人虽然没有这样说，但不等于蒋介石不会这样想。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台蒋政权开始了"蜜月期"，面对源源不断的美援，以及"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台岛地区的形势，变得不再岌岌可危，孙立人就由昔日的"香饽饽"，就变成了今日的"冰疙瘩"。

1953年7月27日，历时2年零9个月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面对志愿军的强大攻势，只得来到谈判桌前，乖乖地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孙立人会见尼克松夫妇。

随后，一场整饬孙立人的行动，便悄然展开了。首先，蒋介石将孙立人撤掉“陆军总司令”，将他调任至无实权之“总统”府参军长。

孙立人当时觉得非常苦闷，他就向参谋总长周至柔递上了一份辞呈，请其报请“总统”批示，但蒋介石见到辞呈后，不由大怒，不仅不同意孙立人辞职，反而这样说：嗣后一切高级将领不可自由请求解职，务共遵此旨，树立新范！



1954年宋子文由香港到台湾拜访孙立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解放军开始将战略的重心，从朝鲜半岛移到台湾问题上。

蒋介石从大陆溃守台湾地区之后，为了给将来“反攻大陆”做准备，他在福建外海金门、马祖诸岛，台州湾洋面的大陈诸岛，以及上海外的舟山群岛，都驻留有整师整团的军队。

周至柔的空军还利用金门、马祖和大陈岛等诸岛，作为空军基地，用飞机大肆骚扰大陆沿海地区。1953年5月起，解放军陆续攻占了由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小鹿山岛、鸡冠山岛、羊屿和积谷山岛等岛屿。

不久之后，一江山岛被解放，而由29个岛礁组成、距离台州市区不到30海里的大陈岛就失去了屏障，彻底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力之下。

台湾地区到大陈岛的距离，较大陆到大陈岛远，台蒋政府对大陈岛守军的物资补给与战力维持，抵不上日常与战斗的消耗，再加上解放军的米格-15战斗机，已

经夺取了大陈岛的空中优势，艾森豪威尔便向台蒋政府建议：应从大陈岛撤退。

蒋介石虽然不满美国盟友的建议，但面对大陈岛岌岌可危的形势，蒋介石最后只得痛下决心，主动撤离大陈岛。大陈岛撤除军民，被定名为“金刚计划”，具体的负责人就是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

1955年2月7日，美军第七舰队132艘、台湾地区27艘舰船组成混合船队抵大陈海域，开始了全岛的撤退工作。

“金刚”计划基本完成后，2月10日早晨，“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搭飞机来到大陈岛。他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共同巡视防卫司令部，孙立人看到营房前种的一株茶花后，他决定把它挖回台北。这株茶花也成了整场大撤退行动中，唯一参与的植物。

孙立人在政治的对抗中，竟连一株茶花都不给对岸留下，可以想见，他对蒋氏政权之忠心程度，可是蒋介石却对孙立人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并不领情，5月28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孙立人，他用严厉的语气说：“你以后少跟政客们来往。”

孙立人回答说：“是的，我一生最讨厌玩政治和与政客打交道。”

蒋介石说：“这次我要把你给孤立起来。”

1954年，美国普渡大学决定授孙立人予荣誉博士学位，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让孙立人去美国，而普渡学校有个硬性规定，那就是荣誉博士，必须本人到学校来领取才有效，孙立人没有办法，只得将其作为终生憾事了。

潘德辉原本是军统出身，入缅作战时，他被派到孙立人身边，一开始是负责监视孙立人的一举一动，可是缅战打完，潘德辉却成了孙立人最忠实的追随者。

潘德辉刚到台湾地区，便被抓了起来，他在黑牢中度过五年后，为了给孙立人罗织罪名，在1955年端午节前夕，他突被提到台北南所，“国防部”高级法官毛惕园找潘德辉谈话，并让他出面指认孙立人搞兵变，想造反。

潘德辉在《半世追随一生被泽》中，记下了当时的经过：

毛人凤不愧是搞审问的老手，他手指壁上悬挂的肖像问我他是谁？我答：领袖。哪里人？浙江，你是哪里人？浙江。你是军校学生吗？是。孙立人是何处人？

安徽。

毛惕园问：听说孙立人对你并不好且时常责骂你是吗？

潘德辉答：不错，这是因为我有时太随便而受责。

毛惕园继续启发：你是浙江人，军校学生又是自己同志，应该好好与我们合作，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段将此案作一结束，好向海外侨胞及友邦作一个交代才是呀。

潘德辉答：我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为国家民族牺牲性命在所不惜，但我绝不会昧着良心说不实的话，听先生的口音好像是两湖人，而又姓毛，如今贵同乡同宗高居北京主席，为何不去追随，既是同乡又是同宗……

可是潘德辉话尚未完即被毛惕园厉声打断了，谈话后他被送到如狗笼般的特制囚牢折腾了四个多月，才送回桃园看守所。一直到1958年秋才让我恢复自由……

孙立人将军获释后，潘德辉立即去看望。白发苍苍的孙立人望着老部下，说："潘德辉，你怎么这样傻！"

潘德辉一阵爽朗地大笑，接着回答："我就是这样傻！"

毛惕园在潘德辉这里找不到突破口，他便将突破口转到了郭廷亮身上。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的部属，在步兵学校服务的郭廷亮无端被捕。郭廷亮，云南河西人，时年34岁。他在1939年考入税警总团训练所，毕业后留所任教育班长等职，成为当时任税警团团长的孙立人的下级。

孙立人赴缅甸作战，郭廷亮即追随孙立人参加了远征军，国民党在大陆溃撤台岛之后，郭廷亮经上海与原属新一军的官兵们溃撤到了台湾地区。并成为孙立人陆军总司令部搜索组大队长、陆军步兵学校少校教官等职。

郭廷亮被捕，遭到严刑审讯，可是郭廷亮咬紧牙关，不仅不承认自己是"匪谍"，更是拒绝指控孙立人为"兵变案"之主谋。

毛惕园拿郭廷亮没有办法，毛人凤为了完成"上峰"交派下来的任务，他决定亲自审问郭廷亮。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匪谍'，就不会牵连到孙立人，如果你不承

认，那么孙立人才真正危险！”

郭廷亮自然斗不过毛人凤，他写下自白书，违心承认自己是“匪谍”。

随后，蒋介石下令由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吴忠信九人组成调查委员会，陈诚任主任，负责调查孙立人兵变案。

在沈克勤编著的《孙立人传》中，曾经这样记录下了孙立人坦然受审的具体情况：

1955年9月19日，询问地点被定在阳明山第一宾馆，首先调查委员会将全部取证文件，交给前来接受询问的孙立人阅览，孙立人对这些“莫须有”的证词，并无多大兴趣，草草将其翻阅一遍后，便到了中午，陈诚设宴请诸人午餐后，孙立人即在宾馆中稍事休息。

孙立人在午睡时，鼾声大作，当时陈诚和副秘书长黄伯度正在商议询问要点，听到孙立人的鼾声，黄伯度说：“孙立人不是大奸就是大愚，调查委员会马上就要开始审判他，在此生死关头，他还呼呼睡大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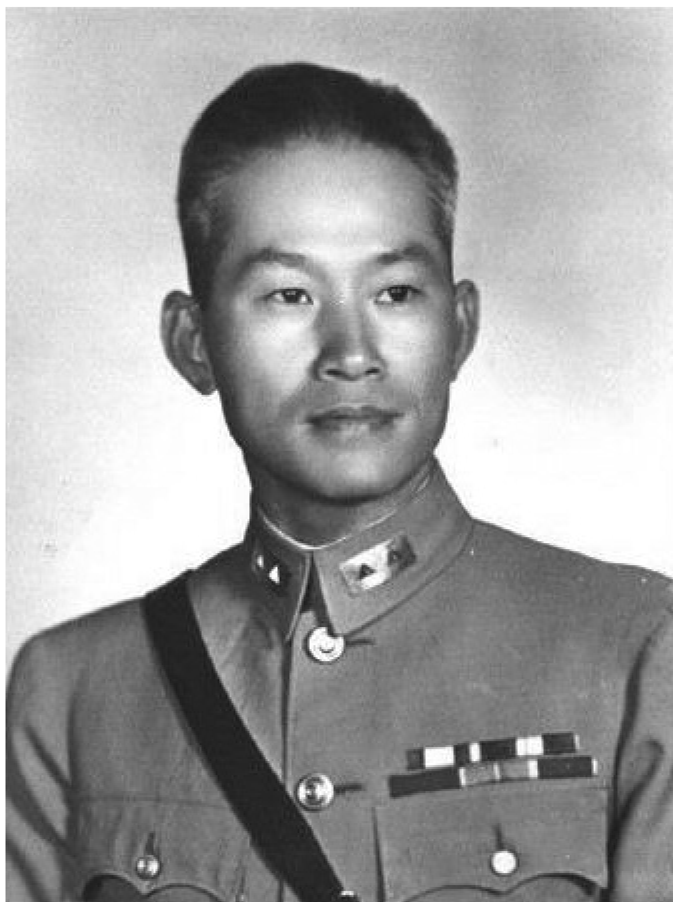
陈诚说：“我们可不要冤枉了孙立人，如果他做了亏心的事儿，怎么会在接受大审之前，呼呼大睡，说他是大奸大愚，我看不像，不像！”

审问案情时，许世英（“总统府”资政，曾经在北洋内阁任过总理）指责孙立人：“你怎么这样糊涂，做出这种不忠不义之事？”

孙立人闻言，勃然变色，慷慨陈词：“我从小立志从军救国，自入军旅之后，无时不以精忠报国为念……倘我心生不轨，不在三十八年大陆‘沉沦’之时，阻止中央政府撤退来台，其后我掌握兵权，不兴兵作乱，及至调任参军长后，手无一兵一卒，说我这时候要联络下级军官兵变，三尺孩童也不会做此傻事。我孙立人一生带兵打仗，稍知礼法，在座诸公，能会相信我愚蠢至此？果真我有任何不轨行动，愿守国法制裁，随时可以枪毙我！”

孙立人面对诬陷之词，神情激动，他解开上衣，指着身上的刀伤、枪伤和弹片伤，并告诉九人小组，军人的职责就是上阵杀敌，一个置生死于不顾的将军，能否

会搞兵变，只要稍微想一下，都会明白。



孙立人将军

王宠惠（法学家，曾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问话结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本委员会迄尚未经发现足以证明孙将军处于主谋地位之直接证明……本委员不作孙将军为变乱行动主谋之认定。"

但这件案子，是蒋介石亲自交办，不能不办。虽然证据无法显示孙立人是兵变案的主谋，但他却对下属有"未适当防范，有失查之责"！

随后，陈诚对孙立人通报了郭廷亮"匪谍案"的全部过程——解放军占领沈阳前夕，"X匪"白经武便"策反"了郭廷亮，郭廷亮带着潜伏的任务，来到台岛，并伺机在

孙立人手下，准备完成两件任务：一是制造国民党军队大规模之叛乱；二是等解放军进攻台湾地区时进行接应。

1954年8月之后，郭廷亮便积极进行 “匪谍”活动。孙立人改任“总统府”参军长之前，曾令“陆军总司令部”第5署督训组中校组长江云锦，要在每一团中指定第4军官训练班，军衔最高的同学作为联络人，以利今后同学间的联系工作，江云锦没有把这件事办好，孙立人就指定郭廷亮担负联络工作。

郭廷亮假传孙立人的兵谏“圣旨”，他利用联系第4军官训练班毕业同学的机会，让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刺杀蒋介石。并举行“兵变”。

郭廷亮在供词中称：“他（指孙立人）有他的意图，就是利用我联络部队学生，造成一股势力，作为他兵谏的本钱；我有我的意图，就是利用他的关系，达成我兵运工作和刺蒋的任务。”

孙立人至此，竟成了“兵变案”的主角。随后，他被软禁在家中，成为了另一个“张学良式”的囚徒。孙立人百口莫辩，于1995年8月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可是孙立人的辞呈屡次交上去，屡次被打回来，直到修改了六次，当局才满意，可是其内容，已经不是孙立人的原意，他本不愿签字，可是黄伯度跟孙立人谈，如果他再不签字，孙立人被抓的三百名手下，都将性命不保，一向爱护手下的孙立人想想受到株连，已经命在旦夕的三百名手下，他最后只得违心落笔。

孙立人被软禁两个月后，面对社会上的猜忌，蒋介石才不甘心地公布了孙立人的这份“辞职信”：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言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材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局，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30年，尽忠效死，唯恐不及，乃党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切反省，职实有错，应向钧座坦率自陈，请予惩处……

接下来，孙立人讲了他做错的两件事，一是未查郭廷亮为“匪谍”，二是自己想

搞小组织，却被“匪谍”利用，差点“贻祸国家”。

在辞职书的最后，孙立人这样写道：上述二事，均应接受钧应严厉制裁……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1955年8月20日，“台蒋政府”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匪”等罪名，革除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孙立人接下来，在当局“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开始了被软禁的生活。

2．千古，十全九美在人间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蒋介石心知肚明，美国人很赏识孙立人，再加上孙立人的战功，如果他将事情做绝，恐怕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故此，孙立人就被软禁了起来。蒋介石本以为时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刃，能帮他完场自己完不成的事情，可是事与愿违，在岁月面前，不仅他天年不永，而且他的继任者蒋经国也一命不在，孙立人却享年92岁，最后晚于两蒋病逝于台中寓所。

孙立人被蒋介石整饬，直接受到牵连的有3百多名青年军官。当年，孙立人的旧部属李鸿、陈鸣人、彭克立等人来台后，即被逮捕，孙立人面见蒋介石，并以身家性命相保，可是蒋介石仍然不肯放人。

孙立人被诬陷为兵变案的主谋，而关在桃园龙潭监狱（卧龙山庄），一直不审不问的李鸿等人才被想起，台蒋当局，本意是想让李鸿承认自己为“匪谍”，然后将孙立人拉下马，可是李鸿等人拒不承认“乌有”的罪名，直到1966年，台湾地区的军事法庭才以弃守长春的罪名，判处李鸿无期徒刑，后减刑为25年。

陈鸣人亦被拘禁25年，1984年2月，病逝于台北家中；彭克立被释放的日子是1975年7月14日，被囚的日子也是整整25年。彭克立在1988年4月，向当局提出了回大陆探亲的申请，在获得批准后，便于4月中旬，回到了故乡长沙。

孙立人被整饬后，蒋介石即下令，命孙立人搬出台北南昌街“陆军总司令”官邸，迁到台北近郊新店居住，但是新店靠山，湿气较大，孙立人还得自己付房屋的租金，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可不可以住进台中自己买的房子。台湾地区的情治局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孙立人在台中的房子是一栋独立住宅，适合隔离和监视，便同意了孙立人的要求。

孙立人携着家人，搬回了台中向上路西区1段18号那栋日式住房。可是在搬家的途中，孙立人获得的所有奖章，竟全部丢失了。

孙立人在台中的日式住房非常简朴，根据到孙家玩耍的同学回忆，孙家有几只用象腿做成的椅子（用在缅甸死去的大象的腿骨做成），他们连碰都不敢碰，还有一点，就是孙家有大量的工程学和军事学方面的藏书，除此之外，孙家的陈设与其他台中市的普通居民并无二致。

孙家有来自“情报局”和“安全局”的人员负责看守，他们采取三班制，对孙立人进行严密监视。在孙家围墙之外的斜对面，“情报局”加盖了一栋三层小楼，楼上住的监视人员，还架着一挺机关枪，以防有人来救孙立人脱离软禁的生活。

孙立人想要出门，必须报请“情报局”批准，得到允许后，他会乘坐一辆黑色的军用轿车走在前面，而后面的情报人员，则会坐在一辆吉普车内寸步不离地监视。

当年“情报局”派往孙家的厨子身上，都藏有利刃，他们接到的指示是：一旦有人想救孙立人，立刻将其干掉。

孙立人的原配名叫龚夕涛，第二个太太名叫张晶英，可是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张晶英来到台湾地区后，虽然醉心于佛学，但对无人继承孙家香火之事，也是甚为挂牵，在张晶英的穿针引线之下，孙立人在1952年娶了自己的第三位妻子——张美英。

淳朴善良的张美英是台湾高雄人，当时应征为孙立人家的家庭护士，1955年，蒋介石凭手中的权力，将孙立人变成了“张学良第二”后，张美英就开始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孙立人一生廉洁，并无多少积蓄，即使在未被整饬之前，有老部下前来探望，如果要加几道菜的话，也只有咸蛋、皮蛋和炒蛋，部下们都在私下称其为“三弹轰炸”。



孙立人和夫人

孙立人被软禁在家后，也没有工资可以让他安然度日。一开始，张美英就开始变卖首饰度日，可是首饰终有卖光的时候，又加之张美英为孙家生了两儿两女，生活更加捉襟见肘。随着四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上学的学费对于毫无进项的孙立人来说就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

孙立人被软禁后，不仅工资待遇全无，即使一般军人子弟，上学读书学费减免的政策也无法被惠及。张晶英便请孙立人以前的秘书萧一苇，给蒋介石写信，蒋介石这才从“总统”特支费当中，每个月拨给孙家一定的生活费。

孙立人戎马倥偬前半生，过了五十岁才儿女满堂，因此他决定以“中国安定，天下太平”为儿女命名。即：长女孙中平、长子孙安平、次子孙天平和次女孙太平。

经过孙立人和夫人的悉心培养，孙家两子两女皆有成就，孙立人毕业于清华，故此，他对子女读书考学，有一个近乎执拗的要求，那就是读清华。长女孙中平毕

业于清华（位于台湾地区新竹市的清华大学，以下同略）核子工程系，美国康乃尔大学材料工程博士，现任职于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

长子孙安平1955年生，清华大学物理学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材料工程硕士。现任职于美国硅谷。



孙立人将军子女家祭：（自左至右）安平、天平、太平、中平。

次子孙天平，出生于1956年，毕业于辅大数学系，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硕士。现任职于台资企业汉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职务为区域总监。

小女孙太平，1958年生，毕业于清华化学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现任职于杜克大学，职务为教授。

孙立人的四个子女，有三个都是清华毕业，经过孙立人的教育，孙家的四个孩子，皆正派规矩，身上绝无纨绔子弟的作风。孙立人后来曾经写过回忆录，并在台湾的一家报纸上连载，他得到了200万新台币的稿费，这笔巨款，本来对他的生活

应有很大的补益，但都被孙立人作为奖学金和助学金，赠给了清华大学。

根据孙天平先生回忆：当年监视孙立人的情报人员，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的时候，孙家的电话，皆被情报人员安了分机，孙立人接的每一个电话，都逃不过他们的监听，有时候孙立人午睡或没在电话机旁，电话铃响起，负责监听的情报人员，都会拿起电话，厉声地问："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事？"

以至于给孙天平打电话的同学，都一个劲地跟他抱怨，你父亲的口气好凶啊。更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孙天平的同学，一旦上门，便会被情报人员问个不停，上门找孙天平玩耍的朋友越来越少，他度过了一个相当孤独的童年。

孙立人不仅从小要孩子们背诵《古文观止》，而且对于孙天平等孩子的管教也非常严格，根据他回忆，吃饭的时候，拿饭碗的一项，都有一定的规矩，即：拿筷子的姿势要像"凤点头"，拿碗的正确姿势是，必须大拇指扣住碗边，其他四指并拢，扶住碗底一圈，要像"龙吐珠"。

孙天平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优秀，可一旦有同学说他父亲是"兵变案"的主谋，他就会冲上去和人打架。



孙立人将军与徐复观教授的合影

校方将孙天平爱打架的事儿告诉了孙立人，孙天平回家后，便被父亲叫进了书房，孙天平本以为一定会挨揍，可是孙立人却这样说：一个男人要成功，必须要学会忍耐。拳头、武力是最后的方式，要学会理性沟通。孙立人怕孙天平不懂这些道理，他还给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路边有野狗对你叫，你会怎么做？是叫回去，咬回去，还是不理它？对于有的事，不需要回应。

孙天平后来也就理解了父亲，也懂得了该如何处理社会上关于父亲的流言蜚语了。

1959年，孙立人大哥孙同人在屏东去世，可是当局却不允许孙立人前去探望，孙立人只好看着自己的大哥送给自己的砚台，也只有默默流泪的份了。

后来，孙立人的长子安平硕士毕业，幺女在大学毕业时，孙立人想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可是情报部门却对其约法三章：不许上台说话，不许带花，不许与任何人交谈！

张美英为了让家人生活得宽绰一些，她决定在家里养来亨鸡，孙立人虽然年逾花甲，也时常需要为生活操心，他亲自在院子里，搭建了鸡棚，并让监视他的情报人员，帮他购得来亨鸡的鸡仔，经过一番饲养，来亨鸡长大产蛋，张美英每天早晨骑上自行车，负责将鸡蛋到集市场上去贩卖。

“将军蛋”虽然风靡一时，但随着养鸡户的增多，饲料价格上涨，卖蛋收入，入不抵出，再加上张美英租不起摊位，竟被警察驱离了好几次。孙立人也就放弃了养鸡生蛋的生意。

孙立人接下来又做起了养金丝鸟的生意。可是这种名贵的观赏鸟，并没有给孙家带来什么收入。随着孙家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费用也在一天天的增多，孙立人还在后院搭建了一座饲养兰花的花棚。有一段时间，孙立人发现家后方就是教会，他们就开始种植圣诞红，卖给信教的教友，赚一些零用钱，当然养植兰花和圣诞红，

都不如孙立人种植“将军玫瑰”出名，孙立人种植的“将军玫瑰”，因为培育精心，用得又是亲戚邮寄来的美国种子，故此，在市场上很俏销。

但玫瑰一年只开一次花，一时的收入，无法解决一年的花费，孙立人便卖掉了阳明山的一块地（此地是梁实秋送给孙立人的），并花钱在台中大坑买了六甲（一甲约合14.5亩）山地，还在山上栽种了荔枝、龙眼、柠檬等热带果树。本来这地方应该叫东山果园，可是孙克刚提醒孙立人，为避免当局认为孙立人要“东山再起”，就叫这地方大坑果园了。

孙立人到果园劳动的时候，便在两名参谋、两名副官和多名安全人员的监护下，坐着那辆当局配给他的黑色玉龙将级座车，直奔大坑果园，来到果园，他和张美英头顶斗笠，手持锄头，完完全全地当起了“果农”。虽然孙立人的工作很辛苦，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中忙碌。但他现在“不需摧眉折腰事权贵，终于能够开心颜”了。

孙立人的作息时间非常有规律，因为住宅的场地有限，他每天早起，就在院子里站着，用手模仿游泳和高尔夫挥杆的动作进行晨练。他早晨喝牛奶的时候，饮罢牛奶，还一定倒半杯白开水将牛奶瓶涮涮，接着把带着牛奶味的开水也喝完。孙立人在缅甸战场上养成的喝牛奶习惯，一直到他晚年，也没有改变。

随着两蒋时代的结束，台湾地区给孙立人“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1988年，李登辉掌权后，孙立人的义子揭钧教授，为了给孙立人“兵变”冤案平反，他上书当时的 “行政院长”俞国华与“国防部长”郑为元，要求恢复孙立人的自由。

经过孙立人旧部的多方奔走，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部长”郑为元亲自来到孙立人家中，向他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一切行动、言论的自由”。当有记者问及孙立人对“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时，孙立人反问：“从未反过，何平之有？”

33年的软禁生活，让孙立人这样一代名将成了鬓苍苍、齿摇摇的垂暮老者。关于孙立人被囚原因，有蒋介石构陷说；有美国后台拆崩说；还有同僚不容说。其实还有一个更“靠谱”的说法，那就是：蒋介石要搬开孙立人这块石头，给蒋经国的“总

统”之路排障清路。

因为蒋经国和孙立人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1950年的时候，蒋经国正在部队里推进政工工作，可是孙立人却利用“陆军总司令”的职权，处处给蒋经国设限，不让他在军队中推行“政工挂帅”那一套。

而标榜民主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也来凑热闹，他不但支持孙立人的观点，主张军队“国家化”，甚至要蒋介石取消“政治部”。蒋介石让蒋经国在军队中推行政工制度，他就是想突出政治，控制军事，并牢牢地掌握“枪杆子”，孙立人借着美国顾问之手，阻挡蒋介石掌握军权之路，这不是“反叛”，这不是“谋逆”又是什么？

随着“台美”关系恢复，孙立人只能被蒋介石无情地“一脚踢开”，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海峡两岸一旦远离了战火，等待孙立人这位“鹰派”将军的下场，便是33年囚囿生活。

齐学启将军当年曾任远征军的副师长，因在一次入缅作战中，重伤被俘，后宁死不降，而惨遭杀害，抗战胜利后，孙立人通过国际组织，将齐学启的遗骨从缅甸运回国内，并将其葬于风景如画的岳麓山公墓，1989年，孙立人听说齐学启的墓地在运动中，遭到毁损，他便筹集了6000美元，委托旧部前往长沙，历时一年，并将齐学启墓修缮完毕。

孙立人还亲笔为齐学启书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九载同窗，同笔砚，同起居，情逾手足。彪勋震蛮域，威名扬环宇，君酬壮志气，功垂青史，湘水湘云存浩气。下联是：十年共事，共生死，共患难，待若股肱，杀身惊天地，成功泣鬼神，我迎忠骨，泪洒红叶，秋风秋雨悼忠魂。

孙立人还给齐学启将军的亲人，写了一封信：令尊与立人情同手足，不幸为国捐躯，虽已名垂青史，而在生交谊四十余年，未曾暂去于心。今者墓道重新，或者可以稍慰在天之灵，惜乎衰迈，未能亲临一拜，为阙然耳。

孙天平在墓地建成之日，他代表父亲，并与孙立人义子揭钧还有7名远征军的老兵，30多名远征军老兵的后裔，以及齐学启将军的亲人，共同参加了齐学启将军

墓碑揭牌仪式。

孙天平动情地说：今天能在齐将军墓前祭拜，是替父亲完成了一个几十年的心愿。

孙立人在晚年的时候，一直想回安徽庐江县祭祖。他常说：“为人子不能亲拜祖墓，算不得是人！”

1988年，孙的旧属潘德辉回乡探亲，孙立人委托他到安徽庐江代为祭祖。潘德辉代孙立人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并将祭祖的过程，用照相机拍成照片带回。孙立人看到照片，激动地要向潘行跪拜大礼。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百年，倏忽而过。1990年孙立人病逝于台中寓所，享寿92岁，孙立人公祭仪式在台中殡仪馆举行，不仅宋美龄敬献了花圈，陶百川书写了“忠义昭著、公道伸张”个大字，当时祭拜者新一军旧部，第四军训班、幼年兵总队官兵及学员生，总数达一万余人，场面极其隆重悲戚。当时便有人说，恐怕以后，在台湾地区，不会有这么多人，再为某个人出席如此隆重的葬礼了。

由于孙立人“兵变案”的当事人纷纷故去，台岛当局对此案也是讳莫如深，故此孙立人“兵变”案，至今也没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孙立人将军故居

根据台湾地区近日出版的《孙立人访谈录》披露，孙立人过世前，曾喃喃道出“我对得起国家”……

孙立人去世后，灵柩暂厝在自家果园内，准备以后外迁。按照孙天平的想法，他打算将父亲的遗骨迁往安徽庐江老家安葬……

李敖先生在《孙立人研究》的开篇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

孙立人将军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将领，他的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为抵御外侮，投笔从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终因身隶蒋介石政权之中，毕竟有他发展的上限，忌才多疑的蒋介石，最后以冤案软禁了他，于今三十三年了……

孙立人案的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立人非黄埔系又比黄埔系杰出，基本上，就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有国际性的地位，极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支持，更引起蒋介石和黄埔系军头的猜忌，蒋介石在情况紧急时，拉拢老美，不得不用孙立人，一旦情况稍稳，就要把孙拉下马矣，于是冤

案出矣……

由于这本记录，我们可以把孙立人案完成基本的轮廓。在这一轮廓下，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这一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自己。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意旨”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

在方宁（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的方宁，曾追随过孙立人将军）著《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中，作者曾经在孙立人兵变案发生后一年之中，走访了一百多位高层人物，征求他们对此案的看法：

吴国桢认为：孙立人是被特务陷害。

唐守治中将这样说：（孙立人案）是“政府”反谍报组布置的，孙将军冤枉。

张少杰中将和孙克刚少将都认定：蒋家特务陷害孙将军，其坑人之罪恶，令人发指。

方宁采访的人士一致认为，孙立人兵变案是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布置的假案，孙立人先生根本就从未有过反叛两蒋的任何行动。

明朝的大将袁崇焕在《哭熊经略》一诗中，曾这样写道：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其实功到雄奇本无罪，而有罪的却是容不下雄奇之功的政府和制度而已。

江南（刘宜良）在《蒋经国传》中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他和他的同僚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

如果翻开古书，找到关于凤凰的记载，便会发现：凤凰，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凤凰，高飞于天，特立独行，因为天生的性格就注定，它就是一种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神鸟。

日军自侵略大中华以来，神州大地之上，可以说处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就在“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时代，孙立人就好像是一把出鞘利剑，在缅甸的战场上，杀得日军望风而逃，缅甸抗日的胜利，恰是雾海迷航的灯塔，其闪

烁的光剑，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谣言，击碎了日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想，重新构建了国人抗日必胜的信心。

孙立人并非完人，他情绪激动时，也会经常用口头禅“他妈的”骂人；他的孤傲，也让一些人觉得难以共事，另外孙立人在其他小方面或偶有微瑕。但这都不能妨碍他创建一番事业，孙立人能建非常之功，必有超凡之能，而超越平凡之人，必有易于常人的成长经历。

孙立人幼年及冠，鼻直口方，剑眉星目，顾盼之间，大有“周瑜”之形貌神采；清华招生，全省大考，一举夺冠，当比唐代17岁即中状元的贾至。孙立人清华毕业，留学海外，投笔从戎，到弗吉尼亚军校深造，亦在步汉代班超的后尘。

孙立人组建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中，与敌反复争夺，让日军苏州河战场血流成河，若论其勇可媲在长坂坡前显神威的赵子龙。

孙立人入缅作战，他面对不利的形式，西去印度，巧妙地保存实力，可以说深得孙武用兵“强而避之”的神髓。

孙立人在蓝姆迦苦练精兵，增强实力，在学习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随后，孙立人率领中国驻印军，穿插迂回，断敌后路，勤于用计，谋略争不亚于孔明；中国驻印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对日军展开了秋风扫落叶似的进攻，取胜之勇，不逊秦朝时候的名将蒙恬。

但孙立人并没有认清形势，率新一军进军东北，以至于全军覆没，其过程难比走麦城的关羽；扎营凤山，苦练精兵，阻碍解放战争的进程，其愚忠又让北齐一代名将斛律光汗颜。

孙立人被蒋介石无端整饬，被囚33年，他以徽骆驼的精神，顽强地挺了下来，这些年，他应该想了很多，看明白了官场，也懂得了政治。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孙立人含冤被囚，却至晚年也不肯出来揭露两蒋父子的暴行。

孙立人的一生可以用五句诗来形容，他的幼年是：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他的青年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的壮年是：铁马秋风大散关，不斩倭寇不复还；他的中年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而到了晚年：只能是若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成功有很多种，当时担任总政战部主任的张彝鼎指出："孙立人的个性太强，作为一个武将，能和古代的郭子仪或民国的徐永昌那样，随和一点，会比较好……"

可是孙立人偏偏不要这种世俗的所谓成功，他要做"功高无二，略不世出"的韩信，他要做"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的冉魏，他要做"破匈如披靡，平生无败绩"的李牧。这种超越凡俗的成功，是不是才叫真正的大成功？

孙立人将军为帅哥、为学霸、为军神、为"囚徒"、为天地间的"立人"，他虽然作古，但他留给我们学习和思考的东西很多，值得捡拾，更值得我们去敛收。

当吾国遭受异族侵略，当吾家即将分拆离析，我辈青年应当存天地正义，怀不屈精神，提七尺锐气，破十万甲兵，成国之栋梁，垂范而后世！

热情无法沸腾一壶老酒，但却可助张命运之羽翼；勇敢难以让风云变色，但却能延续国祚之脉搏；让我们当血为墨，削骨为笔，使皮为纸，书写人生，并聚蚁力为千钧，化泪泣为江流，迎阳春夏日之万花盛开，让金秋冬风之旌旗猎猎，展个没有瑕疵的黎明……

参考书目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作者：郑洞国 团结出版社 2008年

《杜聿明传》作者：汪中华 唐坚 哈尔滨出版社 1997年12月

《突破缅北的鹰》作者：萨苏 文汇出版社 2012年01月

《孙立人言论选集》主编 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研究 2000年

《孙立人传（上、下）》 作者：沈克勤 台北学生书局 2005年增订版

《孙立人将军传》作者： 薛庆煜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孙立人研究》作者：李敖 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11月

《纪念孙立人文集》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02月

《缅甸荡寇志》作者： 孙克刚 上海时代书局 1946年

《小兵之父——孙立人将军侧记》作者：揭钧 跃升出版社 1991年

《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作者：戴广德 黄山书社 1995年

《军碑1942年》作者：王楚英 京华出版社出版 2009-6-1

《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作者：方宁 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 1987年4月